卓别林自传

喜剧人生

卓别林

安徽人民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卓别林自传

喜剧人生

卓别林

安徽人民出版社

卓别林自传

喜剧人生

卓别林

安徽人民出版社

译者序

卓别林，世界电影史上一个绕不过的名字，当之无愧的“喜剧之王”。就像他的电影一样，卓别林的一生也是跌宕起伏，充满戏剧性的。

他塑造的那个流浪汉形象，穿着一条鼓囊囊的裤子和一双大皮鞋，头戴圆礼帽，嘴上长着一撮翘胡子，拿着手杖，像鸭子一样走路……这个可爱又可笑的小丑形象，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喜爱。而这个天真、幽默、乐观、随遇而安的形象的出现，与卓别林早年的悲苦经历不无关系。

卓别林生于英国，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开始分居。七岁时，他被送入一家孤儿院，几周后又被送入一所收养孤儿的学校。不久，他离开孤儿学校，完全成了一名流浪儿。他当过报童、店员、小贩、佣人、吹玻璃的小工人，还在游艺场扫过地。

1913年，卓别林随哑剧团去美国演出，被美国导演看中，从此开始了电影生涯。1914年，在影片《阵雨之间》中，卓别林第一次向观众展现了著名的流浪汉形象，这一形象成为卓别林喜剧片的标志，风靡欧美几十年。

卓别林奠定了现代喜剧电影的基础。他一生共拍摄了八十余部喜剧片，其代表作有《淘金记》《城市之光》《摩登时代》《大独裁者》等。1972年，卓别林被授予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因为他“在本世纪为电影艺术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他还获得了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时间最长的起立致敬，当时，会场内所有观众整整起立鼓掌了五分钟。

卓别林是二十世纪最引人注目的文化偶像之一。1975年3月9日，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授予卓别林不列颠帝国勋章，从此人们开始称呼卓别林为爵士。

本书作为卓别林的亲笔自传，细致入微地描绘了他的一生，包括辉煌的事业历程，也包括被某些人诟病的私生活；既有具体事务的记录，也有内心的喜怒哀乐和深层思考。

作者的语言十分生动幽默，因译者水平有限，恐未能将原作中诸多令人会心一笑的细节之处一一展现，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希望读者能够从译文中略微领略到原作的风采。译文中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真诚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序　幕

在威斯敏斯特桥还没有通车的时候，肯宁顿路仅仅是一条很窄的小路。从桥头那儿开出一条新路直通布赖顿区，已经是1750年之后的事情了。我的童年几乎都是在肯宁顿路上消磨的。新路开通之后，那里出现了一些有着临街阳台的高档房屋，居民们没准还从那些围着铁栏杆的阳台上看见过乘着马车亲临布赖顿区的乔治四世。

到十九世纪中叶，那些房子大多都已经变成住房和公寓，论间出租，十分残破。不过其中一些住着医生、富商和歌舞剧名演员的房子还是原样。在肯宁顿路上，每个周日上午，你都可以看到歌舞剧演员坐着自家的马车去兜风。他们可以一路奔驰十多里，甚至到达诺伍德或默顿，回途时再边走边停，光顾各种酒馆。

那时我十二岁，经常站在肯宁顿路的巨盅酒馆外，乐此不疲的看那些声名显赫的先生们从他们的马车上跳下，走进那个聚集了歌舞剧名演员的酒馆休息室。演员们真是风头正劲，格子花样的衣服穿在身上，灰色的礼帽戴在头顶，钻戒和领带上的别针闪闪发光。午后两点，这些顾客全都会走出酒馆，因为那儿要关门打烊了。他们在开一会儿玩笑后彼此告别。在这时有的人会故意摆出一副姿态，那样子挺惹人笑的。我觉得这非常有趣，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看。

就像太阳躲进云雾里一样，所有人都走了，那之后，我才向肯宁顿路后面走去，走向那排破旧荒凉的房子，走到波纳尔弄三号，走上那条通向我们住的顶楼的楼梯，它就像要倒一样在不停摇晃。进了屋子，桶里的脏水和破烂的衣物让人一见就觉得泄气，空气也很污浊。这屋子最多也就十二英尺见方，脏乱的盆和茶杯摆满了墙角的桌子，被母亲漆成白色的旧铁床刚好放在低矮的墙根那。一个小火炉摆在床和窗户中间，床脚那儿放着一张扶手椅改装成的单人床。这就是我哥哥雪尼睡觉的地方。他那时去出海了。

母亲不知什么原因没收拾屋子，所以屋子里的氛围在那个周日更使人压抑。母亲是个性格开朗的人，也很有情致，那时又不满三十七岁，还年轻。以前，她总是把这简陋的顶楼整理得干干净净，看起来

十分舒适。尤其在冬天的周日，我一醒来就能看见收拾得很整齐的小屋子、小火炉里熊熊燃烧的火和炉台上冒着热气的水壶。在母亲乐滋滋地在我身边忙碌的时候，这个屋子总让人感觉很舒服，开水倒进陶制茶壶的声音温柔而深沉，我就这样在屋里看着每周的滑稽连环画。这宁静的周日早晨的一切，都是我所享受到的乐趣。

可是，她在那个周日却没精打采地望着窗外发呆。她的沉默寡言已经持续三天了，一直坐在那个窗口，看起来忧心忡忡。她的烦恼我是知道的。雪尼出海后已经两个多月没给我们来信了，而那架维持家里生计的缝纫机也被收去了，因为没钱交分期租金（这已经是常事了）。那可是母亲租来拼命做活以挣点儿钱的工具。更别提我每星期教跳舞能挣的五个先令也突然没了，这些钱都是用来贴补家用的。

不过，由于我们的生活中常常面临经济困境，所以我对这些并不大留意。再说，还是个孩子的我很容易忘记家中这些烦人的琐事。我照例放学后回家做点杂活，然后就跑到麦卡西家去打发整个傍晚，只想躲开家里那个顶楼，它真是太让人觉得愁苦了。

麦卡西夫妇是母亲在歌舞剧团唱歌的时候认识的，他们是老朋友了。这家人过着在我们看来相当富足的生活。他们住着一套租来的舒适公寓，就坐落在肯宁顿路较为幽静的路段。麦卡西夫妇的儿子沃利是我的玩伴，我每次和他玩到天黑之后，总会被留下来吃点心，就这样在他们家吃了很多次晚饭。每当麦卡西太太问起最近怎么没有见到我母亲，我就找点借口遮掩过去——母亲自从生活窘迫后，就很少能和她剧团里的朋友相聚了。

当然，我也有待在自己家里的时候，这时就能享受到我觉得十分美味的茶点：一壶茶，几片用烤肉的油煎的面包。之后母亲还会给我读上一个小时的书，她的书读得那么好，让我觉得和她在一起是那么快乐，觉得在家里待着比去麦卡西家更有意思。

回过头来说那天，我刚走进房间，母亲就转过身来盯着我，满脸责备。我被她的样子吓了一跳。她的眼神里写满了痛苦和煎熬，脸庞瘦削，模样憔悴。一种难以名状的哀伤袭上我的心头，我想留在家里陪陪母亲，却又想抛开家中所有烦心的事，于是左右为难，不知怎样才好。这时，母亲愣愣的说了句：“你怎么不去麦卡西家呀？”

我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说：“我想要陪着你。”

她把脸转向窗户，失神地看着外面。“家里没的给你吃了，快去麦卡西家吃你的晚饭吧。”

我听出她语气里的责备，但还是不想走。她却坚持要我去麦卡西家。我只好去了。我走的时候，看见她一个人留在那个破旧的顶楼里，心里十分内疚，但我当时怎么也没料到，噩运在几天之后就要降临在她头上了。

目　录

译者序
序　幕
第　一　章　我的童年岁月
第　二　章　兰贝斯贫民学艺所
第　三　章　八童伶木屐舞蹈班
第　四　章　与贫困作斗争
第　五　章　第一次登上舞台
第　六　章　在卡诺剧团
第　七　章　首次出国
第　八　章　来到美国
第　九　章　与电影开始结缘
第　十　章　奇斯顿影片公司
第十一章　埃山奈影片公司
第十二章　互助影片公司
第十三章　与道格拉斯成为朋友
第十四章　情欲与工作
第十五章　募购公债
第十六章　第一次婚姻
第十七章　重返英国
第十八章　回到美国
第十九章　联美影片公司
第二十章　玛丽昂·戴维斯
第二十一章　《城市之光》
第二十二章　回到故乡伦敦
第二十三章　日本之行
第二十四章　宝莲·高黛
第二十五章　拍摄《大独裁者》
第二十六章　参加集会演讲

第二十七章　认识乌娜
第二十八章　《凡尔杜先生》
第二十九章　在好莱坞最后的时日
第 三 十 章　别了，美国
第三十一章　定居瑞士

第一章　我的童年岁月

1889年4月16日晚八时，我出生在沃尔沃斯区的东街。不久后，我们搬进了三间陈设优雅的房子，坐落在兰贝斯区圣乔治路的西广场。当时的家里的生活是相当安逸的，在我残余的童年记忆里，每天晚上，母亲总让我和比我大四岁的哥哥雪尼一起躺在舒服的床上，怜爱地给我们盖好被子，嘱咐女仆好好照顾我们，然后才去剧院。她每天夜里才从戏院回来，总会在桌上放些好吃的让我和雪尼第二天早晨吃，或是一块那不勒斯式蛋糕，或是几颗糖果。早上她经常睡到很晚，所以前一天晚上会跟我们说好不要太吵。

那时，还不到三十的母亲是戏院的喜剧演员，长得娇小可人。那些认识母亲的人都觉得她当时美艳动人，别有风韵。那时的周日，母亲总会开心地带我们一起出去旅行，穿得漂漂亮亮的一家人信步走在肯宁顿路上，总能引来许多艳羡的目光。

在我眼里，那时候的伦敦，一切都是优雅从容的。那里萌生出我很多情感，萦绕着我很多记忆。有和母亲一起坐在公共马车顶层时，我伸手触摸紫丁香树枝的瞬间，也有那些五彩的车票被扔在人行道上的画面，橘黄的、蓝的、粉红的、绿的，散落在有轨马车和公共马车站附近；有威斯敏斯特桥拐弯处正在做纽扣眼插花的卖花姑娘们，她们灵巧的手指穿梭在亮晶晶的锡箔纸和抖动的羊齿草之间，红扑扑的脸蛋和鲜艳的插花相映成趣，也有那些勾起了我绵长忧伤的玫瑰花，洒过水的花朵散发着香气；有让人心情压抑的星期日，看到脸色苍白的父母拉着孩子走过威斯敏斯特桥，孩子们小心翼翼地抓牢了玩具风车和彩色气球，也有收费一便士的妈妈船轻轻的放下烟囱、驶过桥底的样子。我觉得，这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就是我内心成长的轨迹。

记忆中也有些不寻常的“大事”：有一次母亲带我去水晶宫看杂技，看到熊熊燃烧的火焰中，一个活生生的女人伸出头向观众们微笑，看完表演我们还摸了六便士的彩。再有一次在坎特伯雷杂剧场里，父亲在台上表演，我坐在铺着红丝绒的椅子上看着……

有一天，我突然开始觉得母亲的行为和外面的情景都有些不对

劲。那天她一上午都在外面，回到家里时就十分激动，边哭边埋怨一个叫阿姆斯特朗的人："看看阿姆斯特朗这个畜生！"我被她反常的行为被吓到了，于是开始大哭，母亲只好抱着我哄。几年后，我才知道母亲那天是去法院告父亲不抚养孩子，官司却遇到了麻烦。至于阿姆斯特朗，他是我父亲的律师。

我几乎不记得自己还有个父亲，更不记得他曾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他也是名喜剧演员，长着一双乌黑眼睛的他，性子恬静，热爱思考。母亲说他有着和拿破仑相似的长相和洪亮的嗓门，是公认的优秀演员。那个时候他的薪酬能达到每周四十镑，但母亲却跟他离婚了，唯一的原因是父亲酗酒过度。

那时的歌舞剧演员几乎不可能不喝酒，因为酒是所有的戏院的必备品，有的戏院还附设酒吧间。演员们总会在戏剧落幕后到那儿和客人们对酌。有些戏院的酒吧间甚至比门票还能挣钱。更有些名艺人把大部分收入都花在这儿，以求拿到大量的薪酬。就这样，很多艺人把一生都耗费在酩酊大醉中，父亲亦然。他刚三十七岁，就因饮酒过度而离开人世。

我的外祖父查尔斯·希尔是个做皮匠活的爱尔兰科克郡人，经过很长时间的颠沛流离之后，在伦敦安了家，谋了一份修鞋的生计。

外祖母有一半的吉卜赛血统。这本来是家族内部的秘密，她却经常对外人吹嘘她的娘家有钱。我不到六岁的时候她就过世了。印象中她十分开朗。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她跟外祖父很早就分开了。从凯特姨妈那里听说，是因为外祖父无意中看见外祖母跟其他男人在一起的缘故。可能得益于外祖母家族的遗传吧，我漂亮的妈妈和姨妈，早早的就登上了舞台，离开了家庭。

凯特姨妈是母亲的妹妹，也是个喜剧演员，不过只是我们生活中的小插曲。她很漂亮，火气却很大。来我家的时候，她常常因为母亲的一句话、一件事而大发雷霆，弄得大家都很不愉快。

母亲十八岁的时候，跟一个中年男人私奔到了非洲。后来她常常提到那里的奢华生活，提到她拥有的大农场、雇用的仆人和喂养的马匹。我哥哥雪尼就生在那一年。我听别人说他是爵爷之子，有一笔二千镑的财产等着他继承，只消他等到二十一岁。

不过母亲很快就回了国，嫁给了父亲。在生活极度窘迫的时候，

我总会埋怨母亲，说她不该抛下非洲的幸福生活。她只是报之一笑，说当时太年轻了，做事欠考虑。

我无法了解母亲对父亲有多深的感情，但她提起父亲时的语气并没有满怀怨恨。一说到父亲的事，比如酗酒和打架，母亲有时候会带着同情的口吻。

她和父亲的恋爱始于她去非洲之前，他们俩共同登台演过戏。母亲在十六岁时就成了剧团的主角，在巡演的时候，和那个非洲的中年爵爷相遇并且私奔了。回英国时，她又邂逅了父亲，旧情复燃的两个人结了婚，三年后生了我。

我一岁时父母就离婚了，不知道除了父亲饮酒过度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当时母亲正当走红，每周能挣二十五镑，足够维持一家三个人的生活，所以她没向父亲要抚养费。后来是因为她在事业方面开始走下坡路了，才会去打抚养费的官司。

她早年就经常会嗓子干涩，又容易染上喉炎，一病就是好几个星期。歌又必须要唱，疲劳和疾病让她的声音越来越差。这样一来，她从剧团里接的活也就从渐渐减少到完全没有了。

因为母亲嗓子的缘故，我五岁那年偶然有了第一次登台表演的机会。那时候母亲在奥尔德肖特的俱乐部唱歌，那是一家主要招待士兵的下等戏院，十分脏乱。她不想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就常常带着我去。

有一天，母亲唱歌的时候嗓子突然哑了。我站在条幕后面，听到观众开始起哄，那声音越来越大，母亲也只能被迫离场。她沮丧地走到条幕后面，跟舞台的管事争辩起来，那个人就建议我上台替母亲表演，他说曾经看到我在母亲的朋友面前唱过歌。

记得那时他牵着我走上舞台，向台下一片混乱的观众说明了原委，就让我独自留在那儿了。在缭绕的烟雾中，我对着耀眼的灯光和模糊的脸，开始唱起那首脍炙人口的《杰克·琼斯》：

谁人不知道杰克·琼斯？
你常常见到他在街道上奔驰。
我可不想对他吹毛求疵，
只想要他依然和善如始。

但是，自从他有了很多金子，
就变得那么偏执，
他把他的朋友们全都忘记，
我看着怎么能不生气。
从前，他翻翻《明星报》就可以度日，
如今他读《电讯》读得煞有介事。
哎，自从杰克·琼斯成了有钱的小子，
就变着法子炫耀他那点得意的事。

刚唱到这，观众们都噼里啪啦地往台上扔钱。我赶忙住了口，告诉大家我要拾了钱再唱。台下的人“轰”的一声笑了。舞台的管事走过来，帮我把钱捡到一张手帕里包着。我心里想着他是要把钱占为己有，居然就大声说出来了。而且还紧紧跟着他，看见他把手帕里的钱都给了母亲，我才肯回台上唱歌。观众们被我的举动逗得哈哈大笑。在这样的氛围里我毫不拘谨，对着台下又是说话又是跳舞，还会模仿别人的动作。母亲在我唱完后上台领我回去，这时，台下掌声雷动。那一晚是我表演生涯的开始，也是母亲表演生涯的终结。

命运是不公的，他总是爱戏弄人。母亲的声音再也没有复原。天气日渐寒冷，而我们的家境也日渐窘迫。母亲虽然有些存款，但完全不经花。为了生活，她把珠宝首饰和一些仅有的值钱什物都当了。我们也已经无法支付原来那么多房租了，住的屋子从三间减少到两间，再减少到一间。新家也让人感觉十分灰暗。

也许是因为希望嗓音能够复原吧，母亲信教了。每个周日，她都要到威斯敏斯特桥路的教堂做礼拜。我每次都要坐在那里等她很久，有点按捺不住。母亲在牧师讲话的时候会偷偷掉泪，所以我觉得那演讲应该很是感人的吧。不过她的眼泪又让我有些担心。最让我欢喜的就是牧师手中的《圣经》被合上的时候，因为说教结束后，就只剩下最后的祈祷和唱诗了。

信教后，母亲曾经在剧院里拥有的一片天地就灰飞烟灭，徒留伤悲了，她很少再去看当时的朋友们。从那之后，家里的生活就一直很潦倒。我们度日如年，承受着仿佛没有尽头的贫困和穷苦。当时的工作很难找，对于只会唱歌的母亲来说，就更难找了。运气好的时候她也曾经找到当保姆的活儿，但工作时间短，机会也少。幸好母亲当年

需要自己做戏服，所以做得一手漂亮的针线活，于是她就想出为教友们做衣服的法子，靠这门手艺挣点小钱。但我们一家三个人靠这点钱根本难以度日。而父亲那边每周十先令的抚养费也渐渐没了下文，因为他酗酒过度，导致戏院不再跟他签订长期的合同了。

到这个时候，母亲能卖的东西都已经卖光了。家里唯一值钱的就只有那口箱子里的戏服。但是她一直期待着有一天恢复嗓音，登台演出，所以怎么也不肯卖了它们。我们在母亲找东西的时候偶尔会看见，箱子里有一件绣着金线的戏服在闪闪发光，或者是一头假发，于是就撒着娇要看母亲装扮起来。记忆中有一次她穿戴好之后，俨然一副法官的打扮，用嘶哑的嗓音唱起一支二拍子的轻松愉悦的歌，那是她过去自编自写的走红歌曲：

> 我是一名女法官，
> 公正廉明的好法官。
> 审起案子水平高，
> 判决从来不偏袒。
> 律师们都来看一看
> 我就是要你们惊叹，
> 女孩比你们男人更能干……

一曲歌毕，她舞了起来，那舞姿真是惊为天人。

母亲不但给我们表演自己擅长的歌舞剧，还在我们面前模仿她见过的“正牌剧院”中其他女演员所演的戏。每模仿一部戏，她都要担任好几个角色。

她自始至终都能分出谁才是有真才实学的演员，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感觉。凭着自己的天赋，她对每个演员的演技都能很准确的理解。能做到像她那样深入探讨戏剧的，必须是一个真正热爱戏剧的人。

我们住在奥克利街地下室一间屋子里的时候，有一天的黄昏，我因发烧而睡在床上。雪尼去夜校上学了，只有母亲在我身边。她给我读着《新约》，并且表演着书中的故事，告诉我基督是怎样怜悯穷苦的人和孩子们，她生动的神态和语调真是一般人难以企及。不知道是不是生病的缘故，我觉得当时的母亲十分感伤。从没有第二个人能像

她那样清楚明白的告诉我，耶稣是怎样对待世人的。母亲跟我说，耶稣对普通人是那么仁慈和宽容，他对想要砸死那个有罪女人的暴徒们说："你们中谁是无罪的，就可以先拿起石头砸她。"我被母亲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巴不得自己立刻就死了，好能见到耶稣。可母亲并不支持我。"耶稣教导我们好好生活，"母亲说，"首先要做好在这世上应该做好的事。"

就是那个下午，在那间灰暗的地下室里，母亲把这世上绝无仅有的仁慈光芒带进了我心里。只有在这种光芒的闪耀之下，文学、戏剧中关于爱情、仁慈和人性的主题才显得那么伟大、丰富和熠熠生辉。

生活在下等社会的我们，在说话中常常注意不到语法的错误，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但母亲永远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她时时给我们灌输这样的意识：自己是有身份的人。所以她对我们说的话特别注意，随时随地更正我们的语法错误。

入冬后，雪尼没有御寒的衣物了。母亲只好把自己的一件旧天鹅绒衣服给他改成一件外套。那衣服怎么改都很难看，雪尼忍不住哭着说："同学们看了会怎么想啊？"母亲则安慰他："管人家怎么想呢？何况这衣服也挺帅气的呀。"雪尼到今天也没想通自己当时怎么答应穿了那件衣服，可能母亲就是这么能说服人吧。她不但让他穿了那件衣服，还让他穿了一双削了跟的高跟鞋。就为这副行头，雪尼在学校没少打架。我也好不了多少，穿着一双皱巴巴的长筒袜，是母亲用自己的红色紧身衣改的。

在窘迫的生活中，母亲得了偏头痛，不能做活了，而且一躺就是好多天。那段日子，能维持我们生计的只有领来的贫民救济粮、赈济包裹和换粥的粮票。雪尼利用课间那点休息时间卖报纸挣点小钱，聊胜于无。但就在家里的情况坏到不能再坏的时候，事情却突然有了转机。

原来，雪尼去卖报的时候，无意中看见一个钱包放在公共马车顶层的空座上。他急忙装作不小心掉了一张报纸，接着就一手抓起报纸和钱包，一路忐忑地跑回家来了。

母亲把包里的钱都倒出来放在床上，钱包却依然很重。她在夹层发现了另一个小袋子，里面有七个金镑！这让我们高兴得快发疯了。感谢上帝，母亲没因为她的信仰而有负罪感，因为钱包里没找到失主

的地址。

我无法知道母亲的病根在身体上还是心理上。短短的一个星期内，她就痊愈了。病刚好，她就带我们去绍森德海滨玩了一天，而且全家都穿得焕然一新。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大海。我就像被催了眠一样，在阳光的照耀下走下山路，走向大海。我们脱了鞋，温热的海水轻轻拍击着脚面和脚踝，踩在脚底的沙粒慢慢陷下去，有一种说不出的舒畅。那天的场景真是太美了，粉红色、蓝色的水桶、木铲散落在橘色的沙滩上，还点缀着五彩缤纷的帐篷和阳伞。海面上，一些帆船欢快地遨游在柔柔的水波里，还有一些散发着海草和柏油味的小船懒懒地漂浮着。直到今天，我的脑海中还深深地印着那美丽的情景。

再回绍森德时已经是1957年了，我已经找不到当年第一次看到大海的那条窄窄山路。只有镇子最边缘处还开着几家旧式的店铺，可能是当年某个渔村遗留的痕迹吧。在这里仿佛能听见那个时代的浅吟低唱，不过，那也可能只是海草和柏油散发出的旧时气味吧。

这笔捡到的钱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花光了，日子又穷苦起来了。忙着另找工作的母亲一无所获，家里的问题也接踵而至。因为给不起分期租金，缝纫机被收走了，父亲那边每周十先令的抚养费也完全没有着落了。

母亲在万般无奈下向另一位律师求助，律师觉得代理这案子没什么好处可言，就给她出了一个法子，让她带我们去兰贝斯市当局，用请求当局救济的手段逼父亲出钱抚养我们。

体弱多病的母亲没办法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她别无选择，只能决定一家人一起去兰贝斯的贫民学艺所去了。

第二章　兰贝斯贫民学艺所

去贫民学艺所是一件很丢人的事，但当母亲告诉我们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想到可以改变现在的生活，又都忍不住有些欢欣，因为不用再住在那憋闷的小屋里了。可是，等我们真的走进贫民学艺所，才感到伤心和无所适从了。因为我们一到那就被分开，母亲被领往妇女收容所，我们兄弟二人则被领到了儿童收容所。

这里的生活很好适应，但雪尼和我总觉得日子中萦绕着一种灰暗愁苦的气氛。我最期待的就是围着长桌吃饭。吃饭时，我们由一位老先生照看着。他七十五岁上下，白色的胡子稀稀拉拉，忧郁的眼睛里总透着严肃。因为我最小，他就让我坐在他身旁，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喜欢我没剪短发时，有一头比其他孩子更卷曲的头发。不过好景不长，很快来了个比我更小的孩子，头发也比我的更卷，我在老先生旁边的座位就只能让给他了。年龄越小、头发越卷的孩子越要坐上座，这就是那位老先生的奇怪理由。

我和雪尼在三周后转赴汉威尔贫民孤儿学校学习，离伦敦市区快十二英里。到达之后，我们先在试读部进行身体和智力检查，合格之后才能正式进入学校，因为平均每三四百个小孩中就会出现一个身体有病或智力不正常的。

最初，我一直郁郁寡欢。因为在贫民学艺所的时候，觉得母亲就在身边，可是来这儿之后就离她越来越远了，所以不免怅然。从试读部正式进了学校之后，雪尼和我也被分开了，他上大班，而我则和小一点的孩子分在一起。这样一来我们也就住在不同的区，平时很少能见面。我那时又瘦又小，刚过六岁，愈发显得孤苦孱弱。每逢夏日傍晚，我就和其他二十个孩子一起跪在宿舍里做临睡的祷告。窗外是西沉的夕阳和绵延的小山。我跟大家一起，用高低不和的声音沙哑地唱着：

夕阳西沉，求主与我同居；
黑暗渐深，求主与我同居；

求助无门，安慰也无求处，
常助孤苦之神，与我同居。

虽然并不了解这赞美歌的深意，但每当此时我都会感觉异常愁苦，因为歌声和夕阳让我徒增伤悲。

两个月之后，母亲曾帮我们请过一次假，我们一家人有了一天短短的团聚。不过这次之后我们回汉威尔待了几乎一年，这也是我个性成长中最重要的一年。我开始上学，跟着老师学写自己“卓别林”这个姓。我觉得这几个字的样子十分像我，所以被它们深深吸引了。

在汉威尔的时候，我们被照顾得很好，但生活中总透着些清冷愁苦的气息。七岁后，我由小班升到专门教七到十四岁孩子的大班。这意味着我可以参加军训和体操，并且可以进行每周两次的定时校外散步了，这些都是成年人的活动。

在乡间小路上散步的时候，我们都是上百个人一起，两两成排。经过那些村子的时候，居民们像看怪物似的，紧张地盯着我们看。我恨这种散步，也恨那些居民。在他们说的黑话里，我们所在的贫民学艺所就叫“牢房”。

学校里有一块铺着石板的运动场，是建给男孩子用的。运动场旁边最阴暗的拐角里有一间空屋，据说这几天有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被关在里面了，有人说他的胆子特别大，有一天居然从三楼窗户里爬出来，想要从屋顶逃出学校，还直接用石子和七叶树的果实去砸那些来捉他的管事们。我们小班学生是从大一点的孩子那里听说这件让人咋舌的新闻的。

犯了这种大错的学生，在星期五的大健身房里是要受罚的。那个健身房十分阴冷，有几根绳子从很高的房梁上垂下来，大厅深处，摆着一张长课桌，桌前靠右的架子上搭着几根用来绑手腕的皮条，还有一个让人心惊胆战的板子挂在那。每逢周五早上，二三百名七岁到十四岁的男孩，就会列着像士兵那样齐整的队伍走进大厅，站在桌子三面，犯错的学生则站在缺口那面等待审讯和惩罚。

错误没那么严重的孩子，挨的是藤条。欣德拉姆大尉，一名大概两百磅重的退伍海军军官，背着一只手，另一只手握着一根差不多四英尺长的藤条，那家伙几乎比男人的大拇指还粗。等受罚的孩子被脸

朝下按到桌上之后，欣德拉姆大尉就架势十足地站好，把藤条横在孩子屁股上空，打量完了之后，慢悠悠地举高了藤条，再“唰”的一声重重抽在那孩子的屁股上。在这种惊魂的场面下，两旁看着的孩子常常会昏厥，跌倒在队伍中。

犯错的学生挨的打从三下到六下不等。挨了三下以上的孩子，那声嘶力竭的哭叫声听起来十分可怕。有时候有孩子会在挨打中晕过去，人们就把这个孩子抬到健身房的垫子上。他至少要在那儿抽搐发抖个十来分钟，才能感觉到疼痛缓解，不过屁股上已经印了三条粉色的伤，足有洗衣女仆的手指那么宽。

如果是用板子打，那就更为严重了。通常三下之后，两位中士就会扶着挨打的孩子去外科医生那儿治疗。

如果有人指控你犯了错，即使你实际上没有，也不要去辩解。这是有些孩子告诉我的，因为一旦辩解后被查出来确实犯了错，那就要受最大的责罚。而笨嘴拙舌的孩子们，常常很难证明自己的清白。

我第一次见人挨打，就是那个要出逃的胆大包天的孩子。他似乎很矮小，站在那张长桌后面，只露出比桌面高一点的脑袋和肩膀，消瘦的脸庞和大大的眼睛。

校长很严肃的当众宣读了他的罪状，之后问他：“你承认有罪吗？”

这个胆大包天的家伙毫无畏惧地直视着前方，拒绝作出回答。于是他就被人拉到架子前面，在脚下垫上一只肥皂箱，用皮条绑住手腕。挨了三板子之后，他照例被送去外科医生那儿了。

运动场上每周四都会吹起喇叭，一听到这声音我们立刻就停止玩耍，傻傻地立在那里，听着欣德拉姆大尉在扩音器里大声念出星期五要受罚的学生的名单。

有一个周四，我居然听见扩音器里传来了自己的名字，这真是让我震惊。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自己犯了什么错。但可能是因为即将成为那幕戏的主角吧，我竟有些说不清的激动。第二天，我走进健身房受审。校长说：“有人告你放火烧厕所。”

我这次可是被诬告了，那天我去厕所解手，看见有几个孩子在外面的石头地上烧碎纸玩，但我并没有点火。

紧接着校长问：“你承认有罪吗？”

我极为紧张，却不假思索地说："我有罪。"这时候我不气愤也不喊冤，只感觉到恐怖的危险向我袭来。我乖乖地被他们领到桌子前，屁股上挨了三藤条。挨打的地方疼的像在灼烧一样，我几乎停止了呼吸，但却没让自己哭出声来。当时我觉得自己像个胜利的勇士。

雪尼之前并不知道我要受罚，他那时在厨房做杂活。一直到星期五那天才知道。看见我结结实实的挨了三藤条之后，他愤怒地哭了。这是雪尼事后告诉我的。

我总把雪尼称做"我的小家伙"，这是弟弟对自己哥哥的昵称。这样说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被人好好地保护着，所以总有很骄傲的感觉。有时我去看他，他会偷偷摸摸地塞给我一个面包卷，有一大块黄油在里面，我就赶紧掖在衣服里跑出来，跟另外一个孩子分享。我们平时也能吃得饱，但是这么大一块黄油对我们来说还是极为奢侈的。不过好景不常，雪尼很快就离开汉威尔学校，到"埃克斯默思"号上去训练了，所以我们再也享受不到那美味的点心了。

贫民学艺所里的男孩满十一周岁之后，就有自由选择去参加陆军或者海军。选择当海军的孩子就要到"埃克斯默思"号上进行实战学习。当然，学校并不强迫孩子们，不过雪尼的理想就是能在海上成就大业，所以我只能独自在汉威尔待着了。

曾经有一段时间，一种叫金钱癣[(1)] 的病在汉威尔肆虐，所有得病的孩子都被送进了隔离室，关在可以俯瞰运动场的二楼那里。他们经常可怜巴巴地从窗户那里望着我们，我们一抬头就能看见他们剃光头发的脑袋，还被碘酒抹成了棕色。那样子太可怕了，我们一见就忍不住感到反胃。

所以有一天，一个保姆突然停在我背后，把我头顶的头发一撩，马上说："你有金钱癣啊！"我的眼泪就"哗"的一下涌出来了。

治疗的日子似乎永无止境，足足持续了好几个星期。我剃了光头，涂了碘酒，脑袋上还包了一条手绢，活像个采棉花的。我知道窗户外运动场上的孩子是多么厌恶我们，所以绝对不会从窗户里往外看。

母亲在我被隔离的时候曾经来看过我一次。她当时正在想法子重建我们的家，所以已经离开了贫民学艺所。我看见母亲的时候，觉得她像花束一样娇艳动人，再看看自己穿的邋遢衣服和涂了碘酒的光

头，觉得太难为情了。

母亲却紧紧搂着我，一边吻我一边和蔼地说："我会永远爱你的，不管你多么邋遢。"这一切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记忆。

在这之后，我们一家很快就团聚了，雪尼离开了"埃克斯默思"号，我也离开了汉威尔。新家是母亲在肯宁顿公园后面租的一间屋子。不过因为母亲找不到工作，父亲在戏院接的活也越来越少，所以我们最后不得不再次回到贫民学艺所。

当时因为住在另外一个贫民救济区，所以我们进了另一家贫民学艺所。之后又转进了比汉威尔更加冷清的诺伍德学校。那儿有着更高的树和更浓密的绿叶，可能乡间也更是风景如画，但却无法逃离那种悲凉愁苦的氛围。

那天，雪尼正在运动场上踢足球赛，两个保姆把他叫出去，告诉他母亲已经被送进凯恩—希尔疯人院——她疯了。听到这个噩耗后，雪尼十分木然，仍然回到运动场去踢球，但比赛一完，他就一个人静静地走开，忍不住哭了。

他对我说这件事的时候，我怎么也不能相信。虽然没有失声痛哭，但我在昏聩中感受到了极度的绝望。母亲怎么可能疯呢？那么天真烂漫、活泼开朗的母亲怎么可能疯呢？冥冥中我似乎有这样一种感觉，觉得母亲是故意的，她借丧失理智来抛弃我们。我似乎能在绝望中看见她无奈地盯着我看，然后消失在一片虚无中。

一周后，我们正式听到关于母亲疯了的宣布，同时也听说法院判决父亲必须负担起抚养我和雪尼的任务。我十分开心，因为就可以和父亲住在一起了。我长这么大就见过他两次，一次是看他在舞台上表演，一次是走在肯宁顿路上，看见他和一个女人走在一栋房子前的花园小路上。

那天，学校的管事驾着车把我们送到了肯宁顿路二百八十七号，就是我和父亲第二次见面的那幢房子。开门的是上次陪在父亲身边的那个女人。她叫露易丝，清瘦的脸庞上写满了愁苦，但是很美，身材也高挑儿匀称，年纪在三十上下。我父亲卓别林当时不在家，所以管事的办完手续，在文件上签了字之后，就把我们交给露易丝了。她领我们去了楼上的一间起居室，就在第一层楼梯口那。屋里有一个坐在地板上玩耍的小男孩，四岁，有着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和一头棕色的浓

密卷发，长的十分俊俏。这是露易丝的儿子，我同父异母的弟弟。

我们总共住了两个房间，前面一间有一扇大大的窗户，但窗外的阳光却像从水底反射出来一样照进房间。房间里的任何事物看起来都像露易丝一样哀伤。她另摆了一张床，让雪尼和我睡在后间，但那床对两个人来说太小了。雪尼要在起居室里的沙发上睡。露易丝却说："叫你在哪睡，你就在哪睡。"这句话一说，所有人都原地僵住，无话可讲。我们只能再回到后间的卧室。

我们没有被热情款待，这是意料之中的。因为抚养雪尼和我的担子对她来说太突然了，更何况，我们只是父亲前妻的孩子。我心里隐约地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恐惧感，只希望赶紧离开她和她身边所有东西，回到诺伍德。

父亲回来后，很和蔼地招待了我们。我被他深深地吸引了，在餐桌上，我用心地看他吃饭的一举一动。他在切肉的时候，握刀的手就像拿着一只铅笔一样。我在这以后的很多年里，都模仿父亲拿刀的样子。

父亲听露易丝说了雪尼嫌床小，于是让他睡在起居室的沙发上。露易丝被雪尼的这个胜利激怒了，从此就开始怨恨他，并且经常跟父亲说他的坏话。她脾气很坏，性格阴郁，不过从没打过我，甚至连做个样子吓唬我也没有过。但是我对她一直有一种畏惧感，因为她讨厌雪尼。更让我感觉害怕的是她经常喝酒。她一醉，就一脸什么都不管不顾的可怕神情。露易丝有时候坐着一边喝酒，一边想着什么，一言不发，这让我十分害怕。雪尼总是很晚才回家，从来都不理露易丝。但我却一放学就得赶紧回去，帮她做点零碎的事情，干干杂活。

露易丝送我们进肯宁顿路学校去上学，和其他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孤独感就不再那么强烈，这也是悲苦生活中的一丝慰藉。我从来不期待周六下午的放假，因为我必须得回家洗地板、擦餐具，还要在这一天面对照例要痛饮一番的露易丝。她经常和一个女性朋友坐在一起边喝酒边寻气。我在她身旁一面擦刀叉，一面听她跟朋友大声诉苦，说她如何被迫照顾我和雪尼，如何受了很大委屈。我经常听她刻薄的咒骂雪尼，又恐惧又担心。对于当时还不满八岁的我来说，那是我一生中最难熬、最悲惨的一段时光了。

雪尼总是很迟才回家（他似乎一直这样），睡觉前还要去橱子里

找吃的，这让露易丝恼怒非常。有一天夜里，喝了很多酒的露易丝走进起居室，扯开雪尼的被子，要赶他出去。但雪尼对她早有防备，他迅速从枕头底下一把抓出一个针眼锥，那是他用鞋绊的钩子磨成的。

“你再敢过来一步，我就拿它扎你！”他说。

露易丝吓得连退几步。“看看这个该死的小流氓，他要杀人啊！”

“是的，”雪尼说，那样子像演戏似的，“我要杀了你！”

“走着瞧吧，等卓别林先生回来再说。”

但卓别林先生是很少能回来一趟的。

又一个周六，我从学校回来后，发现家里空无一人。雪尼照例还在外边踢球玩。房东太太告诉我，露易丝一大早就带着她儿子离开家了。刚听到这个消息我很开心，因为没有人让我洗地板、擦餐具了。不过午饭时间都已经过了很久了，她们还没有回来，我这才有些慌张，害怕她们丢下我一个人不管了。下午的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同时开始想念露易丝和她的儿子了。更让我恐惧不已的，是这间看起来愈发空荡和冷清的屋子。我在害怕之余肚子也饿了，可打开放菜的橱子，却空空如也。饥肠辘辘的我再也忍受不了饥饿的煎熬，只好一个人走出家门，溜达溜达，在周边的市场里打发下午的时间。我游荡在兰贝斯支路上，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小菜馆冒着热气的烤牛肉、烤猪肉，让人垂涎三尺，还有在肉汁卤子里浸成金色的土豆。我一连几个小时都盯着那些推销商品的小贩，看他们说的天花乱坠。只有这个办法才能稍稍排解我的苦闷和饥饿，让我暂时舒服点。

我夜里才回到家，敲了敲大门，里面却没人答应。还是没有人在家。我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到肯宁顿路的拐弯处，坐在离家不远的路边，留意着有没有人回去。也不知道雪尼去了哪里，我当时真是又疲倦又难过。就这样坐到夜半时分，肯宁顿路上已经几乎没有人影，只有几个零星的行人路过。除了药铺和酒店，所有的店都关门了，这让我感到自己越发的孤独可怜。

忽然，一阵醉人的音乐声从拐角处白鹿酒店的门厅里传出来，悠扬的回荡在空荡冷清的广场上，听起来是多么的悦耳啊。这支曲子的感情是那么充沛，调子是那么活泼，我从未留神听过这动人的乐曲，它真是给人温馨而舒适的感觉。我向正在演奏的艺人们走过去，忘了

自己的窘境。到对街之后才发现，拉小风琴的人没有眼睛，眉毛下有两个结痂的大疤，是个瞎子，吹大箫的人表情则既茫然又气愤。

他们一曲弹毕就走了，而此时的黑夜看起来就愈加忧伤。我也不管家里有没有人回来了，只是精疲力竭地往回走，想要回去睡觉。这时，我看见一个模糊的人影沿着花园小路走向房子。那是露易丝，她的小儿子在前面跑着。只见她身子一直倾往一边，走得颠颠簸簸，我吓了一跳。一开始还以为她是在什么事故里伤了一条腿，后来才反应过来她是醉得太厉害了。我还没见过谁醉到走路都这样歪歪倒倒的。所以看情形，我觉得还是躲开了为好，就静静地待在那等她进了家门。房东太太一会儿也回家了，我就跟着她进了屋子。我轻手轻脚地爬上黑漆漆的楼梯，这时露易丝却踉踉跄跄地走到了楼梯口。

她对我说：“你要去哪儿？你以为这里是你家吗？”

我呆住了，茫然地立在那里。

“今晚你们不准睡在这！我受够了，给我滚，你和你的哥哥都给我滚！让你们的父亲管你们去吧！”

我立刻回过身去，没有一丝迟疑地走下楼，夺门而出。这时我已经不觉得累了。曾听闻父亲常常去半英里外的王后酒馆，在王子路上，于是我走向那个方向，希望能在那儿找到他。不过我很快就看见一个路灯下的模糊身影向我走来，那正是父亲。

我哽咽着向父亲哭诉：“她大概喝醉了吧，不让我回家。”

我们走回去的时候，他也一路踉踉跄跄的，说着：“我自己也不清醒了。”

我跟他说他还是清醒的，想安慰安慰他。

他却沮丧地嘟囔着：“不，我喝醉了。”

回家后，他推门而入，站在起居室里不发一言，恶狠狠地盯着露易丝。她扶着壁炉的台子站着，身子因醉酒而不停地摇晃。

父亲问她：“为什么不让他回家？”

她失神地看了看父亲，嘴里咕哝着：“你最好也滚，你们都给我滚出去！”

父亲猛地从旁边架子上抓起一只沉沉的衣服刷，用力扔出去，刷子的背边像闪电一样打到她的半边脸。她眼睛一闭，“咚”的一声倒在地上，似乎是渴望在昏迷中把这一切都给忘了。

父亲的举动完全把我吓傻了，我在心里面很看不起他这野蛮的行为。之后发生的事情在我的记忆中已经含糊不清了。后来，仿佛是雪尼回来了吧，父亲看着我们俩睡下之后，又一个人出去了。

事后我才知道，父亲和露易丝那天早上吵了一架，因为父亲要去看他那个在兰贝斯附近开了好几家酒馆的哥哥，把她独自留在家里。露易丝不喜欢去父亲那个哥哥家，她一向对自己的身份很敏感，所以父亲一个人去了那儿。露易丝去其他地方玩了一整天，就是为了跟父亲赌气。

不过露易丝是爱着父亲的。我虽然年龄很小，但也能看出她眼神里流露出的爱意。很多时候也能看出来，父亲是爱着露易丝的。有些晚上，他很温柔，在去剧院之前总会和她吻别。如果前一夜没有喝酒，那么周日的早晨，他就会跟我们一起吃早饭，跟露易丝讲他演喜剧时的那些动作，大家都听得聚精会神。我总是像老鹰一般紧紧盯着他，留心看他的一举一动。

有一天，防虐童会的工作人员登门造访了，这让露易丝恼羞成怒。那儿的人接到了警察局的报告，说有人在某天夜里三点钟的时候，发现雪尼和我在值夜人的火炉边睡着了。那天夜里是露易丝把我们俩锁在门外，直到警察敲门才放我们进去。

几天后，露易丝接到一封信，通知她我母亲从疯人院里出来了，那时父亲正在内地巡回演出。在那之后的一两天吧，房东太太上楼跟我们说，大门口有一位夫人，叫雪尼和查理出去。露易丝说："来的是你们的母亲。"一时间我们都呆立在了那里。紧接着，雪尼就一路又蹦又跳地奔到楼下，一头扎到母亲怀里，我则紧随其后。母亲亲热地搂着我们，她还是当初那个笑容满面的、开朗的母亲。

为了避免和露易丝见面的尴尬，母亲就在大门口等我和雪尼上去收拾自己的东西。露易丝跟着我们，两边都没有显出什么愤恨或生气的样子来，她甚至还很客气地跟雪尼道了别。

母亲租的房子在肯宁顿路口后面的一条街上，临着海华腌菜厂，所以每个下午都能闻到那股腌菜的酸味，不过那间房子的租金很少。我们就这样再一次团聚了，雪尼和我根本看不出母亲曾经生过病，因为她的身体是那么好。

我一点也不知道那些日子我们是拿什么维持生计的。但我不记得

当时有什么难以忍受的困窘，也没遇见什么过不去的坎儿。父亲每星期十先令的抚养费几乎都准时给，母亲也开始重新做活，并且继续去教会。

那段日子里发生了一件事。我们住的那条街上，尽头那儿是一个屠宰场，所以常有赶了羊去宰的人从我家门前经过。有一次，我看见一头羊逃走了，一直沿着街跑，这让一旁的人们忍俊不禁。有人跑去捉它，还有人跌倒了。到处都是一片混乱，我看见这滑稽的情景，乐得捧腹大笑。但之后，那头羊到底被捉回屠宰场了，这可悲的现实让我难过极了，我跑回家中，对母亲大声哭诉着："他们要杀它了！他们要杀它了！"那寂寞寥落的春日午后，那让人开怀大笑的场面，在很多天后还是清晰地印在我脑海中。所以后来我时常猜想，我的电影里那种悲喜剧混合的主旨，也许就源自于这件事吧。

这段时间里，我学习了历史、诗歌还有科学，算是让我大开眼界了。不过也有让我觉得索然无味的课程，尤其是算术，那些加加减减，只不过能和一个小职员还有他收钱的机器联系到一起罢了，这门课的用处充其量也就是能让人把钱找对了。

实际上，历史也不过是写满了狠毒和暴虐的书，不是写臣子弑君，就是写皇帝怎样害死自己的妻子、兄弟和侄子侄女们；地理也不过是教人怎么看地图；诗歌也不过是磨炼人的记忆罢了。学校教的这些知识让我多少有点糊里糊涂，所以对它们的兴趣没有多大。

回到母亲身边后，我对戏剧的兴趣又被激发了。她的鼓励，让我觉得自己很有天赋。不过，我的表演欲被完全激发出来，还是圣诞节前几周，学校演出《灰姑娘》大合唱的时候。我那次没有被挑去表演，不知是为何。我对那些被选上的同学十分艳羡，同时又觉得自己如果去表演，一定能做得比他们好。那些同学们只会呆板地念着台词，完全是小学生的做作腔调。当时我真是由衷地希望自己可以去扮演一个丑姐姐，好把母亲教我的一切技巧都展现在舞台上。不过我深深地被那个演灰姑娘的女孩子迷住了。她十四岁上下，既美丽又文雅，我偷偷爱慕着她。但在社会地位方面，我是无法高攀她的，并且她也大了我那么多岁。

我心里窃以为，这大合唱完全是因为那个美丽的女孩才不至于那么索然无味，但她的美丽又给我的心头蒙上一丝忧伤。当时我完全没

料到，自己会在两星期后一崭头角，被老师叫到所有的班级背诵《普丽茜拉小姐的猫》。那是一段母亲在报刊部橱窗里看见的喜剧台词，她觉得有意思，就抄下来带回家了。有一天课间休息，我背诵给另一个同学听的时候，被正在备课的里德老师听见了，他觉得十分有趣，于是等学生们到齐了，就让我在大家面前再背一次，同学们听了都被逗得哈哈大笑。我就这样一鸣惊人了，第二天被领到全校所有班级的男生女生面前，在各个教室里背诵这段台词。

虽然五岁那年，我就曾经代替母亲登台演出，不过这一次才是我对演出趣味的初体验。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害羞孩子，一举成为老师和同学们心目中的焦点人物，学校对我来说，也变成了一个充满乐趣的地方。我甚至连学习成绩都提高了。不过，我的学校生涯很快就要中断了，因为我进入了兰开夏的八童伶木屐舞蹈班。

---

(1)　又称为环癣，是一种受真菌所感染的皮肤病，会在皮肤上形成一个个圆形的红色印，像钱币一样。

第三章　八童伶木屐舞蹈班

父亲跟这个舞蹈班班主杰克逊先生认识，就提议母亲让我登台演出，既可以让我扬名立身，又可以缓解她的经济压力，因为我的吃住问题解决了，她每周还能有半镑的额外收入。起初母亲有些犹豫，但见了杰克逊先生和他的家人之后，就答应了。

杰克逊先生年纪有五十多，以前是兰开夏的老师，一个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他现任的妻子杰克逊太太长得并不好看，形容枯槁，消瘦的脸上皱纹密布，苍白不已，但她是个尽职尽责的妻子。

杰克逊先生的几个孩子都在这个戏班里演戏，三个儿子最小的十二岁，最大有十六岁，女儿只有九岁，她剪成了我们这样的短头发，好在戏班里假充男孩子。

在学习了六个星期后，我可以跟着班里其他人一起跳舞了。可是这时候八岁多的我，已经没有当初那种自信了，第一次登台时十分怯场，连动动腿都很困难。适应了几个星期之后，我才能够做到像其他孩子那样独舞。

我不满足于只在这个小戏班里跳跳木屐舞，而是跟其他孩子一样很想要独自进行一场演出，这样就有更多钱可以挣，更何况，我很自然地觉得表演比单纯的跳舞更能让我有满足感。我希望能当个演丑角的童伶，很可惜还没有胆量在台上独自表演。于是我萌生了两人合演一出喜剧的想法，由两个男孩在剧中扮演流浪汉。我跟另一个孩子说了这点子，他决定跟我合演。那之后这件事就成了我们每天的期待。

我们称自己为“腰缠万贯的流浪汉——布里斯托尔和卓别林”，还设想了很多将来表演的细节。可惜的是，我们没能实现这计划。

在去其他区巡演的时候，每在一个镇上停留，我们就得在那里的学校上一周的学，不过这样的读书丝毫不能让我的学业有所进益。

我们在圣诞节那天扮演了《灰姑娘》里的猫和狗，那是一出在伦敦马术表演场里上演的哑剧。马术表演场在那时其实是个新开的剧院，舞台布置得很精致，有一部分地板是凹陷的，蓄满了水，这是为了配合刚刚翻新的芭蕾舞而设计的。著名的法国丑角马塞林在水上芭

蕾之后出场，他穿着一套邋遢兮兮的晚礼服，戴着一顶歌剧帽，拿着一根钓竿，走到场中的一个折叠凳那儿坐下，打开一个装着首饰的大箱子，把一个金刚钻的项圈挂在鱼钩上，当做鱼饵扔到水里。稍后，他扔下去几只手镯，试图用小点儿的首饰去“钓鱼”，最后干脆把整箱首饰都倒到水里去了。这时候有鱼上钩了，他就开始疯狂地往上扯那根钓竿，很滑稽地转着圈，最后终于从水里提出了一只小狮子狗，它是经过专门训练的，可以模仿马塞林的一举一动。马塞林坐下，它也坐下；马塞林倒立，它也跟着倒立。

他的表演是那么幽默新奇，简直让伦敦人喜欢得不知如何是好。我在布景成厨房的一幕戏里演马塞林身边的一个小配角，一只吃着牛奶的猫。他要从一条狗面前退着走过来，却在我背上被绊了个大跟头。他一直嫌我把背拱得不够高，不能让他摔得重点。我脸上带着猫的面具，要演出猫儿十分吃惊的样子。虽然马塞林自己并不编剧，但他一直是很能吸引观众的明星，所以这出《灰姑娘》很卖座。他在几年之后去纽约马术表演场演出的时候，依然能造成轰动效应。可是一旦马术表演场不再演杂技之后，他很快就被观众们淡忘了。

那大概是在1918年前后吧，马塞林跟着林林兄弟的三个马戏团一起来洛杉矶演出。他在演出中只不过是个在巨大的舞台上跑龙套的丑角，这让我倍感惊讶。演出之后，我去他的化妆室介绍了自己，还跟他提起往事，告诉他我就是当年在伦敦马术表演场上，演他身边猫儿的那个小孩。不过他听了之后却很木讷，仿佛在抑郁中失去了当日的灵气。

那次演出之后的一年，他在纽约自杀了。报纸对此只登出了短短一则新闻。里面说和他同住的人听见一声枪响后，发现他已经倒地身亡，手枪握在手里，留声机里依旧转动着唱片，放着那曲《月光和玫瑰》。

英国很多喜剧演员都是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就像那位杰出的喜剧演员T．E．邓，他在一家酒馆雅座听见有人说：“看，那个家伙已经没戏了。”也就是那一天，他在泰晤士河饮弹自尽了。

还有马克·谢里登，英国最杰出的丑角之一，他在格拉斯哥的演出没引起观众的热烈反响，于是在那儿的一个公园里用手枪自杀了。

弗兰克·科恩，一个性格开朗、活泼的喜剧演员，我们还曾经跟他

合演过戏，他在台下的时候总是很开心，笑容满面的。但某天下午，他和妻子备好自家马车，准备出去兜风的时候，突然说落下了一件东西，要上楼去拿，让妻子在外面等一下。结果过了二十分钟他也没有下楼来，他妻子上去看看为什么，却在浴室里发现了倒在血泊中的他。他用剃刀割了喉咙，几乎连脑袋都给割了下来。那剃刀还握在他手中。

儿时，我见到的所有演员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些在台下性格独特的人，而不是那些在台上最走红的人。就像查摩，那个扮演喜剧中的流浪汉和玩杂耍的演员，他在对自己的训练方面是最严格的。他每天从戏院一开门就开始练习他的杂技，持续好几个小时。我们看见他用一根台球棒竖在下巴上，用棒子上面一头去接一个扔到空中的台球，接到之后紧跟着再向空中抛一个台球，用顶着第一个球的棒子再去接它。自始至终，棒子和球都是不能掉的。不过他在接第二个球的时候经常会失误。他对杰克逊先生说，自己连续四年都在练第二个动作。终于，他准备在一个周末首次登台表演这一招了。我们那晚都站在条幕后面看着，见他抛起第一个球，用棒子那头接住，再抛起第二个球，那球又稳落在第一个球上面了。但台下的掌声却没那么热烈。后来，杰克逊先生经常跟查摩提到这事，他说："那招之所以不那么受欢迎，是因为你让观众们觉得它太简单了啊。在表演成功之前你应当先失手几次的。""我还没有练过怎么失手呢。"查摩哈哈笑着说。他喜欢给人摸骨看相，给我看相后，他说我对学到的知识都记得很清楚，而且很擅长利用它们，不管是什么样的知识。

此外就是格里菲斯兄弟俩，最为幽默，让人印象深刻。这两个演丑角的经常在幽默剧里荡秋千，一边荡还一边用大棉鞋拼命踢着对方的脸，我对这种粗野的行为觉得非常吃惊。不过戏一结束，他们就是一对相亲相爱的兄弟了，看起来是那么安静平和。

丹·伦诺，可以称他为英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丑角。我虽然没有看过伦诺在事业巅峰期的表演，不过我觉得比起丑角来说，伦诺更像是一名侧重于展现人物性格的演员。母亲曾告诉我，伦诺凭着自己的想象对伦敦底层社会的那种演绎，是人情味十足而让人动容的。

玛丽·劳埃德是个因活泼、轻浮而声名在外的演员，但事实上，我觉得她是我见过的演员里最严谨和勤奋的。登台前她会一直焦虑不

已，很紧张地在后台来回踱步，不过一出场后就立马换成了轻松的姿态和愉快的神情。

还有布兰斯比·威廉斯，一个专门致力于演绎狄更斯小说人物的演员。他的表演深深地吸引了我。这个年轻人长得俊俏，态度也很端正，他在表演的时候几乎已经和小说中有趣的人物合二为一了，那种演绎方式为舞台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这也让我开始对文学产生兴趣，很想对狄更斯小说里藏着的秘密一探究竟。虽然当时我不会看书，但还是买了一部《雾都孤儿》。

我对狄更斯小说里的人物是那么着迷，以至于也跟布兰斯比·威廉斯一样，去扮演这些人物。有一天，杰克逊先生看见我正在其他孩子面前扮演《老古玩店》里的老者。当时他就宣布我是个天才，并且决定要把这件事告诸全世界。

他是在米德尔斯布勒的一家剧院里宣布这件事的。他在我们跳完木屐舞之后走上舞台，十分严肃地宣布，自己在这帮孩子里发现了一位小天才，他像布兰斯比·威廉斯一样，扮演《老古玩店》里的老者，能活灵活现的演绎出老者看不出他的小蕾儿已经死去的场景。

这时候，耐着心思看完一晚上乏味节目的观众们，已经没什么兴趣继续看演出了。我身上穿的还是跳舞时的衣服，却要打扮成个九十岁老头的模样，戴着一顶不知道从哪弄来的旧假发，许是杰克逊先生买的吧。那假发尺寸很不合适，比我大大的脑袋还要大得多。当我模仿着老者的样子，拱肩缩背地走到舞台上的时候，看起来就像是甲虫在爬行一样。台下的人们也这么觉得吧，所以都呵呵地笑了。

他们一笑，就很难再安静下来。我放低了音调悄声说："嘘，嘘，别作声，你们会把我的蕾蕾吵醒的。"

他们在台下喊着："大点声，大点声！说得大声点！"

但我还是像讲悄悄话一样，轻声轻气地说着，人们就开始跺脚，这样一来，我对狄更斯小说里人物的演绎也就告一段落了。

我觉得，和这个戏班的学徒们在一起的时候，生活是朴素却开心的。不过我们偶尔也会掀起些小涟漪。我记得有两个跟我们一起串演的小男孩，年龄与我相仿，是走绳索的。有一次，他们悄悄跟我们说，他们的母亲每周能拿七先令六便士，一到周一早晨就把一先令放在他们盛火腿蛋的盘子下面，算是他们的零用钱。我们中的一个孩子

就说：“可是我们的早餐只有面包和果酱，还只能只拿到两便士啊！”

听到这样的抱怨，杰克逊的儿子约翰哭了，他伤心地跟我们说，在伦敦郊区，我们有时只能临时出演一两个星期，所以他父亲每周最多能给这戏班挣到七镑钱，充其量只够维持日常开销。

这两个小学徒的富足生活，激起了我们成为走绳索演员的热切欲望。好几天早上，我们当中的几个人一等戏院开门，就开始练习翻跟头。在腰间绑上一根绳子，一头系在一个滑车上，另一头让一个孩子拉着。就这么练着，我已经能翻出很好的跟头了，但后来我摔伤了大拇指，所以也就终结了走绳索的历程。

我们总是想尽办法要多学些舞蹈之外的本领。我想在幽默剧里玩点杂耍，于是存下一点钱，拿它买了四个皮球和四个白铁皮的盆子，站在床头练习，每天都持续好几个小时。

杰克逊先生的确是个好人。我离开戏班三个月之前，他组织我们参加了为我父亲举办的义演。那时父亲已经病重，很多艺人都自愿进行义演，为父亲募钱，杰克逊先生的戏班也是其中之一。父亲在义演那晚气喘吁吁地走到台上，说了一席话，非常吃力。我站在舞台边上，看着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是个很快就要去世的人了。

回到伦敦后，我每个周末都回去看母亲。她看我苍白消瘦，以为我在跳舞时伤到肺了。忧虑的她给杰克逊先生写了信，信中对这件事絮絮叨叨。看到信之后，杰克逊先生十分恼怒地说，为了我跟这种多事的母亲反复纠缠太不值了，最终把我送了回去。

几周之后，我出现气喘的症状。病情越来越重，母亲以为我得的是肺结核，赶紧带我去布朗普顿医院做了全身检查。医生诊断出我没有患肺病，但得的是哮喘。我在之后的好几个月里都呼吸困难，痛苦异常。有时候甚至想要一头从窗户里跳出去。在头上蒙着毯子、闻着草药的喷雾也没能让我好受一点。但最终我的病还是好了，正如医生所言。

这一段日子在我的印象中，有的清晰，有的模糊。贫穷生活中遭遇的窘境给我留下了最深的记忆。我记不得雪尼当时在哪，他可能是去跟外祖父一起住了吧，为的是能减少母亲的生活压力。我们的家搬来搬去，最后住进了波纳尔弄三号那间顶楼。

我切身的感觉到了因为贫穷而在社会上受到的鄙夷。就算是那些

最穷的孩子，每个周日也总可以吃到一顿家里的饭菜。能不能在家里吃烤肉，是区分穷人里不同阶层的标准。那些周日在家里吃不上一顿饭菜的孩子，都属于近乎乞丐的阶级，而当时的我们就是那个阶级。母亲总是打发我去小饭馆买一盒六便士的饭（有一点儿肉和两份菜）。这样的一顿饭，在星期天显得多么贫寒啊。我总是缠着母亲不放，怪她不在家里做饭，不管她怎么跟我解释，说在家里做饭要多花两倍的钱。

不过在某个周五，我们却时来运转，母亲赛马赢来了五先令，于是决定星期天在家里做饭，让我高兴一次。她准备了不少美味的食物，还买了一块肉准备烤着吃，不过那肉看上去像是牛肉，又像是一块油。家里没有炉灶，母亲只能借用房东太太的，结果那块肉被烤得缩成棒球那么小了，叫人十分沮丧。母亲抱怨着说，还不如吃六便士一盒的饭菜，又可口又方便，不过我却吃得很满足，因为觉得自己已经过上和左邻右舍一样的生活了。

后来母亲遇到她旧时的一个朋友，我们的生活中就有了些变化。她的这个朋友已经结束了做演员的日子，嫁给一位有钱的老上校做外室，穿着华贵，很有派头，春风得意。她现在住在斯托克韦尔街的一个上等小区里，和母亲在久别后偶然邂逅，于是很高兴地邀请我们去她家消夏。雪尼当时去农村采蛇麻了，所以，母亲很快就答应了。做得一手好针线的母亲自然有办法打扮得大方好看，我穿的则是在兰开夏八童伶班里留下的那套漂亮衣裳，所以我们这次算是体体面面地出门的。

第二天我们到了一个富丽堂皇的房子里，那是坐落在兰斯顿广场拐角上的、一个非常幽静的宅邸。那儿有很多仆人，卧室有粉色的和蓝色的，挂着印花的棉布窗帘，铺着白色的熊皮地毯，我们就在那里过了几天奢侈的生活。

除了母亲和我以外，那家还有一位举止优雅的男客，这个年轻人留着短短的红色小胡子，看起来总是很紧张。他对人彬彬有礼，十分和善，但那位满脸灰色络腮胡子的上校一回来，他就立马消失了。

上校每星期只是回家一两次。他一回家，屋子里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氛围，母亲总是嘱咐我躲着他。有一天，我跑到客厅，看见高大的上校正从楼上走下来。他脸色红润，穿了件大礼服，戴着顶大礼

帽，长着一副花白的络腮胡子，没有头发，边走边微微向我笑着。

大家对上校大惊小怪的原因我一直不知道，也不知道他是如何让家里的气氛变得神秘的。不过他极少逗留，而他走之后家里就恢复如前，那个短胡子年轻人也很快回来了。

我渐渐对这个年轻人十分喜欢了。他总是和我一起，带着女主人的两条漂亮猎狗去克拉彭公园散步，走得很远。他还建议母亲让我每天早晨洗冷水浴，说这样可以治哮喘，而我也觉得的确有效果，后来就爱上冷水浴了。

由俭入奢易，一周之内，我已经认为这一切的享受都是理所应当的了。每天早晨的仪式后，我们带上两只系着簇新棕色皮带的狗去遛弯，紧接着回到豪华的府邸，享受着仆人用奢华的银盘子端来的午餐，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幸福无比。

这家人的花园后面住着一户一样有钱的人，是一对年轻夫妇和一个儿子，他们儿子那间小卧室里全是新奇的玩具。我因为和他年纪相仿，所以常被邀去陪他玩耍，和他成了一对好朋友。他父亲在市中心的一家银行工作，职位很高，母亲则年轻漂亮。

有一次，我偶然听见两家的女仆在说悄悄话，那家的女仆说要请一位家庭女教师给她家少爷。我们家的女仆则说："这一个（指我）也是要请的呀。"我十分高兴听到自己被当做一个富家少爷来对待，不过不清楚她这么做的目的，后来觉得她也许是想表明，雇她的人家和另一家是一样有钱的，以便自抬身价吧。从那之后，我一跟隔壁的孩子一起吃饭，就觉得自己是在假充有钱人的小孩。

最后，在一个让人沮丧的日子里，我们从那个有钱的人家回到了波纳尔弄三号，不过因为做客时难免感到紧张，所以想想现在无拘无束的生活，又觉得有些慰藉。就像母亲说的那样，客人就像点心，留久了就变了味。于是，我们短暂的奢侈结束了，等着我们的又是以前的穷苦生活。

第四章　与贫困作斗争

1899年盛行留络腮胡子，皇帝、政治家、士兵和水手都不例外。那年头，见到的是荒诞而夸张的行为，贫者与富人的天壤之别，还有写满了漫画和报纸的愚蠢偏激的政见。几个布尔农民在非洲德兰士瓦作战时，躲在大石头背后，把穿着红色军服的英国士兵当做靶子来射击。英国人因此倍受打击，恼怒非常，幸亏后来陆军部识破了这个伎俩，就把红色军装换成卡其制服，给了布尔人一点厉害。

我对战争的消息都只是零散听闻的，有从爱国歌曲和戏剧里，也有从那些画着将军像的香烟卡片上。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敌人都是十足的恶棍，而我们在经历种种失败后终于胜利了。母亲从未跟我提过这些，她有自己的战争要打。

那年雪尼十四，已经在河滨马路邮局里做了报差，不再念书了。母亲继续靠缝衣服挣点微薄的收入。那时她在一家工厂做计件工，缝一打罩衣能拿一先令六便士，需要工作十二小时。母亲最多一周内缝了五十四件，总共只能拿六先令九便士。靠母亲缝衣服挣的血汗钱和雪尼的工资，我们的生活勉强可以支撑得下去。

我常常在夜里醒来，看见母亲缝衣服的样子，她低头凑近缝纫机，由于精神高度集中而微微张着嘴，盯着在缝纫机下高速移动的线。重复的机器声会让我再次进入梦乡。常常是因为某一笔分期付款的钱又要到最后期限了，母亲才会这样缝衣服缝到深夜。

后来遇到了一件难事：雪尼需要一件新衣服。因为他一周七天都穿着那套报差制服，惹得所有朋友都取笑他，导致他有两个周末都足不出户。母亲想尽办法凑足十八个先令，给他买了一套蓝色的哔叽衣服。这就导致了我们入不敷出。所以雪尼周一穿制服去上班时，母亲就把那套哔叽衣服当了，换来七先令，周六再赎出来给雪尼在周末穿。一年多来，这已经成了惯例，直到有一天那衣服已经开始破损，当铺的伙计说什么也只肯给三个先令了。这算是一个大打击，一向坚强的母亲也急得直哭，那七先令可是用来维系我们一周生活的啊！

同样，我在兰开夏童伶班的那套衣服也已经破旧不堪，到处是补

丁，变得像小丑的戏服一样。有一天我穿着这身衣服，遇到了当时在斯托克韦尔街的玩伴。我羞愧得不好意思问他来这儿做什么，他却很亲热地跟我打招呼——我知道他不过是在打量我的窘样罢了。于是我尽量平静下来，若无其事地跟他说，之所以这样打扮，是因为刚去上了一节讨厌的木工课。

但他对我的解释并没有兴趣，又问起我母亲，我笑容满面地说她去乡下了，还关切地问他：“你还是住原来那儿吗？”

“是啊。”他盯着我看，好像我出了什么大错似的。

我突然冒出一句：“那我回去了。”

他淡淡一笑，跟我道了别，然后不急不慢地走了，我则气恼而羞赧，匆忙朝另一个方向跑过去了。

母亲经常教导我：“总是取悦别人也许什么也得不到。”可是她自己却并不这样做，我也常常因为这个而觉得丢脸和气恼。有一天，母亲在路上停下，责怪几个欺负流浪女人的孩子。那女人衣衫褴褛，留着短头发，这在当时极为少见，所以小孩们大声笑话她，对她推推搡搡，多亏母亲帮了她。这时那衰弱的女人却认出了母亲：“莉儿，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伊娃·莱丝托克啊。”

母亲立刻认出这是个演歌舞剧时认识的老朋友。我非常难为情，只好在拐角那儿等她过来。那些孩子都嘲笑我，我恼怒地回头看着母亲，她居然和那流浪女人一边说话一边向我走来。我听见那肮脏的女人说，她抱过小时候的我，这真让我一阵反胃。更难堪的是，一路上都有人盯着我们看。

母亲说这女人当初漂亮又可爱，人称“时髦姑娘伊娃·莱丝托克”，不过据那女人自己说，她病过一次，出院后就穷困潦倒了。

母亲带她到公共浴室里洗了澡。然后带她回家，居然还让她睡了雪尼的床，这让我异常懊恼。之后母亲又把自己所有可以给的衣服都给了她，额外还借给她两先令。三天后，这个“时髦姑娘”离开了，从此杳无音信。

在父亲去世前，我们曾一度搬出波纳尔弄，住在母亲的一位教友泰勒太太家。这位太太也是虔诚的基督徒。她总是显得精神气十足，而且因为信教的缘故对母亲额外照顾，把自家三楼的一间屋子以很低的价格租给母亲。她那大房子旁边是一片坟地。

她的丈夫是一个技工，活像狄更斯笔下的匹克威克先生，他干活的时候我经常帮着打打杂。她女儿跟她长得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只是年轻得多，总是一副傲慢的样子。这父女俩不信教，但泰勒太太始终希望能感化他们。

泰勒太太把她的女儿当宝贝，不过我母亲不喜欢她。有一次，母亲跟泰勒小姐吵了一架，在那之后我们又搬回波纳尔弄了。

父亲并不常常去肯宁顿路上的三鹿酒馆，但有一个晚上我经过那儿的时候，却突然心血来潮，把门推开了一条缝，想看看父亲是不是在那，结果真的看见他坐在角落。我正打算离开时，他却笑着招我过去，我很惊讶于他的热情，因为他一向是喜怒不形于色的。走近之后，我发现他眼睛凹陷、身体浮肿，估计已经病得很重。他很亲切地问了母亲和雪尼的一些近况，还在我走之前把我抱到怀里，第一次吻了我。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三个星期后，他被人灌醉，送进了圣托马斯医院。他知道自己身处医院之后，发疯似地大吵大闹，不过这个时候，他已经快不行了。他才三十七岁，却有很严重的水肿，医生从他的膝盖那放出了十六夸脱的水。

那段时间，母亲每次探望父亲过后都很伤心。她告诉我，父亲提到要跟她一起，去非洲重新开始一段生活。我听了之后欢喜异常，但母亲心里明白，她摇着头说：“他只不过是要讨我们高兴罢了。”

几天后，父亲就去世了。

母亲身无分文，想要由戏院慈善团体负担父亲的丧葬费。但卓别林家族里的人全都闹着反对，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太丢脸了。最后，一位非洲的艾伯特叔叔，我父亲最小的弟弟，负担了丧葬费。他当时正在伦敦。

下葬的那天，雪尼因为上班而没能去。母亲提前两小时领我到了医院里，她要在父亲入殓之前再见他一面。父亲的棺材里垫着白绸缎，绸缎旁和父亲脸旁都放着白色的雏菊花朵。母亲觉得那花素雅动人，问是谁放的。管事的说，一大早，有一位太太领着一个男小孩来过。那是露易丝。

下葬时大雨倾盆，掘墓人铲起泥块抛在棺材上，那声音凄厉而厚重。我看着那肃穆可怕的情景，忍不住哭了。之后，亲人们都把花圈

和花朵扔到墓穴里。我们没什么可扔，母亲就拿出那块我最珍视的黑边手绢，轻声对我说：“就把这当做我们一点儿心意吧。”后来，卓别林家人去自家的一间酒馆里吃午饭，临走之前，很客气地把我们送回了家。

回到家之后，发现菜橱只有一碟从烤牛肉上滴下来的油。母亲最后的两便士也已经当饭钱给了雪尼。父亲病后，母亲就几乎没有做缝衣服的活，现在又快周末了，雪尼七便士的工资早就花光。我们都饿了。母亲只能很舍不得的把一个旧煤油炉子卖给了收破烂的，用换来的半便士买了点面包，我们就用面包蘸着那油汁勉强填饱了肚子。

母亲是父亲的法定遗孀，第二天去医院领了父亲的遗物，其实也不过是些破旧衣衫，不过竟然从里面找到了一枚半镑的金币，真是上天怜悯我们啊。

后来有一天，我说服母亲借给我一先令当本钱，做起了卖水仙花的生意，这时我臂上缠着的黑纱就成了赚钱的工具。那些酒馆里的太太小姐知道我是给父亲戴孝之后，就会给我赏钱。我一下午就卖了五个先令还不止，母亲觉得奇怪。有一天从酒馆出来，我跟母亲撞了个满怀。对于她这个基督徒来说，自己的孩子在酒馆卖花是一种耻辱。“酒已经把你父亲害死了，在这里赚的钱只会让我们蒙受不幸。”她留下了我赚的钱，但再也不让我卖花了。

我天性爱做生意，但没处去找本钱。后来我说服了母亲，离开学校去工作，成了在各种行当里摸爬滚打的老油条。我在一家杂货店里当过小伙计，还在一家诊所里当过小用人，接的是雪尼以前的班。这儿待遇很好，每周能领到十二先令，做的是服务生和打扫诊所的工作。在前一项工作上我很讨病人喜欢，但由于个子小，打扫诊所则很吃力。后来诊所的人很和善地跟我说，我太小了，做不了这事。

听到这话，我难过地哭了，所里的金西—泰勒医生看我可怜，就雇我当他家里的小用人。能在这么尊贵的人家当用人，真是让我欢喜异常。那也确实是一件好差事，所有的女仆都把我当成孩子一样喜欢，如果这样下去，我没准能成为个大管家。但后来有一天，太太让我去清理地下室，我无心打扫，却拿着一根铁管子当喇叭吹，被太太逮了个正着，于是她就把我辞退了。

我在一个卖报刊的老板那儿工作过，觉得这活儿很好，不过他发

现我太小之后马上辞退了我。然后我又去吹过一天玻璃，但让那热气给熏晕了，被抬出去之后，甚至没回去领那天的工资。后来我又跟斯特雷克尔文具印刷所里的人吹嘘，说我可以操作菲代尔印刷机，因为我曾经在外面看见过那机器转动，以为这活很容易。正巧碰见他们在招男童工，就去了。对我来说，操作这么个二十多英尺长的东西很是困难，不过我还是接下了这个每周能挣十二先令的活儿。

从此我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要冒着严寒去上工。不过印刷所的工作也不那么让人讨厌，除了要清洗那些巨大滚筒上的油墨之外，其余的活儿我还是可以胜任的，但三个星期之后，我得了流行性感冒，所以母亲又强迫我回去上学了。

那年雪尼十六岁，他有一天很兴奋地告诉我们，自己找到了一份当号手的差事，在多诺万—卡斯尔轮船公司的一艘非洲客轮上工作，负责饭前吹号和一些其他的活儿。这都得益于他从前在“埃克斯默思”号训练船上学会了吹号。这个工作每月能拿二镑十先令，给二等舱里用餐的客人服务的时候还能拿到小费。出海前公司预支了三十五先令给他，他都交给了母亲。于是我们就搬去了切斯特街一家理发店楼上的两间屋子里，因为觉得将来的日子会有转机了。

第一次出海回来的时候，雪尼带了三镑多的赏钱，都是银币。我似乎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钱，于是一直放在手边把玩，不停地把他们堆起来，再放倒，一直摆弄着，后来母亲和雪尼都说我是个十足的吝啬鬼。

那时候我们着实阔绰了一阵子，吃了很多精致的东西，早餐吃的是美味的熏鲱鱼和鳕鱼，周日早晨能吃上松饼，夏天还能买上冰激凌。雪尼在那段时间里给我们讲了他在航行中遇到的很多趣事。不过后来他挣的钱都花完了，幸好公司又一次雇他出航，同样提前预支给他三十五先令。但三周之后，这钱就被花光了，到雪尼回来还有三周。母亲虽然继续做针线活，但那工钱不够我们开销，于是我们又陷入了经济上的危机。

我想了个法子，打算把母亲的一些旧衣服拿去卖掉。那个周六的早晨，我拿着那些旧衣服，在纽因顿靶子场上像个老练的小贩一样吆喝着，“你们愿意出多少钱买？一先令六便士？三便士？两便士？”有些行人惊奇地看看我，然后走掉了。对面珠宝店里的人也对我望着。

我有点窘，但还是坚持在那待着，把一双还算好看的鞋罩卖了六便士。后来珠宝店里的那位先生走过来，问我这买卖做了多久了。我听出他话里有些讽刺的意味，同时也觉得该走了，就包好剩下的东西回了家，母亲对鞋套卖了六便士的价格很不满意，她觉得应当能多卖一点。

那段日子我们为了不交房租而东躲西藏，最终还是回到波纳尔弄三号去了。

这之后，我认识了在肯宁顿路后面的一个老头和他儿子，他们是迁徙于各个城镇的玩具小贩。这种玩具生意最多只要一先令的本钱：准备些不要钱就能弄到的鞋盒子、软木屑，一便士的胶水，一便士的木头，二便士的线，一便士的圣诞节彩纸，再有三卷每卷两便士的彩色锡箔纸。只要这么一先令，就能做成七打小船，看上去五颜六色，招人喜欢，很有市场。每只小船可以卖一个便士。

跟他们熟了之后，我开始帮点忙，所以很快学会了他们的手艺。他们搬走之后我就自己经营起来。我在一个星期内，花了六便士的本钱，做了三打小船，手指也因为剪硬纸板而磨出了水泡。可惜对于两个人的工作而言，我们的顶楼显得太小了，母亲的罩衣常常摆满整个房间，所以总担心我的胶水弄脏了那些衣服。而母亲的活儿能挣的多点，所以我只能放弃这门生意了。

那段日子我们很少见到外祖父。他得了痛风，不能再修鞋了。过去他总会用省出的一两个先令补贴母亲，有时候还会给我们做一种十分可口的燕麦牛奶粥。

我小时候，外祖父对我要求很严格，就算说话的语法这种小事也不例外，所以我一直不太喜欢他，觉得他太严厉了。现在他因为风湿症而住院，母亲总会去看他，每次都能带回满满一袋鸡蛋来，这真是我们穷苦生活中的奢侈享受啊。母亲自己不能去的时候就让我去。外祖父看见我就会很高兴。他告诉我，他很能逗看护们笑。风湿症好点儿之后，他就去厨房里帮忙，所以才能拿到那些鸡蛋。他每次都偷偷地塞给我，我在走之前就赶紧掖在海军服里。不过我总是很担心被人看出来。那几周，鸡蛋就是我们唯一的食物。所以外祖父病好了出院的那天，确实让我们有些难过。

六个星期过去了，雪尼还没有回来。最初母亲还没有慌乱，但一

周之后，她就写信去那个轮船公司的办事处询问，得知雪尼因为风湿症留在开普顿就医了。这让母亲更加焦虑了，健康也受到了影响。不过她继续干活，幸好我也有了一份工作，放学后给别人教教舞蹈，每周能得五先令。

就在这时，麦卡西家搬到了肯宁顿路。麦卡西太太是我母亲的朋友，一位爱尔兰喜剧演员，嫁给了沃尔特·麦卡西会计师。自从母亲离开舞台之后，我们就没再见过他们夫妇，没想到七年后又重逢了。

母亲很少能去看他们一家人，但我很快跟他们的儿子沃利成了一对好朋友。我总是在放学后先赶回家，看看母亲有没有什么活让我做，紧跟着就跑到沃利家去。我们常常在他们家住的霍克特大厦后面玩演戏。身为“舞台管事”的我总是安排自己演坏角色，因为我的本能告诉我自己，演坏人比演好人要好玩。我们每次都玩到沃利要吃晚饭才停。开饭前，我总会表现得很讨喜，从而让他们家人留我吃饭，不过这法子也有不灵的时候，那时我就只得留恋地回家。母亲看我心情好，就会用烤肉的油煎些面包，或是把外祖父弄来的鸡蛋煮一个给我吃，再泡上一杯茶。有时候，她会读书给我听，也有时候跟我一起坐在窗边看着外面，评论着过路的人，编出种种故事逗我开心。

一个星期后，雪尼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当时我太年幼无知，没法感觉到母亲的焦虑，也意识不到将要发生的事。我没有注意到，那几天她总是沉默地坐在窗口，毫无精神，连屋子也不收拾了。我也没有注意到，那家服装店对母亲做的活开始挑挑拣拣，不再给她工作了。因为没法交分期的付款，缝纫机被收走了，我教舞蹈挣的钱也没了着落。我并没觉出，这些问题接踵而至，母亲却表现的迟钝而冷淡。

病了很久的麦卡西太太突然去世了。我立刻萌生了一个想法——希望麦卡西先生能和母亲在一起，这是解决母亲所有问题的最好办法，而且，我和沃利又是那么好的朋友。

麦卡西太太的葬礼后不久，我跟母亲提起：“你应当好好考虑一下，多看看麦卡西先生。我打赌他会娶你的。”

母亲的笑容很黯然，说：“那就让这个可怜人来跟我求婚吧。”

“只要你打扮整齐，跟以前一样叫人喜欢，他肯定会来的。可你连试都不试，只是在这脏屋子里坐着，让人看了害怕。”

我真后悔说这些话，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母亲那是营养不良而引

起的虚弱。但第二天，她却不知哪来了力气，又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了。

那正是暑假里的一天，我还是只想躲开家里那间顶楼，所以觉得还是早点到麦卡西家为好。他们家留我吃午饭，但一种直觉让我觉得要回母亲身边。刚走到波纳尔弄门口，我就被邻居的几个小孩拦下了。

一个小女孩对我说："你母亲疯了。"

我像是被人打了一耳光，嘴里嘟囔着："你们在乱讲些什么啊！"

"是真的啊，"另一个孩子说，"她刚刚敲门，分给每个人家一块煤，说是给孩子的生日礼物。不信你去问问我妈。"

我不再听，一路跑进大开的门，一个箭步冲上扶梯，推开房门，喘了一口气之后，紧盯着母亲看着。那个夏日的午后，空气极度闷热。母亲跟平时一样坐在窗口，慢慢地转身看我，苍白的脸上全是痛苦。

我大声喊着："妈妈！"

她很冷淡地问："什么事？"

我跑过去，扑到她膝上，脸紧紧地偎在她怀里，眼泪止不住地涌出来。

"好了，好了，"她抚着我的脑袋，很亲切地说，"怎么了？"

我哽咽着："你身体不好。"

她安慰着我："我身体好着呢。"但看起她是那么神思不定，忧心忡忡。

"不是！不是！他们说你去每家人那里，去……"我已经泣不成声。

她很虚弱地说："我是去找雪尼呀，他们把他藏起来了，不让我见他。"

这时候我才相信了那些小孩的话。

"妈妈，你别这样说！快别说了！"我哽咽着，"我去找医生。"

她一边摸着我的脑袋，一边说："麦卡西家知道他在哪，可是他们把他藏起来不让我见。"

我大声说："妈妈，你让我去找医生来。"我站起来跑向门口。

她一脸痛苦地盯着我看："你去哪儿啊？"

“我去找医生，一会就回来。”

她不再说话，只紧盯着我。我跑到楼下去找房东太太，跟她说：“我妈妈病了，我去找医生！”房东太太告诉我他们已经找过医生了。母亲被诊断为精神失常，而且营养不良，教区的医生跟我解释，说这是饿的。他把母亲的病症写在一张纸条上给了我。

房东太太安慰我：“还是让她到医院里好，她在那儿可以多吃一点儿。”

她帮母亲穿好衣服。这时的母亲因为过度虚弱，像个孩子那样温顺。我们走出去的时候，邻居和他们的孩子都站在门口惊讶地看着我们。

医院大约在一英里外。我扶着母亲缓缓走着，她虚弱到像喝醉似的，踉踉跄跄。我们的悲惨生活就这样无情地被暴露在午后强烈的阳光之下。我觉得身边的人像梦中的影子一样。母亲一言不发，仿佛知道我们要去哪里，自己也急着要去那似的。我宽慰着她，而她已经虚弱到无法说话，只是一路微笑着。

到了医院里，一位年轻医生接待了我们。母亲顺从地让他检查了身体。但看护要领她走的时候，她却突然转身，很痛苦地察觉到我是要把她丢下了。

而我强颜欢笑地说：“明天见！”

她急切地一直回头看我。看着她走了以后，医生才转过身问我：“孩子，你怎么办呢？”

我实在不想回贫民学艺所里生活了，所以很礼貌地跟他说：“我去我姨妈家。”

从医院回去的路上，我已经难过到整个人都麻木了，但我知道，母亲在医院里，要比没吃没喝地坐在那黑屋子里要好，所以也稍有安慰。可我无法忘记看护领她走的时候，她脸上那伤心的表情。我想到了她的好，那开朗的性格和温柔和蔼的样子，想到这个瘦弱的人常常沿路精疲力竭地走回来，可一见我扑向她怀里，就一下有精神了，满面笑容地看着我。这时我总是急着看她给雪尼和我带了什么好吃的放在纸袋里。就连那天早晨，我伏在她膝上哭的时候，她还拿出一点糖果给我吃。

那天，我没勇气直接回家。只是一路走到纽因顿靶子场那儿，徘

徊到下午很晚才回去。顶楼显得那么空寂和破败。菜橱里除了半小包茶叶之外没有一点儿吃的。母亲搁在壁炉台上的钱包里，放着三个半便士、一串钥匙和几张当票。她刚刚给我吃的糖果还摆在桌角。看到这些我又哭起来了。

那晚我睡得很熟，可能是因为太累了吧。第二天醒来，照在地上的阳光让这屋子显得愈加冷清了。房东太太上来对我说，在她把这顶楼租出去之前，我还可以住那，还让我饿了就尽管去找她要点吃的。我谢了她，说雪尼回来后会补上房租。可我羞于向她要吃的。

这一天我没有兑现跟母亲的承诺，没有勇气去看她。但房东太太去找了医生，并听说母亲被转进了凯恩—希尔疯人院。这伤心事反而让我的良心稍稍好过了一点，因为那儿距家里有二十英里远，我是去不了的。等雪尼回来后我们可以一起去看母亲。刚开始的几天，我没有向认识的人提起母亲的事。

我总是一大早就溜出去，在外面闲晃一整天，随便弄点吃的，饥一顿饱一顿对我来说都没什么。不过房东太太也曾邀我去她那吃饭。

因为不想让麦卡西家知道母亲的事，我刻意避开他们家，逃离了所有的人。

一星期后我对这随遇而安的生活已经习以为常了。我最怕的是如果雪尼再不回来，房东太太就要把我的情况跟教区负责人说，我就会再次被送去汉威尔，所以我一直躲着她，甚至睡在外面。

我在肯宁顿路后边一条小巷子里，认识了几个流浪汉模样的劈柴人。我觉得他们干的这活很有意思，几天后开始帮着他们做。我无意于卖柴火，只是觉得在棚子里和他们一起劈柴很热闹很好玩。

他们都不到四十，安静而和善，不过样子和动作看起来却很老。老板（我们对他的称呼）鼻子通红，满嘴就剩了一颗虎牙，但他看起来有一种自然的、和蔼可爱的样子。另外一个人脸色很黄，嘴唇厚厚的，虽然挺和气，但是沉默寡言，说话很慢，有癫痫症。每当中午快一点钟，老板总是抬起头来跟我说：“你吃过奶酪皮做的威尔士兔子肉吗？”

我回答：“咱们已经吃过好多次了啊。”

于是他哈哈一笑，露出那颗牙齿，递给我两个便士，我就跑到路角阿希的小店里，买回来一便士乳酪皮和一便士面包，我很讨阿希喜

欢，所以他总会多给我些。我们把乳酪皮洗干净了，加上水、盐和胡椒。老板有时再放上一块咸肥肉和一点洋葱屑儿，外加一罐热茶就是一顿可口的午餐。我并没向他们要工钱，但让我喜出望外的是，周末时老板竟给了我六便士。

老板还请我们去伦敦城南游艺场看过一场戏，我们坐的是两便士一张的顶楼座位。我甚是激动，因为那周上演的是弗雷德·卡诺（几年后我进了他的剧团）的喜剧《早起的鸟儿》。

上学的事则一直让我很担心。劈柴的人们偶尔也会提到。因为暑假结束了，他们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所以我白天特意躲着他们，到该放学的时间再过去。但这样的日子是冗长而难熬的，因为我要在酷热的阳光下闲逛到四点半，然后才能到他们那阴凉的地方去。

一天夜里，我正要溜上楼去睡觉，却被一直等着我的房东太太叫住了。她很激动地递给我一份电报，上面写着："明早十点在滑铁卢车站，盼接。雪尼。"

去接雪尼的时候，我的样子太寒酸了，衣服脏乱邋遢，鞋子大张着嘴，帽子的衬里耷拉得像女人衬衫一样，因为怕提水的时候从房东太太门前经过，所以也很多天没有好好洗过脸，只是在劈柴人的水龙头底下那么冲一下而已，前晚上污垢还留在耳朵后面没洗干净。

雪尼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问："怎么了？"

我顾不上婉言相告了，直接说："妈妈精神失常，我只能送她去医院了。"

他的脸色阴沉下来，但控制住情绪，问："你现在住哪儿？"

"波纳尔弄，老地方。"

他转过身去，我这才注意到他的苍白和消瘦。他叫了辆四轮马车来拉行李，我发现他的行李里居然有一筐香蕉！于是马上急着问："香蕉是咱们的吗？"

他点点头："不过太生了，过几天才能吃。"

他一路上都在问母亲的情况。我激动得有点语无伦次，所以估计他只听了个大概。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他在开普顿医院治病的经历。他发起了一次抽彩会，从一些士兵那赢来了二十镑，原先是准备把钱都给母亲的。

他跟我说他打算演戏，不再去航海了。估计这些钱可以让我们过

上二十个星期，他就在这段时间里去戏院找工作。

我们带着香蕉、坐着马车的归来引起了那小弄里的轰动。房东太太跟雪尼说了母亲的事，不过为了免去他不必要的烦恼，就省去了一些细节。

雪尼当天给我买了一套新衣服，那晚，我们穿戴得体体面面，坐在伦敦城南游艺场的正厅里看戏。雪尼一直说着：“要是妈妈今晚也在，还不知道要怎么高兴呢。”

那一周，我们去凯恩—希尔探望母亲，在会客室里的焦急等待让人难以忍受。终于，在听见一串钥匙响之后，脸色苍白、嘴唇发紫的母亲走进来了。她认出了我们，但没有那么开心，没有以前那种欢欣鼓舞的神情。一个喋喋不休的看护陪着她，她说母亲今天身体不舒服。

母亲微笑着很有礼貌地瞥了她一眼，好像要等她走开。

看护走之前补了一句：“她身体好点了，你们再来。”

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了。雪尼一直想要给母亲打起精神，所以一直说着为什么在国外耽误了那么长时间，又怎么运气好，怎么挣了钱，但母亲只是坐在那，边听边点头，恍恍惚惚、忧心忡忡。我安慰她，说她很快就会痊愈的。于是她难过地说：“是啊，那天下午你们要是给我吃一丁点东西，我也不会这样了。”

后来，医生跟雪尼说，母亲这次精神失常一定是营养不良引起的，虽然她现在有时能清醒，但完全康复还要几个月，需要继续治疗。之后的很多天里，母亲的那句话一直在我脑海里回荡着：“那天下午你们要是给我吃一丁点东西，我也不会这样了。”

第五章　第一次登上舞台

约瑟夫·康拉德曾在信中跟朋友说到：生活让他觉得自己像一只被逼到角落的瞎眼老鼠，等着自己的是即将落下的棍棒。这说出了所有落入困境中的人面临的恐怖场景，但这些人里面总有一些会否极泰来，我就是其中一员。

虽然我曾经做过许多杂活，当过报童、印刷工人、玩具小贩、吹玻璃的，还有诊所用人，但跟雪尼一样，无论自己在做什么活，我从没忘记自己要当演员的最初理想。一到休息日，我总会穿上擦亮的皮鞋和洗干净的衣服，再戴上干净的硬领子，准时到河滨大街贝德福路的布莱克默演员介绍所那去。这是我的惯例，直到我的那套衣服破到没办法再穿出去为止。

第一次去的时候，事务所里站的满满的都是穿着体面的“演员们”，有男有女，装模作样地交谈着。我生怕有人看见我那身破旧的衣服和开了口的鞋子，很羞愧地躲在门边的角落里。间或会有一个年轻职员从办公室走出来，极干脆地说一句：“没你能做的工作。也没有你的。也没有你的。”瞬间那些骄傲的“演员”就蔫了下去，事务所里的人也渐渐都走光，像做完礼拜的教堂一样。有一次，那儿就只剩我一个人了，那职员看见了我，突然停下来问：“你来做什么？”

我像奥立弗·退斯特求人给他添点粥一样，可怜兮兮地挤出一句：“你们需要人扮演小孩子的角色吗？”他问我登记了没有，我摇摇头。

让我喜出望外的是，他领我到隔壁的办公室里，登记了我的姓名住址和一些其他细节，并告诉我会在需要的时候通知我。我轻松愉快地离开了那里，因为终于完成了一项任务。

在雪尼回家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布莱克默演员介绍所寄来的一张明信片，让我去他们那。于是我打扮得焕然一新，被带去见了布莱克默先生，他不像我想象的那么摆架子或是吹毛求疵，而是和蔼可亲。他给了我一张纸条，让我去查尔斯·弗罗曼的事务室里去找C．E．汉密尔顿先生。

我向汉密尔顿先生虚称我已经十四了，其实我才刚十二岁半。他看了字条，见我又矮又小，觉得挺奇怪又挺有意思的。他告诉我，需要我扮演《福尔摩斯》里的小用人比利，一共巡回表演四十周，从秋天开始起。

此外，《福尔摩斯》里的主角H．A．辛斯伯里先生，自己又编了一部叫《吉姆，伦敦人的传奇》的新戏，也有一个要孩子出演的角色。“它很适合你。”汉密尔顿先生说。巡演《福尔摩斯》前，戏班要先在金斯顿戏院试演《吉姆》这部戏。他在这部戏里给我每周两镑十先令，之后演《福尔摩斯》的时候也一样。

这么多钱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笔飞来横财，但我却一本正经，连眼睛都不眨，说：“我要跟我哥哥商量一下这个待遇怎么样。”

汉密尔顿先生似乎觉得很有意思，大笑起来，还把工作人员都叫出来看我：“这就是我们的比利，如何？”大家都满面笑容地看着我。我有些纳闷，世界忽然变得不一样，它开始对我宠爱有加了。

然后，汉密尔顿先生给了我一张纸条，让我去莱斯特广场的绿厅俱乐部里找辛斯伯里先生，于是我踌躇满志地去了那儿。在那儿，辛斯伯里先生同样把工作人员们都叫出来看我。他把桑米的脚本给我，说这是他剧里的重要角色。我几乎不会读书，所以生怕他让我当场念台词的时候出丑，不过幸而他让我带回去抽空看，一周以后才开始排练。

回去的路上，高兴到有点傻呵呵的我才明白刚刚发生了什么。我就要实现自己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理想，成为一名演员了！这变化来得是那么突然和意外。我不停地翻看手中的脚本，那本棕色封面的小册子，这是我自打出世以来拿到的最重要文件。我坐在一路行驶的车上意识到，自己已经过了一个重要的关口。我已经是戏剧界的的一员，而不是游荡在贫民窟的野孩子了。这想法让我禁不住热泪盈眶。

雪尼听我说了这些之后，也止不住流泪了。他蹲在床上不住地点着头，盯着窗外，有点出神，最后表情严肃的说：“这可是咱们生活的转机了。如果母亲也能在这里跟我们分享这个消息，那有多好啊！”我很高兴地跟雪尼说，我们一年至少能存下六十镑。

心情平复之后，我们考虑到这个角色的重要性，觉得也许还可以多拿点，我认为可以试着跟汉密尔顿先生提一下。于是雪尼去交涉，

不过汉密尔顿先生最多只肯给两镑十先令了，我们也就欣然同意了。

后来雪尼把脚本上的台词都给我读出来，还教我怎么背。那脚本差不多有三十五页，不过我三天之内就背熟了所有的台词。

《吉姆》开始排练了。在雪尼细致地教导下，每一句台词我都能说得完全正确。只有“皮尔庞特·摩根”这个名字总被我念成“普特普林特·摩根”。辛斯伯里先生让我牢牢记住。这出戏的排练给了我很多启示，让我看到了一片新天地。我很快就学会了很多舞台上的技巧：如何在时间上配合，如何停顿，如何告诉一个演员转身或坐下。不过我说话时会扭着头，有时候幅度有点大，这是辛斯伯里先生纠正我的唯一错误。我在排练中的表现让他十分惊讶，甚至怀疑我以前演过戏。而对于他和戏班里人的赞赏态度，我感到既高兴又理所当然。

《吉姆》要在金斯顿戏院和福勒姆戏院分别试演一星期。这是一出情节剧，我在里面扮演的是报童桑米，台词和动作都很多，观众们觉得这个角色很有意思，可能由于当时我看起来像是个还不到我实际年龄的小孩子吧。我的每句台词都能逗观众发笑，不过在动作方面有时候我却有些糊涂，对我来说讲台词比做动作要容易得多。

《吉姆》没有得到剧评家的好评，但我却因此而崭露头角。查尔斯·罗克，戏班里一位很有声望的老演员，拿给我一篇登在《伦敦热带时报》上的剧评，先跟我说了一通要谦虚谨慎的道理，然后给我念了那篇剧评。我把它一字一句的记住了。作者在讽刺了那部戏之后，写道：“但是报童桑米却是这出戏里的亮点，这个灵巧的伦敦流浪儿是这出戏逗人笑的重要原因。桑米的角色在剧本里毫无新意，但是查尔斯·卓别林这位活泼的小演员却将其演绎的可爱有趣。我以前不曾听说过他，但是希望他能在不久以后大有所成。”后来雪尼买了一打这期的《伦敦热带时报》。

我们演完两个星期的《吉姆》之后，开始着手排练《福尔摩斯》。因为还不确定可以完全摆脱贫困，所以那时雪尼和我还在波纳尔弄住着。

在排练的时候，有一次雪尼和我曾到凯恩—希尔去探望母亲。那天看护告诉我们母亲情况不太好。于是雪尼就去了病房里面看她，我一开始是不敢去的，怕自己承受不了。后来看护告诉我母亲情况稳定了，我才去了病房里面。走之前，母亲叫我到一边，心事重重的跟我

说：“千万别走丢了啊，他们会把你关在这里的。”她在凯恩—希尔治疗了十八个月才康复。雪尼在我巡演时，常常去看她。

辛斯伯里先生在扮演福尔摩斯的时候，跟《河滨杂志》里插图上的福尔摩斯几乎一模一样。他有着一张看起来十分精明的长脸，还有那标志着智慧的前额。他被认为是福尔摩斯的扮演者中最优秀的一位，甚至超过了兼剧本撰写者与福尔摩斯最初扮演者于一身的威廉·吉拉德。

第一次巡演时，我被安排跟格林夫妇住在一起，这夫妇俩丈夫是做木工的，女的则管理戏班的行头。他们有时候喝酒，我又不愿意总迁就他们的吃饭时间，对他们的饭菜也不喜欢。这样下去他们也会厌烦我的，所以，三个星期之后我们就决定不住一起了。我开始一个人独住，因为我太小了，不适合跟其他人同住。在这举目无亲的陌生城市里，我孤独地住在一个后间里，演出之余很少跟其他人在一起，只能自言自语。有时我也去酒馆里看戏班其他人打弹子，但明显感觉到我一去，他们就拘谨起来，而他们对这一点也毫不掩饰，总是在我笑他们轻浮的时候朝我皱着眉。

于是我开始变得忧郁。每到周日晚上，我沿着这北方城镇的大街走着，灯光已灭，教堂里传来清冷的钟声，总是让人觉得寂寞无助。平时我会去市场或商店溜达溜达，买些肉和吃的让房东太太做菜。有时也找来戏班里管食宿的那家人，和房东太太一家人在厨房里吃饭。北方人家的厨房都收拾得那么干净，在阴湿寒冷的一天过后坐下来，对着兰开夏人家厨房里烧的旺旺的炉火，还有灶头上一盘盘等待烘烤的面包，和房东太太一家人一边品着茶，一边吃着涂着新鲜奶油的热面包，的确是个很惬意的时候。

我在外省巡演了六个月。雪尼那时搁置了做演员的理想，当了河滨大街科尔—霍尔酒店里的一名侍应生，因为他一直没有在戏院里找到工作。虽然是在一百五十个竞争者中被成功录用了，但对他来说，当侍应生也是一件没什么面子的事。

他时常在信中告诉我母亲的近况，但我却因为不太会写字而很少回信。于是他在一封信里问我为什么不回信，他提到了我们一起经历的苦难，说母亲病后只有我们俩相依为命，在这种时候我们应当更加相亲相爱，“你应当经常给我写信，让我感觉到自己还有一个弟弟

啊！”这封信将我深深的打动了，我立刻回了信。从此以后，我和雪尼更加亲密了。他的信让我们之间的亲情牢不可破，一生都没有改变过。

而同时，我也习惯了独自生活，平时说话很少。这导致我在偶遇戏班其他人的时候，会显得局促不安。对别人的问题我有点慌乱而语无伦次。有的人可能会奇怪或担心地认为我的精神有些失常。我们班里的女主角，漂亮和善的格丽泰·哈恩可能就这么以为吧。因为我一看见她穿过马路走向我的时候，就急忙躲开她，转身看着店外的橱窗或是向另一条路走去。

我的生活开始变得散漫，对外表也不再讲究。每次和戏班一起上路的时候，我几乎都是在最后一分钟赶到火车站，穿着零乱，连硬领也不戴，大家常常为这些责怪我。

为了排遣孤独感，我买了一只兔子，无论住在哪里，都要偷偷把它藏在屋子里，不让房东太太知道。她到我屋子里之前，我都会把兔子藏进床底下的一只木笼子里，她一走，我就放出兔子来，让它在屋子里上蹦下跳。不过，房东太太似乎能闻到兔子身上那股不好闻的味儿，每次离开时的表情都很疑惑。

不久后，我开始训练那只兔子这样的技能：一听见有人敲门就跑回到笼子里去。房东太太发现了我的秘密之后，我让兔子演了这套把戏，结果她也觉得挺有趣，就耐下心来让我们住完了那一周。

到威尔士的托尼庞蒂之后，房东太太却对兔子的这套把戏笑而不语。那晚我从戏院回去之后，就发现心爱的小宠物不翼而飞了。房东太太只是声称它自己逃走了或是被人偷了。

后来，我们又从托尼庞蒂到了埃布维尔，准备演出三天。那是个阴湿难看的矿业市镇，戏班里的人多数住在小客栈。我算是幸运的，能在一个矿工家里租到一件干净舒适的小房间。每天演完戏还能在火炉前吃到热的晚餐。

房东太太是一位高大而美丽的中年妇女，但脸上似乎总有着忧伤的神情，给我送早餐时也是一言不发。我留意到他们家厨房的门一直关着，只留着一条几寸宽的缝，每次去取东西的时候，我也必须要敲门。

第二天晚上我吃饭的时候，她的丈夫走了进来。他是在戏院里看

了戏回来的，手里拿着一只燃着的蜡烛，正要去睡，见到我就和我说了会话。后来他停下，好像想到了什么事："给你看一样东西，它也许能做你们这行。你见过蛙人吗？"

于是他让我拿着蜡烛，提着灯领我进了厨房，然后把灯放在菜橱上，菜橱下边没有橱门，而是拉着一块帘子。他拉开那帘子，说着："出来啊，吉尔伯特！"

一个怪物从橱里爬了出来，长着一个大到不成比例的扁脑袋，一头金发，没有血色的脸上是塌鼻子和大嘴巴，肩膀和胳膊上的肌肉十分健壮，但没有小腿，穿着一套法兰绒衬衣，裤管被剪到大腿那，能看见露出十个粗短的脚趾头。这恐怖的怪物抬起头，咧开嘴，露出一排黄黄的牙齿，看起来像是二十岁，又像是四十岁。

"跳一下，吉尔伯特！"他父亲说，那可怜虫就慢慢俯身，用手臂撑着往上一跳，几乎跳到我头那么高的地方。

"你看他能去马戏团演出吗？他可是蛙人啊。"

我已经被吓得快不能说话了。不过还是告诉了他几个马戏团的名字，说可以写信试试。

他还是要那可怜儿子再做一些蹦跳、倒立之类的动作，我也只能装出一副欣赏的样子，夸他演得好。临走时我对他说了句："晚安，吉尔伯特。"他也粗着嗓子磕磕巴巴地说："晚安。"

那天，我夜里醒了好几次，每次都要去看看厨房的门锁好了没。第二天，房东太太看起来挺高兴，话也多了："你昨天看到吉尔伯特了啊。不过，他是因为有戏班的人在家住，才睡在那菜橱里的。"

我这才意识到这可怕的事，原来我睡的就是吉尔伯特的床啊。不过我还是答应了一句，并装作感兴趣地问他能不能去马戏团表演。

房东太太点点头："我们常这样打算呢。"

可能是为了讨好房东太太吧，走之前我还特意到到厨房里跟吉尔伯特告别。我尽量装出一副完全不介意的样子，握了握他那满是茧子的大手，他也很和蔼地跟我握了手。

我们在外省演出了四十个星期才回到伦敦，紧接着的八个星期又在郊区各地表演。《福尔摩斯》这戏大受欢迎，所以，第一轮之后三个星期，我们已经又开始准备第二轮演出了。

这时候雪尼和我决定搬家了，从波纳尔弄搬到肯宁顿路上一套更

像样的房子里。我们想要消除过去留下的痕迹，就像蛇蜕去身上的那层皮一样。

同时，我从戏班的管事那儿为雪尼在《福尔摩斯》里谋了一个小配角，每周能拿三十五先令，这样一来，他也进了戏班，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去巡回演出了。

第二轮巡回演出时，雪尼每周都写信给母亲。演出快结束时，凯恩—希尔疯人院给我们来信说母亲已经康复了。我们很快就办好了她的出院手续，打算先接她到雷丁，一家团聚。为了庆祝这件天大的喜事，我们租了一套非常精致的公寓，有两间卧室，起居室里放着一架钢琴，母亲的卧室里摆着鲜花，还准备了一顿精美的饭菜。

在火车站接母亲时，我们俩兴奋而紧张，但是想到母亲必须要适应新环境才能跟我们一起生活，而且也再也回不到当初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了，这样一来，我又有些焦虑。

火车进站后，我们忐忑地盯着从车门那依次下车的旅客，后来终于看见了母亲，她微笑着朝我们走过来。看见我们，她并没有表现的很伤感，而是亲切地跟我们打了招呼。很明显，她也在努力适应着一切。乘马车回去的途中，我们断断续续地谈到了很多以前的事情。

我们首先领她去看那套房子和摆在她卧室里的鲜花，一阵欢欣雀跃之后，我们都在起居室里坐下了，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但在那和睦的阳光下，房子里寂静的空气反而让我生出一些忧郁的情绪。因为看到母亲只要在生活中稍稍满足就很开心了，这让我不免为自己不幸的过去而伤怀。她可能是唯一能让我有这种感伤的人吧。不过，我尽量掩饰住了自己的情绪。母亲老了些，人也胖了点。我一向觉得她很会打扮自己，并以此为傲，希望她能衣着光鲜地跟我一起去见同事们，不过现在她看起来却有些落魄。可能是察觉了我的心思吧，母亲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

我小心地帮她整了整头发，笑着说：“我要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见我的同事。”

她看了看我，取出了粉扑往脸上扑点了粉，高兴地说：“看我过着多么幸福的生活啊。”

不久后我们互相适应了，我也不再有那种为过去伤怀的情绪。不过因为年龄渐长，我们不会再像小时候那样亲热地黏着她了，她也心

知肚明，因此我们也就觉得她更通情达理了。在巡演那段日子里，她会出去买些吃的用的，还要带回来一些鲜花。这跟从前一样，就是再穷苦，她星期六晚上也要带点紫罗兰回来。只是有时候我对她的沉默和冷淡感到难过，感觉她有时候不太像母亲，而像是我们的客人了。

过了一个月，母亲要回伦敦了。她想省些旅费，不再跟着我们到处跑，而且想要在我们巡演结束前布置好一个新家。她在切斯特街那家理发店的楼上租了一套房子，就是以前我们住过的地方。此外她还买了一套十镑的家具，分期付款。那几个房间当然谈不上雄壮华丽，但是她在卧室里装橘子的木箱上盖上了印花布，别出心裁，让它们看起来像小衣柜一样。雪尼和我每周能挣五镑五先令，把其中一镑五先令交给母亲。

第二轮巡演结束后，雪尼和我陪了母亲几个星期。我们虽然很乐意陪着她，但由于家里比起设备舒适的外省公寓要简陋一些，所以我们又有点想再次参加巡演。这时候我们对那些小享受已经开始习惯了。母亲也觉察到这点了吧，去火车站送我们的时候，她看上去很高兴，但火车开后，她在月台上笑着挥舞手绢的样子却又显得忧郁。

在第三轮巡演的时候，母亲来信说，那个露易丝，也就是父亲的后一个妻子死了，她只比父亲多活了四年，就死在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兰贝斯贫民学艺所里，真是造化弄人。她的小儿子也被送进了雪尼和我曾经去过的汉威尔学校。

母亲在信里说，她去看了那个孩子，他已经十岁，完全不记得雪尼和我曾经和他一起住过，因为那时候太小了。他对自己的父亲也没什么印象了。据母亲所知，他也没有其他的亲人。他很漂亮，安静害羞，看起来心思缜密。母亲给他带了些食物，而且说要经常去看他，我相信她确是常去的，直到后来她自己旧病复发，再度进了凯恩—希尔疯人院。

知道母亲再次发病之后，我心如刀绞。我们一直不了解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只是在一份短短的通知里得知有人发现她一直在马路上徘徊，说话语无伦次。束手无策的我们只能听天由命。母亲从此再也没有完全清醒过，而之后的几年，凯恩—希尔疯人院也渐渐萧条，我们手头宽裕了之后，才想办法把她转到了一家私人医院。

不过命运之神并没有完全抛弃母亲。因为在母亲生前的最后七年

中，我们都长大成人，功成名就，她也过上了不曾想到的舒适生活。

后来，《福尔摩斯》的上演权被哈利·约克先生从弗罗曼戏班买走了，他是布莱克本皇家戏院的老板，于是我们在这个戏班的巡演就告一段落了。新戏班邀上了我们，去更小的城镇里演出，但每人的报酬都降到了三十五先令。

这个新戏班和弗罗曼戏班相比逊色了很多，这让我们十分懊恼。我本不打算让别人知道我对这班子的歧视，但由于被新导演问到了一些舞台技巧，我就急着告诉他弗罗曼戏班是怎样导演的。这引起了戏班人的不快，从此他们就当我是个乳臭未干的自负小子。一个新的舞台管事还多次借机找我的麻烦。

后来，机缘巧合，《福尔摩斯》的作者威廉·吉拉德编了一出叫《福尔摩斯难做人》的开幕戏，共三个角色：一个疯女人，一个福尔摩斯，还有福尔摩斯的小用人比利。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吉拉德的管事波斯坦斯先生给我拍来一封电报，问我能否扮演比利这个角色，到伦敦跟吉拉德一起出演这场开幕戏。

我激动极了，但又急得团团转，因为不知道我们的戏班能不能在外省找到人，替我演他们这边的比利，好在他们真的另找到了一个比利。

回到伦敦后，我们在西区的一家戏院里演出。这次经历被我形容成自己的新生。我到了约克公爵戏院，会见了舞台管事波斯坦斯先生，他领我会见了吉拉德先生。我还见到了美若天仙的玛丽·多萝，她有着娇嫩的嘴唇，整齐雪白的牙齿，令人心醉的下颌，乌黑的长发和一双棕色的眼睛。这种美丽让刚满十六岁的我惊呆了，我告诉自己不要被她迷住，却还是对她一见钟情了。这一切的经历，几乎让我有些眩晕。

优秀的女演员艾琳·范博朗在《福尔摩斯难做人》里演那个疯女人，出演福尔摩斯的吉拉德只是坐在那听她念着大段对白。我则在剧里说了一句笑话："您的办法是对的，先生。那儿才是真正的疯人院呢。"

剧评家们对这幕剧里的笑话是欣赏的，但他们批判吉拉德为玛丽·多萝所写的《克拉丽莎》并不成功。于是吉拉德在那之后又开始重演《福尔摩斯》，我依然在剧中扮演比利，又能拿到每周两镑十先令。

这让我喜出望外。

排练的时候，我再一次遇见了玛丽·多萝，我告诉自己不要为她倾倒，但对她的爱慕却又在沉默中渐渐加深，我恨自己的软弱无能，觉得她可爱，却又因为无法接近她而觉得她可恨。她演的是爱丽丝·福克纳，我没有跟她合演的戏。但我算好时间，故意在楼梯上遇见她，然后结结巴巴地说句“晚上好”，她也会笑眯眯地说声“晚上好”。这就是我们所有的接触了。

《福尔摩斯》一炮走红，我参演的时候，有一次亚历山德拉王后同希腊国王和克里斯琴亲王也去看戏了。

在这部戏结束前两周，巴昔卡先生开了封介绍信，把我介绍给当时大名鼎鼎的肯德尔先生和太太，希望能让我在他们的新戏里演个角色。那时候他们正在圣詹姆斯戏院里上演一出很卖座的戏，正好快要结束了。我们约好上午十点在那家戏院的休息室见面。二十分钟之后，才看见肯德尔太太远远地走过来。她神情傲慢，一见我就说：“你就是那个孩子啊。我们下一部戏要到外省巡演，我很愿意听你念下脚本。可我们现在太忙了，明天早上这个时间，你再来一趟，好吧？”

我冷冷地答道：“对不起，夫人。很可惜我不能去外省演出。”然后就将帽子稍微抬了抬，出了休息室，雇了一辆马车走了。此后的十个月里，我就一直散漫着，无事可做。

在约克公爵戏院演完最后一场《福尔摩斯》后，玛丽·多萝要回美国去了。那晚我一个人在外面喝到酩酊大醉。两三年后，在费城，卡诺喜剧团参演新戏院开幕典礼的时候，我又看见了她，依然是那么美丽。她致辞时，我就站在条幕后面看着，但因为演丑角，又已经上了装，所以因为难为情而没让她知道那就是我。

伦敦演出的《福尔摩斯》和在外省的巡演的《福尔摩斯》几乎是同时结束的，所以雪尼和我都闲下来了。不过他在《时代》戏报上看到了一则广告，于是很快就进了查理·马侬的丑角闹剧班。这种戏班演的都是幽默的哑剧，不过配上优美的舞剧音乐，很受观众欢迎。后来，弗雷德·卡诺，最杰出的丑角闹剧班的班主看中了雪尼，邀他去了自己的戏班，每周给他四镑的薪酬。当时那里没有合适的戏让我演，不过幸好我在伦敦演出时存了点钱，于是在雪尼去外省演出的时候，

我就一个人留在伦敦，偶尔去台球室打打台球。

第六章　在卡诺剧团

这一阶段里，我进入了躁动的青春期，酝酿着年少时分的情感。我憧憬着那些冲动热情而又轻狂的事情，有时候畅想，有时候苦恼，对生活忽而憎恨忽而热爱，徘徊在这庞杂的迷宫里。我的词典里从不曾有过“艺术”这个词汇。演戏仅仅是我谋生的手段罢了。在这种独自迷茫和混乱的时期里，我也曾接触过娼妓，还喝过酒，但这些都不能让我流连忘返。浪漫和刺激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很了解那些穿着爱德华时代服装的无赖青年们的心理。他们无非和我们一样，喜欢传奇而冒险的生活，想要引人注意罢了。既然那些公立学校的学生可以寻欢作乐，胡作非为，那这些无赖们要出出风头的想法不是也很自然吗？

后来，我在凯西马戏团里找了份工作，那是个让孩子去扮演街头上的大人的戏班子。我在歌舞剧中扮演并且讽刺大盗迪克·特品和“医生”沃尔福德·博迪。我对博迪“医生”的模仿相当成功，那是对一种教授和学究式的人物的性格刻画，已经超出低级的逗笑层次了。我把自己扮得和博迪活脱脱一个模子印出来，于是成了戏班的台柱子，每星期能挣三镑。我觉得那戏挺差劲的，不过给我提供了一个锻炼自己喜剧演员才能的契机。

在伦敦演出的时候，我们六个演员都在肯宁顿路的菲尔兹太太家寄住。这位六十五岁的老寡妇有三个女儿，弗雷德丽嘉、茜尔玛和菲碧。弗雷德丽嘉的丈夫是个俄国细木匠，挺有派头，却长着一张鞑靼人的大扁脸，亚麻色的头发和胡子，还有一只眼睛是斜的，难看极了。我们六个每天在厨房里吃饭，跟他们渐渐熟稔了。于是雪尼回伦敦演出的时候也住她家。

我离开凯西马戏团后又回到肯宁顿路，仍住在菲尔兹家里。她是个很和蔼的老太太，勤勤恳恳，完全靠房租为生。大女儿弗雷德丽嘉有丈夫养活，所以不用她负担。茜尔玛和菲碧帮她做些家务活。菲碧十五岁，鸭蛋脸庞，微钩的鼻子，十分漂亮。不管是肉体还是感情方面，她都深深地吸引着我。但我知道，当时不满十七岁的自己，对女

孩子打得都不是什么好的主意，所以一直很理智地克制着自己。而菲碧则为人正派，后来成了我很好的朋友。

菲尔兹一家人都容易激动，有时候会为了谁做家务而大吵大闹。二十岁左右的茜尔玛最娇惯，也最懒惰，总是把家务事推到弗雷德丽嘉或者菲碧身上。小吵往往发展成大闹，于是家里那点丑事也会闹得人尽皆知。从菲尔兹太太话中听出，茜尔玛曾经跟一个年轻的利物浦律师私奔过，从那以后就不愿再做家务，而是当自己是个贵妇人。菲尔兹太太吵到气极时，也会拿这事来讽刺她，她则毫不退缩。

每当这个时候，总会由菲碧来调解劝和。她为人正直、处事公平，家里人都喜欢她。每次吵架结束，也总是她自告奋勇去做家务，但茜尔玛却拦着她不让她做。

我失业快三个月了，雪尼每周交给菲尔兹太太十四先令，那是我的食宿费。他现在在弗雷德·卡诺的戏班里已经是主要喜剧演员了，而且常常会向卡诺提到我，说我很有演戏天分，但卡诺却觉得我太小了而不加理会。

那时候犹太喜剧演员在伦敦是最受欢迎的，我就想到戴上大胡子演犹太人，隐瞒自己的年龄。我从《麦迪逊汇编》这本美国笑话书里，摘出一些歌曲和有趣的对话，编成一出戏，用雪尼给我的两镑钱准备排练。我连着好几个星期都在练习，还表演给菲尔兹家人看。她们看得都很认真，也一直给我打气，不过没什么其他表示。

我找到福雷斯特游艺场，一家建在迈恩路不远处犹太区中心的小戏院，因为在凯西马戏团的时候我曾经在那演过戏。戏院管事觉得我还可以，就答应让我借场地试演一周，不过没有任何报酬。我把将来的理想全压在这一个星期的试演上了。期待着在福雷斯特一鸣惊人，然后再去伦敦所有的大剧院里轮流演出。没准还能平步青云，在一年内成为轻歌舞剧中响当当的名演员。我还答应菲尔兹一家人，等排练完了，就去给她们拿戏票。

周一的午后，我很专业地带着所有人排练了一遍，但对自己的装扮始终拿不准，无论多少假胡子都瞒不住我的年龄。更重要的是，我的喜剧内容是十分反犹太人的，我之前竟然没有意识到。何况，我的笑话很陈旧，模仿的犹太口音也十分拙劣，而我自己本身也并不是个能逗人笑的人。

我刚说完了开场的几句笑话，台下的人就开始起哄，往台上扔铜子儿和橘子皮，而且愈演愈烈，还夹杂着嘲笑和吆喝。于是我离开舞台，也没跟戏院的管事说话，径直到化妆房里卸了妆，离了戏院，连放在那的几本音乐书都没拿回来。

我回去时已经很晚了，很庆幸菲尔兹家人都已睡着。第二天，菲尔兹太太很急迫地问我演得如何，我假装漫不经心地说："还不错，但要做修改。"她告诉我菲碧去看了演出，但回来的时候很累了，所以没跟家里人说如何。后来菲碧没有说这事，我也就让它过去了。菲尔兹一家人都没再提过，她们对我没有演满一星期也没觉得惊讶。

幸而雪尼当时不在伦敦，我不用痛苦地跟他讲述这段经历。他也从未问过我，估计是猜到或听说了吧。那晚的可怕经历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也让我清醒的认识到，我缺乏接近观众和吸引观众的天赋，不适合做个轻歌舞剧里的喜剧演员。不过我也安慰自己，在刻画性格方面，我还算是个成功的喜剧演员。不过，想在这一行里崭露头角，这一次的挫折怕是不够的。

我十七岁那年，得以在《快乐少校》中扮演少年主角，那是出令人沮丧的戏，仅仅演了一周。扮我妻子的女主角，是一个五十岁的女人，满身杜松子酒的气味，我这个多情的丈夫还要把她搂在怀里吻着。这次演出真是把我从前要成为男主角的远大理想消磨殆尽了。

之后我又开始涉猎编剧的工作，写了一出叫《十二位正直的人》的短小喜剧，讲一个陪审团审理违约案件的故事。陪审员里一个是聋哑人，一个是个醉汉，还有个赤脚医生。我跟玩杂技的催眠师查科特说了这个故事，他愿意出三镑给这个脚本，让我导演这部戏。于是我们请了几名演员，在肯宁顿路号角酒馆的聚会室里进行排练。有个爱挑毛病的老演员总是批评我这剧写的无聊而粗俗。

第三天练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收到查科特送来的一张字条，告诉我他不想再演下去了。但我生性没那么洒脱，只是没动声色地把字条揣进兜里，让大家继续排练。午饭时，我把那些演员都带到我们的宿舍里，说我哥哥有话要跟他们说。然后在卧室里给雪尼看了那张字条。他问："你还没跟他们说吗？"

我小声说："没有。我没办法说出口，让他们知道自己白练了三天。"

“我去告诉他们，这又不是你的错！”雪尼大声说。

我却害怕地哭了：“我可怎么说呢！”

“别傻了。”雪尼去了隔壁，把查科特的字条拿给大家看了，说了一下原委，然后带我们到拐角的酒馆吃了三明治，还喝了酒。

演员们的举动常常让你意料不到。那个爱发牢骚的老家伙这时表现得最让人宽慰。他听雪尼说了我的为难之后开始大笑，拍着我的背说：“这可不是你的错，孩子，只能怪那个该死的老无赖查科特。”

就这样，自从在福雷斯特戏院的演出失败以后，我一直在碰壁。但由于年轻，我一直很乐观，总是相信有一天会时来运转。那一天真的来了，雪尼说卡诺先生要见我。当时卡诺可能是不满意在他的当红短剧《足球赛》里跟哈里·韦尔登先生搭戏的丑角。韦尔登是倍受观众欢迎的丑角，直到他临死前，三十多岁的时候，一直都是最能卖座的。

卡诺先生长得矮小精壮，紫褐色的皮肤，炯炯有神的双目。起初是个登杠子玩杂耍的，后来成了一名杰出的喜剧演员，塑造了不少喜剧人物。他赚了很多钱之后，有一次被人埋怨演戏的时候时间把握得不好，于是干脆不再登台，只是开戏班了。他家住在坎伯韦尔区的科德哈伯弄，隔壁的房间既做储物间又做办事处。他很客气地接待了我。问我：“雪尼说你很会演戏，你对跟哈里·韦尔登合演《足球赛》有没有把握？”

哈里·韦尔登可是特邀的演员，每周能拿三十四镑的薪酬。

不过我很有信心：“只要给我机会就可以。”

他笑了：“十七岁很小，不过你看起来还不到十七呢。”

我耸了耸肩膀：“这只是化装的问题罢了。”

卡诺开始大笑：“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之后我听雪尼说，我就是因为那一耸肩才进了戏班子。

当时我们定了两周的试用期，每周有三镑十先令，如果我演得好，就能签下一年的合同。

离《足球赛》在伦敦游艺场上演还有一周的时间，让我可以对角色进行揣摩。卡诺让我去牧林戏院看看和我演一个角色的那个人的表演。说实话，他演得的确不怎么样，我很有信心超过他。而且我觉得这角色需要有更多模仿和讽刺的幽默成分。我也打算就这样去演绎。

韦尔登先生忙着打高尔夫球，不高兴来排练，所以我只跟他一起排练了两次。排练中，我也表现平平。当时我感觉韦尔登对我出演这个角色的能力有点怀疑。雪尼当时正在外省演出，否则可能会给我一点帮助，因为他曾演过这个角色。

《足球赛》中，一切都是为了韦尔登这位著名的丑角作准备，所以每一次都要等到他出场，台下才响起笑声，并且一直持续到他下场。

那晚登台前，我的神经绷得像拧紧的发条，一直在巨大的舞台后来回踱步，默默祈祷，又焦虑又恐慌。我期待着用今晚的表演一洗在福雷斯特戏院演出的耻辱，重拾自信。

幕起乐响，在一段歌舞之后，台上空了。该我出场了啊！这时候我极度紧张，但一走上台，神经马上放松了，脑子也完全清醒了。我走上场，背对观众，这是我自己设计的出场方式。从背后看过去，我穿着礼服，戴着大礼帽，套着鞋套，手里还拿着手杖，体体面面，完全一副爱德华时代反面角色的打扮。结果一转身就让观众看见了我的红鼻子，他们哈哈一笑，开始对我有了好感。我故作姿态地耸耸肩，打个响指，在台上走了一圈，却被一个哑铃绊了一大跤。然后我的手杖无意中打在一个吊球上，吊球“叭”的一声打到我的脸。于是我踉跄了一下，这时手杖却又从侧面打到了我的头。于是观众们开始大笑不止。

此时的我完全放松，可以连续耍五分钟的宝，不说一句话而让观众们笑个不停。以前，哈里·韦尔登台前可是从来都不会有笑声的。这次他一走出场，我就激动地抱着他的腰，低声说：“这下遭啦！给我一根针！”这都是即兴表演，没曾排练过。我已经让观众情绪高涨，给他创造了有利条件，所以那天的表演非常成功。结束后，戏班里的几个演员都过来祝贺我，我也知道自己演得算不错。而韦尔登只回头冷冷跟我说：“演得不错，很好。”

那天夜里，为了缓解激动的心情，我步行回家。路上，我停下来倚在威斯敏斯特桥的栏杆上，低头看着桥底闪闪发光的流水，高兴得想哭，却又哭不出来。只觉得心里一片空虚。下了威斯敏斯特桥后，我走向象堡，坐在一家小咖啡馆里喝茶。很想找个人聊聊天，但雪尼当时在外省表演，我无法跟他讲述今晚精彩的经历。在经历了福雷斯

特戏院的那次挫败之后，今晚的表演对我来说是多么大的宽慰啊。

从象堡走到肯宁顿门之后，我又喝了一杯茶，还是没有一点睡意。一路上自言自语，呵呵笑着。直到早晨五点，疲倦不堪的时候才沉沉睡去。

卡诺先生第三天晚上才来，那天我一出场就赢得了观众的掌声。之后他满面笑容地来找我，让我明早去他的办事处里签合同。

我没有写信跟雪尼细说初演的情况，只是拍了一份极简短的电报，告知他已经签了一年的合同，每周四镑。《足球赛》在伦敦连续上演十四周之后，开始去各地巡演。

在这剧里，韦尔登主要靠模仿兰开夏那种言语迟钝的傻子来逗笑。这对于南部的人来说，就显得没有那么好笑了。这些城市的观众对韦尔登都挺冷淡。所以那几周里，韦尔登的脾气一直很暴躁，把气全撒在我身上，对演戏只是敷衍了事。戏里面有他打我脸的情节，其实应当是由在条幕后的另一个人拍巴掌配音，好让观众觉得像真的一样。但他有时竟真的很重地打我耳光，多半是嫉妒的缘故。

在贝尔法斯特演出的时候，剧评家们把韦尔登批驳得体无完肤，却对我的演技高度赞赏。于是无法容忍的韦尔登对我恨到了极点，那天他在台上狠狠地打了我一顿，我鼻血直流，痛得几乎没有力气再演下去。事后也因为这事跟他起了争执，他却不承认自己是嫉妒我。

雪尼回伦敦后，准备在布里克斯顿路安家。我们在那租了一套房子，并且打算在家具摆设上花个四十镑。我们在前面那个房间铺上了地毯，其他几个屋子铺上了漆布，还买了一套家具，有床和两个扶手椅。起居室的角落里摆了一架手工屏风，对面摆着一个镀金画架，放着一幅镶着金边框的蜡笔画，还买了一架竖式钢琴，总共比预算多了十五镑，不过我觉得那钱花的是很值的。

从此以后，布里克斯顿路格伦肖大厦的十五号房，就成了让我们留恋不已的家。每当在外省演出的时候我们总是格外渴望回去。这时我们手头有不少富裕的钱，每周能补贴外祖父十先令，还能雇个女佣打扫房间——虽然没什么必要。住在那房里的感觉就像是在神庙里一般。雪尼和我总坐在那两张大大的扶手椅里，怡然自得。我们还买了个有浮雕的铜炭围，四周有垫了皮的座位。我总是在扶手椅上坐坐，再去那儿坐坐，试试哪个坐着更舒服。

在我快十九岁的时候，已经是卡诺剧团里很红的喜剧演员，但我总觉得有些不足。春来春去，夏日又是那么空虚无聊。工作单调，生活也很烦闷。我觉得自己永远是为了生存而奔波劳碌，前途渺茫，过着一种毫无意义的庸俗生活。我开始变得郁郁寡欢，容易不耐烦，还会在休息日独自去公园散步，听乐队演奏。这一切的迹象都表明，我开始渴望爱情了。

那段日子，我们每天晚上都要在两三个游艺场里表演。在斯特里塞姆帝国戏院的时候，有个歌舞团排在我们前面，叫“伯克—库茨美国姑娘”。我从来没注意过她们。但有天晚上，我站在条幕后发呆的时候，忽然她们中的一个在台上滑倒了，逗得另外几个直笑。其中有一个姑娘的眼神不经意间跟我碰上了，我立即被她那双闪亮而顽皮的棕色大眼睛迷住了。她像个小羚羊一般苗条，有着一张端正的鸭蛋脸，饱满的嘴唇和好看的牙齿。那一瞬间我就像触了电一样。她下场后，曾叫我帮忙拿着一面小镜子，以便她整理头发。于是我也就近距离地看了她。故事就这样开始了。星期三那天，我约她在周日见面。她大声笑了：“我还不知道你不抹红鼻子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呢！”这是因为当时我扮演的是一个爱喝酒的丑角。

我解释道：“我的鼻子可不是这么红，也没有打扮的这么老。”

第二天，我送给她一张我的照片，上面是一个身量尚小的青年，戴着黑领圈，满脸愁容——我觉得这照片拍的比我本人要好看。

她看了之后说：“没想到你挺年轻嘛，我还以为你至少有三十了。”

我笑着说：“我还没满十九呢！”

后来她答应我周日下午四点在肯宁顿门见面。因为平日都要排练演出，没法约会。

那天真是酷暑难耐。我打扮得很体面，穿了一套有点时髦的收腰黑衣服，戴着黑领圈，还拿着黑檀木手杖。四点还差十分的时候我就到了那，紧张地看着走下车的乘客。

我还不曾见过她卸了装是个什么样儿，这让我有点害怕。没准她的美只是因为化装而显出来的吧。所以每当一个样貌平平的年轻姑娘从车上下来之后，我都要失望好一会儿。

还有三分钟到四点，一个长得不怎么样的姑娘从车上跳下，朝我

这边走来。想到整整一个下午都要故作高兴地陪着这个人，真是让我心灰意懒。但出于绅士，我还是略抬了帽子，并挤出一个笑容，她却狠狠地瞪了我，从我身边走过去了。多谢老天爷，幸亏不是她。

四点多一分，又一个年轻姑娘下了车，她走到我面前停下，戴着一款简单的水手帽，身上是一件蓝色短上衣，手插在外套口袋里，没化妆，看起来却更美。她对我说："看，我来了。"

我顿时慌乱而激动了，不知如何是好，只是哑着声说："叫辆车吧。"紧张地向路上看了一会儿之后，又转身问："你喜欢哪儿？"

她耸耸肩膀："随便。"

"那上了车咱们再决定吧。"我说。

我一路上都是那么热情激动，不停地赞扬着她的美丽，肯定都让她莫名其妙了。我本来也想说些有趣的话，好让她对我印象深刻一点，可怎么也说不出来。我已经从银行里取出三镑钱，打算带她去特罗卡德罗，想要在那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地方展现我的风流潇洒。但她的目光却很冷静。她是不会了解这一切对我的意义的。我当时都不曾想到男女之爱，只是单纯地想多跟她在一起多待会。在我当时那种身份下，是难得有机会跟这么漂亮优雅的姑娘相处的。

那天晚上，我一定要请她在特罗卡德罗吃饭，她起初怎么也不答应，不过还是没拗过我。吃饭的时候我为了显出潇洒，一直有点装腔作势。所以离开那豪华酒店的时候，我们反觉得如释重负了。离开特罗卡德罗之后，她就坚持要回家了。她没答应我雇车的建议，想要步行回去。这对我当然更好，因为这样我就能在她身边多待会了。

这时候我的心绪已经平静，她也没有起先那么拘谨了。我们沿着泰晤士河滨一路走去，海蒂谈到她的朋友们，还有些趣事和琐事。但我几乎都没有听下去，只是觉得像在天堂漫步一样，沉浸在迷人的夜色中了。

我送她回去后，又独自沿河往回走，我已经完全对她入迷了。像被一种诚挚的善良感动了一样，我把身上的钱都施舍给了睡在泰晤士河畔的穷人们。

她每天八点钟要在沙夫茨伯里大街附近的地方排演。所以那晚我们约好第二天早上七点钟再见面，尽管我每天演完戏要两点钟以后才能睡，但天一亮我就起来赶去见她。

连续三个早晨，我都和她在一起。我完全沉浸在这短暂而愉悦的相见中，坚信我们是因为有缘，而在冥冥之中注定要相遇的。那几天除了每天的早晨，其他的所有时间都显得可有可无了。但第四天早晨，她突然变得冷淡了，甚至连手都不肯跟我握，变得一点兴致也没有。我半嗔半怪地说她不再爱我了。

她回答："你真是想入非非。不说别的吧，我才十五呢，你也只比我大四岁而已。"

我不知道她这几句话的意思，但我看得出她突然跟我生分了。

"你是说，你其实并不爱我啊。"

她说："我不知道。"

这让我大吃一惊，但还是故作镇静地说："你不知道，那就是不爱我啊。我跟你说过，遇到你会让我烦恼的。你看我猜得一点不差。"她只是一言不发地走着。无论我怎么旁敲侧击，想知道她对我的态度，她也只有一句"不知道"。

于是我表白了："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还小呢。"

"那如果是必须要嫁人，你要嫁我还是嫁别人呢？"

她只是重复着："不知道。我喜欢你，但是……"

"但是你不爱我。"我完全心灰意懒了。

她一言不发。那个满天乌云的早晨，整条街看起来那么凄凉落寞。

走到地下车站入口的时候，我沙哑着嗓子说："是我的错，我太冒失了，咱们还是分手吧，以后也不要再见面了。"我心里想着她听到这话会有什么反应。

她看起来十分严肃。

于是我亲热地拍拍她的手："那么还是再见的好，我已经太受你影响了。"

她回答："再见。对不起。"

这道歉让我倍受打击。看她慢慢走进地下车站里的时候，我的心中是无法承受的空虚。

我错了吗？太鲁莽了吗？我太傲慢太愚蠢了，可能现在我必须要出一次丑，才能再见到她吧。也许是因为我对她太执着太热情了。下

一次见面，我一定要表现得淡淡的，若即若离的。但她还会见我吗？肯定的，她不会这么容易就抛弃我的。

第二天早上，我忍不住又走向坎伯韦尔路。这一次我遇见了她的母亲。她数落我："看你对海蒂做了些什么！她回家后哭着说你永远也不会跟他见面了。"

我苦笑一声，耸耸肩膀。心里想，她又是怎么对我的啊！

我请她去酒店喝酒，并央她再让我见海蒂一面，她同意了。

我们走到她家门口，海蒂开了门，带着一股清新的香味。她一见我，就显得惊讶而忧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大眼睛里流露出冷淡的神情。我知道是没有希望了。

于是我假装开玩笑地说："看，我又来跟你道别啦。"

她不说话，但能看得出她很想让我走。

我笑着伸出手："那，又一次再见了。"

她冷淡地答了句："再见。"

我转身，走了几步之后，听见那门在我身后被轻轻地关上了。

我只和她约会过五次，每次几乎都只有二十来分钟，但这段短短的经历却长时间影响了我。

第七章　首次出国

1909年，巴黎女神剧场的比尔内尔先生邀卡诺剧团去短期演出一个月。于是我有了出国的机会。一想到这个，我就异常兴奋。出发之前，我们在阴暗潮湿的伍尔维奇演出，所以我一直希望能去一个新环境。起程的日子定在周日早晨。我还差点儿误了车。

横渡海峡时大雨倾盆，但令人难忘的是，穿过迷雾我第一次看到了法国。我一直提醒着自己："那不是英国，那是法国的大陆！"那是我一直以来憧憬着的一个地方。因为实际上卓别林家族是法国人，在亚戈诺时代才到了英国。父亲的一位叔父经常夸口，说卓别林家族在英国的这一支是一位法国将军的后裔。

时值深秋，火车从那些清冷落寞的村庄穿过，让人沉闷不已。突然，在渐暗的天际慢慢出现一片灿烂的灯火。同车的一个法国人说："那是巴黎的灯光啊。"我立刻兴奋起来了。

巴黎的一切都跟我想象的一样。从火车站到若弗鲁瓦—玛丽街的一路上，我激动而急切。在每个拐弯处都想下车去看看。那大概是晚上七点吧，诱惑的金色光芒从咖啡馆里透出来，从摆在咖啡馆外的桌子就能看出，巴黎人是多么会享受生活。除了多出一些汽车之外，巴黎和莫内、皮萨罗和勒努瓦笔下所描绘的还是一样。那天是周日，到处一片欢喜和活泼的氛围，像是所有人都在玩乐嬉戏着。

那晚没有演出，我们去女神剧场，也就是明天我们要演出的剧场去看戏。剧场到处都装饰着镜子和巨大的枝形水晶挂灯，看起来金光灿灿，富丽堂皇，这是我见过的最有派头的戏院。休息室和楼道上铺着厚厚的地毯，那些上流社会的人物就在这来回走动。带着粉头巾、浑身珠光宝气的是印度王子，在酒吧里喝着白兰地的是法国和土耳其军官，还戴着插有羽毛装饰的头盔。宽敞的外间休息室里奏着音乐，还有衣帽间，女士们把披肩和皮大衣寄存在那，露出雪白的肩膀。这些都是老观众，故意在休息室和楼道里走来走去，想引人注目。那个时代的女士们都既漂亮又文雅。

剧场里还配备着一些专门的翻译，来回走动，带着"译员"标志的

帽子，我认识了一个翻译领班，他会好几国语言。

我们的戏在女神剧场很卖座，原本可以连演十八个星期的，但卡诺先生之前已经和别的地方约好去演出了。我每周能拿六镑，但都被我花光了。雪尼的一个表兄，他父亲的某个侄子吧，来跟我认亲。他是个上流社会的有钱人，带我在巴黎玩了不少地方。他很迷戏剧，甚至剃光胡子冒充我们剧团的演员去后台玩。可惜过了一阵子他必须回英国了，听说他一回去就被父母严厉斥责一番，送到南美洲去了。

我去巴黎前听说，海蒂的舞剧团也在女神剧场演出，所以想要再见她一面。到巴黎的当天，我就去剧院后台打听，一个跳舞的姑娘告诉我，那个舞剧团已经离开巴黎一周，去了莫斯科了。我正跟那姑娘说着话，楼梯上突然传来一个粗莽的声音："快给我回来！你怎么能跟陌生人说话！"那是她母亲，我解释说自己只是在打听个朋友，但她完全不听，还是说："不准跟那家伙啰嗦，给我立刻回来。"

她的粗鲁让我很生气，不过后来我跟她渐渐熟悉了。她们母女三人跟我同住一家旅馆，两个女儿都在女神舞剧团里跳舞。十三岁的小女儿长得好看，舞也跳得好，是舞剧团里的主角。十五岁的大女儿却恰恰相反，长得难看又跳不好舞。这个母亲是个丰满的法国人，四十岁左右，丈夫是苏格兰人，当时在英国。她在我演出之后来找我，为刚才的鲁莽跟我道歉，我们就和好了。她们还常常邀我到她们房间喝茶。

如今想来，我那时真是天真啊。有一次我和那母亲单独在她们房间里，跟她大谈了一些我的理想、爱好和经受的一些失望，让她颇为感动。我站起来的时候，她突然走到我面前，双手捧着我的脸。"你真可爱，"她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你这么好的孩子，是不该被人欺负的。"她的表情有些古怪，声音颤抖起来："知道吗，我像爱自己的儿子一样爱你啊。"接着，她慢慢向我靠近，吻了我。

我回答："谢谢你。"然后诚挚而天真地回吻了她。她的目光还是凝滞在我脸上，哆嗦着嘴唇。后来，她忽然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去倒了一杯茶，脸上似乎流出一丝笑意，说："我真的很喜欢你，你太可爱了。"

她悄悄告诉我："小女儿是个很好的女孩，但大的那个有点麻烦，你要对她留点神。"

我常在演出后被邀到她和小女儿住的大卧室去吃宵夜，跟她们道了晚安之后，我回去必须经过大女儿的房间。有一次我经过的时候，她对我招招手，悄声说：“把门开着，等她们都睡着了我就去你房间。”信不信由你，我当时气愤地一把推开她，大步离开了。我听说她在女神剧场的演出结束后，跟那个六十岁的驯狗师，一个身材魁梧的德国人私奔了。

然而，我也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天真。一般年轻人会做的狂浪不羁的事，我都会。或是和戏团的人出去通宵达旦地玩，或是在妓院里狂歌滥饮。有一天我多喝了几杯苦艾酒，在酒馆里跟一个人打了起来，后来被警察和酒馆的人拉开了。那个人以前是个轻量级的职业拳击手，叫阿尼·斯通。当时我们两人住在同一家旅馆里，于是他对我说：“旅馆里再决胜负。”凌晨四点我踉踉跄跄地回到旅馆，去了他房间。

为了不惊吵别人，我们脱了鞋，拳打脚踢地斗了很久，最后他一拳正中我的嘴，打到我的门牙，我这才清醒，于是说：“住手，我可不想被你打掉牙齿。”于是我们停下手，拥抱了一下。我把他的脸全打破了，自己的一双手也肿得像戴了拳击手套似的。房间里溅得到处都是血迹，连天花板上都有。

夜里，我嘴角的血一直流到脖子上，在舞剧里演主角的女孩照例给我送茶点，还以为我自杀了，吓得尖声惊叫。从那次之后，我再也没打过架了。

又一个晚上，翻译告诉我有一位知名的音乐家要见我，带我去了他的包厢。包厢里还坐着一位俄国芭蕾舞团的女演员，是个极漂亮的姑娘。那位先生告诉我，他对我的表演十分欣赏，说我是一位天生的音乐家和舞蹈家，而且没想到我如此年轻。听了他的夸奖，我客气地鞠了一躬，还偷瞄了他的女友几眼。离开包厢后，我问翻译：“那位先生身边的小姐是谁？”

“她是俄国一位芭蕾舞演员，叫……”接着翻译说了个长而复杂的名字。

我又问：“那位先生的名字呢？”

“德彪西，非常有名的作曲家。”

“我没有听说过。”我说。

那年，指控斯坦赫尔夫人谋杀自己丈夫的案子被传得沸沸扬扬，最后她却被判了无罪；那年，开始流行用于男女间调情的“蹦蹦舞”，一对对情侣们没羞没臊地搂在一起转圈；那年，竟然通过了让人难以接受的所得税法令，每镑要缴六便士；那年，德彪西的《牧神的午后序乐》被介绍到英国上演，但听众们只是喝了倒彩，还退出了剧场。

我一腔愁闷地回国了，开始了到外省各地的巡演。这些地方和巴黎真是有天壤之别。在北方城镇那些愁苦的周日黄昏里，全部店铺都关了门，清冷的钟声似乎是对人们的谴责。喝了酒的年轻人和嬉笑着的姑娘们，三五成群地在昏暗街巷里游荡着，一路吵吵闹闹。这也是他们周日傍晚唯一的乐趣。

六个月后，我总算对现在的工作适应了。这时从戏团在伦敦的办事处传来一条让我雀跃的消息。卡诺先生让我在《足球赛》的第二轮演出中顶替哈里·韦尔登的角色。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契机。我虽然在其他一些短剧中获得好评，但如果比起《足球赛》中的主角，那些演出都只是微不足道。更何况，我们这次要去伦敦一流的牛津游艺场上演。我的名字会第一次被印在戏单的最顶端，成为全市人瞩目的中心，这是个大大的进步。如果我一举成名了，就可以拿到一大笔薪酬，接着就能拓展我的演艺范围，实现我各种美好的梦想

《足球赛》用的演员基本上都是原来的，所以我们只需排练一周。我对如何演绎自己的角色揣摩了很久。不同于哈里·韦尔登的兰开夏口音，我打算在戏里说伦敦本地话。

不巧的是，我在第一天排练时得了喉炎。我用尽所有的办法想让嗓子痊愈，轻声说话，吃药片，喷药水都不管用。我已经急到完全无心去想在演出时怎么插科打诨，逗人发笑了。

第一场演出时，我绷紧了嗓子里所有的血管和神经，拼命大声说话，但观众们还是听不见我在说什么。事后，卡诺过来责怪我，脸上的表情既失望又有些轻蔑。我跟他保证明天嗓子就能好，但实际情况却更糟糕了。我用嗓过度，很可能导致完全失声。于是第二晚，另一个演员临时顶替了我。第一个星期结束后，我的戏被取消了，在牛津游艺场的所有梦想都化为泡影，在沉重的打击下，我得了流行感冒。

感冒初愈，我身体虚弱，心情郁闷。忽然想到了已经一年多不曾见到的海蒂。有一天很晚了，我信步走向她家，却发现那幢房子已经

空了，贴着一张写着“召租”的纸。

于是我继续漫无目的地在那几条街上转悠。忽然，一个人影出现在夜幕中，向我走过来，跟我说：“查理！你来这做什么？”这正是海蒂。她出落得更俏丽了，打扮得也很时髦，穿着一件海豹皮的黑色外衣，头上戴的是海豹皮圆帽子。

我开玩笑地说：“来接你啊。”

她笑笑：“你瘦了啊。”

我跟她说，自己流行感冒刚好。

“你来这儿又做什么呀？”我问。

“刚才去看一个朋友，现在要去我哥哥家了。”她问我，“你要一起去吗？”

她在路上跟我说她姐姐嫁了一个美国的大富翁，住在尼斯，她明早要离开伦敦去跟他们一家住上一段日子。

那晚，海蒂在她哥哥身边的时候，看起来是那么娇憨和妩媚。我在一旁看她和她哥哥翩翩起舞，不由得觉得，自己对她已经没有当初那么热情了。可能是因为她跟其他女孩没什么区别了吧？想到这一点，我心里难免惆怅，觉得自己对她而言，只是一个旁观者了。

那个寒冷的夜晚，月光皎洁，我们一起往回走。我用忧伤而冷漠的声音说，她将来一定会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她告诉我：“你说的这么悲伤，我都要哭了。”

回旅馆后，我感到有些得意，因为她觉出了我的忧郁，可见我的性格给她留下了印象。

让人又高兴又气恼的是，我的嗓子在一个月内就痊愈了。于是卡诺又让我演出《不作声的鸟》。我尽量不去想《足球赛》演出的失败，但却一直有着这样的念头，觉得也许是因为自己不配代替韦尔登。而这个念头，又勾起了福雷斯特游艺场那次失败的打击。我始终没有重拾自信，所以，一旦担任一次喜剧主角，我就要经受一次可怕的心理考验。而现在，我的合同又已经期满，我决定要跟卡诺先生谈谈，要求增加薪酬。

卡诺对自己看不上眼的人，是完全不会留情面的。幸好他对我一直挺喜欢，所以还不曾奚落过我。我跟他谈到加薪的时候，他责怪我弄砸了牛津游艺场的演出，并且告诉我别人说我演得不行。这就像一

记重拳打到我心上，让我又气又恼，但我还是镇定地说：“别人可不是这么想的，有人还愿意给我更多的薪酬让我演戏呢。”其实我这只是一句谎话而已。

于是卡诺在电话里接通了伯蒙德赛区明星戏院，让我听他们的对话，那戏院在电话里说我演得糟透了。这反而激怒了我。我告诉卡诺，如果他也觉得我演得烂，我们就不必再签合同了，还要求把薪酬从五镑提到六镑，虽然我对这点没什么把握。但没想到卡诺竟应允了，开始重新信任我。

后来，卡诺剧团在美国分部的经理阿尔夫·里夫斯来了英国，听别人议论说，他是要来挑选一位喜剧主角带到美国去的。

在牛津游艺场的失败之后，我就一心想去充满刺激感和冒险精神的美国，希望能在一个新的环境中重拾希望，重整旗鼓。说来幸运，当时我主演的新喜剧《溜冰》正在伯明翰上演，深受欢迎，里夫斯先生就在那时去找我们，于是我在表演时使出了浑身解数。里夫斯果然看中了我，就拍电报跟卡诺说了这件事。但卡诺准备让我演别的戏。所以我一连好几周都在担心。后来，卡诺看上一部叫《银猿》的短戏，是关于一个人如何被介绍到秘密社团里的喜剧。里夫斯和我都不看好这部戏，卡诺却认为鉴于美国有很多秘密社团，所以这戏在那边一定会卖座。于是他安排我去美国，在《银猿》一剧中担任主角，这个决定让我甚为激动。

当时我觉得自己在英国已经没有什么发展空间了，发展的机会也有限，去美国对我来说正是最好不过的。由于我几乎没读过书，所以一旦在游艺场演丑角失败了，那就只能沦落到去干粗活了。但是到了美国之后，我会有更光明的未来。

起程前夜，我漫步在伦敦西区，一路走过莱斯特广场、考文垂大街、马尔街和皮卡迪利街。我沿途走走停停，一想到这是最后一次看见伦敦了，就倍感寂寞寥落，因为我已经决意要长住美国了。我一直徘徊到夜里两点，一路静默无人的街道徒增了我的伤感诗意。

跟家人告别是我最讨厌的，亲友的送别只是让人平添愁绪罢了。我六点钟就起床了，没有惊扰雪尼，只是留了张字条在桌上：“起程奔赴美国，会常常写信给你。查理。”

第八章　来到美国

我们的船在恶劣的天气下开往魁北克，一直在海上航行了十二天。船舵有三天坏了，差点抛了锚。不过想到自己是要出国，我的心情还是很愉快的。

九月上旬的一天，我们的船在迷雾中行驶，绕过纽芬兰，看见了大陆。在蒙蒙细雨中，圣劳伦斯河两岸看起来十分荒凉。魁北克从船上看过去，就像是徘徊着老哈姆雷特鬼魂的那堵城墙，我开始猜想美国到底是什么样子。

但随着船驶向多伦多，秋色中的田野愈发美丽了，这让我的希望油然而生。我们在多伦多乘上火车，奔赴美国移民局办理手续。一个周日早晨的十点，我们终于抵达纽约。从有轨电车上走下来，看见纽约时报广场的时候，我有些失望。报纸被风刮得到处都是，看来很不齐整，百老汇大街像是个起床后还没有梳洗的女人，十分凌乱。几乎每个路角都放着高椅子，穿着衬衫的人们舒服地坐在那里让人擦鞋。看来他们习惯于在马路上收拾打扮。也有些人无所事事地站在人行道旁，看起来像是外地旅人，趁换乘火车的间歇在这里打发时间。

这就是充满了冒险情趣的纽约，让人有些畏惧和不知所措。和它不同，巴黎让我觉得更亲切。我不会法语，但在巴黎每个小酒店和露天咖啡座都很受欢迎。纽约却是个让人做大生意的地方。冷冰冰的高楼大厦不会考虑老百姓的方便。酒吧也没有顾客的座位，只有一条可以搭搭脚的铜栏杆。食品店虽然收拾得干干净净，却没什么人情味，让人觉得十分冷漠。

我在如今纽约时报大厦的所在地，第四十三街附近租了一间屋子。这屋子阴暗脏乱，让我不免怀念在伦敦的家。地下室是个洗衣房，每天熨烫和烘干衣服时散发出的难闻气味都让我不舒服。

第一天在饭馆里点菜，我就面临了窘境，因为自己是一口英国口音，说话又慢。那些人的话说的既快且急，让我担心自己慢吞吞的说话方式浪费了他们的时间。

我不适应纽约这种快节奏的生活。这里，连做小买卖的干起活来

都是干净利落；擦皮鞋的飞快地抖动他那擦鞋布；酒吧伙计把一杯啤酒轻轻一推，一直滑到客人面前；卖苏打水的给客人调上一杯鸡蛋麦乳精牛奶，动作都那么敏捷，像是杂技演员的戏法一般。

第一天白天，我看见路上很多人都孤寂寥落。也有些人架子很大，态度十分冷淡，好像觉得软弱无能的人才会对人热情礼貌似的。但入夜之后，随着一群穿着夏日衣衫的人走在百老汇大街的时候，我的心境开始平和了。这时已经是天气晴暖的晚秋，八十度上下的气温。百老汇大街上亮起千千万万盏五颜六色的灯，如同华丽的珠宝一般闪耀。就在这个温暖的夜里，我对美国的态度转变了，那些高楼大厦，那些绚烂的灯火，那些争奇斗艳的广告牌让我燃起了希望，开始憧憬着冒险。我对自己说：“就是这个地方，这就是我应当来的地方！”

在百老汇大街上，仿佛所有的人都是做娱乐行业的。演员、玩杂技的、玩马戏的和表演其他技艺的到处都是。他们在各处谈论着自己的表演，马路上、酒店里、旅馆里和百货公司里，还提到许多戏院老板的名字。即便是女佣、电梯工人、侍者、售票员、酒吧伙计或是送牛奶的、烤面包的，说起话来听着都像是开戏院的。比方一个看门的会说：“你看到艾尔·乔尔森在冬花园里演的戏了吗？他肯定留了一手准备在杰克戏院演出呢。”

报纸上每天都登着整版舞台新闻，看着像赛马预报的表格一样，而且他们也跟划分赛马一样，把轻歌舞剧按照受欢迎的程度列出名次来。我们的戏班还没进入“比赛”，但我急着知道演出过后，我们在报纸上所排的位置。起初我们只定下了在珀西·威廉的戏院演出六周。暂且还没接到其他戏院的邀请，所以这次演出决定了我们能在美国待多久，一旦演砸，我们就必须回英国了。

我们订了一间房间，在那里花了一个星期时间排练《银猿》。卡诺在美国很有名声，所以我们的戏码被排在一流演员的上边。虽然我不喜欢这出独幕剧，但也要竭尽所能演好它，希望它能如卡诺所说，“最合美国人的胃口”。

第一天出场前，我的紧张程度自不待言。美国演员们在条幕后面盯着我们看，这又让我我如芒在背。我的开场笑话，在英国观众里是非常有市场的，而且可以借此预测下面的戏能不能演得成功。但在这

里，台下只有轻微的笑声，然后就寂静一片。接下来的几句笑话仍然打不破台下的一片沉默。我们只能沉闷地演下去，条幕后的美国演员脸越拉越长，没等我们演完就全走光了。

这出剧确实索然无味，我早就劝卡诺不要把它安排成主要剧目。我们还有其他很多能让美国观众有兴趣的独幕剧，但卡诺总是不听劝告。

对这次失败，不说别的，单是演出的情形就让人沮丧而难堪。每晚我们都在台上演着充满热情、妙趣横生的英国喜剧，台下坐着的却是冷漠无语的观众。我们在戏院里偷偷地来来去去，如同逃犯一样。而且连着六周都在受这样的羞辱。其他戏班的演员也都远远地躲开我们。我们在条幕后面等待演出时，个个都垂着头，灰心丧气，像是等待枪毙的囚犯。

这经历让我倍感孤独挫败，幸好我是一个人住，避免了让自卑感影响到其他人。白天我总是沿着漫长而不知所终的大街散步，或是去动物园、公园、水族馆和博物馆里打发时间。演出失败之后，我一直觉得纽约很可怕。高大的建筑和适者生存的环境压迫着我们。那豪华的房屋看来并不是住宅，而是记录成功的纪念碑。它们都好像在无情地提醒我，我个人的力量是那么微不足道。

有时候，我会走到很远的贫民区，那里的穷人看起来都是那么冷漠或是愤怒，有的在地上爬，有的尖声高叫，有的哭，有的笑，到处都是。那景象让人十分泄气，于是我又急着要回到百老汇大街了。

美国人都相信乐观主义，他们敢想敢做，永远在不停地尝试。他们一心要名利双收。还有一些像倾销存货、捞了钱就跑或是改换行业这种不安分守己的点子。他们这些想法让我受益匪浅，我在这里还有很多其他的机会啊，我又不打算献身于艺术，何必要固守这一行呢！于是戏班的失败反而让我轻松起来，觉得自由了。我重拾信心。决定无论经历什么事都要在美国待下去。

为排遣失意，我想要学点知识，于是买了一些课本回来，下决心研究。可惜的是，我没能持之以恒。那些书只被我简单的翻了翻，就压在箱底，之后全忘了。直到我第二次去美国时，才再次把它们拿出来看。

戏班的演出虽然失败了，但我个人却得到了戏剧界很高的评价。

《剧艺报》的赛姆·赛弗曼这样提到我："至少，那剧团里还有一个能逗人笑的英国人，总有一天美国人会为他倾倒的。"

我们当时都已经心灰意懒，打算一演完六个星期就收拾行李回国了。但第三个星期，在五马路戏院演出的时候，观众们大多是在美国当管家和仆人的英国人。所以那个星期，一开演我们就大受欢迎。观众们对我们的每一句笑话都报以满堂笑声。由于预想中还会是前几周的冷清场面，所以我们所有人都大为惊奇。因为演出时很放松，我那天演得十分成功。

在那个星期，一位戏院的经纪人看中了我们的戏，于是请我们去西部给沙利文和康斯汀巡演二十周。我们准备每天演三场轻歌舞剧。

虽然第一次的巡演没一炮打响，但我们的成绩跟其他戏班相比还是可以的。在美国，那个年代的中西部是让人喜爱的。那儿生活节奏比较慢，充满了传奇浪漫的色彩。每一间药铺和酒吧门口都有供人摇骰子的桌子，你可以把赌注下在店里的任何货物上。每到周日早晨，街上就会一直传来骰子的响声。我曾经好多次用一角钱赢了一块钱的东西。

在那儿生活很省钱。在小旅馆里解决食宿，一周只要七美元。食品卖得特别便宜。我们戏团的人总是去吃酒吧柜台上的便餐。只需五分钱，就能喝上一杯啤酒，吃上一样可口的菜肴。

戏团里总共十五个人（也许不止），扣除火车卧铺的票钱，每人都能省下一半的薪酬。我一周能拿七十五美元，总是按时存五十美元到曼哈顿银行里。

太平洋沿岸地区是我们此次巡演的目的地。有一次跟我们同去的有一个年轻英俊的得克萨斯州人，他的戏跟我们排在一起。他是个演空中飞人的，但正在犹豫要不要改做职业拳击手。我每天早上都陪他练拳，总能打中比我更高更大的他。后来我们的关系变得非常好。练完拳之后总要一起吃午饭。他的家人是得克萨斯州的普通农民，因而他跟我谈到农场的生活。于是很快我们就想到要放弃做演员，一起合伙养猪赚钱。

我们大做致富梦，计划用两千美元的存款，在阿肯色买两千亩每亩五角钱的地，余下的钱用来买猪和打理土地。我们按猪每年一窝生五头计算，如果一切顺利，五年内每人就能赚十万美金。

每次从火车的窗户看见养猪场，我们都激动万分，吃饭、睡觉、做梦的时候满脑子都是猪。直到买了一本教人科学养猪的书，看到里面详细描写了阉猪的方法，我的满腔热情才冷却，渐渐把这念头抛诸脑后了。

这次巡演，我还带上了我的小提琴和大提琴。我从十六岁开始，每天都要在卧室里练习四到六小时。而且每周我都要请戏院的乐队指挥或是他推荐的人来教我。我渴望将来成为一名首席小提琴手，如果实现不了这愿望，那在轻歌舞剧团里拉琴也可以。后来渐渐长大，我意识到自己不是这块料，于是只得放弃。

1910年，依然富有边疆时代精神的芝加哥还在以它的丑恶吸引着人们，偏僻而脏乱。在我的想象中，它跟俄国大草原相仿，应当有着一望无际的原野。这座城市有着拓荒者那种蓬勃向上的彪悍精神，但男性那种寂寞和愁闷又隐藏在它骨子里。这就导致了一种特殊的“歌舞剧”风靡全国。剧里面是一帮举止野蛮的丑角和二十来个合唱团的姑娘，她们中有的年轻漂亮，也有的年老色衰。丑角们挺能逗笑，而这戏的内容却比较粗俗猥亵，强调男人的重要性，再点缀一些讲述两性纠纷的庸俗情节。说也奇怪，这戏不会让观众们联想到色欲，其中的故事反会惹人同情。

我们到芝加哥之后，住进了瓦巴希大街上的一家旅馆，在商业区外面。演歌舞剧的姑娘们也住在那，所以这冷清和寒酸的旅馆也显得别具浪漫。我们在每个城镇都会找那些姑娘住的旅馆下榻。我也渴望一段艳遇，不过却不曾实现。每天夜里，附近很高的铁轨都有火车疾驰而过，闪烁的光影投射在我卧室的墙壁上，如同老式电影放映机一般。在那家旅馆里我没有什么传奇经历，但还是很喜欢那里。

有一个年轻美丽的姑娘，总是显得安静而扭捏，不跟其他人在一起。我偶尔经过她身边，也始终没鼓起勇气跟她搭话。从芝加哥去太平洋沿岸时，她和我们同车。有一次，我在车厢里看见她跟我们戏团里的一个演员说话。后来我从那个演员那儿听说她得了梅毒，十分可怜。

到了西雅图之后，她不得不进医院，离开了歌舞团。车上所有的剧团都给她捐了钱，不过这样一来她的事也就让所有人都知道了。不过幸运的是她被治愈了，后来又能够再加入歌舞团。

那时候，美国的妓院到处都是。芝加哥一家万国妓院更是声名远播，据说那儿拥有所有国家的妓女。房间也装修成世界各地的建筑风格，是全世界最讲究、最昂贵的一家妓院。百万富翁、行业巨头、内阁成员、议员和法官都会光顾那里。

我越向西走，越觉得那些地方惹人喜爱。从火车里只能看见大片的荒野，虽然清冷落寞，但那种一望无际却让我眼界开阔，充满希望。那儿的城市个个都是一片繁荣，这也让我欢欣鼓舞。我们在其他剧团结交了很多朋友，经常六七个人一起在城镇的妓院区里聚会。有时我们跟老鸨套上了近乎，她那晚就会把妓院全场包给我们。也有些爱上了演员的姑娘，跟着他们到附近城镇去了。

随着继续西进，一路所见的城市越来越干净了，这让我十分开心。我们经过温尼伯、塔科马、西雅图、温哥华、波特兰这些城市，其中温尼伯和温哥华基本上都是英国观众。对于一心向往美国的我，能在英国观众面前演出，也未尝不是轻松愉快的。

终于抵达加利福尼亚州了。这是个在太平洋海岸绵延千里的乐园，风和日丽，到处都是橘树林、葡萄园和棕榈树。1910年，我们到达到美国通往东方的出口——旧金山，那地方在经历了1906年的那场地震，或是人们所说的那场大火之后，已经被重修了。几乎看不出毁坏的痕迹，连我住的那家旅馆在内，所有东西都是崭新而美丽的。

我们在那里的皇后戏院演出，锡德·格劳曼这个戏院老板和他的父亲都为人和善，爱交朋友。那时候，戏报上第一次没有提到卡诺，而登上了我的名字。那些可爱的观众们在演出时笑声不绝，沉闷的《银猿》在那里上演时也能场场客满。格劳曼很高兴地邀我在卡诺戏班演出结束后再回来演出。在旧金山，能让人感觉到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与此相反，洛杉矶则让人感觉丑陋。那里的居民像是患有贫血症似的，个个脸色蜡黄。天气虽然很温暖，但没有旧金山那种清新的空气。

那时候我觉得，将来，即使有一天，好莱坞只剩下了威尔夏尔大街上历史悠久的柏油坑了，加州北部也会因为得天独厚而继续繁华的。

我们的第一轮巡演在盐湖城结束，这个被烈日下的热气包围着的城市，空荡荡的，像摩门教徒一样显得冷淡而沉默。那里的观众也给

人同样的感觉。

我们在巡演过后回到纽约，打算直接回英国了。但由于威廉·莫里斯先生当时正和其他几个剧团抢生意，所以我们受邀在他纽约第四十二街的戏院里演出六个星期，上演我们所有的戏目，主打戏是《英国游艺场之夜》。观众对我们的演出大为赞叹。

有一晚，几个年轻人出来打发时间，不经意间走进了威廉·莫里斯的美国音乐厅，看见了我们的演出。他们当中一个说："如果有一天我做了老板，我就要请那个演员演戏。"他指的是在戏里扮演酒鬼的我。这个说话的年轻人叫麦克·森纳特，当时是一个临时演员，每天能拿五美元，是后来奇斯顿影片公司的创始人。

我们这六个星期的演出空前卖座，于是再一次被沙利文和康斯汀轮回上演戏院邀去做巡演，为时二十个星期。

第二轮巡演快要结束，三个星期之后，我们就要回英国了。这难免让我心中抑郁。

我在离开旧金山前的那天，在街上漫步，偶然走进了一家看相算命的店铺。接待我的是一个四十岁上下的胖女人。她嘴里还嚼着饭，像例行公事一般，看都不看我，就指着墙根的小桌子让我坐，然后自己坐在我对面，对我说："请洗一下这些牌，对着我抽三次，然后把您的手摊到桌上。"她翻过牌，铺在桌上仔细地看了一会儿，接着看我的手。"您现在准备出远门，也就是要离开美国。但不久以后您还会回来干另一行，不同于您现在做的。"她说到这里有些迟疑，略显迷惑。"虽然有些不同，但又几乎是一样的。我看您干新的这行前途无量，但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职业。"这时她才抬起头来看看我，拉起我另外一只手："您要结三次婚，前两次不那么美满，但最后生活幸福，还有三个孩子。"（这个她可算错了）然后，她又一次仔细地看了我的手。"这可是一只发财的手啊，您将来会成为百万富翁的。"接着她又给我相了面，说道："您将来会得支气管肺炎寿终，享年八十二岁。请交一元卦金吧。还有什么要问的问题吗？"

我大笑起来："没有。我还是不多麻烦您了吧。"

第九章　与电影开始结缘

离开时我并没有多么留恋，因为自己已经决意将来会再回美国，而如何回，何时回，我暂且还没有考虑过。而且，我也很渴望回到伦敦，怀念住在我们家那套舒适房间里的日子。去美国之后，我几乎把那几间屋子视为我的朝圣之地了。

我很久没有接到雪尼的信了。他最后一封信提到要把外祖父接到我们家。但在伦敦车站接我的时候他却跟我说，他结婚了，所以退了那套房间，搬到布里克斯顿路一所有家具的房子里去了。这让我倍受打击，因为我已经无家可归了。那个让我的生活充满了意义的地方，那个让我宽慰的避风港，那个让我骄傲的家已经不存在了。我只好在布里克斯顿路租了一间房子。但那个地方让我觉得郁郁寡欢，我想要尽快回到美国。那晚，伦敦对我的归来表现得那么冷淡，我就像一枚钱币投进了空洞的老虎机一样，毫无声响。

我很少去看雪尼，因为他已经结婚，而且每晚都有工作。但每周日，我们都会一起去看望母亲。母亲的病情不大好，在那医院里也得不到很好的治疗。由于我们现在已经能负担她的医疗费了，就把她转进一家私人医院，已故的英国著名喜剧演员丹·伦诺曾经在那住过院。

我像个流浪儿一样，孤独感一天天加强。我想，如果能够回到当初那套小公寓里，我的情绪不会这样的。不过，我自然也会有快乐的心情。英国熟悉的风俗和生活都让我倍感亲切。当时正值夏季，英国在这个时候的浪漫和可爱是绝无仅有的。

卡诺，我的老板，邀我跟他一起去塔格岛度周末，乘着他那艘能住家的船去。那是一艘装修考究的船，船上镶着红木板，还有几间客厅。入夜时分，船上亮起五光十色的彩灯，十分好看。在一个温暖而叫人欢喜的夜晚，我们吃完晚饭，坐在甲板的彩灯下，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抽着烟。这样的英国风情让我对其他国家不再留恋了。

从美国归来后，我们的戏团再次登台，在伦敦的各个游艺场连续演出了十四个星期，非常卖座，观众们都十分喜爱。但我一直在想着自己能不能回到美国。我爱英国，却不可能在英国一直生活下去。我

总是因为自己的卑微出身而感到不安，想到自己将来注定会郁郁不得志。因而，当知道我们又被邀请到美国巡演时，我才觉得又看见了出人头地的希望。

周日我和雪尼去看了母亲，她的情况似乎有所好转。雪尼离开伦敦去外省前，我跟他一起吃了晚餐。在伦敦的最后一晚，为了消解心中的混乱和烦闷，我又去西区散步，边走边告诉自己说：“这些街道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了。”

这次我们乘的是“奥林匹克”号，住在二等舱内，抵达纽约后再转赴美国西岸。随着轮机声渐弱，我们离目的地也越来越近。这次来美国让我觉得很亲切，因为我已经交了很多外国朋友。

在热爱纽约之余，我还期待去西部，再去见那些以前是萍水之交，现在我认为是好朋友的人，就像蒙大拿州比亚特一间酒吧里的爱尔兰伙计，明尼阿波里斯那个腰缠万贯而热情好客的地产商人，圣保罗那个跟我缠绵了一周的美丽姑娘，盐湖城那个苏格兰矿山的老板麦卡比，塔科马那个为人和善的牙医，还有旧金山的格劳曼一家。

我们去太平洋沿岸之前，一直在一些小戏馆里演出，主要在芝加哥和费城郊区，还有福尔河和德卢斯那些工业城镇里。跟往常一样，我仍然独自在外面寄住。这正好给我提供了学习知识的机会。之前的几个月，我一直想要学习，却难以付诸实践。当时戏班里热心学习的不止我一个。只不过我不像他们为学而学，我对知识的学习不是因为爱好，而是想把它作为挡箭牌，以免自己因为愚昧而受人歧视。我总是利用空闲时间去逛旧书店。

有一次在费城，我无意间看见了一部罗伯特·英格苏尔的《论文演说集》。惊奇地发现他的无神论观点跟我的想法完全契合。接着我还读了爱默生的《谈独立》，粗略地看了叔本华的《世界是意志和表象》，还有沃尔特·惠特曼的《草叶集》。在化妆室休息时，我喜欢读一读吐温、坡、霍桑、欧文和黑兹利特的作品。也许在这次巡演期间，我没能像预期的那样阅读很多古典著作，但对演戏行业下层的沉闷却有了充分的体会。

这段时间，巡演低级轻歌舞剧的情形让人沮丧，我们每周演七天，每天演三场甚至四场。这种拼了命的辛苦让我对美国的希望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英国的时候，演轻歌舞剧就好比在天堂里一样快活。

每周只演六天，每晚两场。不过在这里总算有一点好处，就是能多挣点钱。

在内地连续五个月的乏味演出已经让我心灰意懒，所以在费城休假一周的时候，我简直太高兴了。我决意从轻歌舞剧那烦闷的演出中解脱出来，尽情享受一周浪漫而闲适的生活，把自己忘记，成为另外一个人。这时候我一下想开了，想要痛痛快快地花一次存下来的钱。我节衣缩食地存了这么多，如果有一天失业了，又得过节衣缩食的日子，何不趁现在潇洒一把呢？

我花七十五美元买了一件很贵的睡衣和一个时髦的旅行箱。店员十分殷勤地问："需要我们给您送去吗，先生？"仅仅这句话就让我感觉自己很优越。我打算去纽约，一洗前段时间在演出里郁积的烦闷。

我在阿斯特旅馆订了一间当时算十分奢华的房间，打扮得体体面面，穿着一件下摆裁圆了的时髦外套，戴着圆顶帽子，拿着手杖，提着刚买的那个箱子。在豪华的休息室里看见客人们个个举止潇洒自若，我登记房间的时候不禁稍稍有些哆嗦。

房钱是每天四元五角美金。我怯怯地问是否要预付。登记的人十分客气地说："不用的，先生，不必先预付。"

我十分激动地走过那富丽堂皇的休息室，到自己房间里的时候只觉得要哭。我在房间里待了一个多小时，仔细看着这精细考究的陈设，这是尽可以享受的豪华啊！

我洗好澡梳好头之后，穿上新睡衣，准备充分享受这花了我四元五角美金的奢侈生活。我很想读点报纸，但是又不好意思打电话让人送来，于是把一张椅子搬到房间正中，坐下来看着四周的一切，在这金碧辉煌中突然有了忧郁的思绪。

一会儿之后，我穿戴完毕，到楼下问了大餐厅的位置，然后去了那里。还不到晚饭时间，餐厅里的座位几乎都是空着的，只有一两个人。领班领我到窗边的一张桌子旁："先生，您坐这可以吗？"

"坐哪里都可以。"我用自己最动听的英国口音回答。

接着侍应生们就赶过来，一股脑儿送上冰水、菜单还有黄油和面包。由于过于兴奋，我并不觉得饿。但还是做了做样子，点了清蒸肉汤、烤子鸡和香草冰激凌，还有半瓶香槟。我只顾沉浸在对现在角色的扮演中，无心用餐。饭后我还给了应侍生一美元的小费，当时这算

是出手相当阔绰了。我一路走出来时，他们对我都恭恭敬敬，让我觉得这钱花得很值。我没缘由地回到自己房间坐了十分钟，洗了手之后又出去了。

那是一个夏夜，天气舒适，我情绪甚佳，稳步走向大都会歌剧院。大歌舞剧《汤豪舍》正在那里上演。我并不喜欢这部戏，所以从没完整地看过，只在轻歌舞剧中见到一些片断。但这时我却对它饶有兴致。我买了票，坐在二楼的观台上。歌剧是用德语演的，我完全听不懂，也不知道在演什么。但是，当朝圣者合唱队的歌声响起，那去世的皇后被人从场上抬过时，我感觉那出戏就像是我劳苦一生的终结，于是抑制不住地哭了。不知道旁边的观众会怎么看我。走出剧院时，我步履蹒跚，内心被极大地震撼了。

这时的我，已经无法经受百老汇大街那些繁华喧嚣的刺激，不想马上回到旅馆那奢华的房间里去。我专挑商业区里那些黑暗的街道走着，试图让自己内心平静下来。心情终于平复之后，我的精神和身体都已经精疲力竭，于是打算回去睡觉了。

刚走到旅馆门口，迎面忽然走来海蒂的哥哥阿瑟·凯利，他以前是海蒂那个歌舞团里的管事。因为海蒂的缘故我们交上了朋友，上次见到他已经是几年以前了。他跟我寒暄了几句，给我介绍了一下他身边的两个朋友，然后邀我们一起到他在麦迪逊大街的公寓里喝点咖啡。

阿瑟知道了我住在阿斯特旅馆，很想打听我现在在做什么，我只是告诉他我来纽约度几天的假。闲谈中他一直避免提到我们过去的事情。他现在已经是他姐夫弗兰克·J．古尔德的助手，一个有钱的富商了，和当年在坎伯韦尔的情景大不一样。在他喋喋不休地谈着社会新闻的时候，我觉得烦闷无比。他在提到某个朋友时说：“他是个有教养的年轻人，家世很好的。”我哑然失笑，阿瑟现在关心的都是门第出身，看来，我们俩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人了。

我第二天早上就决定回费城了。在纽约度过的这一天，让我的生活有了变化，但也让我徒增寂寞的愁绪。我开始需要朋友，心想在周一早上演出的时候，就可以遇到同事们了。虽然我还是对工作感到烦闷，但那一天的优雅生活已经带给我很大的满足感。

回到费城戏馆，我碰巧看见里夫斯先生收到一份电报，上面说：“你戏班内有无姓卓福尔或姓与此相似的人？若有，请使之与百

老汇大街隆加克大厦二十四号，凯塞尔与鲍曼事务所联系。”他觉得这说的有可能是我。因为我们戏班并没有卓福尔这个姓。

于是我的情绪激动了，据我所知，坐落在百老汇大街中段的隆加克大厦里都是律师事务所。我记得自己在美国有一位很富有的伯母，于是幻想着是不是她去世了，给我留了一大笔财产。我给那个事务所回电说，戏班里有一位卓别林，不知是不是他们所说的人，然后焦急的等待着回复。他们当天就给我回了电：“能否请卓别林速来事务所？”

第二天，我满怀希望地搭上去纽约的早班车。从费城到那里的两个半小时里，我一直幻想着这样一幅场景：自己坐在律所里，听着别人向我宣读遗嘱。

但到那之后，我这希望就破灭了，因为凯塞尔与鲍曼只是一家电影制片公司，而不是律师事务所。不过这件事的经过却十分刺激。

公司的合伙人之一查尔斯·凯塞尔，是奇斯顿滑稽影片公司的一个股东，他告诉我，麦克·森纳特先生曾在第四十二街的美国音乐厅里，看到过一个演员在戏里扮演酒鬼，如果那是我的话，他想要邀请我去代替福特·斯特林先生去演电影。

我以前就经常想到要拍电影，还试图跟戏班老板里夫斯合伙，把卡诺剧团的所有的独幕剧上演权都买下，改拍成电影。但对于拍电影来说，我们都是外行，所以里夫斯一直很保守，不敢贸然行事。

凯塞尔先生问我有没有看过奇斯顿的滑稽影片。我看过好几部，但并不很热心，只是对它们的宣传价值有所了解。这时我想着演上一年电影后，再回去演轻歌舞剧，就能成国际有名的演员了，何况还能体验新生活和环境。凯塞尔说要跟我签三部电影的合同，每周有一百五十美元的报酬。这可是我在卡诺戏班里薪酬的两倍，但我还是吞吞吐吐地说，我一周至少要拿二百美元。凯塞尔先生说，他要跟还在加州的森纳特先生商量一下，然后告诉我他们的决定。

等候回音的时候我一直忐忑不安，担心自己要价过高。最后公司答应跟我签一年的合同，从我们在沙利文和康斯汀轮回戏院演出结束后开始，前三个月给我每周一百五十美元，其余时间给我每周一百七十五美元，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能拿这么多钱。

这都始于我们在洛杉矶皇后戏院的演出。多谢上帝保佑，那演出

当时极受欢迎。我在《俱乐部之夜》这部喜剧里扮演一个酒鬼，老态龙钟，看起来起码五十岁。森纳特先生也去看了演出，结束后还向我祝贺过。在那次短短的见面中，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堪萨斯城时，我要跟戏班分别了，心里有些犹豫。他们即将返回英国，而我则要一个人转赴洛杉矶打拼，对未来很不确定。最后一场演出前，我请戏班里的人喝酒，一想到即将到来的分别，不免有些留恋。

戏班里一个叫阿瑟·丹顿的演员，不知为何一直不喜欢我。这时想要捉弄我一把，就私下告诉我，戏班有一件小礼物要送我，当时我甚为感动。但直到大家都喝完酒走出了化妆室，我也没收到礼物。小弗雷德·卡诺告诉我，丹顿原先要演讲一番，然后把那礼物送给我，但见我请他们喝酒，就不好意思再玩这个把戏了。他那件“礼物”放在化妆台的镜子后面，是一个包着锡纸的空烟盒，装着几个用剩的油彩头。

第十章　奇斯顿影片公司

我在一路的担心中抵达洛杉矶，住在一家叫大北旅馆的小旅店里。头一天晚上，我去以前演出过的皇后戏院里看第二场戏。检票员认出了我，问我要不要跟森纳特先生和玛蓓尔·纳耳芒小姐一起坐，他们就在后面两排。我十分激动地过去了。大家匆匆地小声介绍之后就一起看戏。散场后，我们去了一家德式地下餐馆里吃宵夜。森纳特先生对我的年龄十分惊讶：“我还以为你要大得多呢！”我想起他的喜剧演员都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觉出他对我不太放心，于是有些着急，答道：“只要化装一下，想要我多老都可以。”不过玛蓓尔·纳耳芒的态度却使我的心定了定，其实也不过是我的心理作用罢了。森纳特先生让我在工作之前，先去伊登代尔熟悉一下电影制片厂里的人。后来他用那辆气派的跑车送我回了旅店。

第二天一早，我搭电车去伊登代尔。那是洛杉矶的郊区，还没有发展定型，看不出是要建成住宅区还是半工业区。有些地方堆积着木材和一些废弃的铜铁，还有一些似乎没人打理的小农场，公路旁边有几间木头房子，是商店。我一路问人才走到奇斯顿电影制片厂外。这个制片厂有一百五十英尺见方大小，是被绿色栅栏围起来的一些破烂房子。要走过一条花园小路，穿过一所平房才能到那里面。我站在公路对面向里面呆看了一会儿，犹豫是否要进去。

到了午饭时间，一群没有卸妆的演员从平房里涌了出来，男男女女，还有奇斯顿警察。他们穿过公路，去一家小店里了买三明治和热狗，一路嬉闹着。我突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于是赶紧躲远了些，注意着森纳特先生或纳耳芒小姐会不会出来，但他们没有出现。站了半小时后，我决定回去了。当时我觉得没法一个人走进制片厂去面对那些演员。接连两天都是如此。第三天，森纳特先生打电话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去，我只能编了个借口。他说：“快过来吧，我们在这等着你。”于是我去那之后终于鼓起勇气走进平房，说要见森纳特先生。

森纳特看见我很高兴，马上把我带到制片厂里面参观。眼前的景象完全吸引了我：那儿拉着一幅幅宽阔的白色亚麻布，阳光照到那上

面，被均匀地分散开，柔和地照到整个场地上，于是那儿的每样东西都蒙上了一种缥缈而神秘的色彩。这种布置是在阳光下拍摄的需要。

森纳特介绍了几位演员给我认识。我对电影的拍摄过程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当时那儿有三个场地景，三拨演员分别在那里拍摄，看起来就像是展览会一样。玛蓓尔·纳耳芒正在其中一个场地一边捶着门一边喊："快让我进去！"然后摄影机停下，一场戏就拍完了。我不知道，原来电影就是这样七零八落地拍出来的。

这时，需要我顶替的那名演员，福特·斯特林，正在另一个场地上拍摄。森纳特先生跟他介绍了我。他快要离开奇斯顿去环球演戏了。他很有观众缘，人们围着他的场地观看，都很热情地对他笑着。

森纳特跟我介绍了他们拍电影的方法。"我们没有剧本，只是按照故事的自然发展去表演，加入随时想到的笑料，最终形成一幅打闹追赶的画面，我们笑剧的主结构就是这样的。"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方法，但就我自身来说，并不喜欢那些打闹追赶的场面。这样会埋没每个演员独特的性格。虽然我几乎不懂电影，但我明白，个性是演员最重要的东西。

那天，我看了好几个场地的电影拍摄。不过让我烦恼的是，演员们似乎都在模仿福特·斯特林，而我和他的风格是刚好相反的。我不知道森纳特打算怎么让我演。他应当知道我不适合演福特所演的那种喜剧，因为他曾经看过我演戏。但是这制片厂里的每个故事、每个镜头，看起来似乎都是为福特·斯特林量身打造的。

看得出，这电影制片厂是由一片农场改建的。玛蓓尔·纳耳芒有一间单独的平房作为化妆室，普通女演员用隔壁的一间。平房对面是一个用牲口棚改成的大化妆室，供一些小演员用。我则跟麦克·森纳特、福特·斯特林和罗斯科·阿巴克这些主角共用一间化妆室，这应该也是从牲口棚改过来的。包括玛蓓尔·纳耳芒在内，那儿有好几个漂亮女孩。整个制片厂有着一种美丑混合的奇妙感觉。

我在那连续溜达了好几天，不知何时轮到我拍戏。森纳特偶尔从我身边走过，却很少注意到我。我开始担心他是不是后悔请我来了，于是一直很紧张。如果他注意到了我，对我一笑，又让我有了些希望。其他人对我都持观望态度，但我觉得也有人怀疑我是否有能力代替福特·斯特林。

星期六那天，森纳特十分亲切地让我去办公室领薪水。我跟他说了我急于工作的心情，想跟他谈谈关于模仿福特·斯特林的事，他却打断了我，说这并不着急。

我就这样闲了九天，在紧张中煎熬着。不过福特经常宽慰我，下班后有时候用他的车载我去市里喝酒，见见他的几个朋友。他有一位叫埃尔默·埃尔斯沃斯的朋友，总是半开玩笑半讽刺地问我："我知道你要顶福特演出了。但你能逗人笑吗？"他当着福特的面这样取笑我，总让我感到很尴尬。幸好福特给我解了围，他说："你没看到他在皇后戏院演的酒鬼吗？很能逗人笑。"

埃尔斯沃斯却会说："嗯，他还没能逗我笑呢。"

终于，我期待的那天来了。玛蓓尔·纳耳芒和福特·斯特林的班子都跟着森纳特去拍外景，制片厂只留下几个人。亨利·莱尔曼先生，仅次于森纳特的奇斯顿总导演，要开拍一部新片，让我去扮演一个记者。莱尔曼是个虚荣心很强的人，总因为自己导演的几部喜剧片很成功而得意洋洋。他扬言，他的影片不需要个性，只要靠机器的效果和剪接的技巧就能逗人笑。

当时拍的是一部讲述印刷厂里故事的电影，没有剧本。我穿着大礼服，戴着大礼帽，在嘴上贴了两撇翘胡子。在开拍之前，我看到莱尔曼还在想笑料。初来乍到的我很是热心，想帮他想些点子，却因此导致了两人的矛盾。在我跟报馆编辑见面的那场戏里，我加入了所有能想到的笑料，还给其他演员出了主意。短短三天里，我觉得拍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镜头。但让我伤心的是，在制作好的电影里，我所有能逗笑的地方都被剪去了。我不知道个中缘由。直到很多年后，亨利·莱尔曼才说出那是他故意剪的，因为他觉得我知道太多了。

那部电影拍到第二天的时候，森纳特他们回来了。那天三个班子一起拍戏，场地上全是人。我没有化装，无所事事地站在那里。这时森纳特叼着一支雪茄，站在玛蓓尔身边，正打量着一个布置成旅馆休息室的场景。"我们现在需要加点笑料啊，"他转向我，"你来扮个丑角吧。扮什么样都行。"

我对装扮有些拿不定主意。我不喜欢那身记者打扮。去化妆室的途中，我突然灵光一闪，决定穿上一条松松垮垮的裤子，紧紧绷在身上的上衣和一双很大的鞋子，拿根手杖，戴一顶很小的圆顶礼帽。我

希望每一件东西在我身上都看起来不合适。起初我不知道应该扮成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后来想到森纳特觉得我太年轻，就贴上了一撮小胡子以增加年龄，不过不会挡住我的表情。

对于这样一个人物的性格，我并不清楚。不过一旦打扮起来，这副样子就让我对他的性格胸有成竹了，而上场之后，这人物更是被活灵活现地演出来了。我在森纳特跟前一面挥着手杖，一面大摇大摆地踱着步子，脑中不断涌现出一个个笑料。

麦克·森纳特的成功秘诀就是他洋溢的热情。他看到好笑的地方从来不会吝啬自己的笑声。他看见我之后咯咯地笑到浑身直哆嗦，这就给了我很大的信心，跟他解释道：“你看，这是个有多重性格的人。他是个流浪汉，也是个绅士；是个诗人，也是个梦想者；他很孤单，渴望着浪漫和冒险。他指望别人把他当做科学家、音乐家，或是一位公爵、一个玩马球的人。实际上他只会捡捡烟头，还会抢孩子的糖果。在他异常恼怒的时候，还会看准了机会对着那些女士们的屁股就是一脚！”

森纳特被我逗得笑不停，接着说：“不错，上场去吧，看看你能玩出些什么花样。”跟拍摄莱尔曼的影片时一样，我不知道电影的具体情节，只知道讲的是玛蓓尔·纳耳芒还有她丈夫以及情人之间的纠纷。

在演喜剧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感觉，而感觉也并不是永远都那么好找的。在那场戏里，我感觉到自己应当是个冒充客人的骗子，一个想找到安身之处的流浪汉。我刚走进休息室，就被一位太太的脚绊倒，赶紧转身向她抬抬帽子致歉，结果一回身又被一个痰盂绊倒，马上又跟痰盂抬抬帽子。于是摄影机后面的人都笑了。

这时场地旁边已经聚了一大群人，有离开自己场地过来看我们的演员，还有木匠和管戏服的工作人员。这又让我增加了信心。排练完毕，很多观众都哈哈大笑了。之后，我看见福特·斯特林越过人群张望我们这边。拍摄过后，我知道自己演得不赖。

那天我去化妆室的时候，正遇见福特·斯特林和罗斯科·阿巴克在卸妆。没有人说话，化妆室里的气氛充满了矛盾。他们俩一直挺喜欢我，但我能察觉他们此时心里的矛盾。

我那个镜头很长，一共拍了七十五英尺的胶片，而一个喜剧镜头

一般是不多于十英尺的，所以森纳特和莱尔曼为是否要全部放映而争论。我说："既然是要逗观众笑，长度并不影响什么啊。"最后他们决定全部放映。这一身打扮已经让我被这个人物感染了，所以我那时就决意此后要一直穿这身衣服演戏了，不管是什么戏。

那晚，我和一个小演员一起乘电车回旅馆。他对我说："你这次可是一举成名了啊，从来没有人能在摄影场上那么招大家笑，连福特·斯特林也没能这样呢！"

我抑制住自己的得意之情："如果上映时，观众也能那样笑就好了。"

几天后，在亚历山德里亚酒馆里，我又无意中听见福特向那个埃尔默·埃尔斯沃斯说："看看那家伙，一条松松垮垮的裤子，一双扁脚，你可从来没见过那么邋遢可怜的流浪汉，抓痒的时候就像是在胳肢窝里捉虱子一样，他还真是能逗人笑啊。"

我演绎的这个人物十分独特，美国人不熟悉，甚至我自己也不熟悉。但是，一打扮起来，我能感觉到这是个活生生的人物。他会让我产生种种荒唐古怪的念头，而在我打扮成他的样子之前，无论如何也是想不到那些点子的。

我跟那个小演员混熟了，每晚一起坐电车时，他都会跟我细说那天电影制片厂里人们的反应，他自己也会对我的笑料做些评价。"有一个太妙了，在洗指缸里洗洗手指，在那老头的大胡子上擦擦汗，厂里的人可都没见过这种把戏。"他一件件地评说下去，我不禁得意洋洋。

我跟森纳特合作时总是轻松自在，一切都是我在场地上即兴出演的。因为在拍摄时，演员和导演都不会有绝对的把握，所以我觉得自己懂得并不比导演少。于是我总会提出一些建议，森纳特也很快采纳。这对我来说是一种鼓舞，让我相信自己是可以创作、可以编故事的。但当时只有森纳特对我满意了，大家还没有对我满意。

第二部影片又是跟莱尔曼合作。他那时已经打算去跟斯特林的班子了，只是为了答谢森纳特而多工作两周。我照例提出了很多意见，但他只是笑着听我说，一条也不采纳。他解释："戏院里这样可能会逗人笑，但电影里可没时间去演。拍这种滑稽片就是要打闹追赶。"

我争论道："幽默就是幽默，电影或是舞台上都是一样的。"但他

全然不听，还是依从奇斯顿拍摄的老办法，要求一切动作都要做得很快。我虽然只能遵守他的原则，但偶尔也会加入自己的一点搞笑动作，可是跟上次一样，他总有办法把这些镜头剪得支离破碎。

莱尔曼走后，我又跟着一位叫尼古拉斯的导演演片子，他从电影出现以来就是个导演，已经快六十了，老气横秋的。他在电影里只有一个笑料，就是抓住一个丑角的脖子赶他从一边到另一边。我想要做些细致点的动作，他却一直嚷着没时间这样演。我只是稍稍违背了他的原则，但看得出他已经跟森纳特打报告说了，他没办法跟我这混蛋合作。

就在这段时间吧，市区上映了森纳特导演的那部《玛蓓尔奇遇记》。我夹在观众们当中，十分担心地看着那部电影。他们在福特·斯特林出现后照例哈哈一笑，对我的出场却表现得异常冷漠。而我在旅馆休息室里的那些动作也没法把他们逗笑。但随着影片的放映，人群中出现了小小的笑声，那笑声渐渐大了，而影片快结束时，他们还有一两次哄堂大笑。这次放映告诉我，对于新演员，观众们并没有偏见。

一两天后，森纳特来找我了，跟我说：“他们都在抱怨，说跟你没办法合作。”我尽最大努力跟他解释，说我只是在认真工作，一心想要拍好影片。他冷冷地回答：“只要你能按我们说的来，那我们也就满意了。”但我第二天又跟尼古拉斯发生了争执，而且大为光火地冲他说：“你叫我演的这些，一个每天拿三块钱的临时演员都可以演。我是想要拍出好的电影来，可不只是被你们赶来赶去还从电车上跌下来。我不想就这样挣每周一百五十美金的薪酬。”

尼古拉斯“老爹”（我们给他的绰号）气极了：“我干这一行已经十多年了，你能懂什么？”我无法说服他。班子里其他人对我的看法也不支持。一个老演员说：“他是明白的。他在这一行的资格可要比你老多了啊。”

我大概先后拍了五部电影，想尽办法在他们大幅度的删剪里面保留自己的逗笑动作。随着对他们剪片方法的熟悉，我知道出场和进场的镜头比较难剪切，所以我总把自己的逗笑动作安排在那些时候。与此同时，我利用所有机会去学习制片的技术，频繁进出于冲印间和剪接室里，观察工作人员是怎样剪片的。

这时的我一心要自编自导一部喜剧电影，我把这个计划跟森纳特说了，可他不但不理睬，还让我服从刚开始做导演的玛蓓尔·纳耳芒的指挥。这让我十分气恼，虽然她是一个好姑娘，但我不相信她是个好导演。第一天在洛杉矶郊区拍外景的时候我就顶撞了她。是因为要拍一个我拿着水管在公路上浇水的镜头。我提议自己先踩在水龙皮带上阻断水流，俯身去看管口的时候，无意间抬起脚，那水就直接喷了我一脸。但立刻被她打断了："我们没时间了啊！我们没时间了啊！你就按我说的演吧。"

这句话让我难以接受，于是我回答："很抱歉，纳耳芒小姐，我不能按你说的演。我不觉得你有资格来教我怎么演。"

我离开路中央的摄影场地，坐到旁边的人行道上。而玛蓓尔则坐在摄影机旁不知所措。那时刚二十岁的她美丽动人，所有的人都喜欢她，宠着她，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冲撞过她。其实我也觉得她是个漂亮可爱的姑娘，心底还对她一丝柔情，但我觉得做好工作是自己的职责所在。所有的人都围在玛蓓尔身边，商量该怎么办。后来她跟我说，当时有几个临时演员很想揍上我一顿，但被她拦住了。稍后，她让副导演过来问我，还要不要拍下去了。于是我走到她身边跟她说："抱歉，我根本看不出你的想法哪里有趣。如果你能允许我自己加一些笑料的话……"她打断我的话："好得很。既然你不听我的，那么就一起回制片厂吧。"当时的局面很尴尬，但我只耸耸肩膀，不以为意。不过那时已是下午五点多，我们已经拍了一天了。

到制片厂后，我正在卸妆，突然森纳特冲进化妆室，气冲冲地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尽力解释着："影片缺乏笑料，但纳耳芒小姐完全听不进意见。"

"让你怎么演，你就怎么演，否则就给我走，我才不管有没有签合同。"

我很冷静地回答："森纳特先生，我来这儿以前，也是混口饭吃。如果你想辞了我，那就辞吧。但我的工作是认真的，跟你一样，我也是急着要拍出一部好电影。"

他没有回答，"砰"的摔上了门。

那晚坐电车回去的时候，我跟那个朋友说了这事。

“这太可惜啦，你在厂里一直都演得很好啊。”他说。

我掩饰住心里的焦虑，笑着问：“依你看，他们会辞退我吗？”

“那可不奇怪。我看见森纳特从你化妆室离开的时候，像疯了一样。”

“好吧，反正我也不介意。我已经存下了一千五百美元，足够我回英国了。不过我明儿还要去一下，如果他们真辞了我，那也是我自作自受了。”

按原计划第二天早上八点钟要排演，我不知该如何，所以装也没化，就坐在化妆室里等着。大概八点差十分的时候吧，森纳特探进头来，很和气的说：“查理，我想跟你谈谈，我们去玛蓓尔的化妆室吧。”

我答应着，跟他一起去了。玛蓓尔当时在试片房里看样片，不在化妆室。

森纳特说：“玛蓓尔对你印象很好，我们对你印象都很好，觉得你是一名很优秀的演员。”

我对他态度的转变有些奇怪，自己的态度也柔和了：“我也很尊重纳耳芒小姐，但她毕竟年纪太轻了，我认为她没有做导演的资格。”

“不管你是怎么认为的，还是请你是宽宏大量一点吧。”森纳特拍拍我的肩。

“我一直都是尽我所能这样做的。”

“那就委屈你一下，跟她继续合作吧。”

我回答：“听我一言，如果能让我自己做导演，就能省去这些麻烦了。”

他思忖了一会，说：“要是拍的片子上映不了，那这笔损失又怎么办呢？”

我回答：“我来付。我把一千五百元存到银行里，要是片子上映不了，那笔钱就算是补偿。”

森纳特想了想，问：“你有故事可以拍吗？”

“当然，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好吧，”他说，“等你拍完玛蓓尔这部电影，我会安排的。”我们握手言和了。后来我去跟玛蓓尔道了歉，三个人一起去吃了晚餐。第

二天，玛蓓尔居然主动问我有什么建议，对我态度极佳，这弄得所有人都困惑不已。这部电影就这样圆满地完成了。

我对森纳特这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有些摸不着头脑。几个月之后，我才知道，当时他已经决定那个星期一结束就解雇我，但就在我和玛蓓尔争执过后的那个早晨，奇斯顿纽约办事处发来电报，说是需要大量卓别林的电影，让他抓紧时间多拍摄一些。

奇斯顿滑稽影片公司每发一部影片，平均要印二十个副本。如果需要印到三十个副本，那电影就已经是相当成功了。而我所拍的第四部影片已经印到四十五个副本，要求加印的订货单还是源源不断。所以，那封电报改变了森纳特对我的态度。

那时的导演技巧是很容易把握的。只要掌握好演员上下场的时候要从哪一边、面对哪个方向就可以了，而这些都是拍摄电影所应注意的基本规则。

随着工作经验的增加，我发现摄影机的位置对观众的心理会产生影响，并且可以辅助说明电影的情节，甚至是电影风格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摄影机离的更近些或是更远些，对电影效果有明显的增强或者削弱作用。动作的精简很重要，一些无谓的动作，比如走路，是缺乏戏剧性的，所以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就不应当让演员走不必要的路。应当利用摄影机的位置来影响电影编排，并且尽量使演员的出场显得好看。摄影机的位置增加了电影中的变化因素。此外，特写镜头并不一定就比远景镜头更有强调作用。特写镜头的采用可以凸显情感问题，而远景在某些情况下有着更好的凸显效果。

以我早期一部名为《溜冰》的喜剧片为例，影片里流浪汉在溜冰场上溜冰，他打着圈一路向人群滑过去，跌倒在他们当中，把一大堆人撞倒在摄影机的前景中，然后自己却溜到溜冰场的后边，夹在一群观众中间坐着，事不关己地看着自己造成的混乱。这时候他成了背景中一个很小的影子，但这个影子却让人觉得比给他一个特写镜头更有趣。

我在导演自己第一部片子时，不像自己预期的那么有把握，心里没底。那部影片叫《遇雨》，算不上一部轰动全国的影片，但很能逗笑，也很卖座。电影拍完后，森纳特进试片房去试看，我很忐忑地等在门外。他出来后问我：“怎么了，你准备好开拍下一部了吗？”打那

以后，我就自编自导所有的喜剧片。每拍一部，就能拿到森纳特给我的二十五元额外奖励。

森纳特现在每晚都要请我吃饭，完全把我当成了自己人。他在用餐时跟我说一些其他班子的影片内容，于是我就会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建议。我觉得，这些点子对别人来说不太容易理解，但是他听后总是忍俊不禁，几乎都会采纳。

我有时还会夹在观众中间看自己的电影，发现他们的反应有了变化。每当出现奇斯顿滑稽影片公司的广告时，观众中总会产生一阵兴奋和躁动。我在影片中一出现，还没做动作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怀大笑。看出来他们非常喜欢我，这让我非常开心。我觉得如果能一直这样生活着，那就很满足了。这时候加上额外津贴，我每周有二百美元的收入。

自从醉心于工作之后，我很少再去亚历山德里亚酒馆，所以很久没遇见埃尔默·埃尔斯沃斯，那位喜欢讽刺人的朋友了。有一次我在街上偶遇他，他对我说：“嘿，我最近看了你的几部电影，演得太好啦！你的风格很是独特。我可没有乱吹捧你。你太能逗人笑了，怎么不早说啊？”在那之后我们的关系变得十分要好。

我从奇斯顿的人那里学会了很多知识，也教给了他们很多东西。他们那时对舞台技巧、艺术和一些表演手法都知之甚少，是我把这些戏院里的知识介绍给他们。他们对一些自然的手势也不甚了解，做手势的时候从不顾及含蓄性和影片效果，我的强项恰恰在这方面被凸显了。所以，在出演早期一些影片的时候，我很有优势。就像一位地质学家一样，我走进了一片蕴藏着丰富矿藏的地域，开始发现一些奇妙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事业生涯中最刺激的一个时期。

一个人一旦事业成功，就会讨人喜欢。我和制片厂里所有的人都很熟。无论是临时演员、场地工作人员、服装管理员还是摄影师，都直呼我的名字“查理”。我并不爱跟所有人都套近乎，但他们这样亲热的称呼让我很高兴，因为我知道，这是我事业成功的证明。

现在我已经对自己的计划充满信心了，这一点应当要归功于森纳特给我的影响。他虽然跟我一样不是文化人，但他坚持自己的好恶，并且促使我形成同样的性格。他第一天在制片厂里对我说的“我们没有剧本，只是按照故事的自然发展去表演，加入随时想到的笑料”，

这几句话给了我想象的空间。

因为有了创作元素的加入，我觉得拍电影是一项有意思的工作。我在演戏时总是每天重复同样的事情，工作单一呆板。舞台上的动作一旦经过排练，确定好了，就很难进行改动了。相比之下，拍电影显得更加自由，让我觉得自己仿佛在冒险。森纳特会说："你觉得根据这个拍一个喜剧片可以吗？"或是"市区的大马路被水淹了。"这种话常常能衍生出奇斯顿的一部喜剧片。正是这种无拘无束的精神激发了我的创作力，给我增加了极大的乐趣。拍电影不像搞文学研究或是写作，它很自由，也很容易。我们只要想到一件事，就可以围绕它去找笑料，并且随着情节的发展拍成一部电影。

就好像在《他的远古生活》这部片子里，我一出场就找了个笑料。我披着一张熊皮，打扮成远古人那样出场，看看四周之后，从熊皮上拔了一些毛装进烟斗。就这么一个场景，已经能够延伸出一系列关于爱情、打斗、战争和追逐的原始生活故事了。这就是我们在奇斯顿拍电影时采用的方法。

在增加笑料之外，我开始想到给影片增添一些新的元素。这都源于我一部叫做《新看门人》的影片。片中有一个经理开除我的情节。我祈求他行行好，留我在那工作，于是就用恳求的手势告诉他，我家里人多，要养活好几个孩子。当时旁边站着一个叫多萝茜·丹波特的老女演员，她看到我那伤感的表情后，竟然哭了起来。我见到之后不由得吃了一惊，她对我说："我知道你是要逗观众笑，但我看了就是忍不住要哭啊。"这就证实了我曾经的一个想法：我能逗人笑，同样的，也能引人哭。

那是1914年，刚满二十五岁的我风华正茂。我对自己的工作是那么热爱，这不只是因为事业上的顺利，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份工作让我可以见到所有的电影女明星，而她们都曾经在某个时期对我迷恋过。这些女孩们个个都算得上国色天香，面对她们的时候仿佛身处仙境。

珀姬·碧尔丝是一位极其美丽的姑娘，有着精致的脸庞、白腻的脖子和娇俏的姿态，这一切都让我情不自禁。我刚进奇斯顿时，她因为感冒而没有去厂里。第三周我才见到她。后来我们坠入了爱河，我快乐得不能自已。那段时间是多么浪漫啊，我每天去上班的路上，一心只想要见到她。

每个周日，我都会去她父母的公寓看她。我们约会时，每晚都要山盟海誓一番。可能是因为好事多磨吧，珀姬是爱我的，却几度拒绝了我，后来，失望的我只能放弃她。那时我并不想结婚。我还没有找到跟我心中那个模糊影像相符合的女人。

每个电影制片厂都像一个人家一样。以我们厂为例，每周能拍一部电影。花两三周拍出的电影可以达到一部正片应有的长度。我们的电影都是在露天阳光下拍，所以选中了加州，据说那里一年的九个月都有充足的阳光。

1915年前后，弧光灯就已经问世了，但是奇斯顿从不使用，因为布置那灯太花时间，何况那灯光不稳定，还不如在阳光下拍的清楚。奇斯顿拍每部喜剧片都很少需要一周以上时间。甚至有一次，我一个下午就拍完了一部叫《二十分钟的爱情》的短片，上映时观众们的笑声持续了整场。那部最卖座的短片《面包和炸药》，只用了九天时间拍摄，不过花了一千八百元。由于超过了预算，我那二十五元的额外津贴也被扣除了。森纳特说，只有把它剪成上下两部放映，才能赚回本钱。的确，这样做了之后，第一年就赚了十三万有余。

那段时间我还曾与玛蓓尔和玛丽·德蕾丝勒合作拍过一部正片。和玛丽的合作十分愉快，但我觉得那影片并不出彩。不过让人欣慰的是，后来我又回过头去导演自己的电影了。

此时卓别林这个姓已经很出名，所以我把雪尼介绍给森纳特的时候，他很干脆地跟雪尼签了一年的合同，每周薪酬二百美元，比我还要多二十五美元。雪尼和他的妻子从英国赶来的那晚，我们共进了晚餐。席间，我问起我的电影在英国放映时的情景。

他说，广告上还没出现我名字的时候，很多游艺场的演员就兴冲冲的跑来告诉他，我成了美国的电影丑角新星。他还说，在看我的喜剧片之前，先跟影片经纪人打听了一下上映时间。雪尼在告知了他们自己的身份之后，那些经纪人就请他看了三部电影。他一个人坐在放映室里，像傻子似的一直笑。

我问他：“你当时怎么想？”

他并没表现出惊奇的样子，而是信心十足地说：“我就知道你肯定会一鸣惊人的。”

麦克·森纳特是洛杉矶体育俱乐部的会员，他送了我一张临时会员

证。那是一个很高级的俱乐部，对于市里所有的单身汉和生意人来说，都是一个聚会的好地方。二楼上还有可供女士活动的大餐厅和几间娱乐室，此外又有附设的酒吧。

我在俱乐部顶层租了一间宽敞幽静的房间，放着一架钢琴和一些藏书，五月百货商店（当时市里最大的商店）的老板莫斯·汉伯格就住在我隔壁。我每周付十二元房钱，就能享受到俱乐部里讲究的健身房和游泳池，还有其他的所有设备以及周到的服务。算上经常请朋友喝酒和偶尔请吃饭的钱，我每周花七十五元，过着奢华的生活。

俱乐部里的气氛是很友好的，连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没有影响到这种氛围。我们都以为战争最多能持续六个月。而对吉钦纳勋爵关于这一仗要打四年的预言，我们都觉得十分荒谬。也有不少人对宣战的消息十分兴奋，因为这样就能扮演德国人了。英国人和法国人会在六个月之内把德国打得一败涂地，胜利是指日可待的。何况当时战争还没有进入白热化，战场离加州又是那么遥远。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吧，我要跟森纳特谈续签合同的条件了。对自己受观众欢迎的程度，我已经心中有数，但我也知道好景不长，按现在的速度拍下去，我那点把戏不到一年就会耍完的，所以我决意要抓住这个机会，于是信心满满地对森纳特说："我要加到每周一千元！"

森纳特吃了一惊："现在连我都拿不到这么多呢！"

我回答："我知道，但如果只是打着你的名号，观众是不会像看到我名字那样排队买电影票的啊。"

"也许是这样吧，但如果失去了这个组织的支撑，你也会玩完的。"他警告我，"看看福特·斯特林的下场吧。"

这倒是事实，福特在脱离奇斯顿之后混得不怎么样。但我还是跟森纳特说："给我一座公园，一个警察和一个漂亮女孩，我就能拍出一部喜剧片。"而事实上，我几部最红的电影，用的就是这么点场景和人物。

森纳特跟他的合伙人凯塞尔和鲍曼商量后，跟我提出这样的方案："要不这样，还有四个月你才合同期满。我们把原来的合同取消，从今天开始给你每周五百，一年后加到每周七百元，两年后再加到一千五。这样算来，你平均每周也能拿到一千。"

我回答："麦克，如果能颠倒一下顺序，给我第一年一千五百

元，第二年七百元，第三年五百元，我就没意见。”

“可这也太奇怪了啊！”森纳特说着。

从那以后，续签合同的事就再没人提过。

直到与奇斯顿的合同还有一个月就到期时，也没有其他电影公司想要雇我。我开始紧张了，觉得森纳特之所以这么耐下性子一言不发，一定是看清了我的底细。以前我每拍完一部影片，他都会开玩笑地催我接着拍下一部。但现在，我已经两周没工作了，他也一直不来找我，对我的态度客气而冷淡。

但我并没有因为这些而失去信心。我打算，如果没有其他制片厂来邀请我，那就自己经营一家。我对自己独立工作是有信心的。从我某次伏在制片厂的墙上签一张领料单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信心。

自从加入奇斯顿电影公司之后，雪尼也已经拍出好几部卖座的电影。有一部《潜艇海盗》在世界各地打破了票额纪录，那部影片中，他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摄影技巧。我见他如此成功，就约他合办一个电影公司，跟他说：“我们只需要一架摄影机和一个片场就足够了。”但雪尼比较保守，觉得这样太没有保障。他补充道：“况且我生平第一次能领到这么高的薪水，我不想放弃。”于是接下来一年，他还是留在奇斯顿工作。

后来有一天，环球影片公司的卡尔·莱姆勒打电话跟我联系。他出每英尺胶片一角二分美金的价格收购我所拍的电影，但没有答应我每周一千的周薪，所以最终也没能谈出结果。

埃山奈影片公司的代表，一个叫杰斯·罗宾斯的年轻人来看我。他告诉我，听别人说我要在签合同前先分一万元的红利，还要求每周一千二百五十元的薪酬。其实我从来就没想到过要红利，不过，这主意对我来说倒挺新鲜，所以听他这么说之后，我就一直盘算着这种方法了。

我那天晚上请罗宾斯吃饭，席间一直在听他讲话。他直接代表着埃山奈影片公司的G．M．安德森先生来跟我谈条件。绰号布朗科·比利的安德森，是乔治·K．斯普尔先生的合伙人，他愿意给我每周一千二百五十元。但罗宾斯还不能肯定他愿意给我预先分红一万元。我耸耸肩，说：“看来，很多人都是在出高价抢演员，应允的价钱挺高，但都不肯拿现金出来。”于是罗宾斯打电话到旧金山，跟安德森说其

他条件都已谈妥，但要先付一万元红利给我。一会儿之后，他满面喜色地回来：“全都谈好了，你明天就能拿到一万元红利。”

我真是心花怒放。事情简直顺利得不太真实。但让人沮丧的是，第二天罗宾斯只拿了一张六百元的支票给我，说安德森将会亲自来洛杉矶办理给我一万元红利的事情。可是安德森来了之后，也依然没有拿出那一万元，不过他对这件事表现出很确定的样子，说：“到芝加哥后，我的合伙人斯普尔先生会把这事办妥的。”

我有点怀疑，但也不愿胡思乱想，还是保持着乐观的心态。我还要为奇斯顿工作两周，这期间工作很紧张，必须要拍完最后一部影片《他的远古生活》。我当时一直在考虑其他事情，所以心绪不宁。后来终于拍好了这部影片。

第十一章　埃山奈影片公司

在奇斯顿，我和森纳特以及全厂同事都建立起感情了。现在要离开，还真的有点舍不得。我连向大家道别的勇气都没有。

周六晚上，我把影片剪接工作做完。下周一，我就要和安德森先生去旧金山了。我们到旧金山的时候，安德森的绿色汽车早已恭候在此了，他的汽车是梅塞德斯牌的。我们停下来，在圣弗朗西斯旅馆吃了午饭，就奔向奈尔斯。在奈尔斯，安德森有一所电影制片厂，规模很小。这里是专门为埃山奈公司拍摄安德森的牛仔比利西部电影的地方。

奈尔斯在铁路线附近，是一个小镇，只有四百人。从旧金山乘汽车，一小时就可以到。电影制片厂坐落在离市镇约四英里的一片空地上。玻璃铺成的屋顶，夏天里面肯定热得不可开交。一看见它，我的心都凉了。安德森说，芝加哥的制片厂拍笑片的设备比较好，我肯定会更满意的。在奈尔斯，我只待了一小时。在这期间，安德森和他的下属把一些事务处理了。然后，我们就又去了旧金山，乘火车去芝加哥。

安德森特别让人着迷，我很喜欢。在火车上，一到站头，他就会买一些杂志和糖果给我，对我就像自己的亲兄弟。他很腼腆，不爱说话，看起来恍恍惚惚的，但他骨子里特精。谈及公事时，四十岁左右的他总是说："别担心，这件事会搞定的！"

这次旅程非常有意思。在火车的餐车里，有三个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其中一个穿着朴素，看起来很粗鲁，他应该是干粗活的工人。另外两个人却大不一样，他们看起来很神气，应该是两个工程师吧。我觉得很奇怪，他们三个居然会在一起进餐。

大家认识后，我们才知道，那个穿着朴素的人是罪犯汉克，和他在一起的一个是警察局长，一个是地方检察官。刚从圣康坦释放的汉克，正被他们押往圣路易斯监狱处以绞刑，因为他把一个警察打死了。

在路上，他们说了很多，都与汉克的犯罪有关。

他们是除夕那天下的车，我们告别时，警察局长和地方检察官都对我们说新年快乐。汉克则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的确，汉克犯的罪很严重，但看到他一跷一拐地走下火车，我又希望他能化险为夷。

之后，听说他被绞死了。

到芝加哥后，电影制片厂经理迎接了我们。斯普尔先生到外地去了，年假后才回来，因此他没有到场。新年以后，电影制片厂才有事情可做，因此我当时也没太在意斯普尔没来。

除夕我是和安德森一家人一起过的。安德森在元旦那天去了加州，他说，所有的事情，包括我该得一万元红利，斯普尔一回来就会搞定。

我第二天早上到电影制片厂去了，这里以前是一所仓库。但斯普尔仍然没来，也没留下什么话安排我的工作。这件事情有问题，我马上就意识到了。工作人员肯定知道一些底细，只是不愿说。但我并不担心。我相信拍出一部好影片后，一切都会解决的。于是，我问经理，厂里的一切设备，我能否全权使用；厂内的工作人员可不可以全部配合我。

“当然可以！安德森先生已吩咐过这件事了。”他回答。

“那好，我要开始工作了。”我说。

“好！您到二楼去找路艾娜·帕森斯小姐，剧本组的由她负责。她会把一个剧本给您。”他回答。

“剧本，我自个儿编，不用别人的！”我很豪气地说。

当时，我特别爱发脾气。所有的事情，这些人好像都不知道。我又见不着斯普尔。另外，厂里的工作人员像银行职员一样，一点都不活泼。同时，他们又像信托公司的管事一样，在那里拿着领料单走来走去。一句话，他们制出的影片与办事的样子完全不符合。楼上的气氛对搞创作也是完全不利的。每天只要一到六点，电灯一熄，大家全回家。

我第二天早上就去了演员调配组。

我冷冷地说道：“能否请你们给我几个闲着的演员，我要组织一个班底。”

他们觉得合适的人，我看了几个。我选用了彭·杜平，是一个斗鸡

眼，就他还懂点儿玩意儿，当时也闲着。当时，我还需要一个女主角，看中了一个公司刚录用的年轻漂亮姑娘，但是我没法叫她有反应。最后，只好打发她走了。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她就是格露丽亚·史璜森。

在埃山奈，当时的大明星是弗朗西斯·X．布什曼，他看出了我对这里不满意。他说："不管怎么样，相对而言，这个电影制片厂还是好的。"但是，我既不喜欢这个电影制片厂，也不喜欢"相对而言"这个词儿。

后来的情况更糟了。让我吃惊的是，说是要节省制正片的费用，他们让我看底片，不给我样片。让他们把正片拿出来，感觉就像我存心要叫他们破产一样。最早拍电影的制片厂是他们，他们总是自以为是，仗着享有专利权，根本不想想怎么拍出好电影。不管其他公司的发展如何好，甚至向埃山奈挑战，他们也是狗吃屎改不了德行。

过了两周了，我的第一部影片《他的新行业》也快要拍完了，可还是没见斯普尔先生回来。我瞧不上他这个人，因为我的红利和薪水都没得到。

"这位斯普尔先生去哪儿了？"我问那些高级职员。他们也说不清楚。我问他办事是不是向来都这样。我对他的鄙视一点儿也没掩饰。

几年后，从斯普尔本人口中，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原来，我的名字斯普尔根本没听说过。安德森和我签了一年的合同，每周的薪水一千二百元不说，还要把一万元的红利给我，他一听说这件事后，就给安德森拍了一份电报，认为他疯了。之后，他又打听到，安德森只是听了杰斯·罗宾斯的推荐，才和我签订合同，所以他更担心了。当时他的笑片演员中，待遇最好的周薪也只有七十五元，不亏本就算好的了。所以，斯普尔才离开了芝加哥。

但斯普尔一回来，他的几个朋友就向他道喜，祝贺我加入了他的公司。另外，查理·卓别林的到来把很多报界人士引来了，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多。于是，普斯尔让小侍者在饭店里找我，给了他二角五分钱。一听到小侍者叫喊："查理·卓别林先生，有人找！"饭店里的人就都轰动了。还有，我的电影还没有开怕，影片就预售了六十五个拷贝，以前从没有过这事。我的影片刚拍完，公司就出售了一百三十五个拷贝。并且，还不断有订货单涌进来。于是，公司立即提高售价，

原来是每英尺一角三分，现在是每英尺二角五分。

当我和斯普尔说到我的薪水和红利问题时，他感到很抱歉，并告诉我说，他们早就告诉办事人员了，让我放心。但他说他没有看到合同，以为办事人员知道。听了这话，我直接就说道：“你怕什么呢？高兴的话，合同仍然可以取消啊！但事实上，你们已经把合同撕毁了。”

“很遗憾，你居然有这样的想法。但你知道，我们公司的信誉很好，我们从来都是遵守合同的。”他说。

“但你们这一次违约了。”我打断了他的话。

“这件事情，我们马上处理。”他说。

“我又不急。”我讥讽地说道。

在芝加哥的时间很短，为了安慰我，斯普尔什么方法都想了，但我和他的关系还是没变。我要求他让我去加州，如果要好效果的话。

“奈尔斯，你喜欢去吗？只要你高兴，去哪里都行。”

《他的新行业》一拍好，我就去奈尔斯了。其实，因为安德森，我才去那儿的，斯普尔没他好。

布朗科·比利所有西部影片拍的地点都是奈尔斯。那些影片一天就可以拍一部，七个情节颠来倒去地重复拍。他最后赚了几百万美元。

在奈尔斯电影制片厂周围，有一所大平房，布朗科·比利住在里面。他告诉我，我可以和他住在一起。我很喜欢这个建议。拥有百万家财的牛仔布朗科·比利以前在芝加哥对我很好，以后和他一起住在奈尔斯，生活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吧。

我去他平房的时候，快天黑了。让我吃惊的是，打开电灯，感觉很空洞冷清。里面的家具很简单，只有一些必备品，比如床等。让我住的那间屋子也一样。要想浴室里有水冲下来，必须把满满的一壶水倒在马桶箱里才行。拥有几百万家财的牛仔G．M．安德森就住在这里。

安德森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喜怒无常，喜欢过孤独的生活。他虽然很有钱，却从不想要过舒适的生活。买几辆华丽的汽车，捧几个拳击手，开一家戏院，演几场音乐喜剧，这些就是他的享乐。不在奈尔斯拍电影，他多半就去旧金山，在很便宜的小旅馆住着。在芝加哥，连漂亮的妻子和女儿，他都难得去看。

调到奈尔斯制片厂后，我必须重建一个工作班子，摄影师、副导演、固定的班底，都要重新挑选。在奈尔斯可供选择的人特少，要组建一个固定的班底绝非易事。在奈尔斯，除了安德森的牛仔演员班，还有一个专门拍笑片的班子。安德森不拍电影时，为了维持开销，他们就继续拍戏。

这时，我一心急着工作。剧本还没编好，我就让工作人员搭一个咖啡馆的布景。当我思想枯竭时，一看到咖啡馆的场面，我就会想出笑料或剧情来。他们搭布景的时间，我和安德森去旧金山了。我要在他那里挑一个跳舞的来当我的女主角。她们演戏不赖，但都不适合拍电影。

在那里，一个叫卡尔·斯特劳斯的告诉我，他知道有一个姑娘长得很漂亮，她偶尔会去希尔街塔特咖啡馆。他并不认识她，也许咖啡馆的老板知道她的住址。

这姑娘来自内华达州洛夫洛克，叫艾娜·普文思。我们和她在圣弗朗西斯旅馆见的面。她的确长得很漂亮，但当时看起来却忧郁严肃。她当时刚经历了一次恋爱纠葛，这事我后来才知道。虽然当时对她有很多想法，但还是聘请了她，至少我们的笑片她可以增加一些点缀。

我们第二天回奈尔斯时，工作人员还没布置好咖啡馆的场景，他们搭的布景很粗糙，也很难看。于是，我就让他们再修改一下。很明显，在工艺方面，这家电影制片厂的水平还不够。

之后，经过思考，我把这部影片叫做《夜游》，大概是演一个酒鬼寻欢作乐的过程。单凭这点，一部影片就可以开拍了。当时，我让彭·杜平演的是配角。电影开拍的前一天，我被安德森戏班里的一个演员邀请去吃夜宵。包括普文思小姐，我们一共约有二十个人。夜宵吃得很简单，大家就喝了啤酒，吃了三明治。之后，大家各玩各的。后来，谈到催眠术的时候，我把自己吹得神乎其神的，说在一分钟内就能让屋子里的所有人被催眠，班里的人只有艾娜不信。

“乱说！我，任何人也催眠不过去！”她大笑道。

“最好的一个对象就是你了。我们打赌十块钱，在一分钟之内，我能让你昏睡过去。”我说。

“好，就跟你赌！”艾娜说

“小心哦！你以后要是不舒服，那可不怪我哦——当然，也没有

多严重了。”

其实，我是吓唬她的。可她一点也不怕。

有一个女的对她说：“瞧你那傻样！”

“那也要赌！”艾娜回答道，她很冷静。

“太好了！为了让你专心，你离其他人远点儿，背紧贴着墙站好。”我说。

她微笑着，照我的话做了。这时，其他人也都开始注意了。

“谁来计时？”我说。

“可别忘了，一分钟之内，你就要让我睡着哦！”艾娜说。

“一分钟之内，你的知觉全没了。”我说。

“开始啦！”计时的人说。

马上我就装模作样地打了两三个手势。我紧紧盯着她的眼睛。然后凑近她脸前面，悄悄对她说：“假装一下！”又做了几个手势后，我说：“你的知觉快没了，快没了，没了！”

这时，她开始摇晃，我向后退，马上就把她抱住。这时，有两个人惊叫了。“快来人啊！帮忙把她放到榻上。”我说。

她“醒”过来时，一副迷茫的神气，假装说很疲惫。其实，这场打赌，她可以赢的，但为了玩笑，她放弃了。在这件事上，她给我留下了好印象，她也挺有幽默感的。

在奈尔斯，我拍了四部笑片，但我总感觉不满意，那里的设备不太好。在洛杉矶拍笑片的设备比较好，于是我就建议安德森，让我去那里。他最后同意了。在洛杉矶中心博伊尔高地，他租借了一个小制片厂。

我拍一部新的笑片，市价就上涨一次。于是，埃山奈公司提出：放映我的笑片的所有戏院，如果放映的一部片子长达两本，每天的租金至少是五十元。这样的条件以前可没有过。这样，在每一部影片上，公司预收的租金就在五万元以上。

有一天，晚上我回到斯托尔旅馆，接了一个紧急电话，是洛杉矶的《考察家报》打来的。他们转告了一份来自纽约的电报，邀请我到纽约马戏场登台，给我二万五千元，并且不妨碍我的正式工作。

我马上就去旧金山找安德森，直到第二天早上三点钟才找到他。我把收到的电报告诉他了，问他我可不可以去挣那二万五千元，离开

两周。我还说，去纽约的火车上，我就可以编剧，影片到那边后就可以拍好。但他没同意。

在我卧室，只要一说话，旅馆里所有的屋子都会有回声。我很不甘心，于是，我就大喊：“我不想放弃，二万五千元啊！”

这时，楼上就有一个人喊道：“混蛋，别废话啦！睡觉去吧！”

这时，安德森给我电话，说只要我再给埃山奈拍一部笑片，长达两本，那二万五千元，他第二天就来给我钱，还要签一份协议。之后，我就准备上床睡觉了。可是，我忽然想起刚才楼上那个人的话了，于是，我又爬起来，推开窗子，冲楼上说：“你他妈的！”

第二天，安德森就带来二万五千元，这是一张支票。可两周后，原来邀我去的那家公司就关门大吉了。我真的好走运啊！

到洛杉矶后，我的心情很好。因为这里的制片厂离雪尼的住处很近，我有空的时候可以去看他。雪尼见我的事业发展得这么好，就想专门替我管事。据报道，我的声望每拍一部新片就往上升一级。在洛杉矶，我明白自己很受人欢迎。但没想到在其他地方也很受欢迎。纽约所有的百货公司都在出售，模仿我扮演的角色制成的玩具和肖像。卓别林的节目齐格菲歌舞团的姑娘们都演，她们都穿着大皮鞋和肥裤子，戴着圆顶帽，贴着小胡子，唱《那双查理·卓别林的脚》。各种各样的广告让我们忙得不可开交。要答复一堆堆的影迷信件，也成了一个问题。雪尼说，所有的来信都要回复，必须再找一位秘书，开销多一笔也无所谓。

雪尼建议安德森出售我的照片。另外，他还说，那些更大的戏院要购买我的影片，定价就应该根据座位的多少按比率增加。这样的话，每一部影片就可以多出十万元以上的收入。但安德森却不这样认为。理由有三：第一，它影响到六千家戏院的利益，违反了整个电影托拉斯的设计。第二，很少电影院老板愿意按照这种条件付款。第三，这些戏院购买影片的方式与规则不可改变。

实际上，雪尼的建议后来在《电影先驱报》上发表了。看了这条新闻后，我算了算，自己的周薪才一千二百五十元。于是，我就开始发牢骚。签合同后，每两三个星期，我就拍好一部笑片。很快，斯普尔来洛杉矶，说我每拍一部影片，就给我一万元红利。于是，我的精神就好多了。

D．W．格里菲斯的成名巨作《一个国家的诞生》，大约就是这时拍好的。一夜间，他就成了一位杰出的电影导演。他是拍无声影片的天才，这毫无疑问。他拍的影片总是能够独创一格，尽管有些不足，值得一看。

我给埃山奈拍的最后一部影片是取笑《嘉尔曼》[1] 的一部两大本影片。我离开埃山奈后，该公司擅自修改我的影片。于是，以后每一份合同上，我都作了这样的规定：我已经摄制好的所有影片，公司不得擅自进行修改。

快到合同签订的期限时，斯普尔来找我，让我给他拍十二部影片，都是两大本的，他给我的报酬是三十五万美元，并且制片的一切费用都由他付。我让他当场把十五万美元的红利付给我，他却不肯。就这样，我们拜拜了。

我的未来是什么，一切都让人眼花缭乱。《嘉尔曼》的拍摄工作即将结束时，我在圣莫尼卡海滨的一所房子里居住。有时候晚饭就在圣莫尼卡码头的尽头纳特·古德温开的那家餐馆里吃。

在美国舞台上，公认的最成功的一位演员就是纳特·古德温。他也擅长音乐喜剧的丑角。后来，我和纳特的关系非常好，成了莫逆之交。我把影片拍完后就要去纽约的计划告诉了他，他给了我一些很好的待人接物的忠告。当时，我的事业刚刚开始，但他的已经告终。

一结束《嘉尔曼》的剪接工作，我就提着一个小提包，直接搭开往纽约的六点钟的火车。之前我已经发电报告诉雪尼了。

在火车上，我没有化妆，应该不会被人认出来。后来，我打算到盥洗室去刮脸，但里面有人，我就等着。火车进了阿马里洛站后，突然就被人群包围了。从盥洗室的窗子，我偷偷地向外看了看。看到外面的样子，我还以为是在举行庆祝会。后来，有一群人冲进车厢，他们在过道上走来走去，还大喊着问：“查理·卓别林呢？他在哪儿？”

“找我什么事？”我应声道。

“我们想请您和我们一起吃点儿点心，喝点儿冷饮！这是得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长以及崇拜您的所有观众的心愿！”

突然，我都吓呆了。我现在满脸都是肥皂泡。我说：“天呀！瞧我这副样儿！能去吗？”

“哦，查理，不碍事的，穿一件衬衣就可以了。现在就和大伙儿

见面去吧！”

我慌忙洗了把脸，胡子只刮了一半，穿上一件衬衫，打上一条领带。之后就一边扣扣子，一边往车下走。

看到我下去，人们就欢呼起来了。市长发表讲话的声音不断地被欢呼声所淹没。后来，人群把我和市长都挤到火车旁边了。这时，市长想到的只是我们的安全。

“向后退啊！”在人群中，警察们一边挤向我们，一边嚷嚷。

现在，市长对警察和我说：“查理，好吧，这事结束了你就可以回车上去了。”他说话的口气有点粗鲁。

我们挤到桌子跟前，人们才安静下来。这时，市长敲了敲桌子，发表了欢迎词，大意就是感谢我给他们带来的快乐，让我陪他们吃点东西。

之后，市长就让我讲几句，于是我就嘟哝了几句，大意就是，我很高兴来到阿马里洛，我一生都会记着他们的盛大欢迎，等等。说完后，我就坐下和市长攀谈。原来市长是通过我给雪尼发的那份电报知道我来这里的。

回到车上后，我心里感觉空空的。火车里的人们都走来走去地瞧着我。这里发生的一切，让我感到又高兴又愁闷。

火车还没开，就有人给我送了三份电报来。

第一份电文是：“查理，堪萨斯城居民恭候大驾，欢迎。”

第二份电文是：“下轿车已备，您到芝加哥转车可用。”

第三份电文是：“下榻布莱克斯通旅馆，可否？”

火车驶进堪萨斯城，铁道旁边站满了欢呼着的人们。

人群把堪萨斯城的大火车站挤得水泄不通。警察已无法控制那些从外边不断涌过来的人群。后来，我是爬到车顶上和群众见的面，也就是把在阿马里洛说的几句客套话重复了一遍。

这时，更多的电报送来了，我把它们都塞进手提包，想到纽约后再答复。

从堪萨斯城到芝加哥的路上，欢迎我的人到处都是。我既高兴又愁闷。

到芝加哥后，我要转车去纽约。在人群的欢呼声中，我进了那辆轿车。他们送我到了布莱克斯通旅馆，房间也已经订好了，让我稍微

休息一下再出发。

在布莱克斯通旅馆里，纽约警察局长发来电报，说已经有很多人在中央大火车站等着，让我在第125号街车站下车。

到纽约时，是雪尼接的我。当时，他低声地告诉我，我离开洛杉矶后，每天都有关于我的新闻简报。在去旅馆的路上，他告诉我，他和互助影片公司已经谈妥了，我一年的报酬是六十七万美元，每周给一万美元。体检后，签合同时就先给十五万美元的红利。那天下午他都很忙，所以我在广场饭店下的车，房间已经订好了，他第二天早上来看我。

现在，就我一个人了。我那天下午在马路上到处溜达，却感觉没有地方可去，很忧郁。有一个喜剧演员对我说过，我们现在达到目的了。但是，到哪儿了呢？

这时，我想去看看海蒂·凯利。好久没听到她的消息了。我到了她以前住的地方，但是却没有进去，半小时后，我就走了。

我去了一家名叫查尔兹的餐馆，在哥伦布圆形广场。后来，被里面的人认了出来。我这才挤出去，搭一辆路过的出租车逃走了。

以后的两天，我都在到处漫步，情绪很不稳定，一个熟人也没碰到。几天后，雪尼到旅馆来告诉我说一切都搞定了！

后来的事情就是签合同。领十五万美元的支票时，我拍了照。当晚，我在纽约时报广场上看到了“卓别林与互助影片公司签订年薪六十七万美元合同”的新闻。但我感觉这似乎是别人的新闻，和我没有关系。突然之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我已经麻木了。

---

(1) 美国电影导演西席·布朗特·迪米尔的一部影片。

第十二章　互助影片公司

我不喜欢孤独寂寞的感觉，这种感觉让人感到忧郁。就因为这样，我一遇到什么事儿就害怕，畏缩不前。在纽约，我独自在大街上彷徨，真是无聊得很。有一次，在马路上，我遇见了美丽的乔茜·科林斯，她是英国音乐喜剧演员。看见我后，她很亲切地问我："嗯，你一个人在这儿干吗啊？"其实，我当时很想告诉她说我很寂寞，但我没有。我只是笑了笑，说正准备和朋友午餐。

就在当天下午，我在大都会歌剧院附近溜达，碰到了莫里斯·格斯特，他是大卫·贝拉斯科的女婿。他还是很容易激动，对人说话也是老样子。一见到我，他就问："死鬼，这段时间你跑哪儿去啦？"

还没等我回答，他又问道："死鬼，为什么你不来看我呀？"

我说，我这会儿要去散步。

"你一个人散步！真是太阳打西边儿出来了！你到底去哪儿？"

"哪儿也不去，"我说，"就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来，跟我走！"他说着就钩住我的胳膊，"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他是真正有价值的人。"

"你去哪儿呀？"我着急地问。

"见见我的朋友卡鲁索！"他说。

不管我怎么推辞都没用。

"今儿，卡鲁索和杰拉尔丁·方娜合演《嘉尔曼》。"

"但我……"

"天啊！你该不会是害怕吧！跟你一样，卡鲁索也很朴素，满有人情味儿的，很可爱！你知道吗？他一直在想你会是什么样的。见到你，他还不快活死啦！"

我要去呼吸点新鲜空气，我要去散步，都跟他说了千百遍了。

"对你来说，这比呼吸新鲜空气更有意思！"

他把我拉到了有两个空位子的地方。

"你坐那儿，休息的时候我再来。"格斯特对我悄声说。这话一说完，他就消失了。

《嘉尔曼》的音乐我以前听过几次，但这次听起来有点儿不对。看了节目单后，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那天排的戏是《嘉尔曼》，但奏的曲调却像是《里戈莱托》[(1)] 。我糊涂了，格斯特来后，我低声问他："这是演的《嘉尔曼》吗？"

"对呀，你没拿到节目单吗？"

节目单一下子就被他夺过去了。他悄声说："瞧，这上面不就是吗？星期三，卡鲁索和杰拉尔丁·方娜合演《嘉尔曼》！"

降幕后，他把我拉到后台的边门。在那里，几个穿软底靴的人正换布景，我总觉得妨碍了他们工作。

"老朋友，加蒂-卡萨兹，你好呀？"格斯特一边说，一边把手伸了出来。

他们打完招呼后，格斯特转过身对我说："你说对了，演的是《里戈莱托》，不是《嘉尔曼》。演出前最后一分钟，杰拉尔丁·方娜请假了。这是查理·卓别林，这会儿，我领他去见卡鲁索，或许可以把他的兴致鼓起来。我们一起去好吗？"加蒂-卡萨兹摇了摇头，哭丧着脸。

"哪儿是他的化妆室？"

"他带你们去。"加蒂-卡萨兹叫那舞台管事。

我对格斯特说我不想去打扰卡鲁索。

"你别犯傻啦！"他回答道。

于是，沿着过道，我们一路摸索着去了卡鲁索的化妆室。

"谁熄的灯？我去找开关，等一下！"舞台管事说

"听我说，我要先离开了，有人等着我呢！"格斯特说。

"这时候你不能走开吧？"我赶紧说道。

"会有人照应你的！"

还没等我答话，他就走了。舞台管事把一根火柴擦亮了。

"到了。"他说。之后，他轻轻地敲了敲门。里面传出一声吼叫，带有意大利的口音。

舞台管事也用意大利语回答他。

"查理·卓别林！"是他最后说的。吼声又传了出来。

我悄悄地说："还是以后再来吧！"

"别，别！"他说。对他来说，他这时是在完成一件任务。

门开了，上了装的那个人朝外面望，外面是黑的。舞台管事有点烦恼地介绍了我。

“嗯！”上了装的人答道，随即就把门关上了。之后，他又开门，说“请进吧！”

小小的成功让舞台管事的精神振作了起来。进去后，舞台管事兴奋地说：“啊，卡鲁索先生，这位就是电影界有名的查理·卓别林先生！能介绍您们认识，是我的荣幸！”

卡鲁索只是朝镜子点了点头，又接着修剪他的小胡子。

后来，他站起来，一边打量着我，一边束带子。

“你现在很红了，是吧？也挣了很多钱。”他说。

“是的。”我笑着回答。

“你一定很快乐。”

“嗯。”我答道，看了舞台管事一眼。

“那很好啊！”他很高兴，表明我们该走了。

我站起来，对卡鲁索笑了笑。

“斗牛的一场我可别错过了。”

“现在演的是《里戈莱托》，那是《嘉尔曼》里的一场。”他边说边跟我握手。

“哦，对！对！呵呵！”

在纽约，我休息得差不多了，我想早点回洛杉矶，履行新订的合同，开始工作。

到洛杉矶后，我住在亚历山德里亚大饭店，是当地最豪华的旅馆。前一天，从旅馆管事那里我收到了演员莫德·费莉小姐的一封来信，是邀请我作陪的。这周三，她要请俄罗斯芭蕾舞演员帕芙洛娃在好莱坞旅馆吃饭。以前虽然没见过费莉小姐，但我很高兴去。

周二那天，我让秘书打电话问一下是不是吃个便饭。如果不是的话，我就要打黑领带。

接到我秘书的电话，费莉小姐感觉很诧异。

“嗯，当然是便饭啦！”她说。

费莉小姐已经在好莱坞旅馆的游廊上等着我了。她的美丽不减当年！见面后，我们就闲聊上了，至少半小时过去了，其他的客人一个也没到。我觉得有点奇怪！

“我们进去，开始吃饭好吗？”她最后说。

天啦！桌上就我们俩！

看着美丽动人的费莉小姐单独与我在一块儿，我就产生了一些遐想。我想试探她邀我到这里干什么。

于是，我兴冲冲地说：“就咱俩吃饭，真有趣！”

她笑了，一片茫然。

“咱们饭后玩点有趣的游戏吧！去夜总会，来点儿别的什么事儿也行！”我说。

她有点惊讶，迟疑了一下说：“我今天晚上恐怕得早点儿休息，我明儿一早就要开始排演《马克佩斯》。”

我被搞晕了，试探也没成功。幸好，第一道菜上来了，我们都默默地吃着。我们都觉得有点不对。费莉小姐迟疑了一下，说：“今天晚上，您觉得很沉闷吧！”

“相当有趣。”我回答说。

“我知道您也认识帕芙洛娃。只可惜我三个月前请她吃饭的时候您没来。您当时在纽约，我现在才知道。”

“真抱歉。”我说道。赶紧把费莉小姐的信取了出来，我这时才看到日期，然后递给她了。

“您看！我竟来晚了三个月啊！”我大笑起来。

现在我开始准备履行六十七万美元的合同了。在好莱坞中心区，科尔菲尔德先生租了一个电影制片厂，他是互助影片公司处理一切事务的代表。艾娜·普文思、埃里克·坎贝尔、亨利·伯格曼、艾伯特、奥斯汀、劳埃德·培根、约翰·兰德、弗兰克·乔·科尔曼、利奥·怀特等人都在我的小班子里，这个班子的阵容很强。于是，我信心满满地开始了工作。

《百货公司巡视员》是我的第一部影片，里面有一个百货公司的场面，其中追赶打闹的动作是在一个自动楼梯上演的，演得很好。总之，这部影片拍得不错。

之后不久，我的工作速度极快，一部两大本的笑片一个月就搞定了。拍完《百货公司巡视员》后，又拍了《救火员》、《当铺》、《拍电影》、《溜冰》、《安乐街》、《越狱》等十二部笑片，拍完它们，前前后后，加起由于各种原因停拍的时间才十六个月左右。

剧情中出现了问题，我总是暂停工作自己思索，想尽一切办法解决。但科尔菲尔德先生在那儿监视着拍片进度呢，我有时候也会感到难堪。如果问题要是一天都没解决，我离开制片厂的时候，总会碰到科尔菲尔德先生，其实，他是故意的。然后，他假装很轻松的样子跟我打招呼。之后，就问："有思路了吗？"

"完了！我什么都没想出来！我大概快完蛋了！"

"会有思路的，别着急。"他笑着说，其实这都是装的。

有时候，想了一天也没想出什么办法，但突然灵感就来了。这时，科尔菲尔德先生特别兴奋，制片厂里的气氛也活跃起来了。

在所有影片的拍摄过程中，只有在拍《安乐街》时发生过一次事故。我的鼻梁上缝了两针。

我一生工作中最愉快的时光，就是给互助影片公司拍电影的那些日子。当年我只有二十七岁，不管在哪方面，对未来都充满了希望。再加上我当时的身价就是四十万美元，并且还在不断上涨。有人对我说，金钱是一件应该忘记的东西，但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它储存在记忆中。

的确，成功了的人生活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但是，我有时候也会感到孤独寂寞。

有一天，我刚洗完澡，把一条毛巾围在腰上，在屋里拉着小提琴，奏着《霍夫曼故事》。此时雪尼来了，他很兴奋地对我说："嗨，查理，我跟你说，你给第一国家影片公司拍八部两大本的笑片，就给你一百二十万美元，这笔交易我已经替你谈好了！你现在是百万富翁了！"

"哈哈，太妙啦！"我答道。

突然，雪尼大笑起来："我永远都记得你这副模样儿。在屁股上围着一条毛巾，手里拉着小提琴，听到我签了一百二十万美元的合同，就高兴成这样啦！"

的确，我当时有点儿装腔作势。当时，我想到那些要做的事情，就觉得这钱挣得真不容易！但是，对我来说，我挣到的这笔钱仅仅是数字，我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因为它们而改变。于是，为了证明这些钱确实是我拥有的，我就买了一辆汽车，雇了一个车夫和一个仆人，还聘了一个秘书。当时在美国，我买的车是最好的。我看到它的时候，

还以为不出售呢。

“这车多少钱卖？”我进去就问。

“四千九百美元。”

“这辆车，我要了。”我说。

看来，那个人是不想这么快就成交，于是，他问：“机器，您不好好看看吗？”

“那些玩意儿我不懂，看不看都一样！”我回答。话是这么说，但我又用大拇指揿了揿那轮胎，表明自己不全是门外汉。

在一张纸上签了个名，我就是那辆车的主人了。

投资方面的术语雪尼都很熟悉，但我是外行。那段时间有很多机会可以投资。当时，有一个洛杉矶的房地产经纪人让我跟他合伙，在洛杉矶谷地购买大片土地，每人投资二十五万美元。我没有同意，真是一大遗憾啊！那儿后来发现了石油，是加州最富的地区之一。要不然我现在的投资本利就有五千万美元了。

---

(1) 这出歌剧是意大利歌剧家朱塞佩·韦尔伯编的。

第十三章　与道格拉斯成为朋友

这时候，有许多知名人士，包括巴德莱夫斯基、利奥波德·戈德斯基、尼赞斯基、帕芙洛娃和梅尔芭，都到我们好莱坞的电影制片厂参观。

巴德莱夫斯基既有迷人的一面，又有庸俗的一面。他特别自高自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纽约里茨旅馆里碰到他，问他会不会在纽约演奏，他却回答道："现在我是为敝国政府公务外出，不举行演奏！"后来，他成了波兰的总理，我对此事没有什么好感。

而伟大的钢琴家利奥波德·戈德斯基，总是那么朴实和幽默，他圆圆的脸上总是堆满了笑。在洛杉矶，他开完演奏会后，就在那里租了一所房子住下，我经常去他那里。每到周日，我都可以去听他练琴。

尼赞斯基的长相很漂亮，但神情严肃。当时，我们刚好拍《治病》。他就坐在摄影机后面看我拍戏。其他的人看了都大笑，他却一点也不笑，还越来越忧郁了。告别时，他和我握了手，只是淡淡地说他很欣赏我的演技，问还来参观行不行。我说当然欢迎。后面的两天，他看我拍戏还是一样的表情。最后一天，我知道受尼赞斯基的忧郁影响，我做不好那些逗笑的动作。于是，我就让摄影师别在摄影机里装胶片。但每天看完后，他都会对我说："您是一位舞蹈家，您的喜剧是芭蕾舞型的。"

说到舞蹈，什么芭蕾舞剧团我都没看过。也就是那周末的时候，我受邀去看了一场午后演出。

到戏院后，出来欢迎我的是贾季列夫。为了让我喜欢，后来他对经理说："跟尼赞斯基说，休息后，我们演《牧神》给夏洛[1]看！"

第一场芭蕾舞演的是《山鲁佐德》。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是很满意。但尼赞斯基一出场，我就震撼了。看了他跳的双人舞，我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位天才。

休息的时候，贾季列夫带我去尼赞斯基的化妆室，他之前就跟贾季列夫说了。但是，敷衍应酬不是尼赞斯基所擅长的。我到那里后，他只问了一些与电影有关的无关紧要的话，我的答复也很简单。催场

铃响，休息时间结束了。我要回到座位上去。

“还早呢，多待会儿吧。”他说。

“尼赞斯基先生，奏完序乐了。”这时，有人来敲门说道。

我着急了。

他却说：“不用担心，时间多着呢。”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感觉有点奇怪。

于是，我说：“您瞧，我还是回去吧？”

“别！别！让他们再奏一次序乐。”

后来，贾季列夫冲进化妆室来了。

“观众已经在鼓掌了！快上场吧！快上场吧！”

“这样更好玩，让他们等着好啦！”尼赞斯基说。然后，他又泛泛地问了我一些话。

我感觉很窘：“但是，我真的要回位子上去了。”

尼赞斯基的演技在《牧神的午后》中是空前绝后的。里面所需要的一切情趣，他用几个简单的手势就表达出来了。

半年后，尼赞斯基疯了。

要达到一门艺术的崇高境界，这样的人很少。但帕芙洛娃就是这样一位罕见的艺人。我总是被她的表演深深地感动。

帕芙洛娃到好莱坞环球影片厂来拍新片的时候，我认识了她。后来，我们成了知己。可惜的是，她舞蹈中抒情的趣味，旧式摄影机的速度拍不出来。就这样，她那伟大的艺术没有流传下来。

有一天，在利维餐馆里，我收到一个条子，问我可不可以到康斯坦斯·科莉尔小姐的桌子上去，她想见我。这让我特别高兴，我当然答应了。要知道，科莉尔小姐和赫伯特合拍过电影，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很钦佩她的演技。这次见面后，我们就有了很好的交情。她还给我介绍了很多朋友，让我认识了赫伯特·比尔鲍姆·特里爵士，会见了道格拉斯·梵朋克。

据我所知，赫伯特的演技非常好，他不仅能激发观众的思维，连观众的情绪他也能掌握，实乃英国戏剧界的一位巨匠。他演过很多好电影，如《奥立弗·退斯特》、《裘力斯·凯撒》。

我十四岁时就看赫伯特·比尔鲍姆·特里爵士的许多出拿手戏。因此，我非常愿意接受康斯坦斯·科莉尔的邀请去作陪，她要约赫伯特爵

士和他女儿艾里斯吃饭。

约会当天，我故意去晚了一点儿，我希望康斯坦斯·科莉尔先去，这样的话我才不会紧张。因为约的见面地点是在亚历山德里亚旅馆赫伯特·比尔鲍姆·特里爵士的房间。但是，我去了之后，只有赫伯特·比尔鲍姆·特里爵士和他的影片导演约翰·爱默生两个人。

“啊！卓别林，进来吧！您的大名我从康斯坦斯那里早就听说了！”赫伯特爵士说。

进去后，他把爱默生给我介绍了一下，并说他们刚才在讨论影片。但没过多久，爱默生就离开了。这时，我感觉很不好意思。

“让您久等了，很抱歉！刚才，我们在探讨如何加强女巫的那一场效果。”赫伯特爵士坐下后说道。

“嗯……嗯……”我结巴了。

“如果给气球挂上些薄纱，让它们在空中飘，这样效果就会更好些。您觉得呢？”

“嗯……嗯……非常妙！”

这时，他望了望我说：“您在事业上非常顺利，是吗？”

“这没什么。”我吐词不清，似乎在道歉。

“但现在您是名满天下啊！在英法两国，您的歌士兵们都唱呢！”

“不会吧？”我装出一副毫不知情的样子。

他又望了望我，有些怀疑我说的不是真话。然后，他站起来，说：“康斯坦斯怎么还没来？我出去打电话问问她怎么回事儿。现在，您见一下我女儿艾里斯吧！”他一边说，一边就走出去了。

终于，我可以舒一口气了。但这时，一个姑娘进来了，她说：“卓别林先生，您好！这个世界上唯一没看过您电影的人，大概就是我吧！”

我有点窘，笑着点了点头。

当年，艾里斯刚刚十八岁，她的样子很吸引人。

“康斯坦斯总是提起您！”她说。

我又有点窘，仍笑着点了点头。

后来，赫伯特爵士进来，说我们不等康斯坦斯了，她要试戏装，来不了了。

天啊！和他们两个陌生人在一块儿，我该怎么办啊？我心里很着

急，只是默默地跟着他们。坐到桌子上后，他们尽量找话题，但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他们说到很多地方，问我去过没有。谈到马克斯·莱因哈特导演的戏，问我看过没有。我都摇摇头，表示很遗憾。

这时，特里打量着我，说：“我觉得，您应该出去旅行旅行。”

我说，我现在根本没时间去旅行。然后，我一口气说了很多话，大概就是说他演的好多戏，我小时候就看过，还说，能和他在一起进餐，我很激动。

我的话感动了赫伯特·比尔鲍姆·特里爵士。他说：“真的吗？真的吗？”

我们从那以后就成了知己。

从康斯坦斯口中，我听到了与道格拉斯·梵朋克有关的许多描述。总之，道格拉斯·梵朋克是一位很有魅力的活泼的年轻人。但有一天，几个人约好了在道格拉斯家里聚餐。后来道格拉斯和我都曾谈起那天晚上的情景。那天晚上见面之前，我们都不太愿意和对方见面。但是，从那晚起，我们成了一辈子亲密的朋友。

事实上，道格拉斯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他为人真诚，也很谦虚。观众就是被他的优秀气质感染了的。

为了拍摄《罗宾汉》，道格拉斯专门开辟了一片占地十英亩的场地作布景。他交友很广，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但他住的地方环境很差，房子盖在比弗利山上，看起来，这里以前是投资地产的，只是现在荒废了。第一个在比弗利山定居的电影明星是道格拉斯·梵朋克，我常被邀去他家度周末。他那儿经常住着两三个配角演员。

每个周日的早晨，我们天不亮就要起身，骑着马越过山地去看日出。道格拉斯每次都事先把马准备好了。

当时，道格拉斯的第一个妻子和他离了婚。他与新女友玛丽·碧克芙正在热恋，但他们都很谨慎。我竭力劝他们不必拘泥于形式，因此，他们后来结婚的时候没请的人就我一个。

那段时间，哲学是道格拉斯和我常谈的话题，他认为我们的命运是老天注定了的，可我觉得人生是空虚的。他对浪漫情调的痴迷真的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另外，为了贪玩取乐，他还养了很多警犬和狼狗。

很快，好莱坞就成了演员、作者和其他知识分子的圣地。世界各

地的许多著名作家，包括英国的小说家萨姆塞特·莫姆和艾莉诺·格林，都来到这里。

好莱坞特别欢迎萨姆塞特·莫姆写的电影故事，虽然他从来不在这里写文章。

让人想不到的是，竟然会有一个看起来破破烂烂的旅馆出现在好莱坞，但它的租金却很昂贵。由于交通不便，很多名人都会住在这里。艾莉诺·格林在这家旅馆包了两间卧房。其中一间被改成了客厅。

艾莉诺宴请十个客人的那一次，是我第一次和她见面。我第一个到她那里，刚开始，她说的一些与我眼睛有关的话让我很不好意思，但后来她留给我的印象是很可爱的。

生活于英国上流社会的艾莉诺的名叫《三星期》的小说讲述的是保罗和一位王后的爱情故事。这部小说的影响很大，震撼了整个英国社会。在一般人的眼里，艾莉诺很容易激动。事实上，她是最冷静的。但她设想电影中的恋爱故事时，却像个小姑娘一样天真。

她写给好莱坞的《三星期》、《他的一小时》、《她的片刻》三部曲，一部比一部写得快。《她的片刻》十分感人，写的是一位即将出嫁的大家闺秀与自己喜欢的男子在片刻间的相识、相知、相爱的故事。

---

(1) 夏洛即是卓别林。

第十四章　情欲与工作

我与互助影片公司签订的合同期满后，就开始着急为第一国家影片公司工作，但我们连一个制片厂都没有。所以，我就在好莱坞买地，建了一个电影制片厂，设备很齐全。

在建造电影制片厂的过程中，艾娜·普文思和我到檀香山旅行了一个月。在那个年代里，夏威夷是一个美丽的岛屿。尽管如此，但一想到与大陆相距二千英里，我就很郁闷。我总是想回去。

艾娜·普文思长得很美，和她朝夕相处的人没有不动情的，我也不例外。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在洛杉矶工作。那时候，几乎每天晚上我都要陪她到俱乐部去吃饭。时间长了，我们都对对方有了感情。我也想过以后能不能娶她，可当时我不太相信她。

1916年，我和她一起参加了所有红十字会安排的游园庆祝活动。那时候，艾娜经常吃醋，要是我引起了谁的注意，她就会离开。之后，就会有人告诉我说她晕倒了，要我马上去。当然我很听话啦，就去了，当天晚上还要一直陪着她。虽然我有点儿得意，但渐渐地，她的这种经常性的晕倒让我很反感。

在范妮·沃德的一次宴会上，艾娜·普文思又晕倒了。但这一次，她醒来后，招唤的人不是我，而是汤米·麦恩，他是派拉蒙影片公司的男主角演员，个儿很高。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

我对艾娜很痴情。范妮·沃德不愿意看到我被人愚弄。于是，他第二天就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了。但是，我真的没法相信，同时，我的自尊心也大受打击。

我又想，要是果真发生了这样的事儿，我们的关系就此结束了。但是，我不能就这样和她分手了，我还不知道怎样面对分手后的空虚。回忆起我们共同度过的时光，我不禁感慨万千。

我知道这件事儿后，一点工作的心情都没有了。那天午后，我给艾娜打电话，想听她对这件事的解释。我跟她说：“你的记性是不是也太次啦！我听说在范妮·沃德的宴会上，你唤错人了，是吗？”我没有跟她大发脾气，我克制住了。

回应我的是她的大笑。电话这头的我，感觉她有点儿窘。

“你在乱说些什么呀？”她说。

我希望她会尽力否认这件事。但她没有，还问是谁告诉我这些混话的。

“谁说的不都一样吗？但我觉得，再怎么着，你也应该给我点儿面子，也不至于公开地玩弄我吧。”

但她一口咬定说，这是别人造的谣言。她很镇静。我故意要让她难堪，就装作无所谓的样子。

“只要你对工作认真负责，你爱怎样就怎样吧！我们反正又没结婚，不用和我装模作样！”我说。

艾娜欣然表示同意，她也不愿意我们的合作受这种事情的影响。她说，我们仍然可以做永远的好朋友，听了这些话，我却感到更痛苦。

我很紧张，也很烦。电话打了一个小时，最后，我以谈这件事为借口，邀她和我一块儿吃饭。其实，我只是想找个借口跟她和好，我也和其他恋人一样，当时更加依恋她。

在我的再三恳求下，她终于接受了我的邀请。那天晚上，在她的寓所里，她煎了火腿蛋，我们一块儿吃的晚饭。

我们就这样和好了，我的心情也平静了许多。第二天，我至少有心情工作了。但是，我觉得有些内疚，又有些凄凉。内疚的是有时候我冷落了她，凄凉的是她叫了别人，我真希望那不是真的。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大约三周后，她来电影制片厂领薪水。她刚要离开的时候，我碰到她了，有一个男朋友陪她来的。

她满面春风地说：“汤米·麦恩，你认识吗？”

我差点都没反应过来。一刹那，好像我是第一次和艾娜见面，她是那么的陌生。

我回答道：“汤米·麦恩，当然认识！汤米，你好呀？”

看得出来，他有点儿不好意思。我们互相握手后，寒暄几句之后，他们就一起离开了电影制片厂。

没有了爱情，我只能在工作中寻找安慰。

一年五十二个星期，我都得自编自导自演，耗费大量的脑力，十

分艰苦。拍完一部影片后，我就筋疲力尽，心情沉闷，要在床上躺一天。睡到黄昏我才起来。然后，我就到外面去散步。我在市区里茫然地看看那些商店橱窗，到处徘徊。这时，我的大脑已经麻木了。但第二天早晨，在去电影制片厂的路上，我的大脑就恢复了活跃状态，我又开始有精神了。

一般情况下，我吩咐搭布景的时候，脑子里一个主意也没有。布置场子的时候，美术导演常问我，我就在那儿随口乱说，比如门在哪儿开，拱道又在哪儿造。但是，往往在这种一点儿主意都没有的情况下，我的许多笑片就开拍了。

有时候，我的神经绷得很紧，必须好好放松一下才行。这时，出去玩一个晚上是很有好处的。但我不大会去喝酒，因为我担心喝酒会影响我的工作，影响我灵敏的大脑。

说到情欲，它大部分都在我的工作中消耗掉了。听说我在写《自传》，一位著名的女作家就说，希望我能实话实说。后来，我才知道她说的是性生活。在我看来，这方面并不重要，对一个人的心理更有影响的，恐怕是饥寒与穷困所带来的羞辱。

我的性生活具有周期性，这一点和其他所有人都一样。但在我的生活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创作，并不是性生活。因此，关于这方面的话题，我不想多说。在这方面，我觉得更有趣的，是那些导致男女关系的经过。

在亚历山德里亚旅馆，偶然发生了一件趣事。那天，我刚从纽约回到洛杉矶。晚上，我很早就回房去休息。我一边哼着一首流行歌曲，一边开始脱衣服。当时哼着哼着就停下了，因为我突然想到了一点儿事情。但这时，隔壁有个女的就接着往下哼。之后，她又停下，我又接着哼。我们就这样哼完了那支歌曲。我觉得没有必要和她认识，那样很冒险，加上我又不了解她。我之后又用口哨吹那只曲子，她又把先前的那一套重复了一遍。

“真有趣呀！哈哈……”我大声笑道。

“你说什么？”隔壁传来的声音。

“你肯定是刚从纽约来的，对吧？”这时，我对着钥匙孔小声说道。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她说。

“那你就把门打开吧。”我说。

“但你不许进来，我就开一点儿。”

“我不进来，保证！”

门开了一条缝，约四寸宽，一个十分娇媚年轻的金发女郎窥看着我。我只知道她穿的是一件丝绸睡衣，很迷人。

“不许进来！你进来我就要打你！”她说，挺逗人爱的。一嘴雪白好看的牙齿露了出来。

然后，我就跟她打了一下招呼，介绍了一下自己。

那天晚上，她对我说，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能跟她打招呼，即使在旅馆休息室里碰到，向她点头也不行。关于她，我就知道这点。

接下来的几天晚上，她都主动来敲我的门，刚开始还好，但后来我就厌倦了，甚至都不答理她的敲门，还从里面把门反锁了。当然，她很生气，白天见面时就冷冰冰地瞪我一眼。就这样，我在旅馆折腾了五个晚上。我觉得还是赶紧离开那里较好，于是，第二天早上，我就又搬回体育俱乐部去住了。

在新制片厂里，我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狗的生涯》。这部影片具有讽刺的味道，将一个流浪汉的生活与一条狗的生活进行对比。故事的结构就由这一中心思想形成的。围绕着故事结构，我穿插了各种笑料和打闹动作。虽然这些打闹的笑片都很简单明了，但却含有深意，并且新鲜玩意儿也不少。当然，笑料必须要符合剧情的发展。

每一组镜头都符合剧情发展的逻辑，都是由上一组镜头连续引出来的。这样，所有的镜头结合在一块儿，就成了一个整体。

奇斯顿电影制片厂时期，流浪汉的动作受情节的束缚还不大，比较自由。那时，流浪汉只是根据自己衣食住行的情况本能地进行活动。但后来伴随着新笑片的不断问世，流浪汉也有了感情，成分变得更加复杂了。这样一来，由于打闹动作要与心理相符合，流浪汉就受到了限制。后来，我把流浪汉想象成一个丑角，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编剧的技巧不断地发展，但我拍笑片的自由却逐渐受到了限制。有位影迷来信说，我近来拍的影片没有在奇斯顿拍的影片好，那时我牵着观众的鼻子走，而现在却是观众牵着我的鼻子走了。

我给笑片定的基调常常是音乐给我的启发。我给影片《移民》定的基调，就是受了老歌曲《格伦迪太太》的启发，它在凄凉中透出的

亲切，让我想到了在愁苦无奈的日子里，两个孤苦无依的人结婚。

通过一些简单的小调，我想出了另一些笑片。配合1914年流行的二步舞曲《芥末太多了》的调子，编成了《二十分钟的爱情》的笑片。《维奥莱特拉》这支歌给《城市之光》提供了基调，《古老的日子》给《淘金记》提供了基调。

我对故事片的许多设想早在1916年就有了。有一部影片利用引力定律，还可以演出许多玩意儿。这部影片，要讲的是去月球旅行，但在那里看到了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滑稽场面，嘲笑文化的进步。我想到了一顶可以闹出种种笑话的无线电帽子，还有一台进餐机器。后来，我在《摩登时代》里用上了这台进餐机器。

我是怎样想出来那些影片的笑料的，对于记者们提出的这个问题，我至今也不能给出满意的回答。长期以来，我发现，是强烈的欲望产生了那些笑料。不断地努力思考，不断地想象，经常注意可能刺激想象的事物，主意就有可能诞生了。当然，初具雏形的每一个笑料，必须要经过合理的归纳后，才能发展成为一部笑片。

在我看来，矛盾和痛苦基本上就是人生。因此，我几乎都是不知不觉地以此为根据来插科打诨。怎样让几个角色招惹麻烦，然后再从麻烦中把他们解脱出来。这就是我编制笑剧的方法，很简单。

但是，幽默又不一样，而且更加微妙。在《幽默的意义》一书中，作者马克斯·福雷斯特·伊斯曼认为，幽默来自痛苦，这种痛苦具有玩笑的性质。但我认为，幽默就是一种工具，让我们在看似正常的现象中看出不正常的现象，在看似重要的事物中看出不重要的事物。另外，幽默让我们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增强了我们生存的意义，促进了我们的调和意识。

举这么一个例子。一场葬礼上，亲朋都聚集在死者周围，神情肃穆。就在仪式要开始时，一个迟到的人匆匆地闯了进来，他装出神情严肃的样儿，踮着脚走到自己的座位，一屁股坐下，才发现座位上有一顶大礼帽。于是，他又带着那副装出来的肃穆把帽子递给主人，主人怒目圆瞪，却还要严肃地继续听祷告。于是，本来庄严的时刻就变得这么滑稽可笑了。

第十五章　募购公债

大多数人都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到四个月就会结束，理由是现代战争的杀伤性很强。人们会要求早日结束这种野蛮的行为战争。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却整整持续了四年。关于这次战争爆发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关于“民主”的说法是比较现实的。但是，为了“民主”，不知倒下了多少人。

直到1915年，美国政府还宣称自己不屑于参战。于是，就诞生了《我养孩子，不要他当兵》这支歌。但是，在当年五月份，美国商船“卢西塔尼亚”号在大西洋被德国潜艇击沉后，人们就唱起了《在战场上》这支歌。在这之前，对于这场战争的压力，加州人还没有什么感觉。慢慢地，每个人都体会到了战争的可怕。

到1918年，美国一共发动了两次自由公债募购运动。第三次自由公债募购运动的正式动员大会是在华盛顿召开的。我同玛丽·碧克芙和道格拉斯·梵朋克都被邀去参加了。

当时，我在新制片厂的第一部影片《狗的生涯》的拍摄也快要完成了。我连着三天三夜没睡觉，忙着剪接片子，因为这部影片要在发动公债募购运动时放映。为了在这次动员大会上演讲成功，我们在去华盛顿的火车上，做了很多努力，包括写演讲稿以及在途中的试讲。

到华盛顿后，我们的第一次演讲是在足球场进行的。一些粗制木板搭成的讲台上挂满了旗帜、横幅。台下站着一些陆海军代表。站在我旁边的是一位漂亮的年轻人，他身材高大。我跟他说，我现在很紧张，以前从来没演讲过。

“您想到啥就说啥，没什么可怕的！让大家买公债，不要讲笑话。”他胸有成竹地对我说。

“您不用担心这一点！”我安慰他说。

一会儿后，我就听见介绍我了。于是，我跳上台去。开始后，我就不停地说：“德国人已经到你们的大门口了！我们必须把他们拦住！你们只要买自由公债，我们就能够把他们拦住！请大家记住，你们买一份公债，就救活了一个士兵！一位母亲的儿子！这一仗就可以

早日打胜！”我很兴奋，说得又快，一下子就从台上滑下去了。我把玛丽·德雷丝勒住，一起栽在了一个人的头上，就是那位和我聊天的朋友，他就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当时任海军部次长。

结束正式仪式后，按照预定程序，我们去白宫会见威尔逊总统。我们先是进的绿厅[(1)]。后来门忽然开了，走进来一位秘书。

“请排成一列，向前一步走！”他兴冲冲地说。

然后，总统就进来了。

第一个开口的是玛丽·碧克芙：“总统先生，群众很有热情，我相信公债募购运动一定会顺利成功！”

“的确是成功的，会成功的……”我插嘴说道，完全是前言不搭后语。

总统瞥了我一眼，露出迷惑的神气。之后，他就给我们讲了一个参议员的笑话。大伙儿都笑了，很有礼貌。然后，我们就退出来了。

我以前没有去过南方。因此，我选的推销公债的地方是南方的几个州。道格拉斯和玛丽选的是北方的几个州。我从洛杉矶邀来朋友罗布·瓦格纳陪我一起去。他是一位作家兼肖像画家。那一次，我卖的公债有好几百万美元。

我们来到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城市，当地的一位巨商是接待委员会主席。先前，在火车站，他叫他的十个儿子拿奶油蛋糕往我脸上扔。由于下车时我们的随从很多，这件事才没发生。

说到南方绅士，我得说说亨肖法官。我是在佐治亚州奥古斯塔遇到他的。他是公债募购委员会负责人。先前，他寄来一封信，说要在城郊俱乐部设宴为我祝寿，因为我们到达奥古斯塔的那一天恰好是我的生日。但那时我已经很累了，就决定直接回旅馆，谢绝了他的盛情。

我们这次抵达火车站时，只有亨肖法官一个人来了。而在其他地方，不但会来很多人欢迎我们，还有管铜乐队奏乐。作了自我介绍后，亨肖法官就赶过来一辆老式四轮马车，说要送我和罗布到旅馆。

在车上，我们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忽然，这位法官说：“我很爱看你的笑片。你知道吗？屁股是人身体上最不体面的部分，你的那些笑片就证实了这一点。不管是谁，只要踢他屁股一脚，即使是一位绅士，他的庄严就没有了。在总统的就职大典上，只要你踢一脚总统的

屁股，庄严的气氛也立即就没了！”

“屁股是一个羞人的地方啊！千真万确！”他自言自语。

后来，我悄声对罗布说：“他们给我过生日，是在这儿呀！”

给我过生日那天，除了我和罗布，亨肖只请了三个朋友，地点在高尔夫球俱乐部，那里的环境很幽美。他说他感到很抱歉，给我过生日设的是小型宴会。他还说他自己很自私，不想跟别人分享和我们在一起的乐趣。

这时，我们六个人在阳台上围着一张圆桌坐着，一个点亮了蜡烛的生日蛋糕在桌上放着。

亨肖一边细嚼着芹菜，一边望了望我和罗布。

“在奥古斯塔，你们有可能推销很多公债吗？……这类事情，我不大会安排。但你们来这里，我相信本地人都知道了。”

我称赞这里幽美的环境。

“是呀，就是没有薄荷露[(2)]！”

从这句话大家又谈了禁酒的可能性以及禁酒的利弊。

“医学报告说，禁酒对公众的健康是有益的。根据医学杂志，如果禁止喝威士忌的话，就没有那么多人得胃溃疡了。”罗布说。

亨肖有点不高兴。“威士忌是灵魂的粮食！威士忌是不能从胃的角度来评价的！”他说。

之后，他转向我说：“查理，今天是你的第二十九个生日。你还没结婚，对吗？

我笑了起来：“对！你呢？”

“我也没结婚啊！”他叹了口气，闷闷不乐的。

“虽然我审理的离婚案件特多。但是，过单身汉生活实在是太冷清了。如果我现在还年轻，我一定要结婚。但我又是一个赞成离婚的人。如果夫妻双方不愿意一起过下去，我是不会勉强他们的。在佐治亚州，我相信对我这个法官，人们是最有意见的。”

过了一会儿，罗布看了一下看他的表。

“如果八点半开会的话，我们得抓紧了。”他说。因为开会也安排在这一天。

很悠闲地细嚼着芹菜，说：“还早呢！我们还是多聊会儿吧，我就喜欢闲聊。”

去开会的时候，我们穿过一个很小的公园，里面至少也有二十多座参议员的塑像。看到他们那副神气活现的样儿，我就想笑。我开玩笑说，他们完全可以扮演刚才亨肖谈到的笑片中被踢屁股的配角。

他打着哈哈，说：“可不是吗？他们看起来都是一些了不起的大好佬呢。”

后来，亨肖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去了。他住的房子是一幢美丽的老式佐治亚房子。美国十八世纪古色古香的陈设都摆在里面。据说，华盛顿真的“在这儿睡过觉”。

“太美啦！”我说。

“没错！但就像个珠宝箱子一样空着，少了一位太太！因此，查理，要抓紧啊，别耽误得太晚啦！”

我们还去了好几个军事训练营访问。在那里，我们看见了很多愁苦的面孔。

最后一次公债募集运动是在纽约华尔街国库分库外边进行的。这次，玛丽、道格拉斯和我卖的国债有二百万美元以上。这也是我们旅行活动中的高潮。

当时在纽约，军国主义的魔影到处都可以感觉得到，情景十分令人沮丧。一时间，仿佛是从同一个模型中铸出来的一样，美国人只知道服从命令，首先信仰的就是战争！

在这样的氛围中，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偶尔会发现一点幽默情趣。有七队军乐队要去接受纽约市长的检阅，他们要穿过鲍尔公园。运动场外面站着威尔逊·迈兹纳，他佩着一颗引人注目的徽章，拦住每一队军乐队，要求他们经过市长的大看台时奏国歌。市长和所有的人为此起立了四次，之后，迈兹纳又不得不通知乐队，让他们停止。

之前，我和玛丽·多萝在伦敦约克公爵戏院里合演过戏，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当时我还暗恋过她，但她对我已经没有印象了。后来，由于她很喜欢看我的影片，经过康斯坦斯·科莉尔的介绍，她才算是正式认识我了。上一次和她见面，是我离开洛杉矶参加第三次自由公债募购运动之前。

玛丽现在来纽约了！一知道我住在里茨旅馆，她就给我写了封信，邀请我去她公寓里吃饭。

回洛杉矶后，我又住进了体育俱乐部，考虑我工作的问题。《狗

的生涯》的拍摄花了很长时间，花的经费也超出了我的预算。但合同要满期时，这些都可以扯平，所以我并不为此烦恼。我的下一部片子应该找一些什么题材，这才是我所着急的。

我后来忽然想到，拍一部以这场战争为题材的笑片也行。于是，我跟几个朋友说了这个想法。但他们都觉得不行。

迪米尔说：“拿战争开玩笑，这种时候是有危险的！”

但我对这个想法已经有了兴趣，才懒得管它危不危险呢。

《从军梦》原计划要拍五大本，“家庭生活”是开头部分，“战争经过”是中间部分，“大摆宴席”是结尾部分。在宴席上，所有的首脑一起庆祝我英勇抓获了德皇。最后，当然是我从梦中惊醒了。后来，战争前面和后面的几段删掉了，开头的一段先前拍出来了，但宴席那场一直没有拍。

在开头的一段，观众可以看到夏洛和他的四个孩子一路走回家的经过。后来，夏洛离开了孩子们，一个人回去了。他刚走到家里，脑袋就被一个煎锅砸了。影片里没出现他的妻子，但晾在厨房一根绳上面的一件肥大的女衬衫，就暗示了她有多么肥胖。

第二段拍的是夏洛在体检过程出现的一些丑态，但后来没采用。在我看来，夏洛还是没有背景、来历不明比较好。因此，在影片里，他出现的时候就到军队里了。

拍《从军梦》花了很长时间，并且是在外景中拍摄的，特别辛苦。但是，拍完后并没有让我满意。这样一来，电影制片厂里的其他人也不满意。后来道格拉斯·梵朋克要看这部影片，我说我很想把它扔到垃圾桶里去，我很失望。

放映室里只有我们三个人在看试片。从影片开始放映到结束，梵朋克一直在放声大笑，只是在几次咳得厉害的时候稍微停了停。我最内行的看客，就是可爱的道格拉斯。

看完影片，我们一起走出来。他笑出来的眼泪还没有干！

“它真的有那么好笑吗？”我不相信。

他转过身去，对他的那位朋友说：“他想怎样？你猜猜！他要把它扔到垃圾桶去啊！”对这部影片，道格拉斯只说了这样一句。

“一战”期间，《从军梦》成为士兵最爱看的一部影片，它的上映轰动了全国。但是，拍摄它的成本比《狗的生涯》更高，花的时间也

超出了我的预计。我想第一国家影片公司能不能给我一些补助，每部影片补偿一万美元至一万五美元的额外开销就够了。我当时就一门心思想拍出更好的影片。我加入这家公司后，它的生意蒸蒸日上。

我跟第一国家影片公司经理J．D．威廉斯说了这个想法，他的回复是，这件事需要董事们讨论。七天内，董事们将在洛杉矶开会，我自己可以找他们谈谈。

那时，电影院老板都是一些粗俗的商人。影片在他们眼里只是一些商品，论尺码计价。当时，我很诚恳地申辩的几句话合情合理。

“我花的钱和时间都超出了我的预算，我才需要增加一些补贴。就算我是一个外包工，我也可以向通用汽车公司提出要求，把我的工资提高。”我说。

我说完后，大家都不开口。后来，对方的发言人着急了。他说：“查理，您看，这交易是谈好了的。既然你已经签了合同，你就应该按照合同的要求办事儿。”

“如果你们要那种片子，在两个月内，我可以交出六部影片。”我也回答得很干脆。

“查理，那就随你的便啦。”声音很沉着。

我接着说：“为了保持我作品的水平，我才要求加钱的。你们这样漠不关心，只能说明你们没有远见，也不懂得人心。要知道，你们这面对的是一个人工作热情的问题，而不是在买卖香肠！”

但是，我是没法打动他们的，三寸口舌说烂了也没用。一般来说，我被认为是全国最能卖座的演员。因此，我理解不了他们的态度。

“听说所有的电影制片公司要组成一个托拉斯，我觉得，这一次电影业的会议和这件事多少有些关系。”雪尼说。

一天后，雪尼见到了道格拉斯和玛丽。他们的合同即将满期，但派拉蒙影片公司并不打算同他们续约，因此他们也很着急。道格拉斯也认为这和传说中的影片公司组成托拉斯一事有关。

我们都赞成雇用一个侦探去了解一些情况。

后来，我们请了一位女侦探，她非常机灵能干。不久，她就认识了一家资本雄厚的电影制片公司的总经理。于是，她侦探到，传说中影片公司要组成托拉斯一事是真的。这位经理和他的同事正准备把所

有的电影制片公司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托拉斯，资本四千万美元。而且，还要和所有美国的电影院老板签订一份为期五年的合同。在他们的控制下，一伙疯狂的演员再也不能操纵电影业，不能拥有巨额的报酬。对我们来说，这些材料足够了。

我们也给D．W．格里菲斯和比尔·哈特看了这份报告，他们和我们的想法一样。雪尼说，我们自己成立电影制片公司，在公开市场上出售自己的影片。这样，我们就可以挫败电影业的托拉斯计划。因为我们代表电影业中最能卖座的演员。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影星参加的话，而托拉斯计划将变得毫无意义。

因此，在他们开会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决定一起去亚历山德里亚旅馆大饭店里吃饭，然后向报界发表声明。

那天晚上我们都去了，一起坐在餐厅里。J．D．威廉斯一看见我们，就慌忙退出去了，他根本就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后来，其他的影片公司经理看到我们在里面，也都离开了。我们在那儿坐着，热烈地讨论生意。

没多久，就有六七个记者在我们桌上坐着，摘录我们说的话。我们发表声明说，为了保护我们的独立，对抗即将组成的托拉斯，我们正在筹备成立一家联美公司。后来，报界将这个消息作为头版新闻登了出来。

好几家电影制片公司的经理第二天就找到我们，说他们都情愿辞去现任职务，担任我们的公司经理。只要能够在新公司里分享红利，薪水低也没关系。于是，我们就决定完成原来的计划，成立了联美公司。

在玛丽·碧克芙家里，我们开了一次会。每个人都带了一位律师和一位经理出席。有很多人都出席了会议，大家发表意见时，就像演讲一样。每次一发言，我就会紧张。但是，在法律和商业方面，玛丽的精明的程度让我感到惊奇。这方面所有的专业用语她都熟悉。当她明确指出公司管理条例中的不妥时，我除了惊讶外，还更觉得伤心。我没有想到“美国的美女”竟会这样。她的庄严致辞里的“我们理合”，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当时的玛丽不仅以美丽出名，还特别精于经商。玛蓓尔·纳耳芒第一次给我介绍她时，说：“这是玛丽·碧克芙，她又是海蒂·格林(3)。”

我去参加那些业务会议，都是做做样子而已。幸好在商业方面雪尼和玛丽同样老练。事实上，道格拉斯比我们谁都精明，尽管他表现出一副满不在意的神气。

阿道夫·朱赫尔是诸多愿意辞去现任职务加入我们公司的经理中的一位，他的口才很好，谈生意很在行。他说："你们呀！你们是艺人，从事创作的是你们！有了你们才会有人来看电影！你们完全有权利充分享受你们应得的利益！"他说话时带有一口匈牙利口音。

这时候，我们客气了几句。

他接着说："我认为电影业中阵容最强大的就是你们即将成立的公司！要是……"他的语气加重了，"要是经营得当的话。一方面我来出主意，另一方面你们动脑筋。要是我们能够好好合作，不知道会有多好！"

他就这样向我们娓娓道来他的理想和信念。

在演艺圈里，朱赫尔是一位伟大的演员；在商业圈，朱赫尔是一位不寻常的商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轮回上演电影院就是他建立的。但邀请他加入我们公司的事，却一直没有成功。

新的公司成立还不到半年，玛丽和道格拉斯就已经开始拍电影了。但是，我还得拍六部笑片给第一国家影片公司。我的工作进展得很慢，谁叫他们对我那么恶劣呢！关于我和他们订立的合同，我愿意出价收购且贴给他们十万美元的利润，但公司不同意。

影星中由我们的公司发行的影片，只有玛丽和道格拉斯的。因此，他们怪我没拍电影，说他们的负担太重，经常向我抱怨。公司借了一百万美元的债，尽管他们以成本百分之二十的极低代价发行他们的影片，但我的第一部影片《淘金记》一放映，所有的债务立即就偿清了，他们的气也消了，以后也不抱怨了。

当时，残酷的屠杀和破坏正在欧洲各地进行。人们在训练营里学习怎样用刺刀进攻。谁要是逃避兵役，就要被判处五年的有期徒刑。每个人都得随身携带入伍登记证。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穿上了军服，如果谁不穿军服，妇女就会送他一根白羽毛[(4)]，或者就会被检查他的入伍登记证。

报纸上关于我的说法也不少，有一些报纸批评我不曾参军，另一些报纸则为我辩解，说与当兵相比，更需要我拍笑片。

美国军队没有作战经验，但他们抵达法国时立即就要参战。可是，美国士兵不听那些已经血战三年的英法士兵的忠告，结果成千上万的人死的死，伤的伤。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士兵都是在泥污血泊中度过的。最后，终于突破了敌军的阵线。后来，停战协定的消息传来，人们唱歌的唱歌，跳舞的跳舞，和平终于到来了！

战争结束后的几个月里，我们仍然会担心忘了带入伍登记证。总之，协约国终于胜利了，不管胜利意味着什么。但是，人们仍然不能肯定有没有赢得和平。以前我们所熟悉的文化不会保持原样了，只有这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

---

(1) 绿厅是非正式的会客厅。

(2) 薄荷露就是威士忌或白兰地，只不过加了糖和薄荷。

(3) 海蒂·格林是世界上最富的妇女之一，据说她精明干练，经商致富，所赚的钱在一亿美元以上。

(4) 表示蔑视。

第十六章　第一次婚姻

汤姆·哈林顿以前是给伯特·克拉克管服装并兼做其他杂事的，后来他告诉我，伯特·克拉克没给他工资，每星期就给他七八元的生活费。他来侍候我以后，我的生活发生了一个急剧的转变。每天早晨，他都会把收到的信件和报纸送到体育俱乐部，然后把早餐给我准备好。他有时候一句话也不说，就把几本书留下，搁在我床头。汤姆的话不多，他从来不会主动说什么。吃早饭的时候，我从来都不会感觉到他在身边。在我的生活中，他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任何事情，只要我吩咐一声，他就会办得妥妥帖帖的。

1917年下半年里的一天，萨姆·格尔顿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兴趣去他的海滨别墅游泳。如果我没有听到电话铃响的话，我以后的生活也许就是另外一个样子。

那个下午爽朗而宁静。就在那天，我认识了米尔德里德·哈里斯。那天临走的时候，她说她和陪她来的朋友吵架了，问我能不能让她搭车到市里去。我答应了。

在车里，我逗她道："或许你朋友是吃埃利奥特·德克斯特的醋吧！"在她心目中，埃利奥特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她承认了。

她说笑话很天真，在我看来，这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让人家对她感兴趣。这是女性的一种本能。

"他的艳福可不浅呀！"我说道。

于是，我们一路上就闲聊起来。她跟我说，她现在给派拉蒙影片公司拍电影。

送她回寓所后，我就回体育俱乐部了。在屋子里还没清静到五分钟，哈里斯小姐就打电话来了。

"我就是想知道你这会儿在干什么？"她说得很天真。

这让我觉得很奇怪，我们才刚认识啊！

我说，我正要吃晚饭。之后上床看一会儿书。

她"哦"了一声，很是伤感。然后，她问我要看什么书，住的地方是什么样的。就这样，我就跟她在电话里瞎聊起来。

“我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呀？”她问道。

这时，我就开玩笑说，她不应该把埃利奥特抛弃了。

她接着说，事实上，她对埃利奥特根本就没有意思。

于是，我就邀请她来吃饭。本来，那天晚上我预定了节目的，但我取消了。

那天晚上，我并没有过分热情，尽管她也很漂亮可爱。

那以后，我就没有想起过她。那周周三，汤姆说她来了电话。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可能根本就不会想到要和她再见面。另外，汽车车夫对汤姆说她很美，这也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于是，我以后就和她经常来往了。后来，哈里斯怀孕了。

汤姆从来不会告诉你他想到了什么。有一天，他给我端早餐进来。我告诉他说，我要结婚了。他听后连眼睛也没眨一下，冷静地问道：“哪一天？”

“今天礼拜几？”

“礼拜二。”

“那就礼拜五吧！”我一边看报，一边说道，连头都没抬。

“是和哈里斯小姐结婚吧？”

“对呀！”

他点了点头，问：“戒指您准备好了吗？”

“没准备。最好你给我准备一枚。你把该办的手续都办好，不要向外声张。”

他仍然点了点头。

之后，我们都没有再提这件事，直到结婚的那一天。

我们的结婚仪式定在礼拜五晚上八点钟举行。这是他安排的。

礼拜五那天，我很晚才结束工作。七点半的时候，汤姆悄悄来到摄影场，小声儿地对我说：“八点钟您有一个约会，别忘了。”于是，我卸了装，但很郁闷。我的衣服是汤姆帮着穿好的。

上车后，他才告诉我说，我要在本地登记员斯帕克斯先生家里和哈里斯小姐见面。之前，我们可是一句话也没有交谈过。

哈里斯比我们早到，我们到的时候，她已经在厅里候着了。她看起来很漂亮，穿着一套深灰色衣服，很朴素。但是看到她忧郁的微笑，我有点儿难过。汤姆赶快塞给我一枚戒指，动作不是很麻利。这

时，斯帕克斯先生走进来了。他又高又瘦，看起来很和蔼。他让我们到另一间屋子去。

“哦！查理，你这位秘书可真行呀！半小时前，我才知道是你结婚呀！”他说。

婚礼很简单。在哈里斯手指上，我套上了汤姆给我的那枚戒指。就这样，我们结为了夫妇。

婚礼结束后，我们刚要走，斯帕克斯先生却说道：“查理，不要忘了吻你的新娘呀！”

“嗯，知道啦！”我笑着答道。

我当时的心情很复杂。我和她的结合没有基础。但是，我需要一个妻子。另外，她又是那么年轻貌美，当时她比我要小十岁，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我们以后的生活也许可以会很幸福的。

结婚后一天早上，我到电影制片厂去。艾娜·普文思就跟我道喜，她让我觉得很尴尬。

我觉得哈里斯不太聪明，我私下里跟道格拉斯说过这件事。但是，我也并不想娶一位知识渊博的女子。从图书室里就可以获得知识。我嘴上虽然这么说，但还是有诸多的担心，担心与她结婚会带来种种麻烦。我告诉自己，既然跟她结婚了，就应该好好爱她，好好过，尽管没有和她恋爱过。但是，对哈里斯来说，结婚只不过是为了寻找刺激，是一次历险。我结婚后才知道，原来她根本就没有怀孕。

婚后第二天，米高梅公司的路易斯·伯·梅耶就来找她签合同，让她在一年内拍六部电影，给五万美元的报酬。我劝她别签，并且我说什么她都微笑着点头，但她后来还是签了那份合同。这让我拿她也没办法。大约一个月后，她就与米高梅公司发生了纠纷，要我出面去解决。我没去。

好几个月过去了，《阳光山村》的拍摄才结束，这是一部三大本的笑片。结婚后，我的创作能力受到了严重地影响。拍摄《阳光山村》的时候，我很痛苦。拍完《阳光山村》后，我就才穷力竭了。

为了调整一下精神状态，有时候，我就去奥尔菲姆戏院消遣。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我看到了贾克·柯根的表演，当时就特别喜欢他。

后来，我在苦苦思索我的下一部影片的时候，就跟班里的演员说了贾克·柯根的表演。其中有一个人的话启发了我，他说他看到一份早

报，说罗斯科·阿克巴尔已经邀请贾克·柯根去拍一部影片，并且合同已经签了。这时，我才想到我可以把贾克·柯根请来，有了他，我就可以拍好多精彩的片子。但他已经跟罗斯科·阿克巴尔签了合同，我有再多的想法也没用。当天整个下午和晚上，我的脑子里都是那个孩子。有人说，另外再找一个孩子，但是有谁能像贾克·柯根那样有个性呢？

后来才知道，与另外一家公司签合同的是小贾克·柯根的爸爸老贾克·柯根。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激动得一下子就从椅子上跳起来了。

“快！给他父亲打电话，让他马上来这儿！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这时，我们厂里所有的人都特别兴奋，先前的压抑气氛一扫而光。

但是，我又担心罗斯科·阿克巴尔会跟我有同样的想法，抢在我前面，毕竟我还没有和贾克签合同。所以，我让罗宾逊打电话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关于孩子的事一点都别提。

“千万别提这事，在他父亲没来这儿之前，对他父亲都别提。就跟他说，在半小时内，我们必须见到他，事情非常紧急。要是他不能离开制片厂的话，我们就到那儿去找他。记住，在他到这儿之前，一点都别提。”

贾克的父亲不在电影制片厂里，办事的人没办法一下子就找到他。我那两个小时特别着急，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贾克的父亲终于来了，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一脸的惊奇和迷惑。我把他的胳膊拉住。

“只要他拍这部影片，他就会一鸣惊人！这种事以前可从来没有过啊！”我话都没说清楚，他肯定以为我疯了。“拍这部影片，你儿子一定会红的！”

“什么，我儿子？”

“没错！你儿子！只要你让他留下来拍这部影片！”

“啊！这小坏蛋，你尽管留下来好啦！”他说。

听说，电影里最好的演员就是狗和小孩。一个刚满周岁的婴儿，你把他放在浴缸里，旁边放一块肥皂。这时，他只要把那块肥皂抓起来，人们就会哄堂大笑。其实，所有的小孩都会有一点那种天分。怎

么样才能让他们表现出来才是问题的关键。

这个问题，贾克解决起来很容易。演哑剧的几条基本规则，贾克很快就掌握了。他的情感与动作配合得非常好，很自然。

《寻子遇仙记》中有这样一个场面：一个小孩想朝一扇窗子扔石头，这时，他背后悄悄地过来了一个警察。小孩把拿着石头的手举起来，正准备扔，结果他的手碰到了警察的衣服。于是，他抬头看了看警察，就将石头抛到空中，用手接住。然后，他就把石头丢掉，慢慢地走开几步。忽然，他拔腿就逃跑了。

这一镜头的动作我先示范了一遍。我让贾克看着我，告诉他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后来，他排练三四次就学会了那个镜头的动作。结果他表演得非常精彩。

当然了，并非所有的镜头都是这样容易拍好的。要表演得自然，思想一定要活动。贾克的思想只要在活动，他就会表演得很精彩。

贾克的父亲和阿克巴尔订的合同就要到期了，因此他就可以来我们电影制片厂陪他儿子了。有时候，他对我们的帮助挺大的。在《鸡毛旅店》的一场戏里，那个扒手就是他扮演的。有一场戏需要贾克表演伤心地哭，但他当时非常高兴，哭不出来。尽管我跟他讲了各种各样的伤心故事，但也白费力气。

一个小时后，他父亲说："瞧，我来让他哭。"

"可别把孩子吓坏了！"我觉得过意不去。

"嗯，不会的！放心吧！"他父亲说。

当时贾克玩得正高兴，我没有勇气留在那儿看他父亲怎样叫他哭，于是，我到化妆室去了。一会儿之后，贾克号啕大哭的声音就传了进来。

"他这会儿完全准备好了。"他父亲说。

那个镜头拍完后，我就问他父亲："他怎么哭的呀？"

"我就跟他说，要是他不哭的话，我们就把他送到贫民习艺所去。"他说。

贫民习艺所是镜头中的一个地方。

于是，我转过身将眼泪还没干的贾克抱在怀里，说："他们不会带走你的。"

"我知道，爸爸是哄我的。"他小声说。

我觉得，《寻子遇仙记》这部影片以纯闹剧与感情剧相结合为前提，是一大创新。

塞缪尔·雷谢夫斯基是七岁的国际少年象棋锦标赛冠军。我在做《寻子遇仙记》的剪接工作时，他来我们的制片厂参观。听说他特容易激动，不太愿意和别人握手。

他来的时候，有人给我们作了介绍。完了之后，我就接着做剪接工作，查看一卷卷的胶片。他就在那儿站着，上下打量着我。一会儿过后，我就转过身，问他：“你喜欢吃桃子吗？”

“喜欢啊！”他回答。

“那好，我们花园里有一棵桃树，上面有很多桃子。你可以去摘几个下来吃，也给我摘一个。”

听我这么一说，他特别兴奋。

“哦！好啊！桃树在哪儿？”

“卡尔会带你去。”卡尔是我的宣传员。

过了一刻钟，他手里拿着几个桃子，兴高采烈地回来了。

就这样，我们成了好朋友。

“你会下棋吗？”他问。

“不会。”我只好承认。

“那好，我来教你！今天晚上，我要和十二个大人比赛下棋，你来看吧！”他很得意地说道。

“好啊，比赛完了，我请你吃饭！”

“那好，我就早点儿结束比赛。”

也许，你不懂得如何下象棋。但是，你可以感受得到那天晚上的棋赛有多紧张。在棋桌上，一个七岁的小孩——实际上他看起来更小，将十二个中年人逼得走投无路。在坐的三百多位观众静静地观看着这场比赛。没过多久，他就赢了好多个对手。他的棋艺确实很高，但他也为此付出了健康的代价。他的小脸蛋儿一阵红，一阵白的。

这时，格里菲斯博士仍在用心思考。

“你走了吗？”孩子问，有点不耐烦。

格里菲斯摇了摇头。

“那就快点吧！”

格里菲斯笑了。

但是，孩子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你要想赢我，那是不可能！如果你这么走，我就这么应！……”很快，他一口气就把接下来的七八步棋说完了。“在这儿，我们比一个晚上也比不完。那就让我们和了吧！”

格里菲斯也就只有同意了。

哈里斯做什么都是鬼鬼祟祟的，这让我很生气。我们两人的性格始终都合不来，最后只好分开了。其实，我们有过一个孩子，但出生后三天就死了。从那以后，我们的生活就毫无乐趣。我们都忙着自己的事情，即使住在一幢房子里，也很难碰面的。对我来说，家里变成了一个凄凉冷落的地方，没有温暖。她到哪里去，去多长时间，也不会告诉我，只是后来看见她房间的门是开着的，我才知道她没在家。周末的时候，我们也会偶尔遇到。这时，她总是敷衍一下就完了。

后来，决裂的一天终于到了。当时，我正在做《寻子遇仙记》的剪接工作。周末到梵朋克家，道格拉斯跟我说了一些传言，当然都是关于哈里斯的。

“我以为你知道。”他说。

我不想知道那些传言是否是真的，但我听了之后很郁闷。于是，我后来就问了哈里斯，但她没承认。

“但我们总不能这样过一辈子吧！”我说。

过了一会儿，她冷冷地看了我一眼。

“那你想怎么样？”她问。

说这话的时候，她非常镇定，我有点吃惊。

“我觉得……我们还是离婚吧。”我说。

我不知道她会有什么反应，所以说得很慢。但她没有回答。

沉默了一会儿，我接着说：“我觉得，你还那么年轻，离了婚，你可以去追求属于你的幸福，我也可以生活得更好些。当然，我们可以好好商量这件事。你可以让你的律师去找我的律师，你有什么要求，就提出来。”

“我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有足够的钱照顾我母亲就好。”她说。

“要不然，我们自己谈吧。”我试探性地说了一句。

她想了一下，说：“我还是去找我的律师吧！”

“好，我到体育俱乐部去住，你暂时仍然住在这儿吧！”我回答。

我们就这样分手了。我同意她提出离婚申请，控告我精神虐待。我们说好了，这件事不向报界泄露。

汤姆第二天早上就把我的东西搬到体育俱乐部去了。就这样，很快，关于我们离婚的消息就传播开了。记者们来找我问这件事，要我们发表声明，但我没见他们。之后，在报纸的第一版上，哈里斯却大肆地攻击我。于是，我去问她为什么要接见记者。但她说，是记者们跟她说，我已经发表了一篇声明，措辞还相当激烈。这肯定是他们造的谣。我跟她说了，她也答应不再发表声明，但后来还是发表了。

按照加州的夫妻共有财产法，她应当获得的赡养费是二万五千美元。但我愿意给她十万美元，她也同意了。但是，签署最后文件的那天，她径自把协议推翻了，没有提出任何理由。

我的律师说："这件事肯定没有这么简单。"他觉得很奇怪。

结果真被我的律师说中了。

事情是这样的：我花了十八个月的时间拍摄《寻子遇仙记》，还花了五十万美元。本来这是一部七本长的故事片，但第一国家公司却要把它当作三部各两本长的笑片，这样，他们就只给我四十万零五千美元。我不同意他们的这种做法，除非太阳打西边儿出来。为此，双方可能要打官司，但是按照法律，这场官司他们肯定会输。因此，他们想利用哈里斯的影响，把《寻子遇仙记》扣押下来。

当时，我还没剪接好《寻子遇仙记》的影片，于是，我就想剪接工作必须到另一个州去做。我便带了两个工作人员和四十多万英尺的影片立刻出发去盐湖城。

我们住进了盐湖城旅馆，在几间卧室里把全部的影片摊开，利用所有的家具来做剪接工作。但我们必须偷偷地做，因为在旅馆里存放危险易燃物品是违法的。可以想象，我们的剪接工作有多么得难，但是，我们终于完成了。

向观众试片真的是一种考验，而且非常痛苦。虽然这样的工作以前做过，但我还是特别担心，对十五个月来的工作心里没底儿。我们制片厂的工作人员早就看过了，所以现在看的时候就觉得没有最开始看的时候那么搞笑了。于是，我们只好安慰自己说，我们自己没有先前那么热情了。

我们径自在当地一家戏院里试映了一次这部影片。我们事先没有

公布，就是想给它一次严峻的考验。

那家戏院很大，四分之三的座位都坐满了。我在那里提心吊胆地坐着，等着放映影片。自个儿想了很多，觉得自己的全部努力都会付诸东流。

突然，银幕上出现了“查理·卓别林最新影片：《寻子遇仙记》”这几个字。这时，观众们都感到很惊讶，还在那儿欢呼和鼓掌。现在我又担心，他们的期望太高，也许看到后面就会失望的。

影片的前几个镜头是介绍剧情的，因此很缓慢，也很严肃。当时，我特别紧张难受。我扮演的流浪汉在银幕上出现，台下就发出了一阵笑声，并且越笑越厉害，事实上，观众们从头到尾一直都在笑，就像发了疯一样，没有停过。

新片试映完了，我们就收拾好东西离开盐湖城，去了美国东部。

为了利用哈里斯的离婚讼案来扣押影片，第一国家影片公司就怂恿那些递送传票的法警来扰乱我。到纽约后，法警接连三天都在里茨旅馆休息室里守着。我不得不整天在旅馆自己的房间里躲着，感觉又气又闷。所以，后来弗兰克·哈里斯邀我去他家吃晚饭，我借来我嫂嫂的衣服，把它穿在外面，脸上蒙着厚纱，就去了。

弗兰克·哈里斯是一位作家，他写的书我拜读过，我很崇拜他。在经济方面，他经常有困难，我捐赠过他一笔钱，他赠了一本书给我。

在去弗兰克家之前，我还没有见过他。因此，那天晚上我是第一次见到弗兰克。他矮矮的胖胖的，嘴角翘起两撇大胡子，看上去很威武。到他家后，我们说了很多话，一直聊到深夜四点钟，主要是他不停地说话。

没等天亮，我就决定另外找家旅馆，但当时所有纽约的旅馆都没有房间了。后来，还是车夫跟我说，让我到他家去住一晚。我有点犹豫，后来听他说到妻子和孩子，我就答应了。

“非常谢谢你！”我说，接着就把我自己介绍了一下。

他先是吃了一惊，然后笑起来了。

“这下可要把我老婆乐坏啦！”他说。

他们家的摆设很简单，但收拾得很整洁。他把我领去睡觉的时候，把在一张床上睡熟了的十二岁儿子抱起来放在床边上，让我睡里面。他还拿了一件干净睡衣给我。

我睡下了，但一直没合眼。

孩子后来睡醒了，刚开始只是随便望了我一眼。之后，他出去带着他妹妹进来，我仍然假装睡熟了，他们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很兴奋，妹妹把嘴捂住，不让自己笑出声。之后，他们就一起离开了。

后来，车夫进来看我醒了没有。

“我把您洗澡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浴室就在楼梯口那儿。”他说。

他把一件浴衣、一双拖鞋和一条毛巾拿了进来。

“您早餐想吃什么？”他问道。

“什么都行！”我觉得很不好意思。

“有火腿蛋、土司、咖啡，您爱吃什么就吃什么吧。”

“太好啦！”

我刚收拾好，就吃上了他妻子做的热气腾腾的早餐。吃早餐的时候，外面来了一大群孩子和大人。

“他们知道您来这儿了。”他妻子笑着说。

车夫后来也进来了，他很紧张：“瞧呀，一大群人都到外边来了，现在人越来越多了。如果您让那些孩子看看，他们就会离开的，要不然报馆里的人找来了，您可就苦啦！”

“让孩子们都进来吧。”我说道。

于是，孩子们进来了，把桌子四周都站满了，他们都在那儿笑。我只管喝自己的咖啡。车夫不停地说：“进去可别闹腾，排好队，一次进去两个。”

这时，一个年轻的妇女走了进来，她的神情紧张又严肃。仔细看了我一阵，然后就哭出了声。

“这不是他，不是，我还以为是他呢！”她呜咽着说。

也许是有人跟她说，来了一个你想不到的人。于是，她就进来看我，以为我是她在战争中失踪了的兄弟。

后来，我还是决定回里茨旅馆，管它有没有法警在那儿给我传票。但我后来并没有见到法警。我加州的律师给我发了一份电报，说问题全部解决了，米尔德里德提出离婚申请了。

车夫和他妻子第二天来看我。车夫说，报馆一直缠着他，要他把我在他家过夜的经过写给他们。

“没有您的许可，我什么也不会告诉他们。”他说。

“你去写吧。”我说。

当时，有几位第一国家影片公司的人来找我了。在美国东部各州有许多戏院的大老板戈登说：“你要一百五十万美元，但影片我们还没看到呢。”

我承认，这话有些道理。于是，我准备把影片放给他们看。那天晚上的气氛很冷清。之后，影片放映了。

“一部笑中也许含着泪的影片”，这是片头的字幕。

“字幕不错嘛！”戈登说，似乎为了表现慷慨大方。

上次在盐湖城试片后，我现在稍微有了点儿信心。但是，在这次放映时，只听到了两声冷笑。

“哈里，今儿的晚饭你怎么打算的呀？”

“带老婆去广场饭店。然后，我们去看齐格菲歌舞剧。”

“唉，听说那戏演得还不赖呢！”

“一块儿去，有兴趣吗？”

“去不了啊！我今儿晚上就得回去参加我儿子的毕业典礼。”

听他们这样闲聊，我特紧张。

我后来就直接问了：“诸位先生们，请问你们看了觉得怎么样？”

有些人低下头，有些人很不自然地欠了欠身子。这时，只有戈登在那儿走来走去。

“查理，这个嘛，我还得和我的几个同事碰头商量一下。”他说。

“我知道，”我赶紧插了一句，“但你们几位觉得这部影片怎么样？”

他想了一下，然后咧嘴一笑：“查理，我们到这儿来不是为了说我们多么喜欢这部片子，而是为了买它。”

一听这句话，有一两个人就大声笑了。

“我不会因为谁喜欢这部影片，就要你们多出几个钱的。”我说。

他迟疑了一下。

“说实话，我先前还指望它有一些玩意儿。”

“有些什么？”

“查理，这个……要卖一百五十万美元啊！嗯……它还没有那种声势。”他回答得很慢。

“你是要伦敦大桥塌下来，还是怎样？”

“没有这个意思。但是，要卖一百五十万美元……”他用嘶哑的声音说。

“先生们，我说，我要价也就这么多。要不要，随你们的便！”我不耐烦了。

经理J．D．威廉斯走过来敷衍了我几句，也不过是为了打圆场。

“查理，我觉得片子很精彩。里面有人情味，别出心裁……你一定要有耐心，咱们好好商量嘛！”

“没什么可商量的，你们只有七天的时间考虑。”我说。他们对我都成这种态度了，我还客气什么呢？很快，他们就作出了决定。我的律师把协议拟好了：他们只要一赚够一百五十万美元，就给我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和我拍的其他影片一样，五年期满，影片的主权仍然归我所有。

家庭与业务的重担卸下了，我就轻松了。后来，我的一些朋友读了一篇报道，关于我在车夫家借宿的，他们都来看我。于是，我又开始过上那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愉快生活。

纽约的上流社会，都给我献殷勤。住在里茨旅馆里，我经常碰到一些让人兴奋的事情。邀请我的电话整天不断，每天都是这样，我把纽约的上流社会访遍了。

很多人出名后，都想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现在，我也想到格林威治村去体验一下。

在格林威治村的时候，我在一个朋友家里。我说：“肯定可以设计一个系统的方法，根据词典编辑法，把表达抽象和具体意思的字分类排列。然后按照归纳和演绎的程序找到适当的词语来表达你的思想。”

“这有啊，罗杰特的《词典》就是嘛！”一个黑人车夫说。

在亚历山德里亚旅馆，有一个侍者，他每给我上一道菜，就要背诵一句名句。演杂技的一个小丑给我推荐伯顿的《解忧》。他说，莎士比亚等人都受了伯顿的影响。和这些人一样，我也读了很多书，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我在格林威治村还见到了很多名人，包括沃尔多·弗兰克，他是历史学家，又是小品文和小说作家，还有诗人哈特·克兰、律师达德利·菲尔德·马隆。

我认识沃尔多·弗兰克，是因为读了他那本1919年出版的散文集《我们的美国》。另外，他是第一个写了介绍我的文章的作家。后来，我们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在这里，我和沃尔多共同度过了许多个有趣的晚上。后来，沃尔多又给我介绍了哈特·克兰。此后，我们三个常常在一起。

其实，哈特·克兰的父亲是一个百万富翁。他为了让哈特·克兰继承事业，迫使哈特·克兰放弃写诗，就不给儿子钱。所以，哈特·克兰很穷。

我根本就不懂现代诗，但我觉得哈特·克兰的《桥》写得很好。

以前我们讨论过写诗的目的。我说："诗就是一封写给世人的情书。"

"那也只是世上很少的一部分人啊！"哈特伤心地说。

最后，哈特获得了古根海姆奖学金。但是，他跳海自杀了。

在他自杀的几年前，他赠送了一本名叫《白房子》的短诗给我，其中的一首题名为《卓别林风格》。

在格林威治村，达德利·菲尔德·马隆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在宴会上，我认识了乔治（人家都这样叫他，他的真姓名我始终不知道）。

那天晚上，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快乐。但当时，我们都在想，他难免还要回去坐十八年的牢。听说，他由于某种原因被判了二十年的有期徒刑，后来申诉重申被批准了，现正在保释中。

"查理，你急什么呀？怎么这么早就回去？"那天晚上我要走的时候，乔治在后面叫我。

我把他拉到一边。

"有什么事，我可以为你效劳吗？"我悄声问，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摆了摆手，好像有什么想法还是不说为好。

然后他就紧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查理，我没事儿！不必为我担心。"

我本来想在纽约再多待一段时间，但是我有事必须回加州。我很着急，想赶紧开始给联美公司工作。但在这之前，我要赶快给第一国家影片公司把合同中规定的影片拍完。

回加州后，我就要拍四部各两本长的笑片给第一国家影片公司。

看来，要完成这项工作很难。后来，我连着好几天又在制片厂坐着，在那儿苦思冥想。先前在纽约玩惯了，回来后一时还没法适应。

于是，我就决定和我的英国朋友塞西尔·雷诺兹医生到圣卡塔利娜岛去钓几天鱼。那里的鱼很多，在附近捕获的旗鱼，每条都有一百磅到六百磅重。有一次在午饭前，我们就钓到了八条金枪鱼，每一条有三十多磅重。还有一次，我只用了二十六分钟就把一条一百七十六磅重的鱼拉了上来。

那些日子，我们过得很愉快。

雷诺兹是一位神经外科医生，他简直就是神医。他的许多病人的病史我都知道。雷诺兹给一个几乎痴呆了的小孩动了手术后，这个小孩不但完全恢复了健康，并且学习成绩也特别好。

雷诺兹是一个戏迷，迷演戏。因此，我和他成了知己。他总说，戏剧可以鼓舞人。在这件事上，我也经常跟他辩论。我说，行医才能鼓舞人。让一个白痴成为一个学习成绩很好的学生，没有什么事儿比这更富有戏剧性。

“这个，只要知道某些神经纤维在哪儿就行了。但是，演戏是精神上的体验，能丰富人的灵魂呀！”雷诺兹说。

我问他，为什么要专门研究神经外科。

“因为干这行富有戏剧性。”他回答。

在帕萨迪纳的票房戏院里，他常常扮演配角。我的笑片《摩登时代》里，他还客串了那位探监的牧师。

钓鱼回来后，我听说母亲的身体变好了。战事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可以把她接到加州来了。于是，我派汤姆去英国，陪母亲乘船来。她登记的时候，换了一个名字。母亲在航程中完全正常。到纽约后，她待人和蔼可亲，十分安详。

后来，移民局的主管人员跟她打招呼，说：“啊，原来您就是卓别林夫人呀！见到您真高兴，我们查理的母亲！”

“是呀，是呀！原来耶稣基督就是你呀！”我母亲亲切地说。

这时，那位长官感觉有点奇怪。他想了一下，望了望汤姆，然后，他很有礼貌地说：“卓别林夫人，请您到那边去等一会儿好吗？”

汤姆知道，这件事麻烦了。但那些例行的手续办完后，移民局还算是很关照的。他们发给母亲每年一次转期的居住证，条件是不依赖

政府生活。

上次和母亲见面还是在英国的时候。现在，我离开英国已是十年了。当我看到一位小老太太在帕萨迪纳站走下火车时，我有点儿震撼。母亲一眼就认出来了我和雪尼。看来，她是很正常的。

海边有一所平房，离我们很近。我们就让母亲住在那儿，给她雇了一对夫妇料理家务，还请了看护侍候她。

最后，《寻子遇仙记》在纽约上映，观众的反响特别强烈。贾克·柯根变成了童星，我见到他父亲的第一天就说过，让他演这部影片，他一定会红的。现在，我的预言应验了。他出名后，拍电影一共挣了四百多万美元。

《寻子遇仙记》已被评为第一流艺术作品，我们每天都会收到赞扬这部影片的剪报。但是，我宁愿留在加州听有关《寻子遇仙记》的报道，也没有勇气去纽约观看这部影片。

我想在这本自传里，简单地谈一点自己对拍电影的看法。

为了让演员的动作更具有舞蹈的艺术，我经常调整摄影机的位置。在影片中，时间的精简是一个很重要的优点。快速切接镜头时，从一个镜头渐渐转换到另一个镜头，这些都是拍片的机械技巧。另外，有些影评家说我的摄影技术没有紧跟时代，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我的技巧是我自己思考出来的。

关于影片的主题，我想略谈一下大型特制影片。这类大场面的片子主题多是描绘超人。与一般人相比，影片里的主人公跳得更高，射得更准。事实上，超人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这些，但他们不会动脑子。同时，拍摄这种片子最容易，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只要有钱就足够了。

我也说两句关于导演的技术。善于运用心理来指导演员拍一场电影，是很有帮助的。我觉得，作家给戏院写剧本的时候，应该以感情为主。戏剧性的点缀就是所谓的舞台作风。

我比较喜欢在老式的戏院里演戏，在那里，观众与扮演者有舞台隔开，台上的场面可以露出来。舞台的装置能增强场面的真实感就行了，要把握好尺度。

演戏的艺术除了能让自己放松外，还要能保持一种内在的支配能力。感情是演戏最基本的需要。我不相信演戏是可以教会的。有些聪

明的人总演不好戏，而笨的人却演得很好。当然，也不排除聪明人能演好戏，只要将感情与聪明的大脑好好结合，最好的演员就能产生了。

如果一位演员真的会演戏，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指导他扮演某一角色时，你只要说一个词或一个短语提示一下就行了。一个角色的细节没有必要全部知道。随机应变是学会演戏的最重要一条。

在美国舞台上，谁是我最喜欢的男女演员？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他们都很优秀，如果说我喜欢谁，那其他的演员就该生气了。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我，但我还是想说一下，菲斯克夫人是我最喜欢的美国女演员。当然，其他的女演员也都有自己的魅力与风采。

我的那些麻烦事儿还没有结束，尽管《寻子遇仙记》放映后获得了很好的反响，但我还得拍四部影片给第一国家影片公司。可关于下一部影片，我一点主意也没有。于是，我去了道具室，希望能发现一件道具，打开我的思路。终于，我发现了一套高尔夫球棒。于是，我就有主意啦！流浪汉玩高尔夫球，《有闲阶级》就这样诞生了。

这部影片讲的是流浪汉享尽富人的种种生活乐趣后，又回到原来的生活，走上了流浪的路途。在拍摄的过程中，喷灯出了故障，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事故。我的石棉裤被喷灯的热气透过了。于是，我们又添了一层石棉。报界知道这件事后，就大肆地宣传，说我被严重烫伤了。后来，我收到了很多的信件、电话、电报，他们都非常关心我。当然，我也发表了辟谣声明，但很少有报纸关注。

拍完《有闲阶级》后，我就准备拍下一部两大本的片子。这部片子主要是想取笑铅管工人做的生意，当时那行很赚钱。

一辆大轿车里走出来两个人，我和麦克·斯万，这在第一场里就可以看到。那家美丽的女主人是艾娜·普文思扮演的，她招待我们的是丰盛的菜肴。大吃大喝完了，我们就被领进了一间浴室。一进浴室，我就在地板上放了一个听诊器，听那些水管。同时，我还轻轻地敲了敲那些水管。

影片拍到这里时，我的精力再也没法集中了。自己疲劳到了什么程度，我当时也没有想到。过去的两个月里，我很想念英国。收到H．G．威尔斯和海蒂·凯利的来信后，我更加想要快点去英国了。

我让汤姆把我的东西收拾好，又让里夫斯暂时关闭制片厂，让工作人员休假。

我要到英国去了。

第十七章　重返英国

第二天就要出发去英国了，头一天晚上，在爱丽舍酒馆，我宴请了玛丽·碧克芙、道格拉斯·梵朋克和梅特林克夫人等大约四十位客人。宴会结束后，我们玩猜字游戏。第一幕是道格拉斯和玛丽演的。从道格拉斯的装扮来看，他扮演的是一个公共汽车售票员，他把扎了一个洞的车票递给玛丽。这样，第一个字的表演就结束了。表演第二个字时，他们做了些手势，表明有人落水了，需要搭救。玛丽大声地呼喊“救命啊！救命啊！”于是，道格拉斯做着向她游过去的动作。然后，她就被安全地送到河边了。这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喊道：“梵朋克[(1)]！”

那天晚上，大家都玩得非常开心。后来，梅特林克夫人和我客串《茶花女》，表演其中死别的那一幕。当然，茶花女由梅特林克夫人来扮演，我扮演阿尔芒。当演到她倒在我怀里，快要死去的时候，她突然咳嗽起来。刚开始的时候还咳得很轻，但后来越咳越厉害了。很快，我就被传染了，也咳嗽起来。这样一来，好像我们是就在比赛咳嗽一样。结果，不是茶花女死在我怀里，而是反过来，我差点死在茶花女的怀里了。

第二天早上，直到八点半我才被叫醒。起床后，我洗了个澡。之后，我就感觉神清气爽，再也没有觉得郁闷了。一想到马上就要出发去英国，我就特别兴奋。我和朋友爱德华·诺布洛克一起乘“奥林匹克”号去英国，他是个作家，创作过《命运》和其他一些剧本。

跟着上船的还有一大群新闻记者，我真怕他们会一直留在船上，整个旅途都有他们陪着。幸好最后只有两个留下，其他的都被领港的人带下船了。

最后，只有我一个人留在房舱里。朋友们送来的一篮篮水果和鲜花摆满了房舱。看到它们，我不由得想起了从前。

到现在，我离开英国已经有十年了。上次和卡诺剧团的同事们乘的是二等舱，也是这条船。我还记得，为了让我们见识一下另一半乘客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侍者领着我们走马观花地在头等舱里兜了

一圈。他还给我们介绍了个别的房舱，介绍它们豪华的布置和昂贵的收费。而现在的我正是乘坐在这样一间房舱里赶往英国。

以前，我在伦敦的时候，只不过是兰贝斯的一个为了生计苦苦挣扎的青年，而现在的我已经功成名就，乘坐着头等舱，倒好像是第一次去伦敦观光的游客。

起航后没过几个小时，我已经能感觉到英国的气氛了。在船上我有的是空闲时间，为了打发无聊，一到晚上就精心地打扮好再出去吃饭，还要打上黑领带。我和爱德华不去人多的大餐厅，而是去可以点餐的茨酒馆吃饭，那里有香槟、鱼子酱、鸭肉末、松鸡、野鸡、葡萄酒、卤肉汁和小烤饼等。过着这种奢侈享乐的生活，我感受到了钱给人带来的快乐。

我先前还以为坐在船上，再怎么着也可以放松一下。但是“奥林匹克”号将我去伦敦的消息登在了布告板上。在此次横渡大西洋的途中，我收到的邀请和求助的电报犹如雪花，而且到后来是越来越多。人们是如此的狂热，好像正在酝酿一场大的风暴。新闻报道不断地翻新，“奥林匹克”号将《联合新闻》和《电讯晨报》的报道转载到布告板上。一共有四条报道。

第一条是：“卓别林荣归故里！在从南安普敦至伦敦的途中，将重现罗马凯旋的盛况。”

第二条是：“本社每小时都更新从船上发出的简报，报道客轮每天沿途发布的新闻，追踪卓别林在船上的活动，同时在街头出售号外，向人们介绍这位名冠一时、身材矮小、撇着脚，用奇怪姿势走路的演员。”

第三条是：“一星期以来，整个英国对卓别林的狂热可用《我亲爱的查理》这首由詹姆斯二世的拥护者所唱的古老歌曲表现出来，随着搭载卓别林回国的‘奥林匹克’号逐渐驶近，这种狂热每小时都在急剧上升。”

第四条是：“今晚，‘奥林匹克’号将在浓雾中停靠在南安普敦，大批影迷已经聚集在此，人们用自己的热情欢迎这位矮小的喜剧演员。为了防止场面失控，警局方面正忙于作出安排。在码头及市长欢迎查理的典礼上，已经出动警察维持秩序。像平常一样，报纸会在举行胜利游行时报道，可以清楚地一睹卓别林风采的最佳地点是那里。”

受到这样盛大的欢迎，真的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虽然这种特殊礼遇让人非常兴奋，但是当时我却想取消这次回国，把它推迟到我认为自己更配得上受到这种欢迎的时候。

我的想法很单纯，只不过想念以前熟悉的地方，渴望再见到它们，到各处悠闲自在地走走，游览一下伦敦各地，看看肯宁顿和布里克斯顿，瞅瞅波纳尔弄三号的那扇窗子，望一眼那个阴暗的木头棚，看一下肯宁顿路287号二楼的窗子。这些地方突然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心里老是想着它们，怎么也丢不开。

我们的船在瑟堡靠岸时，下去了很多人，同时也上来了很多人。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也上来了。我是有什么任务才去英国的吗？到法国也有什么任务吗？我有没有去访问爱尔兰的打算？对于爱尔兰南北分治的问题我有什么看法？说得形象点，我的话都被他们吞了下去。

我们的船从瑟堡离开，驶往英国。但这时它慢得出奇，简直像是在慢腾腾地爬行。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入睡，清醒地知道一点钟了，二点钟了，三点钟了。船的轮机停了，然后，船后退了，最后完全停了下来。我可以清晰地听到外面走道上人们来回奔跑的脚步声。我神经紧张，一点睡意也没有。于是，我透过舷窗向外张望，外面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但我听见了英国人的声音！

天快亮的时候，由于过度疲倦，我还是睡着了，但只睡了两小时。一大清早，侍者就给我端来了热咖啡，送来了早报。看了报纸后，我就很有精神，快乐得像只云雀。

某报上有这样一则标题：“喜剧演员回国盛况堪比停战纪念日。”还有一则标题这样写道：“卓别林来访伦敦家家户户的话题。”另一则标题是：“卓别林抵伦敦欢迎场面盛大。”还有一条大字标题是：“看哪，我们的儿子——”

当然，指责批评的文章也有，但是少数，有一篇文章写道：

呼唤理智

上帝在看着我们，就让我们远去的理智回来吧。我不否认卓别林先生是十分可敬的。他对故国的这份深切怀念之情也毋庸置疑。我也不想去追究，他的这份怀念，在德国鬼子侵犯大不列颠，国家受到威胁，命运垂危的黑暗日子里，怎么就没有表现出

来过。也许，正像某些人为他辩护时说的那样，与在大炮后面做出英勇救国的事迹相比，查理·卓别林更需要在摄影机前做几个搞笑的动作。

船靠岸了，南安普敦市长在码头上欢迎我。然后，我便匆匆忙忙地上了火车。终于，我们要向伦敦进发了！阿瑟·凯利到包房里来看我，他是海蒂的哥哥。当时，我和阿瑟紧挨着坐在一起，我一边找些话题和他聊，一边向车窗外望着，外面的绿色田野一直向后旋转。我跟他说，他妹妹给我写了一封信，邀请我到她位于波特曼广场的家里去吃饭。但他好像有些窘迫，奇怪地看着我，说“看来你还不知道，海蒂已不在人世了。”

这个消息令我十分震惊，当时的情况就好像是幻境，我想要再去见见的旧时朋友只有海蒂。突然间，往事如潮水般涌上心头，我感到一阵迷惘失落。但海蒂离开人世的悲哀，我当时还不能充分体会到。

火车驶入伦敦市郊。我的心情很急切，向窗外眺望着，但是那些一掠而过的街道我怎么也认不出来了。此时的我既激动又担心。激动的是，我快要到达目的地了；担心的是，经过一场战争的洗礼，也许伦敦已经不是以前的样子了。

火车已经进入伦敦市区，我激动得不知该如何是好，那些堆积在心底的思念都已经散去，现在我的心中充满了期待。至于在期待什么，自己也不清楚。我只觉得心乱如麻，完全没办法思考。那些掠过的伦敦的屋顶，好像并不是现实世界中的，我只是在心里期待着。

后来，我听见了嗡嗡的回声，我们的车开进滑铁卢车站了！走下火车，我看见站台上人头攒动，一排排的警察和事先拉好的绳子拦住了人们。场面乱哄哄的，显得十分紧张。尽管当时我兴奋的情绪战胜了其他的感受，但仍旧感觉到自己好像是被押送着走向站台的。

当我们接近被绳子拦开的人群时，紧张的情绪才开始有所缓和，这时人群中发出一阵阵的欢呼：“他来了！他来了！”“查理，干得好！”我见到了阔别了十五年的表兄奥布里，他和我一起在那一片欢呼声中被推进了一辆轿车。我感到有一点很遗憾，就是在慌乱中，我不得不避开那一群群为了要见我一面等了很久的人。

我一再嘱咐奥布里，让我们的车从威斯敏斯特桥驶过。汽车从滑

铁卢车站驶出，走在约克路上，昔日那些旧房屋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新的大厦，伦敦郡会议大厦。但是，从约克路拐过来，我突然就看见了威斯敏斯特大桥，它一点儿都没变，议会大厦仍然庄严地矗立在那里，仿佛它就是永恒。此情此景和我从这儿离开时一模一样。我情绪激动，差点就哭了出来。

我决定下榻里茨旅馆。因为在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它就建成了。一直以来，我都很想看看它里面是什么样子的。以前，我从它门口路过时，不经意的一瞥，便看到了里面的金碧辉煌。

旅馆外有一大群人在等候，我对他们简短地说了几句话。我安排好旅馆里的一切之后，就想一个人出去走走。但是外面的人没有散去，他们仍然成群地在那里高声欢呼。为了对他们的欢迎表示感谢，我不得不像一位王公贵族那样，几次走上阳台向人们致意。要描绘当时的情景是很难的。

我的房间里坐满了朋友们，可我的心思不在他们身上，巴不得早点离开。下午四点钟的时候，我以想要休息一会儿为由，跟他们说到晚饭时再和他们相聚。

他们刚刚离开，我就迫不及待地换了衣服，从运行李的电梯下楼，从后门悄悄地出去了。之后，沿着杰明街一直往前走，我拦了一辆出租汽车。我看到了干草市场、特拉法加广场，然后车沿着国会街驶过威斯敏斯特桥。

之后，我到很多地方看了看，在船上的时候，我就想着要去这些地方。它们是我在伦敦生活的见证。看了之后，我感慨万千，有的地方还是原来的样子，一点也没有改变。但有的地方我却认不出来了，它们已不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

我去了肯宁顿公园，去的时候，从一家邮局路过。我以前在这里存过六十镑。那些钱是1908年以后，我省吃俭用攒下的。现在还存在里面。之后，我就去了和海蒂第一次约会的地方，肯宁顿门。现在，海蒂已经不在了。

我只剩下好奇心了。于是，我去看了一下雪尼和我布置的那套房间，在布里克斯顿路格伦肖大厦十五号。

在回去的路上，在号角酒馆里，我喝了一杯酒，休息了一会儿。

我漫步在肯宁顿区的时候，只觉得后来在美国经历的那些事情才

是现实，而从前在这里经历的一切就像是一场梦。

人们写了很多关于我的东西，有的说我的性格忧郁孤僻，有的说我很开朗。总之，关于我的各种评价、各种设想都有。我的朋友很多，也许只是由于我出了名的缘故。但是，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想，我还是我自己。

到伦敦后，经常和我聚在一起的一般都是好莱坞的朋友。我想要利用自己的名气看到一些新的面孔，经历一些新的东西。

当时，我和H．G．威尔斯还有一个约会。之前，我拍《有闲阶级》时受了伤，他给我寄来了一封慰问信。那时，我就说好了回来要去看他。这样，我以后就可以自由作一些安排了。于是，我希望会见到另外的一些人。

“我已经安排好了在加里克俱乐部设宴招待你。”爱德华·诺布洛克说。

“老是些演员、作家、画家。”我开玩笑说，“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位贵族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聚会呢！”

我只是想开开眼界，看看那个贵族生活中更有趣的小圈子，并不是追求势力。

在加里克俱乐部，我会见了很多名人，如詹姆斯·巴里爵士等。在这里，最后一道甜点也是糖浆布丁，先前已经吃了很多了。只因为我第一次招待英国报界时，不经意地说了一句，我回英国后还要再尝尝清炖鳝鱼和糖浆布丁。

这次宴会，名人们让我感到很光荣，我很感动，尽管宴会有些沉闷。

宴会没过多久就散了。这时，爱德华·诺布洛克悄悄告诉我，詹姆斯·巴里爵士邀请我们去他的寓所喝茶。

巴里的寓所是间很大的屋子，像个画室，外面是景色优美的泰晤士河。我们跟着他来到一个窗口。在窗口的对面，是另一扇窗子。

“那就是萧伯纳的卧室。有时候，我看见里面的灯亮着，就把几粒樱桃核或者李子核朝那扇窗扔去。要是他不想聊的话，他就不会理我，或把灯熄了。如果他高兴的话，就会把窗子推开，我们就随便聊几句。一般来说，我就扔三次。”他顽皮地说，一口苏格兰口音。

那天晚上，巴里问我：“为什么你要在《寻子遇仙记》里插进做

梦的那一段？故事的连贯性被它打断了。”

“受《吻一吻灰姑娘》的影响。”我坦率地答道。

我和爱德华·诺布洛克第二天一起出去买东西。后来，他建议我们去萧伯纳那里看看，但没有提前约好。

“咱们就转进去，随便看看。”爱德华说。

四点钟的时候，爱德华正在阿德菲街按门铃。在外面等着有人来开门的时候，我突然害怕起来。

“还是下次再来吧！”我说着就向街上跑去。之后，爱德华追来劝我，但我还是没去。直到1931年，我才和萧伯纳见上面。

第二天早上，起居室里的电话铃声把我惊醒了，接着就听见有人说：“请问是哪位？……威尔士亲王！”这是我的美国秘书。

接着就有人接过电话，说：“喂？嗯，对啦。是今天晚上吗？好的，谢谢您！”这是自称娴熟礼仪的爱德华，他刚巧在那儿。

爱德华兴奋地告诉我的秘书，说威尔士亲王请卓别林先生赴宴。接着，他跑向我的卧室。

“现在别把他吵醒了。”我的秘书说。

“天哪，我的朋友！是威尔士亲王啊！”爱德华说道，听他的口气，他很恼火。接下来，他就大谈英国的礼节。

没过多久，我就听到有人在转动我卧室的门把手。于是，我就假装刚醒。爱德华走进来，装作特别镇定地跟我说：“今天晚上，威尔士亲王请您赴宴！您一定不能有其他的约会！”

我也假装很镇定，说我早就约好了，今晚要赴H．G．威尔斯的宴会。爱德华不理会我的话，他只是重复了一遍他的话。事实上，要在白金汉宫和亲王一同进餐，我是很激动的！

我说：“这不可能，一定是有人开咱们的玩笑吧！我昨晚在报上还看到，亲王正在苏格兰打猎。”

这下，爱德华就显得很尴尬了：“要不然，我还是打个电话确定一下吧！”

他回来时，脸上一副高深莫测的神气，说：“没错，他还在苏格兰。”

我那天早上听说阿巴克胖子以杀人罪被控，他是我以前奇斯顿影片公司的同事。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这回事，阿巴克连一只苍蝇都不

肯伤害，怎么会杀人呢？于是，我把这个意见向那些来采访此事的记者讲了。后来，阿巴克被无罪释放，但他的事业却毁了。由于受到严重的打击，他后来过了不到一年就死了。

那天下午，我和威尔斯约好了要看一部电影，是根据威尔斯写的短篇小说改编的。真没想到，我们第一次见面会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是被人连推带挤地塞进电梯，之后又被簇拥到一间小屋子里。我进来时，威尔斯眨巴着青紫色的眼睛，在一张桌子旁坐着。还没等我们握手，摄影记者就从四面涌了上来。

威尔斯凑近我，说："我们成了替罪羊啦！"声音很小。

我们后来被让进了试片室。影片放映完了，威尔斯对我说："您觉得怎么样？"声音依然很小。

"不怎么样！"我坦率地告诉他。

试片室的灯亮了，威尔斯赶紧凑了过来，说："您就说几句，夸夸这孩子吧！"

说实话，这部电影演得还有点水平的，也就只有乔治·K．阿瑟这孩子。

"电影根本就无所谓好坏，只要是活动的，就是精彩的！"威尔斯说。

我们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就没有机会熟悉彼此。

那天晚一些的时候，我收到了一张威尔斯请我进晚餐的便条。那天晚上除了我们，莱贝卡·韦斯特也去了。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熟悉，气氛有点僵，但后来就好了。威尔斯最近去了俄国，他谈到了那里。

"那里的进步很慢啊！一些理想的宣言发布起来很容易，但实行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他说。

"那该怎么办呢？"我问。

"发展教育！"

我说，关于社会主义的东西，我知道得很少。我又开玩笑说，一个必须工作才能维持生活的制度，我没看出它有什么优点。

"说得坦率点，那种不必工作就能生活的制度，我更喜欢！"

他大笑起来，说："那您为什么要拍电影呢？"

"那是儿戏，不算什么工作。"我说话的口气有点滑稽。

在欧洲度假期间，他问我打算做些什么。

我说：“我想先去巴黎，再去西班牙看一场斗牛，听说很刺激。”

“没错，但是对那些牛太残酷啦！”他说。

“何必为了几头牛动感情呢？”我说。

我现在一想到自己当时说的这句蠢话，就恨不得踢自己一脚！我怎么会说出那么冒失的话啊！那天回来的一路上，我都在责怪自己！但我知道，威尔斯会原谅我的。

第二天，爱德华·诺布洛克的朋友埃德温·勒琴丝爵士来旅馆，他是很有名的建筑师。

我已经见过了一帮文人与名流。童年的旧地我也重游了。几天后，我的社交活动进入了低潮。每天都是跳上跳下汽车，避开那些人群。后来，爱德华·诺布洛克到布赖顿去了。这时，我突然决定去巴黎。

据我所知，我们这次去巴黎的消息并没有向外透露。但是，到了加来我们受到了一大群人的欢迎，很明显，我们到达之前，他们就在那里等着了。看见我走下跳板，他们都喊：“夏洛万岁！”我现在还是要勉强地笑着向他们挥手，虽然之前的大风浪差点要了我的命。

到巴黎时，我也受到了一大群人的欢迎，他们热情地推挤着我。最后，人群几乎是把我举起来塞进了一辆汽车。当时的情形有点好笑，会有这么多人喜欢我，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我很兴奋，但我也精疲力竭了。

到克拉里奇旅馆后，每十分钟，安妮·摩根小姐的秘书就要打来一次电话，安妮·摩根小姐是Ｊ．Ｐ．摩根的女儿，我知道她找我干什么。于是，我们千方百计地敷衍她的秘书，可那位秘书就是不肯罢休，要我跟安妮·摩根小姐见一面，还说不会占用我很多时间。于是，我只好答应三点四十五分在旅馆里跟她见一面。但是三点五十五分的时候，摩根小姐还没来。我就出发了。

我从休息室路过时，旅馆经理追来，说：“先生，安妮·摩根小姐看您来了。”

其实我很生气，摩根小姐既然要见我，却又迟到。但我还得笑着跟她打招呼说道：“十分抱歉，四点钟我还有约会。”

“是吗？但是，我最多耽搁您五分钟。”她说。

我看了看时间，正是三点五十五分。

“我们找个地方坐一下，好吗？”她说。

接下来，她就趁找座位的工夫，说：“我正在为重建战时遭到破坏的法国募捐。在特罗卡德罗，如果能够举行一次游艺会，放映您的《寻子遇仙记》，同时您能出场的话，我们就可以募到一大笔捐款。”

我说：“在游艺会上，《寻子遇仙记》可以放映，但我不会到场。”

“但只要您一露面，就可以募得更多的钱。我相信会给您授勋的。”她坚持说。

忽然，在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荒唐的念头。于是，我看着她，说：“您有把握吗？”

她笑了：“我们只能向政府推荐。当然，我一定会尽力的。”

我看了看时间，伸出手，说：“很抱歉，我得走了。我明天要去柏林三天，有什么事您可以通知我。”

一离开旅馆，我就后悔了，自己怎么那么冒失呢？

之后，我就去了柏林。一到柏林，我的一切地位都失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那里，我的影片还没有放过，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是谁。在夜总会时，一个美国军官认出了我。

到柏林后的第二天，我收到了一张便条，很神秘，说让我去看望看望他。后来才知道是乔治写来的，就是那个还要回去坐十八年牢的人。按照他给我的地址，我去找了他。到了之后，我才知道，他现在是布尔什维克政府的采购员，到柏林来订购机车和钢桥。我去之前，以为他需要我的帮助，就随身带了五百元。当然，我又把钱带回去了。

战败的气氛笼罩在柏林的大街小巷。

我将在特罗卡特罗露面的新闻已经登在报纸上了，于是，安妮·摩根小姐的秘书这时发来电报。我的回复是：我并没有答应要到现场，为了不失信于法国公众，我现在要把真相告诉他们。

后来，我又收到了一份电报，内容是：来此定可受勋，经过一番周折，此事已筹划安排——安妮·摩根。于是，我在柏林只待了三天就回了巴黎。

第二天就要在特罗卡特罗义演。头一天晚上，我和塞茜尔·索蕾尔、安妮·摩根等人坐在包厢里看一部影片。塞茜尔凑进来，悄悄跟我说：“今天晚上，要给你授勋！”

“是吗？那太荣幸了！”我谦虚地说。

那部影片很沉闷，看了很久才结束。后来，在两位公务员的陪同下，我们去了部长的包厢。

我们后面紧跟着几位记者，有一位精明的美国记者多次凑到我耳边，说：“小伙子，你要接受荣誉军团勋章了！”

“小伙子，你受骗了。那勋章是发给学校教师的，不对啊！小伙子，要领那个有红色绶带的！领这个还不够光荣！”他悄悄地跟我说，此时部长正在致颂辞。

事实上，我感到很高兴。奖状上是这样写的：“查理·卓别林：戏剧家、艺人、民众教育学士……”

我还收到了安妮·摩根的一封感谢信。她邀请我第二天在凡尔赛特里亚农别墅共进午餐。有很多人参加这次宴会。当时我忙着应酬，有很多事现在都不记得了。

两天后，菲利普·萨逊爵士同洛克萨维奇勋爵和夫人要设宴邀请劳合·乔治，我也约好了要去参加。但我们迟到了三小时。

菲利普·萨逊爵士和我差不多大，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时是在巴黎。当时，我说我很疲劳，他就邀请我到他的别墅去。他的别墅特别豪华，住在里面感觉很温暖。住在他那里的时候，他把我照顾得很周到。

我休息好了之后，就和菲利普爵士去了一家医院，看望了一下那些在战争中受伤的人。看到他们真的很心痛。后来，我们还去参观了威廉·欧潘爵士的画室，以及H．G．威尔斯在华维克伯爵夫人领地上的乡间住宅。当时，威尔斯夫妇和两个儿子住在那里，他们的儿子刚从剑桥大学回来。

那天下午，有三十多位剑桥大学教授来了。他们坐在花园里默默地看着我，好像我是从另一个星球来的。

我记得那天晚上是我在英国度过的最寒冷的一夜。我盖着一条冰冷的被子，没关灯就睡了。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我才感觉暖和了点儿。

H．G．威尔斯问我："昨晚睡得好吗？"

"很好！"我说，很有礼貌。

"很多客人说，屋子里很冷。"他说。

"不是很冷，是冰冷！"

听到我这话，他大笑了起来。

在伦敦，我会见了托马斯·伯克，他是《中国街之夜》的作者。他还把《雨丝风片》赠送给我了，这是他的半自传体笔记。看了《雨丝风片》，才知道我们拥有相似的童年。

后来，我请表兄奥布里一家人吃饭。之后，我去看了一下吉米·拉塞尔。

现在，我要回美国去了。要是继续待在伦敦的话，我就会变得懒散无聊了。回伦敦后，想做的事情都做了，可以很满足地回美国去工作。这次到伦敦，唯一让我感到懊丧的就是，我没能向那些等候在火车站的人们亲切致意。

哎！想那么多又有什么用呢？只有在工作中才会有方向感！我现在终于可以回加州，重新开始我的工作了。伦敦的一切，就让它留在记忆中吧！

---

(1)　梵朋克的英文名是Fairbanks，英文中的车票fare与Fairbanks中的第一个音节fair的读音相似，英文中的河岸banks与Fairbanks中的banks相同。

第十八章　回到美国

一到纽约，玛丽·多萝就给我打来电话了。前几年，她一给我打电话，我就得陪她去吃午餐，然后去看她演的《百合花开》。那天的晚餐我是和几个人一起吃的。

离开纽约的前一天，我和弗兰克·哈里斯一起去参观了星星监狱(1)。当时，他跟我说他正在写一本自传，但觉得应该早点写。他说："我现在上了年纪，有很多不便。"

"岁数大了也有好处，有欠慎重的话可以少写一点。"我说。

现在，弗兰克要去探望的人是吉姆·拉金，他被诬告图谋推翻政府，判了五年的有期徒刑。

监狱里关押着很多政治犯，里面特别拥挤，死气沉沉的。我们去的时候，犯人正在院子里放风。只有一个年轻人靠在敞开的牢房门边，一脸的茫然。我从他身边走过，跨进牢房。但是，我马上就退出来了。

"天哪！这也太不人道了！"我边往外退边说。

"没错！"那个年轻人悄声说，他很悲愤。

狱吏很和善，他告诉我们说："这里太拥挤了，上面应该拨款建更多牢房。但政府最后才会考虑到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哪一位政治家会很关心监狱里的情况。"

后来，我们去了行刑室，对那里的情况了解了一点，出来的时候，只觉得要晕过去了。弗兰克要见吉姆·拉金是违犯规章的，但狱吏把这当特殊事件处理，答应让他会见拉金。后来，我们到制鞋车间见到了拉金。他又高又帅，笑起来感觉很亲切。见到弗兰克，拉金很高兴，但他急于回去做工，所以显得有点紧张不安。

"如果我被特许在工作时间会客，这影响不好。"拉金说。

弗兰克问他："你在这里过得怎么样？我还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我在这里过得很好。我妻子和孩子在爱尔兰，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我进来后，就再也听不到他们的消息了。"拉金说。

“好的，我去打听打听，你别担心，我会帮助你的。”弗兰克说。

从监狱出来，弗兰克说：“你知道吗？以前的吉姆·拉金是很勇敢、很豪放的。但是，他现在竟变得这样规规矩矩。以前的拉金到哪里去了呢？”他心里很难过。

我回到好莱坞就去看望母亲。看来，母亲过得很好，我重访伦敦的盛况她也知道了。

“听到您儿子的这些事感觉怎么样？”我问她。

“很好啊！但是，你为什么要过演戏这种空虚的生活，而不去做一些实际的事情呢？”

“您还说呢！我过这种空虚的生活，就是因为您呀！”我大笑起来。

她想了一下，说道：“你想想，如果你能够把你的才能用来侍奉上帝，会拯救多少灵魂啊！”

我笑了。

“我救得了灵魂，但救不了穷啊！”

我的经理里斯夫的太太很喜欢我母亲。她跟我说，我走之后，母亲几乎没有发过精神病，一直都很健康。另外，她还跟我说了几件关于母亲的趣事：什么买布的时候，母亲要颜色鲜艳的；什么把快要孵出鸵鸟的鸵鸟蛋摔坏了，还把冰激凌扔到下水道工人的脸上……

看来母亲对我的私生活知道得一清二楚，虽然我没让她知道。

后来，我和第二个妻子发生了纠纷。有一天下跳棋的时候，她忽然说：“这些烦恼，你为什么不摆脱掉呢？自己去东方一趟，好好放松一下吧。”

我问母亲她这话是什么意思，因为我觉得很奇怪。

“你瞧，报纸上一天到晚都在说你的私生活！”她说。

我笑了：“我的私生活，你能知道些什么呢？”

她耸了一下肩膀。

“也许我能给你出点儿主意，如果你不这样害羞的话。”

母亲只是偶尔说出一句这样的话。

对母亲来说，我的成名致富好像是理所当然的。有一天，草坪上就我们两人，她说：“那花园收拾得真不错啊！”

“我专门请了两个花匠。”我告诉她。

她想了一下，望了望我。

“那你肯定有很多钱了。”她说。

“妈妈，我这会儿的身价就是五百万美元。”

她点了点头，若有所思。

“但愿你有好的身体，这些钱都能享受。”她就说了这么一句。

我知道母亲再次生病的时候，已经过了两年，那时我正在拍《马戏团》。过去的两年里，母亲的身体一直很好。

这次，医生警告我说，她的病很严重。医生说，她的心脏很衰弱，最好不要动手术。我到医院的时候，母亲已进入半昏迷状态，她刚服了止痛药。

“妈妈，我是查理。”我轻轻地握着她的手，悄悄说道。

她轻轻地捏了捏我的手，睁开眼睛，要坐起来，但是她没坐起来，因为太虚弱了。她总是说痛。

我安慰她说：“别担心，您过几天就会好的。”

“也许吧。”她说，口气很弱。她又把我的手捏了捏，然后就迷迷糊糊地睡了。

母亲第二天就去世了，当时我正在拍电影。我和我的副导演哈里·克罗克一起赶去医院。哈里没有进去，他在病房外面。

在病房的窗口和床之间，有一张椅子。我进去后，就坐在这把椅子上。看到静静地躺在那里的母亲，我想起了她这一生的经历，她对生活的勇气，受到的折磨，她悲惨凄凉的岁月……

我哭了。

一小时后，我才离开病房。哈里仍在外面等着，让他等了这么久，我感到很抱歉。当然，他能够理解我的心情。于是，我们默默回去了。

雪尼没来参加母亲的葬礼。他当时在欧洲，也生病了。我的两个儿子也没来参加母亲的葬礼。他们在他们母亲那儿，我没去叫他们。

我把母亲安葬在好莱坞公墓中，没有火化。当时有人问我是不是要火化，但我觉得火化很恐怖。

母亲就这样走了。但她的善良、她的高贵，我会一直记在心里。

女雕塑家克莱·谢立丹发表的《从五月市到莫斯科》，轰动了全国。我和她认识的时候，她正带着儿子狄克在各地演讲，当时狄克只

有六岁。她说要靠雕塑生活，这在美国很难。

“美国男人不愿做模特儿，他们太害羞了。其实，他们尽可以让艺术家为其太太塑像。”

“但我不害羞。”我说。

于是，我后来就在家里摆好姿势，让她帮我塑像。之后，我仔细地看了快要竣工的塑像。

“这个头型简直就像是罪犯的嘛！”我说。

“刚好相反，这是一位天才的头型！”她一本正经地说。

听了她这话，我哈哈大笑起来。于是，我提出了一套理论：天才和罪犯很相似，皆是极端个人主义者。

她跟我说，她觉得社会已经摈弃她了，这种感觉从她发表以俄国为题的演讲之后就有。克莱既不是一个政治狂热者，也不是一个专写政治问题小册子的作家。

“既然你已经写了一本书，报道了俄国的情况。你就到此为止吧，没有必要一定要登上政治舞台。要不然肯定会吃亏的。”我说。

“我的职业就是演讲。一般人都不愿意听真理。但是，我既然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就是宣传真理。况且，”她情不自禁地补充道：“我喜欢我那宝贝儿布尔什维克。”

“我那宝贝儿布尔什维克！”我重复了一下，就大笑起来。

在我看来，克莱的处世方法是清醒现实的。1931年我们再次相遇时，她住在突尼斯郊外。

“但是，为什么你要住那儿呢？”我问。

她马上就答道：“因为那儿比较便宜呀！就我这点收入，在布卢姆斯伯里只能租两间小屋。但在突尼斯就不一样了，我不但可以租一幢房子，请几个仆人，还可以有一个美丽的花园，让小狄克玩！”

但是，狄克十九岁就死了。狄克的离去对她的打击很沉重，之后，她再也没能恢复过来。她后来进了修道院，应该是为了获得一些安慰吧。

有一次在法国南部，我在一块墓碑上看到了一幅十四岁小姑娘的照片，照片上的小姑娘笑得很甜。在照片下面有三个字：“为什么？”于是，关于生与死的问题让我思考了很多。

我的年纪越来越大，人也渐渐变老了。关于信仰的意义我越来越

有体会了。我坚信，如果没有信仰，就不会有思想。我们依靠信仰所获得的东西要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

我在好莱坞仍然很孤独。我很难遇见其他制片厂里的人，因为我经常在自己制片厂里工作。这样一来，我基本上没有结识的新朋友。我的寂寞只有道格拉斯和玛丽可以解除。因为道格拉斯，我也认识了很多显赫人物。但没有机会和他们熟悉。

道格拉斯和玛丽结婚后，他们生活得很幸福。道格拉斯和玛丽特别会招待客人，很讨那些显贵人物的喜欢。但是，道格拉斯也失败过。那是他招待一对度蜜月的新婚夫妇，他想尽了一切办法，就是不能让新娘打起精神。

三天后的那个晚上，道格拉斯拉我到一边："我可被她难倒了，想尽了一切办法也没法让她说话。所以今天晚上坐席，我安排你去她的旁边。"

说到这话，他就笑了起来："我跟她说了，你很聪明，很有趣。"

这样一来，我就座的时候很担心。我觉得，我和她还是私底下谈话比较好。于是，我拿起餐布，靠近那位新娘，对她说悄悄话。

"打起精神来吧！"我说。

我的话她没有听得很清楚。于是，她转过身来。

"您说什么？"

"打起精神来吧！"我重复了一下，有点含混。

她感到很惊讶："打起精神来？"

"对呀！"我说。我一边铺好膝上的餐巾，一边瞅着桌面。

她没吭声儿，仔细地看了我一会儿。

"您怎么这样说我呀？"她问。

现在机会来了，我说道："因为您特别忧郁啊！"

没等她回答，我就接着说："您看，我有吉卜赛人血统，这类事情我懂。您的生日是几月？"

"四月。"她说。

"没错，就是白羊宫(2)嘛！我知道了。"

听我这样说，她就高兴起来了，显得特别可爱。

"您知道什么了？"她笑着说。

"您的精、气、神，在这个月里都处于低潮。"

她想了一下："这一点您都能看出来，您真的很了不起！"

"这个挺简单的，有直觉能力的人都能看出来。您这会儿看起来很不愉快。"

"这个，从外表上也看得出来吗？"

"有可能，别人看不出来。"

她笑了笑，然后思考了一下。

"说也奇怪，居然被您看出来了。的确，我现在特别发愁。"她心事重重地说。

我点了点头，继续说道："您心情最坏的一个月，就是这个月。"

"我觉得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特别沉闷。"她继续说。

"您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说到这儿，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她很伤心，接着说："我想远离所有的人，抛开一切的事务，只要我能出去，做什么都可以。找一份工作，当一个临时电影演员。但如果这样的话，所有跟我有关系的人就会很没有面子——他们有很高的地位，不会让我做这种事的。"

在谈话中，她用了多数人称。但我知道，那是指她的丈夫。

这时，我就慌了，开始严肃地劝她。

"你离开也没用，该承担的责任还是回避不了。人的欲望是永远也不会满足的，生活就是欲望的表现。因此，千万不要冲动，要不然，您一辈子都会后悔的……"我说的这些话都是老生常谈了。

"我觉得您说得很有道理。不管怎样，和一个了解自己的人这样谈谈，我感觉舒畅多了。"她有点忧郁地说。

道格拉斯时不时地瞟我们一眼，他正在和其他客人闲聊。

这时，她转过身去，向他笑了笑。

吃完饭后，道格拉斯又拉我到一边："我还以为你们把对方的耳朵都咬下来了呢！你们究竟说了些什么呀？"

"哦，没说什么，就是一些日常的大道理！"我很得意地说。

---

(1) 星星监狱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监狱。

(2) 白羊宫又名雄羊座。

第十九章　联美影片公司

第一国家影片公司鼠目寸光，一点儿也不知道体贴和同情别人。另外，我这时一心想要拍故事影片。所以，我希望早点结束与这家公司签订的合同，现在正在履行最后的部分。

还要拍最后的三部电影，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我打算把两大本的《发薪的日子》拍完后，就拍《朝圣者》。还好，我对《朝圣者》提出的条件，第一国家公司并没有怎么为难我就接受了。《朝圣者》算作两部影片，这样一来，我只需要将《发薪的日子》和《朝圣者》拍完，就可以给联美公司拍电影了。

后来，约瑟夫·申克 (1) 和他的妻子诺玛·塔尔梅奇加入了联美公司，这是道格拉斯和玛丽建议的。乔后来当上了公司经理。

不久之后，我就收到一份紧急通知，邀请我参加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联美公司前途问题。

在会议上，经理的发言很乐观。但是，玛丽觉得竞争很激烈，如果不采取适当的措施的话，联美公司的前途岌岌可危。而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拍摄出好的影片，就不怕任何竞争。大家都发表了很多意见，最后为了公司的团结，他们还是作出了让步。

我对艾娜的事业仍然很关心，尽管我们情感已经疏远了。我在给联美公司拍摄第一部影片之前，就打算让艾娜·普文思担任一次女主角。几个月以来，我都在想我自己如何编剧，和艾娜拍一部《特洛伊女人》。但这项计划我后来放弃了，因为它的成本太高了。

让艾娜扮演其他什么有趣的妇女，我后来也考虑过。我们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阅读了《回忆拿破仑·波拿巴》，当时，拿破仑的形象深深地吸引了我。但是，我后来没有什么兴趣了。

佩吉·霍普金斯·乔伊斯来到好莱坞大约也是这个时候。她改嫁过很多次，嫁了五个百万富翁，从五个丈夫那儿弄来了三百万美元。

有一次，我和她一起进晚餐。她悄悄地跟我说：“其实，我最讨厌出风头了。实际上，我是一个很本分的女人，只想嫁个好男人，生几个孩子。”

她一边说话，一边整理那二十克拉的钻石和翡翠镯子。佩吉在开玩笑的时候，这些首饰都被叫做“臂章”。

她还说，她新婚之夜把自己锁在卧室里，新郎要给她一张五十万美元的支票才能进去。当然，支票是从门缝里塞进去的。

“他会按你说的做吗？”我问。

“当然会，”她有点儿嘲笑的口气说道：“我第二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趁他还没醒去把支票兑了。但他是一个酒鬼，是一个浑蛋！我有一次拿着一瓶香槟，朝他的脑袋扔过去，他就被送到医院去了。”

“就这样，你们就散伙了？”

她大笑起来，说：“没有啊！我这一招，他好像倒挺喜欢。后来对我更加着迷了。”

佩吉和我受托马斯·杨斯的邀请到他的游艇上去。我们都喝着香槟，天快黑的时候，佩吉对我有点不耐烦，她当时的兴趣在托马斯身上。于是，我就想起了她跟我讲的香槟故事。

当时我很清醒，尽管喝了一点儿香槟。我轻轻地告诉她：“如果你想重演你的香槟故事来对付我，最好不要让我发现，哪怕是一丁点儿。否则，我就把你扔下去。”

从那以后，我们就断了。

听了佩吉讲的故事，我编写了《巴黎一妇人》。讲的是她与一位法国著名的出版商交往时发生的趣事。这部影片是我导演的，主演是艾娜·普文思。

在《巴黎一妇人》这部影片中，我故意用一些细致的动作来描写心理状态。通过这些动作，观众能够体会到影片中的人物的心理状态。这样，有些电影评论家说的无声电影没法表现心理状态就站不住脚了。《巴黎一妇人》是第一部蓄意讽刺和描写心理的无声电影，受到了一些有鉴赏能力的观众的热烈欢迎。

我和波拉·纳格里只是在柏林见过一次面。我的《巴黎一妇人》还没拍完的时候，波拉就以一副十足的好莱坞派头在美国社交界第一次露面。当然，那时关于她的谣传也不断。

后来有一次，我去好莱坞剧场听交响音乐会。在那里，我又碰到了她。

“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查理！一次也不来看我。我从德国赶来看你，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她说。

我并不相信她的最后一句话。但是听了她说的这些话，我心里倒挺美的。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间二十分钟都不到。

“查理，看你多么狠心啊！连电话也不给我打一个！你在哪儿工作？我要给你打电话，告诉我你的电话号码吧。”她说。

听她这么说，我多少有点感动，尽管她的这份热情值得怀疑。

几天后，她设宴请我，就在比弗利山她租的房子里。有很多人参加那次宴会，她的男明星也去了，但是，在宴会上她只顾招待我。这让我很高兴，不管她是不是真诚的。

从那以后，我们的奇遇就开始了。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一起出现在公共场所。于是，没过多久，“波拉和查理订婚”的消息就在报纸上出现了。这让波拉很不安，她说我应该出来澄清这事。

“这事应该是由女士出面。”我说。

“那我该怎么说呢？”

我没有回答她，只是耸了耸肩。

第二天我就接到她不能见我的通知，是什么原因也没有说明。但是当天晚上，她的女仆给我打来电话，问我能不能马上去她家，她病得很厉害。一到那里，一个哭哭啼啼的女仆就把我领进了客厅。只见波拉小姐两只眼睛闭得紧紧的，在一张长椅里躺着。

后来，她把眼睛睁开了，哼哼着说：“你的心真狠呀！”

于是，我就成了一个卡萨诺瓦[(2)]。

一两天后，派拉蒙影片公司经理查理·海顿打来电话：“查理，你给我们惹了很多麻烦。我想跟你谈一谈，可以吗？”

“没问题。那就请来我家里吧！”我说。

快到午夜的时候，海顿来了。

“看了这些报上登的谣言，波拉都气病了。查理，为什么你不发表一篇声明，澄清这些谣言？”他坐下来就说。

看他这样傲慢无礼，我就直盯盯地瞅着他。

“你要我说什么？”

“你喜欢她，是吗？”他试图掩饰他的窘态，便用开玩笑和不介意

的口气说道。

“这种事情谁也管不着！”我回答。

“但在这个女人身上，我们公司已经投资了一百万美元！这些报上的宣传对她的影响很不好。”

他停了一下，接着说道：“既然你欢喜她，你为什么不把她娶了呢？”

我一点也看不出来他是在开玩笑。

“为了要保护派拉蒙公司的投资，我就会跟一个人结婚。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那就完全错了！”

“那你们就别再见面吧！”他说。

“决定权在波拉！”我回答。

后来，我开玩笑说：“在派拉蒙公司，我又没有股份。我为什么应该娶她？不明白。”

从那以后，她就没有找过我了。就这样，我和波拉的关系突然地开始，突然地结束。

为了找查理·卓别林，一个年轻的墨西哥姑娘从墨西哥一路步行来到电影制片厂。这样的影迷我见过。因此，我让经理好好地打发她走。当时，我和波拉正打得火热。之后，我就没留心这事儿。

但后来，家里打来电话，说这位墨西哥姑娘在门口台阶上坐着等我。一听这话，我就毛骨悚然。于是，我让仆人叫她离开，我等事情完了再回去，暂时就留在制片厂。过了十分钟，家里打来电话说她离开了。

当天晚上，我就把这件事跟波拉和雷诺兹医生夫妇说了，当时，他们在我家吃晚餐。为了看看那姑娘有没有再回来，我们推开前门，望了望四周。但是，我们刚吃了一半，仆人就冲了进来，脸都白了。

“她到楼上去了，正在您的床上睡着呢！”仆人说。

他上去给我铺床，就看见她在床上躺着，穿着我的睡衣。当时，我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让我去看看。”雷诺兹说。他离开座位，急忙上楼去了。

我们其余的人都在那儿坐着。一会儿后，雷诺兹就下来了。他说，他跟她长谈了一次，她既年轻，人也长得漂亮，话也说得头头是道。接着，他就把他们的谈话内容给我们复述了一遍。

“你为什么睡在查理的床上？”他问。

“我要见卓别林先生。”她说。

“你知道吗？你这样做，别人会以为你有精神病。你有可能就被送进疯人院了。”他说。

但她一点儿也不在意。

“我又没疯，我只不过是崇拜卓别林先生的艺术。所以，我才从墨西哥千里迢迢地来这里见他。”她说。

“你最好还是把查理的睡衣脱掉，穿好自己的衣服，立刻离开这儿。否则，我们就叫警察来。”他说。

以上就是雷诺兹告诉我们的谈话内容。

“我想见一见这位姑娘。”波拉装模作样地说。

“让她下楼来，到起居室里去。”我有点犹豫，觉得这样会让大家很窘。

后来，姑娘很大方地走了进来。她确实年轻漂亮，雷诺兹说得没错。她跟我们说，她已经在制片厂外边徘徊了一天。我们请她吃饭，但她就喝了一杯牛奶。她在那儿坐着喝牛奶时，波拉问了她许多问题。

“你爱卓别林先生，是吧？”波拉问。这时，我眨了眨眼睛。

姑娘大笑了起来。

“我爱他呀！哦，没有的事儿！我就是崇拜他，他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你看过我的影片吗？”波拉问。

“看过。”她漫不经心地说。

“那你觉得怎么样？”

“很好。但你不伟大，不像卓别林先生那样。”

可以想象波拉当时的表情是什么样子的。

我对那姑娘说，她这样做会引起误会。然后，我问她有没有回墨西哥的盘缠。她说她有钱。雷诺兹又劝了她几句，她就离开了。

第二天中午，男仆又冲了进来，说那姑娘在路中间躺着，她服毒了。于是，我们立刻打电话报警，救护车来把她拉走了。

第二天，这件事就在报上大肆宣传，还刊登出了她在医院病床上的照片。现在，她已经洗了胃，正在接见新闻记者。她说她只是为了

引起别人的注意，并没服毒。还说她来好莱坞，只是想要拍电影，她并不爱查理·卓别林。

出院后，她被交给了福利院照管。后来，福利院给我寄来了一封信，说得很委婉，问我可不可以资助她回墨西哥。还说，她不是坏人，没有恶意。于是，我付了她回乡的旅费。

现在，我终于可以给联美公司拍第一部笑片了。我决定，这次拍的影片一定要比《寻子遇仙记》更成功，要让它成为一首最伟大的史诗。但是几个星期以来，我苦苦地思索，也没有想出来。

之后，一个周日的早上，我在梵朋克家里度周末。吃完早餐，我就和道格拉斯闲坐着，看几张立体风景照。没想到，看了照片之后，我的脑子里就有了故事的轮廓，尽管一篇故事也没有。

在喜剧中，悲剧的因素往往会激起人们嘲笑的心理。

我读过一本书。在这本书里，很多拓荒者死了，有的是冻死的，有的是饿死的。最后，只有极少数的人活了下来。于是，我就想到了影片中最搞笑的镜头。

我在饿得不行的时候，把自己的皮鞋煮来吃。同时，还把皮鞋里的钉子剔出来，在那儿慢慢地吮吸，仿佛它们是美味的鸡骨头。至于鞋带我也吃得津津有味，仿佛它们是面条儿。大家都饿得要发狂了，于是，我就被想象成一只鸡了，他们就想把我吃了。

我在那六个月里，想出了一系列的笑片镜头。于是，我就开始拍摄了，剧本也不用。当然，我也做了很多无用功。后来，许多有趣的镜头都被剪去了。

第二次结婚的时候，我在拍《淘金记》。关于这次的婚事我不想多说了。我的两个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了，我非常爱他们。

这次结婚后，我们都努力地想要好好过，结果还是让人很痛苦。

《淘金记》是在纽约河滨戏院上映的。当时，我去主持初映典礼。在这次典礼上，联美公司的销售经理海勒姆·艾布拉姆斯跟我说：“查理，这部影片，我保证至少也要卖六百万美元！”

结果真的卖了那么多！

上映完了，我就病倒了。我当时住在里茨旅馆。有一天，我忽然觉得喘不过气来。于是，我就慌忙给一个朋友打了电话。

“我快要死了，把我的律师找来！”我喘着气说。

“找律师？你要找的是一位医生。”朋友也慌了。

“不！不！我要立遗嘱，让我的律师来！”

我的朋友也慌了。律师和医生他都去找了，但只来了医生。当时，我的律师刚好去了欧洲。医生照例给我检查了身体，除了神经衰弱外，并没有发现别的什么病。

“这里的天太热了！离开纽约，去海边一趟。在那儿，你可以呼吸海滨的空气，静养几天。”他说。

我半小时内就被匆匆忙忙送到了布赖顿海滨。在路上，我莫名其妙地哭了。之后，我在临海的一家旅馆住着。我占了前面的一间房，坐在窗口，深深地呼吸海滨的空气。但这时候，旅馆外面聚集了许多人。他们在那儿叫喊“喂！查理！”、“查理，你好啊！”

于是，我只好离开窗口，移到里边去。后来，有两个人在海滨淹死了。我很紧张，于是我就回纽约去了。

两天后，我就回了加州。当时，我好得差不多了。

---

(1) 我们都管他叫乔。

(2) 卡萨诺瓦就是指负心汉。

第二十章　玛丽昂·戴维斯

回到比弗利山后，一个朋友给我来信邀我去他家，会见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坦。

我到那里后，看见格特鲁德·斯坦周围围了一圈的客人，他们都很有礼貌地与她保持一定距离站在那儿。之后，一个侍女在她耳边说了几句，然后走过来跟我说："先生，格特鲁德·斯坦小姐要见您！"于是，我就赶快走向前去。

午餐时，女主人把我安排在格特鲁德旁边。不知怎么回事，我们后来谈到艺术了。刚开始的时候，我说窗外的景色很美。

"天然的都是平凡的，倒是模仿的更有趣！"她说。

于是，关于这个话题，她就发表了一通意见。她的观点就是假的比真的美。我很有礼貌地表示赞同，尽管前人早就说过这些话。另外，对电影的情节，她也有一些看法。她说，那些电影情节太陈旧了，而且太复杂和牵强了。

在我看来，她无非就是想说自己的那句"玫瑰是玫瑰，还是玫瑰"的诗句。但我没说。午餐桌上，我和格特鲁德都把咖啡打翻在了美丽的比利时花边台布上，我感到很抱歉，但格特鲁德却说："没关系，它没泼到我的衣服上。"

一天，埃莉诺·格林给我打来电话："亲爱的查理，请你到公使旅馆来和我们共进晚餐吧！玛丽昂·戴维斯也在这里，她非常可爱。她一定喜欢见到你，你一定要见见她！晚餐后我们一起去帕萨迪纳，看你的影片《有闲阶级》。"

那段时间，我正在拍摄《淘金记》。那些关于玛丽昂·戴维斯的五花八门的广告，我早就看过了，尽管没有见过她本人。

有一次在梵朋克家，我看了玛丽昂·戴维斯演的《骑士春秋》。当时，玛丽昂表演喜剧的才能就让我感到意外。我觉得她很有风趣和魅力。即使没有威廉·鲁道夫·赫斯特为她大肆宣传，她也能成为一位大明星。

在埃莉诺·格林的餐桌上，我觉得玛丽昂十分纯朴可爱。从那以

后，我们就成了知己。

玛丽昂和赫斯特交往前后达三十多年，一直到赫斯特逝世为止。他们的故事，不仅在美国，在世界各国都成为了传说。

在我一生中，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的是已故的威廉·鲁道夫·赫斯特。当然，他给我的印象并非都是愉快的。关于赫斯特，一些人认为，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推销他的报纸，积累他的财富，才是他的兴趣。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人士。

威廉·鲁道夫·赫斯特的出身很好，他可以随意动用父母的家当。听说，有一天，金融家拉塞尔·塞奇碰到了赫斯特的母亲菲比·赫斯特。

“令郎如果再这样抨击华尔街的话，他的报纸每年就要亏损一百万。”他说。

“塞奇先生，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他的事业还可以维持八十年。”赫斯特的母亲说。

第一次见赫斯特时，我就说错了一句话。当时，赛姆·赛弗曼把我介绍给赫斯特一家人。然后我们坐下来吃饭。赫斯特夫人对人和蔼大方，很有风趣。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赫斯特的眼睛总是睁得大大的，就让我自己在那儿说话。

“赫斯特先生，我第一次在美艺酒馆里看见您的时候，一个朋友把您指给我看。当时，您和两位女士坐在一起。”我说。

这时，在桌底下，有人踩了我一脚，应该是赛姆·赛弗曼。

“嗯！”赫斯特说，他的表情很滑稽。

接下来，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哦，如果不是您，那就是一个和您长得很像的人。当然，我的朋友也没有看清楚。”我很天真地说道。

“没错，能有一个替身，对你来说，那是非常方便的。”赫斯特说，他眨了眨眼睛。

“正是。”我笑了，可能笑得太大声了。

接下来，赫斯特夫人就给我解围：“是呀，对你来说，那是非常方便的。”

就这样，这件事被轻轻地带过去了。我觉得那顿午餐吃得很愉快。

玛丽昂·戴维斯到好莱坞后，就在赫斯特的世界影片公司担任电影的主角。她在比弗利山租了一幢房子。

在玛丽昂租的那幢房子里举行宴会时，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当时，我们五十多位客人在那儿站着。赫斯特阴沉沉地在一张高背椅上坐着，他的四周围了一圈他的编辑人员。刚开始的时候，玛丽昂斜倚在一张长椅上。但是，见赫斯特只顾在那里办他的公事，她后来就变得沉默了。

“喂！嘿！”她突然愤怒地大喊道。

“你是在叫我吗？”赫斯特抬起头来，问道。

“对，就是叫你！你，过来！”她的一双蓝色的大眼睛紧瞪着他。

这时，屋子里一片静寂，气氛很紧张。赫斯特的编辑人员就退到后面了。

赫斯特在那儿坐着，看他的神情，就知道他还没有想好到底该不该大发雷霆。这时，我做好了去取我帽子的准备。但他忽然站起来：“嗯，我想我该走了。有什么吩咐吗？我的女主人。”

他说着就向她笨拙地走了过去。

“要办公事别在我家里办，到城里去办。客人们都等着喝酒哩，你赶紧去吩咐一下。”玛丽昂说，她特别生气。

“好，好。”他说着就去了厨房。

这时，大家笑了起来，才放心了。

有一次，我收到赫斯特发来的电报，邀我和他一起去墨西哥。当时，我正在从洛杉矶去纽约的途中，有一件紧急事务需要处理。于是，我就说我去纽约有事，复电表示歉意。但到了堪萨斯城，他的两个代理人来接我了。

“我们来接您下车。”他们笑着说。另外，他们还说我在纽约的事务赫斯特先生准备叫他驻纽约的律师办理。

但是，我分不开身。

像赫斯特那样挥金如土的人，我不曾见过。在圣莫尼卡，赫斯特赠送了一幢海滨住宅给玛丽昂。其占地面积以及里面的装修设施简直就是一座王宫。

赫斯特做事就像小孩，非常任性。他心情好的时候，就跳他喜欢的查尔斯顿舞，做出些奇形怪状的姿势。这时，不论人家怎样批评

他，他都不管。有时候，他动不动就要生气。

有一天晚会上，我们准备玩字谜游戏，正在挑选两组人。突然，他就怪人家没选他。

“这么着吧，我们俩来玩一个字谜，就选‘pill-box’这个字，我扮演box，pill由你扮演。”杰克·吉尔伯特开玩笑说。

但是，赫斯特误会了[(1)]。

“你那个老掉牙的字谜，我才不玩呢。”他说着就走出了屋子，砰地关上了门。他说话的时候，声音都哆嗦了。

在圣西米恩，赫斯特开辟有一片占地四十万英亩的大庄园，沿着太平洋海岸三十英里。住宅的宽敞豪华都不用说了，光是仆人就雇了六十个。在这附近，动物园、车道等设施都很齐全。如果想要娱乐的话，那你就找对地方了。在那里，你可以骑马、打网球、游泳，各种各样的游戏应有尽有。

在这里，下午六点钟之前不用鸡尾酒款待客人，这是赫斯特的严格规定。但玛丽昂会在她住的地方偷偷地用鸡尾酒款待她的朋友。另外，一看这里的菜单就知道酒菜特别丰盛精美。但是只有赫斯特夫人在家时，我们才能用上亚麻布餐巾，其余的时候只能用纸制餐巾。

每年，赫斯特夫人都会到圣西米恩来。但是，她的到来并没有引起纠纷。赫斯特夫人和玛丽昂心里都清楚，她们各自立了内外两个门户。每次，赫斯特夫人要来的时候，玛丽昂就和我们离开那儿，或是回到圣莫尼卡的海滨住宅。

事实上，我既可以去玛丽昂的海滨住宅，也可以去大庄园。

1916年，我就认识了米莉森特·赫斯特。从那以后，我们就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在大庄园里，她看到大伙儿离开时，就假装什么也不知道，但又会很幽默地说：“即使没有玛丽昂，也会有其他的女人。”

在私底下，米莉森特·赫斯特经常谈到玛丽昂和赫斯特的关系，但她从未表示过怨恨。

“玛丽昂这个人好像压根就没有过，他仍然跟往常一样，我们之间仿佛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我一回来，感觉他总是那么亲切可爱，但就是时间太短了，没几个小时。而且，老是来这一套，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仆人就来递一张条子给他。他打个招呼就走了。等他再回来的时候，他总是有点尴尬地说，要马上去洛杉矶处理一件急事

儿。其实，大伙儿都知道，他又是去会玛丽昂了。他的话我们只是假装相信。”她说。

有一天晚饭后，我陪米莉森特到园地里去散步。后来，动物园的猩猩号叫得很厉害。于是，我就说：“瞧，那个该死的畜生肯定是疯了！”

“你瞧呀！这整个地方就是一个疯狂世界！”她一边说，一边望了望那个城堡式别墅。

说到赫斯特，米莉森特的口气总是很和蔼。可是，她对他还有夫妻之间的感情吗？我很是怀疑。没错，她很能为别人着想，很善良。但后来我在政治上受到歧视以后，她却不再理我了。

有一次，我去圣西米恩度周末。出来接待我的是玛丽昂，她当时的神情很紧张。原来在园地里，有一个客人被人用剃刀给刺伤了。一激动，玛丽昂就会口吃。

“我们……还不……不……不知道，这事情是谁干的。赫斯特现在已经派了几个侦探在园地上到处搜索。这件事，我们现在别让其他的客人知道。有人说，是一个菲律宾人作的案。因此，赫斯特吩咐，这件事情还没查清楚之前，让所有的菲律宾人都离开。”她说道，声音压得很低。

“刺伤的是什么人？”我问。

“今天晚餐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她说。

晚餐时，我的对面坐着一个年轻人，他的脸包着绷带。在他的脸上，就看见一双炯炯闪亮的眼睛，以及笑起来露出的一口白牙。在桌子下边，玛丽昂用胳膊肘碰了碰我。

“他就是。”她悄声说。

在餐桌上，他的胃口很好。有人跟他打听这件事，他就把肩耸了耸，咧开嘴笑了笑。

饭后，玛丽昂领我去看出事的地方。

她指着一座复制的“胜利女神”石像，说：“就在那个塑像后面。看，这儿有血迹。”

“他去塑像后边干什么呀？”我问。

“是要……要……要逃避那个人的袭……袭……袭击……”她说。

突然，那个年轻人又出现了。在我们面前，他歪歪斜斜地走了过

去，面颊上滴下了血。我跳了起来，玛丽昂惨叫了一声。不知道从哪里，一下子冒出来了二十个人，将他团团围住。

“我又被刺伤了……”他呻吟着。

他被两个侦探护送到了屋子里，然后在那儿接受调查。玛丽昂也走开了。但过了一个小时，我在大厅里遇见了她。

“是怎么回事？”我问。

“他们说是他自己干的，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要出风头，他是一个痴子。”她说，脸上露出疑惑的神气。

于是，大家就不再同情他了。当天晚上，他就被送走了。

第二天早上，那些无辜的菲律宾人又上工了。

那段时间的每一个周末，赫斯特和玛丽昂都邀我去玛丽昂的海滨住宅。我很喜欢他们过的那种豪华生活，因此我就常常应邀前去，更何况，那时道格拉斯和玛丽也在欧洲。

有一次，我们几个人一同进早餐。玛丽昂问了我一些与她的剧本有关的问题，但赫斯特不喜欢听我的意见。

剧本的故事，讲的主要是男女平等问题。于是，我说，一般来说，都是女人挑选她们的男人，在这方面，男人是做不了主的。

“哦！不对，向来都是男人挑选女人。”赫斯特说。

“那是我们自己这样认为，但只要有一个小姑娘指着你，说：‘我要那一个’，你就会去给她挑。”我回答。

“你这是完全错误的想法！”赫斯特特别自信地说。

“但是，她们的技巧都隐藏得非常巧妙，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这样一来，我们就相信是我们自己在挑选。”我接下去说。

赫斯特“啪”地拍了一下桌子，桌上的早餐以及其他东西都跳起来了。

“我说这是白的，你偏要跟我唱反调，说那是黑的！”他大吼道。

当时，我的脸色肯定发白了。刚好，仆人给我端来咖啡。于是，我抬头对仆人说：“请你叫人给我雇一辆车，收拾一下我的东西。”

接下来，我一句话也没说就站了起来。我到舞厅大踏步地走来走去，憋着一肚子怒气。

一会儿后，玛丽昂就来了：“查理，怎么啦？”

“管他是谁也不能那样对我说话！他以为自己是谁啦？是拿破仑

吗？是尼罗[2]吗？”我说，声音直打颤。

听我说完，她一句话也没说，转身就离开了。没过多久，赫斯特来了，他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的样子：“查理，什么事儿呀？”

“我不习惯被人吆喝！我在别人家里做客时，更是如此。因此，我马上就走。我……”我把话咽了下去。

赫斯特想了一下，接着也在房里走来走去。

“这件事儿，我们就说开了吧。”他说，声音也在发抖。

我在他后面跟着，进了大厅。他坐在一张双人椅上，让我坐在他旁边。

“查理，坐下吧。这事儿，我们就说开了吧。”他说。

他又高又胖，把大半张椅子都占了。我紧紧地挨着他挤坐了下去。之后，他一句话也没说，突然就把手伸了出来。我坐在那儿虽然没法动，但还是和他握了手，尽管费了很大的力气。接下来，他就跟我解释了，声音仍然在颤抖。

“查理，你看啊，玛丽昂演这个剧本，我真的一点也不喜欢。她是很尊重你的意见的。可你又赞成她演这个剧本！嗯，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我才冒犯你的。”

听他这样说，我一点也不生气了，还不断地跟他说，是我的错。最后，我们又握了一次手。然后，我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从那张椅子上站了起来。

现在回忆起来，玛丽昂当时离开后，肯定是去找赫斯特了，让他出来跟我道歉。玛丽昂是一个很开朗的人，很风趣。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儿。

路艾娜·帕森斯每次都由哈里·克罗克陪着，路艾娜·帕森斯是赫斯特报系的专栏作家，哈里·克罗克后来是的我副导演。我们游玩后，回家的时候总是凌晨四五点了。

于是，玛丽昂跟路艾娜说：“赫斯特要是知道我们这样了，肯定要解雇我们中的一个，但是，他是不会解雇我的呀。”

有一天，玛丽昂在家里举行宴会。在纽约的赫斯特打来电话，玛丽昂接完电话，特别生气。

“你们能想到吗？赫斯特居然派了人监视我！”她气愤地说。

原来，在电话里，赫斯特给玛丽昂读了一份侦探的报告，通报了

玛丽昂在他走后做的一些事情。

后来，她跟我说，赫斯特马上就要回来跟她一刀两断。玛丽昂并没有做错什么，她只是去看了几个朋友，也难怪她会生气。

之后，赫斯特在堪萨斯城发来电报：“初衷已改，加州不回，旧地多少欢娱，往事不堪回首，现返纽约。”

但不久之后，他又发来电报说要来洛杉矶。

一见到赫斯特回来，所有的当事人都很紧张。但后来一切误会都消除了，还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欢迎赫斯特回比弗利山。

有时候，为了换个环境，我们就去赫斯特的游艇上度周末。有一次我没去，听说当时游艇到了圣迭戈海滩，不得不把托马斯·哈·杨斯送下船，他当时已经接管了赫斯特世界影片公司。

午餐时，杨斯突然浑身剧痛，就离开了。刚开始，大家都以为他是犯了胃病，但他后来疼得很厉害。于是，大家才把他送去医院。结果，他得了心脏病，回家三周后，心脏病复发就死了。

于是，谣言就传开了，说杨斯的死跟赫斯特有关，说杨斯是被开枪打死的。事实上，这完全是在瞎说。杨斯去世的前两周，我们还去探望过他，看到我们，他很高兴，还相信自己不久就会康复。

尽管如此，杨斯的死还是把赫斯特世界影片公司的计划打乱了。所以，后来由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去完成这些计划。

有时候，赫斯特会显得十分天真。玛丽昂的影片初映，他经常要我和他一起坐车去看。为了避免被别人看见他是跟玛丽昂一起去的，汽车快到电影院门口时，他就下车了。

有一次，赫斯特邀请我到欧洲去旅行。但我没去，因为去的人太多了，肯定航行得很慢，赫斯特高兴走就走，高兴停下就停下。这种滋味，我第一次和赫斯特到墨西哥去旅行就尝到了。

在英国，赫斯特虽然拥有贵重的股票，可以从中获取巨额的利润。但是，他亲德反英，他的这种反英亲德的情绪，我永远无法理解。到欧洲旅行时，赫斯特去德国做了访问，并且会见了希特勒。当时，人们还很少知道希特勒的那些集中营。

透露希特勒那些集中营的内幕的最开始的几篇报道，是我的朋友科尼列斯·范德比尔特写的，他是美国新闻记者。但是，那些残酷的暴行，却很少有人相信是真的。

范德比尔特给我寄来一套明信片，上面印的全是希特勒的各种各样的姿势，这些姿势都是他发表演说时做出来的。看了那些明信片上的姿势，我觉得希特勒的嘴脸很滑稽可笑，心想：“这真的是一个疯子！”

但爱因斯坦和托马斯·曼被迫离开德国后，我才知道希特勒的那副嘴脸是多么的阴险恐怖。

1926年，爱因斯坦来加州讲学，那时我第一次见到他。

当时，环球电影制片厂的卡尔·莱姆勒给我打来电话，跟我说爱因斯坦教授想要见我。可以想象，听到这个消息，我是多么的激动。于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就在环球电影制片厂里。在那里，我还跟教授一起吃了午餐。另外，还有他的夫人、他的秘书海伦妮·杜卡斯和副教授沃尔特·迈耶。

饭后，大家由莱姆勒先生领着去参观电影制片厂。我被爱因斯坦夫人拉到了一边，她小声地对我说：“为什么您不邀请教授去您家呢？要是有机会就咱们几个人在一块儿，安静地聊聊，他肯定很乐意的。”

于是，我就简单地设宴邀请爱因斯坦去我家。

在餐桌上，爱因斯坦夫人把爱因斯坦发明相对论那天早晨的情景给我讲了。

“博士跟以往一样，穿着他的睡衣，从楼上下来吃早餐。但是那天他几乎什么东西都不吃。于是，我就问他哪儿不舒服。‘亲爱的，我有一个惊人的想法。’他说。喝完咖啡后，他就到钢琴前弹琴。他一会儿弹几下，一会儿又停下，一会儿他记下了一些什么。然后，他又重复说：‘我有一个绝妙的想法，一个惊人的想法！’‘那到底是什么想法呀？你不要让人瞎猜，就说出来吧。’我说。‘我还得把它推究出来，不好说。’他说。”

之后，她又告诉我，后来，爱因斯坦回到书房里，一直在楼上待了两周，不让人打扰他，她每天负责把饭送上去，爱因斯坦只在黄昏的时候出去散会儿步。

“有一天，他终于从书房出来了，那时他的面色很苍白。他对我说：‘喏，就是这个。’同时，他疲倦地把两张纸放在桌上，那就是他发明的相对论。”她说。

那天晚上我邀请了雷诺兹医生，因为他也懂点儿物理学。在席上，他问爱因斯坦有没有看过邓恩写的《时间实验》。

爱因斯坦摇了摇头。

“邓恩提出了一条很有趣的原理，关于维数的。一种叫什么……维数的发展。”雷诺兹说。

爱因斯坦赶紧转过身来，带着顽皮的神气，悄声地问我：“这是什么玩意儿？一种维数的发展。”

后来，雷诺兹问爱因斯坦相不相信有鬼。

爱因斯坦说：“我从来也没有见到过鬼啊！要是另外有十二个人同时看到了同样的现象，那么，我是会相信的。”

那时候，灵魂现象是大家常谈的话题。

后来，我问他：“您的相对论和牛顿的假设有抵触吗？”

“不但没有抵触，相反还是牛顿假设的进一步发展。”他说。

在席上，我告诉爱因斯坦夫人说，等我的下一部影片放映后，我打算去欧洲。

“到时候您一定要来柏林看看我们。教授没有很多钱，我们住的地儿也不大。洛克菲勒基金会给他一百多万美元作科学研究，但他从不动用。”她说。

我后来去柏林时，到他们住的地方拜访了他们，那是一套朴素的小公寓房子。德国到处都笼罩着纳粹的恐怖。于是，爱因斯坦一家人去了美国避难。爱因斯坦夫人说，普林斯顿大学聘请爱因斯坦的时候，教授提出的报酬数目很小。于是，普林斯顿学校当局就说，在美国，他所提出的报酬连生活都维持不了，他的报酬至少要在两倍以上。

1937年的时候，爱因斯坦夫妇又来到加州，他们一起来看我。有一次，我邀请了很多人来进晚餐，包括玛丽·碧克芙、道格拉斯·梵朋克、玛丽昂·戴维斯、赫斯特等。在餐桌上，大家一句话也不说，就玛丽昂·戴维斯嬉皮笑脸地跟桌上的每一个人说几句俏皮话，但唯独没有跟爱因斯坦说话，她当时就坐在爱因斯坦旁边。

突然，玛丽昂转过身来，淘气地对爱因斯坦说：“哈喽！”接着，她的中指掠了掠爱因斯坦的头发，说：“您为什么不把头发剪一剪啊？”

听了玛丽昂的话，爱因斯坦笑了。

爱森斯坦是一位俄国电影导演。因为拍过两部很好的影片《波将金》和《震撼世界的十天》，他就成名了。他到好莱坞是为了给派拉蒙影片公司导演一部影片。但后来派拉蒙影片公司考虑到他来自俄国，所以就取消了请爱森斯坦导演影片的计划。

有一次，我和爱森斯坦谈到了共产主义。

我问他："那些无产者接受了教育之后，在智力方面他们比得上那些世代有文化的贵族吗？"

爱森斯坦说："群众一旦接受了教育，他们的智力就会变成一片富饶的新土壤。"

爱森斯坦导演的《伊凡雷帝》用写诗的方式来解释历史，可以说是一部登峰造极之作。不管怎么说，与史书相比，艺术作品的事实更可靠，记述更详细。

---

(1) Pill是药丸的意思，box是盒子的意思，pill-box是碉堡的意思。但pill有时又是讨厌的人的意思，这里，赫斯特就把pill理解成了讨厌的人。

(2) 尼罗是罗马皇帝一个暴君。

第二十一章 《城市之光》

我在纽约的那段时间里，一个朋友将他看到的影片配音的情形给我做了一番描述，他说他有种预感，这一项发明在近期将会轰动并颠覆传统的电影业。

对于这件事我是左耳听右耳出，根本就没有放在心里，直到几个月后，华纳兄弟影片公司摄制了它的第一部有声电影，才使我再次想到它。那是一部由一位特别漂亮的女演员主演的古装影片，在这里我就不提她的名字了。

影片中的她起初是默默无语的，然而，她却用那双充满忧郁的大眼睛，将所有的悲伤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就在这引人入胜的关键时刻，一个新的组成部分出现在了影片中，像是有贝壳凑近耳边时发出的那种声音传进了我们的耳朵。接着，我们听到美丽的公主开口说话了，声音好像是从沙土中传出来的："我一定要嫁格雷戈里，哪怕是让我放弃女王的宝座，我也心甘情愿！"这个声音的出现真的是惊到了我，因为在这之前，公主给人的感觉一直是很可爱的。

影片继续往下演，里面的对话越来越逗人，但让人感到更好笑的并不是这个，而是音响效果。有声电影刚问世时，制片人对怎样控制声音是完全不懂的：公主房门把手扭动时，听起来就像是一辆拖拉机"突突突"地开了过来；关门的声音像是两辆大卡车相互撞到了一起；往杯子里倒水时，会有一种突然升高了的奇怪声音发出；一家人吃饭，好像是在小饭店最忙乱的时刻所发出的噪声；一位骑士身披铠甲作战时，所发出的铿锵响声，你听着好像是走进了一个钢铁厂。

当我看完影片后，我认为有声电影的日子很快就会消失。但我的想法错了。一个月后，米高梅影片公司放映了一部内容低俗无趣，却很卖座的大型音乐片——《轻歌曼舞》，这成了有声电影发展的一个开端。从此以后，无声影片开始衰落，有声影片争先恐后地进了各个电影院。事实上，一部好的无声电影是具有世界性吸引力的，它的对象包括知识分子和下层社会；当时也处在无声电影进行改良的阶段，德国导演穆尔瑙已经很有效地利用了这一艺术形式，某些美国导演也

正在效仿他的手法。可是，现在这一切都要成为过去时了，这真的让人感到惋惜。

然而，我始终坚信不同类型的娱乐是可以同时存在的。我是一个具有特色的哑剧演员，而且，毫不谦虚地说，是超群绝伦、独一无二的。所以我决定继续拍无声电影，《城市之光》是我接下来要去完成的一部无声影片。这是一部情节伤感的影片，讲的是一个马戏场上出了事故而双目失明的小丑的故事。小丑的女儿身体多病而且有点神经质，为了不让女儿受到更大的刺激，医生叮嘱他不要把失明的事情告诉女儿，等她身体恢复健康了再让她知道。于是，小丑为了不让女儿受刺激，便一直隐瞒着真相。他走路时总是东倒西歪，磕磕绊绊，时常逗得女儿发出银铃般的笑声。剧中的情节环绕着这个主题慢慢地铺展开来。

在道格拉斯的制片厂里有一个蒸汽浴池，许多剧组的演员、导演和制片人都喜欢聚在那里。拍《城市之光》的那些日子里，只要一收工，我也会往那里跑，和这些朋友们一边悠闲地喝着杜松子酒和汽水，一边闲聊着和有声电影有关的话题。当他们听说我在拍一部无声电影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满脸惊讶地对我说："你的勇气真是无人可比啊！"

以前只要我一拍电影，那些制片人就会闻风而至，表达他们对我的电影的兴趣。现在却是今非昔比了，他们感兴趣的只是有声电影。于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慢慢地感觉到自己正处在孤立的边缘，我开始担心前方没有属于我的路。报刊杂志上也会刊载一些让人惶恐的文章，都表示查理·卓别林拍无声电影的前途很令人担忧。以前，乔·申克曾经公开表示对有声电影的反感，可现在，他的立场也发生了动摇。他对我说："查理，看来以后的电影界就由有声电影来主宰了，除非你能够拍出一部卖座儿的无声电影，再也没有谁能有勇气超越它们。"虽说这句话是在称赞我，但我听了却觉得很不是滋味儿，因为我并没有死守着无声电影不放的意思。

《城市之光》是一部十分优秀的无声电影，我在拍摄时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我不会放弃。有声电影问世已经三年了，大部分演员在演戏时只关注谈话与时间的配合，而不再顾及对动作与时间的配合，他们几乎忘记了哑剧表演。剧中需要一个既会装得像个瞎子，但又不影

响美感的女演员。许多人来毛遂自荐，她们翻着眼白，高仰着头的样子叫人感到很不舒服。想要寻找到适合角色的女演员也是其中的一个困难。不过，皇天不负有心人。有一天，我看到一群穿着游泳衣的漂亮姑娘在圣莫尼卡海滩拍电影。其中一个向我挥手打招呼，仔细一看，原来是弗吉尼亚·彻里尔，我们以前见过几面。

她问我："我很想到你那里拍电影，你什么时候能给我一次机会呢？"

她身穿蓝色泳衣，身材窈窕匀称，五官精致，很上镜，但是缺乏演戏经验，让她来扮演一个着重表现心灵的盲女郎，是我从来没考虑过的。但是，经过这些日子的面试，我对其他的女演员感到特别失望，于是决定让她来试试。在试戏的时候，我教她怎样用脸部表情反映一个人的内心，她居然能做得很到位，具有那种模拟盲人的本领，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哑剧中的动作技巧是十分机械的，那些富有经验的女演员有时积习太重，反而无所适从，而像彻里尔小姐这样缺少表演经验，有时倒成了一个优点，更容易适应那些机械动作，尤其是拍这种技术占首要地位的无声电影。

在拍摄这部电影期间，股票市场狂跌。我以前读过梅杰·H．道格拉斯的《社会信贷》一书，书里面的内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本书对我们的经济制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释，说工资是一切利润的基础。也就是说，失业意味着利润的流失，并且会减少资本。1928年，美国失业人数达到了一千四百万人，我及时地将自己所有的股票和债券售了出去，在拍摄无声电影时，这笔钱成了我的流动资金。

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城市之光》终于摄制完毕，只要再配上音乐便大功告成了。那些改编乐曲的人总认为应该配上一些滑稽有趣的音乐，可是我却不这么认为，我不希望音乐喧宾夺主，美好的音乐会给我的笑片增添感情色彩。黑兹利特曾经说过：一部没有感情的艺术作品，就根本谈不上完整。所以我要认真地为它们配上富有浪漫色彩的优美的音乐，以此衬托出剧中男主角的个性。好在影片中的音乐可以由我自己来作曲，这一点是值得欣慰的。

在我的努力下，《城市之光》的音乐终于配好了。于是，我没有做任何的宣传，就在闹市区的一家戏院里进行试片，因为我太想知道影片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这次试片让我感到很惶恐，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戏院里空着一半的座位，而且那些观众们的主要目的是看戏，而对笑片并没有什么兴趣。电影放映到了一半时，我终于听到了观众们的笑声，但是笑声很轻。还没等电影演完，有些观众已经起身离座了。

“他们还没看完就走了。”我用胳膊肘碰了碰我的副导演。

他趴在我的耳边小声说：“他们也许是上厕所去了。”

于是，我的注意力再也无法集中到影片，而是时刻关注着离座的那些人是否回到座位上来。几分钟过去了，始终没见那些人回来。我紧张地小声问副导演：“他们怎么都没回来呢？”

他安慰我说：“有些人大概是赶火车去了。”

“两年的时间和二百万美元都算白扔了。”当我离开戏院时心里想道。

路过戏院休息室的时候，戏院经理从里面走了出来：“查理，这部影片很精彩。”然后他又说道：“我很希望能看到你拍的有声电影，全世界的人都在等着你呢！”

这句话表面听起来似乎是恭维话，其实不然。我不自在地挤出了一丝笑容，然后走到了戏院外的人行道上，我们的工作人员都在那里等我。夫斯是我的经理，向来很严肃，这时说话的语气却显得很轻松：“我认为这部影片所产生的效果挺好，要知道——”我感觉到最后这几个字有些不妙，赶紧很有把握地点了点头，并接着他的话茬说了下去：“这部影片还有一两个地方需要剪辑一下，这样效果会更好。如果戏院里座位都坐满了，观众的情绪会更加高昂的。”

这时候我们才猛然想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让大家都有点慌神，那就是至今我们还没有为这部影片做过任何宣传工作。但是我却一点也没有为票房担心，因为以前电影院老板对我的每一部新影片都很感兴趣，我相信自己的名气还是很有号召力的。而我们联美影片公司经理乔·申克却给我泼了一盆冷水，他对我说：“现在跟放映《淘金记》时已经不同了，那些轮流上映的大电影院也和我们保持着相当的距离，都抱着观望的态度。而且一般电影院老板现在已经不那么热心了，不会给你以前那样的待遇了。我还接到他们的通知，说纽约所有的电影院都已被预定出去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排队等候。”

乔治·M．科汉戏院有一千一百五十个座位，是在纽约唯一可以租

借到的戏院，但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赔钱的电影院，甚至不配称为电影院，里面除了四壁之外，其他一无所有，就更别提有经理、出纳、引座员、放映师和台上工作人员了，根本不适合放映电影。而且电灯招牌广告费用，一切都需要自己筹备支付。我想，既然两百万都花出去了，还在乎这些干什么。于是，我孤注一掷地把这家戏院租了下来。我每星期要付七千美元租金，并保证连续租八个星期。

同时，夫斯跟洛杉矶一家新落成的电影院也谈妥了租期，准备在这个戏院首次放映我们的影片。当时，爱因斯坦夫妇也在洛杉矶，也说要去看这部影片，但是他们怎么也不会料到，初映的那天会有那么多麻烦发生。那天晚上，他们夫妇在我家用了晚餐后，和我们一起驱车去电影院。沿途经过的几个街区的街道上人头攒动，戏院附近商店的橱窗被人群挤碎，到处充斥着香水和麝香混杂着煤气灯的气味，让人觉得头昏脑胀，想要呕吐。警备车和救护车试图驶进水泄不通的人群维护秩序。最后，我们在一队警察的护卫下，踉踉跄跄地总算进了休息室。

虽然这个戏院建造得非常考究，但是这家戏院的老板却是个对放映电影一窍不通的人。开始播放影片了。像在一般电影初映时一样，导演和制片人的名字首先出现在了银幕上，观众们也都报以了掌声。接着，终于出现了第一个镜头。我的心快提到嗓子眼儿了。那是一个塑像纪念碑揭幕典礼的滑稽镜头，这个镜头引得观众们发出了笑声，而且笑声越来越高，最后变成了哄堂大笑。听到电影院回荡着的笑声，我的一切疑虑和恐惧都开始烟消云散。在接连放映了三本的过程中，观众们的笑声一直没有间断过。我想哭，又忍住不跟着观众一起笑，我知道自己抓住了观众的心！

突然，一件让人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戏院里的灯光一下子都亮了起来，影片突然中断，观众们的笑声也随之停止。接着一个人的声音从麦克风里传了出来：“请各位允许我占用五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这个美丽的新戏院的优点，然后再继续放映这部精彩的笑片。”

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猛地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发疯一般冲向过道：“我要宰了这个婊子养的混蛋戏院经理！他在哪里？”

观众们又是跺脚又是拍手，表示对我的支持，而那个白痴经理还

在唠叨着戏院里各种设备如何精良。直到观众们不断地喝倒彩，他才停止了讲话。接下来又播映了整整一本，笑声才又在戏院里响起。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部影片是成功的。

再过四天就要在纽约放映电影了，我必须提前赶到那里去，所以我没有等着看影评，在第二天就匆忙赶往纽约。我到了那里才发现，居然什么宣传工作也没做，只有一则简单的广告启事刊载在报上："我们又要见到我们的老朋友了。"还有几条没有任何吸引力的介绍，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了。见此情景，我赶紧找到我们联美影片公司的工作人员，警告他们说："你们要明白，平常没有电影在这家戏院播映，而我们又是在这里初映，光凭观众对我的喜爱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广告是必须要做的。"

于是，我用了同样大小的字体，每天在纽约最大的报纸上刊登了占半幅版面的广告，内容如下：

科汉大戏院
查理·卓别林
在《城市之光》中演出
全天各场连映
票价五角至一元

广告费用花了我三万美元，在戏院门口租一个电气招牌又用了三万美元。距离初映的日子没几天了，我们不得不通宵赶工，反复试验放片，决定影片的大小，对一些有差距的地方进行矫正。第二天我又开了个记者招待会，将我拍这部无声影片的原因向记者们做了一番讲述。

所有的大电影院在播映第一轮影片的时候，最高票价定的是八角五分，最低票价是三角五分，而且它们播映的都是有声电影，演员也会亲自到电影院来跟观众见面。因此联美影片公司的工作人员对我定的票价——最高一元，最低五角提出质疑。但是我拒绝降低票价，我有我的想法：正因为我们播映的是一部无声电影，票价就更需要抬高。如果观众们很喜欢这部电影，是不可能在乎这一点差价的。

虽然影片初映很成功，但是这暂时的成绩并不能说明什么。一般

观众的反应才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直到半夜我都没有睡意，脑子里一直在琢磨着：观众是否会喜欢这部无声电影呢。上午十一点钟，情报员闯进了我的卧室，一脸兴奋地对我喊道：“伙计，你太伟大了！影片火了！从早晨十点钟开始，整个街区都排满了要看电影的人，你仔细听听，那些人都是怎样喊叫的！现在，观众们都抢着要进电影院，整个市区交通也被看电影的人堵住了，维持秩序的警察就有十多名。”

这下子我感到彻底轻松了。我一边吩咐给我准备早餐，一边开始洗漱。我问他：“放映到哪段时，观众笑得最厉害？”

于是他开始认真地给我描绘起来。接着，他对我说：“你还是亲自去看看吧，看了之后有益于你的心脏健康的。”

一开始我并不想去，但是他那份热情打动了我，最终我还是去看了半个小时。影院里的笑声让我感到心满意足。这部影片又受到了观众们的热烈追捧。我兴奋地绕着纽约市区游荡了四个多小时。

放映我们影片的这家戏院的对面是拉蒙影戏院，共有三千个座位，放映的是一部有声电影，还有莫里斯·萨瓦利埃亲自登台，一个星期里卖了三万八千美元。而我们这家戏院一共有一千一百五十个座位，连续三个星期放映下来，共卖座二十四万美元，也就是说每周有八万美元的卖座率。十二个星期以来，《城市之光》一直在不断地放映，将所有的费用都扣除，还有四十多万美元净利润。后来，纽约方面的戏院要求停止在这家戏院的播映，说这部影片已经被它们高价预定了，不希望轮到他们播映时，这部影片已经陈旧不堪。

接下来，我要去伦敦筹备放映《城市之光》的工作。我有个朋友叫拉尔夫·巴顿，才三十七岁却结了五次婚，他是《纽约客》的编辑，最近他正忙于为巴尔扎克《逗乐集》的新版本做插图，但他心情一直很糟糕，曾经吞服了大量的药剂想要自杀。在我待在纽约的这段日子里，我常常开导他，并希望他跟我一起去欧洲，换个环境，也可以换个心情。在我的说服下，他随着我一起登上了我头一次回英国乘的那条船——“奥林匹克”号。

第二十二章　回到故乡伦敦

这次伦敦之行让我感到惶恐不安，离开那里十年了，我不知道伦敦人会怎样接待我。如果不是为了给《城市之光》的初映做宣传，我真的不想惊动任何人，悄悄地回去。不过，那里的人并没有让我失望，他们对我的归来都表现得很热情。

和里茨旅馆相比较，卡尔登旅馆更具有悠久的历史，所以我选择住在这个旅馆，它让我感受到伦敦对我更加亲切。我住进一套十分华丽的房间。我一直觉得要喜欢奢侈生活，是一件最使人头痛的事情。但是，伦敦这个都市就像是一个游艺会，财富能使你随时过着奇特得充满乐趣的生活。

站在窗边向外面的街道望去，看到好几副招贴贴在街道显眼的地方。其中一幅上面写着：“我们仍然很爱查理。”看着这句话，我忍不住想笑，因为我感觉到了它的话中有话。新闻记者对我非常客气，从来没有刁难过我。

第一次去英国时感到特别激动，第二次去时依然是同样的心情，但是因为我有机会和许多更有趣的人物见面，所以显得第一次还要充满趣味。

菲利普·萨逊爵士在城里有个公馆，在利姆普纳的乡间还有个别墅，他打了好几次电话，请我和拉尔夫去吃饭。我们的午餐是和他在议院一起吃的，在议院休息室里和阿斯托夫人见了面。两天后，阿斯托夫人又请我们去圣詹姆斯广场一号一起吃午饭。

在客厅里，我们见到了萧伯纳、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劳合·乔治以及其他一些名流。阿斯托夫人很健谈，而且又机智过人，为我们营造了十分活跃的谈话氛围，但她临时有事走开了，整个气氛马上变得沉闷起来。幸亏和蔼悦人的萧伯纳打破了僵局，使席间再次充满了欢声笑语。

我也跟经济学家凯恩斯闲谈了起来，说我在一本英国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讲的是当时还是私人银行的英格兰银行在信贷方面所起的作用。文章里说，大战期间，英格兰银行除了四亿英镑外国证券，所

有的黄金储备都已经用光了，政府要向这个银行借五亿英镑，于是银行的主管人员就搬出了所有的证券，查看了一下之后，又把它们藏进金库，然后向政府提供了贷款，据说这个办法被反复使用了好几次。

凯恩斯点点头说：“确实是这样。”

我很有礼貌地问：“可是他们是怎样偿还那些贷款的呢？”

凯恩斯说：“仍然用纸币去偿还嘛。”

阿斯托夫人不但是一位可爱的女主人，而且还可以成为一位杰出的演员。午餐快要结束的时候，她在自己的牙齿上套上了一副喜剧演员用的假牙，整个面部表情看起来十分滑稽，她把维多利亚时代贵妇人在骑艺俱乐部里说话的样子模仿得惟妙惟肖。她为我们举行了好几次轻松快乐的宴会，也让我有机会见到那么多英国社会名流，我打心眼里感谢她。

午餐结束后，客人们陆续离开，阿斯托勋爵说芒宁斯给他画了肖像，要带我们去看看。当我们到了画室门口时，却遭到了芒宁斯的拒绝，阿斯托勋爵好说歹说，他总算同意让我们进去。我们看到了他给阿斯托勋爵画的肖像，画中的阿斯托勋爵骑在一匹猎马上，一群猎犬围在四周，猎犬的动作画得十分生动，我忍不住称赞：“这些动作是有音乐性的。”没想到这一句话更合了芒宁斯的意，他高兴得拿出了另外几副速写给我看。

两天后，萧伯纳请我们去他家共进午餐。餐后，萧伯纳把阿斯托夫人和其他客人都留在起居室里，单独把我带到他的书房里。书房和泰晤士河相临，里面收拾得十分整洁。壁炉架上边摆满了萧伯纳的著作，我没有读过太多萧伯纳写的文章，一下子看到那么多他的书，我忍不住走近它们，傻子一样地发出了惊叹：“天啊，您写了这么多书呀！”接着我就想到，也许他要和我谈他的作品，测试我的智力，才故意安排了这样一个机会吧。我又想到，我们不会总这样待下去吧？我真希望其他客人快点儿进来打破这个僵局。可是始终没人进来，屋子里安静得让人感到很不自在，我只好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话，一边打量着屋子里的陈设。又过了一会儿，我们总算回到了其他客人那里去。

后来我又跟萧伯纳夫人见了几次面。当谈到一般人对萧伯纳的剧本《苹果车》反应比较冷淡的时候，萧伯纳夫人很恼火。她说：“我

不希望萧伯纳再写剧本，一般观众和剧评家根本不配看这些戏！”

接下来，连续三个星期，我们一直忙着赴宴会。一次是参加拉姆齐·麦克唐纳首相的宴会，另一次是参加温斯顿·丘吉尔的宴会，此外就是阿斯托夫人、菲利普·萨逊爵士等一些贵族主持的宴会。

我是在玛丽昂·戴维斯的海滨住宅里和温斯顿·丘吉尔第一次见面的。那天在舞厅和会客室之间来回穿梭的客人大概有五十位。丘吉尔在赫斯特的陪同下出现在走道里，他双手插在背心口袋里，站在那里看着跳舞的客人们，站姿很有拿破仑风范，表情却有些茫然，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这时，有人招呼我过去，给我们做了引见。

我和丘吉尔就站在那里随便交谈了几句。他对人很亲热，但显得有点儿粗鲁。我们的话题从英国工党政府谈起，他对这个话题似乎很感兴趣。

我说：“在英国，如果社会党主政，是否会改变国王和王后的地位？这是我一直想知道的事。”

“当然不会改变。”他瞥了我一眼，神情中透着嘲笑和挑衅。

“我还以为社会党反对君主制呢。”

“如果这是在英国，你会因为说这句话而掉脑袋。”他大笑着说。

两天后，丘吉尔邀我一起吃晚饭，地点就在他住的旅馆里。那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晚会。我到了那里时，已经有另外两位客人坐在了那里，还有一个帅气十足的小伙子，经介绍知道那是温斯顿十六岁的儿子，他很擅长说理和辩论，并且主意坚定，敢于批评一些问题。他们父子在席上随意取笑，谈了一些日常琐事。我从温斯顿的眼神里能感到，他很骄傲有这样一个儿子。后来，我又和他在玛丽昂的海滨住宅里见过几次，他就返回英国了。

这次，丘吉尔先生得知我和拉尔夫来到了伦敦，便邀我们去查特威尔度周末。那天的气温很低，我们驱车到达那里。查特威尔别墅是一所美丽的老式房子，里面的陈设朴素中透着雅致，家庭气氛很浓。真正对丘吉尔有所了解是在第二次来伦敦的时候，他当时是下议院一位后座议员。

丘吉尔先生在人生舞台上扮演了许许多多的角色，他的魄力、热情以及兴趣爱好真的是让人赞叹。他几乎没有错过这个世界上所有充满乐趣的事情。他懂得享受权力，但从不痴迷于权力。在忙忙碌碌的

生活中，他能够充分地利用闲暇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砌砖、跑马、绘画。他生活得生动出彩，玩得也畅快淋漓，所以我认为他是我们多数人中最懂得生活的人。在他家餐厅里有一个壁炉，壁炉的上面挂着的一幅静物油画吸引了我的眼球。丘吉尔先生对我说："这幅画是我自己画的。"

我激动地说："画得实在是太好啦！"。

"这很容易。我在法国南部看见一个人画风景画，我就说：'我也能画。'于是我就开始自己画画。"

第二天清晨，他说他自己给查特威尔砌了个围墙，要带我去看看。表面看起来砌墙很简单，其实那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当我看到他砌的围墙时，不禁惊讶于他的本领。

"这不算什么，我教你五分钟，你就可以学会怎样砌墙了。"

第一天晚上，席上有好几位投靠在他门下的年轻议员，其中有布思比先生，也就是现在的布思比勋爵，还有已经过世的布伦丹·布雷肯，他后来被封为布雷肯勋爵。这两位议员的谈吐都很风趣。我对他们说我要去和当时正在伦敦的甘地会面。

布雷肯说："这个家伙被我们给惯坏了。除非我们拿定主意，否则印度就会丢失。当局应该不要理会他的什么绝食抗议，把他送进牢房，永远不要放出来才对。"

"甘地象征着印度人民的需要，除非是他们的需要得到满足，否则就会陆续产生甘地。你把一个甘地关进监狱，就会有另一个甘地出现。"我忍不住插嘴道，"如果监禁能够解决问题，那倒是一个挺简单的办法。"

"我看你倒可以成为一位优秀的工党党员。"丘吉尔听完我的话，转过身来对我笑着说。丘吉尔的优点在于，他好像从来不去记恨那些与他意见相左的人，能宽容和尊重别人的意见。

当时正在进行选举，国内处于经济危机之中，整个政局正处于动荡不安的阶段。比弗布鲁克勋爵一天要往查特威尔打来好几个电话，丘吉尔在晚餐时起身好几次去接电话。当天晚上，布雷肯和布思比就回去了。第二天，我和丘吉尔一家人很亲密地共度假日。

跟丘吉尔一家吃饭的情景非常有趣，他在桌上大谈其政治，已经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一家人对此已经习惯了，都怡然自得地

听着。

“内阁大臣谈到平衡预算的问题时，总是强调怎样充满艰辛，”丘吉尔一边说，一边偷偷地瞟了一眼家里人，又对我看了看，“说什么经费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且再也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上税了。英国人现在喝茶只能喝茶叶末子，拌起糖茶来已经像是在搅糖浆一样了。”他说到这里停顿了下来，仔细观察这几句话给大伙带来怎样的反应。

我问道：“如果再征收一笔茶叶方面的税，是否可以平衡预算呢？

“可以的。”他回答。但是我觉察出他的口气中带着一些犹豫。

查特威尔那种朴素的、几乎是斯巴达式的风格是我很喜欢的。丘吉尔的卧室和图书室是合二为一的，书籍摆满了四面墙壁。国会议事录占了其中的一面墙，另外还有许多有关拿破仑的书籍。

“我很崇拜拿破仑，”他说，“听说你想拍一部以他为主题的电影。不错的想法嘛，值得去拍。这方面有很多精彩的笑片资料，其中最吸引人的应该是这组镜头：有一次，拿破仑的兄弟热罗姆趁着他正在洗澡，以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使拿破仑在尴尬的情况下答应他提出的要求，便穿着一身金线绦镶边的制服，冲到他的跟前。但是拿破仑故意在浴缸里滑了一下，给热罗姆的制服上泼了一身水，然后吩咐他离开那儿。”

在丘吉尔家里做客后不久，我见到了甘地。我一向很尊敬甘地，对他那精明的政治眼光和钢铁般坚强的意志很是钦佩。但是我认为他不应该去伦敦。因为在寒冷阴湿的英国，他很不整齐地缠绕在身的肩巾与四周的一切都格格不入，他的传奇在这种环境里会失去应有的光彩，而他那样举行宗教仪式，对于自己的形象是有消极作用的。他在伦敦给人留下的印象，也许只会给某些人提供笑料。

在距离东印度码头不远有个贫民区，我和甘地约好在贫民区内一幢简陋的小楼里见面。我到达那里的时候甘地还没到，街道上密密麻麻地站着很多人，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将两层楼都占满了。我一边等他，一边盘算着该跟他谈些什么。

总算等到他来了。当他拢着那不规则的肩巾从汽车里走出来的时候，人群开始欢呼雀跃起来。在贫民窟里那条拥挤不堪的小街上，这

样一个外国人被欢呼簇拥着，向一幢简陋的房子走去的情景，真是很奇特。他上楼后，在窗边向我招手，我赶过去后，我们一起向下面的人群挥手致意。

我们在沙发上刚一落座，照相机的闪光灯便噼里啪啦地闪了起来，一想到要对一个陌生的问题发表讲话，我就感到紧张。我知道，这一次必须由我来开场，不能等着甘地来说给我听。在我右边有一个少妇，不停地跟我说话，我只是机械地点头，一句话也没听进去，心里一直在琢磨应该如何打开话题。突然，有个印度女人用命令的口气将那个少妇喋喋不休的谈话打断："小姐，现在是卓别林先生和甘地谈话的时间，请你先停止讲话好吗？"

屋子里顿时安静下来，甘地也用期待的目光望着我。我想，此时全印度都等着我说话，我必须要镇静。我开口了："对印度人的奋发图强我感到很钦佩，也很同情他们为自由进行斗争。可是，我有些想不通，您为什么对机器那么痛恨呢？"

甘地笑着对我点了点头。我接着说下去："机器是个很好的东西，它可以帮助人民打碎奴役他们的枷锁，让他们用更少的时间去从事劳动，有更多的时间去增进知识和享受人生，机器是能为人民造福的。"

他冷静地说："这个道理我明白。过去机器使我们依赖英国，我们要想摆脱这种依赖，就必须摆脱英国的统治，而唯一的办法，就是抵制一切机器制造的货物。因此，从爱国的角度出发，印度人必须自己纺纱、自己织布。面对英国这样一个强大的敌人，我们要想获得进展，就必须采取这种方式。当然，我们这么做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英国天气冷，这就需要发展工业生产，其经济模式也就更复杂。你们需要餐具制造业，可我们吃东西可以用手指抓。两国之间气候的不同，使两国人的生活习惯和需要也不同。"

他还跟我说，要想实现印度的高度自治，就必须抛弃一切不必要的东西。但暴力的方式不可取，暴力是终将走向灭亡的。

后来，屋子里其他的人都离开了，甘地表示希望我留下来看他们做祷告，于是我坐在一张沙发上，看他们恭恭敬敬地祷告。他盘腿坐在地板上，另五个人围过来，坐成一圈。在伦敦贫民区的一间小屋里，六个人盘坐在地板上，夕阳西下，使屋子里笼罩着一层朦胧的光

线。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景象。我不由自主地想，瞧，这位非常讲求实际的人，是多么矛盾啊！他的法律眼光那么犀利，对现实政治理解得那样深，可这一切在顶礼颂赞声中仿佛全部消失了。

《城市之光》初映的那一天，天空下着瓢泼大雨，但这并没有影响观众们观看电影的热情，影片很成功。我和萧伯纳并排坐在楼厅上，引起了场内一片笑声和掌声。我们只好一同站起来鞠躬，而这一来更招乐了观众们。

丘吉尔也来参加了初映礼和初映后举行的晚宴。在晚宴上他做了一番演讲，说要为一个人祝酒。他说："勋爵们、女士们、先生们，我要说的这个人出生在河对面[(1)]，后来受到了全世界的喜爱，他就是查理·卓别林！"

他的一番话让我感到有些惶恐，我没想到他会这样说，尤其他开头的那些繁文缛节称呼，更让我感到拘谨。在他的感染下，我也用类似的口气说："勋爵们、女士们、先生们，我的朋友、故财政大臣——"

还没等我说下去，下面的人就开始低声嘀咕着什么。接着丘吉尔那洪亮的声音传了过来："故财政大臣，故财政大臣！这样的说法我喜欢，故财政大臣！"

我顿时明白过来，赶紧接着说："不习惯说'前财政大臣'，感觉有些别扭。"

马尔科姆·麦克唐纳邀请我和拉尔夫去见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工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晚上就在契克斯住下来。我们在去的路上遇见了他，他穿着灯笼裤，脖子上系着一条围巾，头上戴着便帽，嘴上叼着烟斗，手拄手杖，正在做保养身体的散步，高贵中带着些许幽默的神情，看起来像是一个乡绅，怎么都无法将他与工党领袖联系到一起。

那天晚上，大家一开始都有点拘谨，晚饭后，一起喝咖啡闲谈时，才变得轻松起来。我对拉姆齐·麦克唐纳说，1921年我来伦敦的时候，到处都是穷人，一些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像流浪汉一样，露宿在泰晤士河堤岸上。但是我这次来伦敦，英国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商店里货物充足，孩子们穿着干净整齐的鞋袜，那些老太太和流浪汉都不见了。这一切都是工党政府的功劳。我想知道的是，工党政府能否

对这个国家的组织结构进行重大的改变呢？

他眨了眨眼睛，带着幽默的口吻说："应该可以。但是，英国的政治中有一个矛盾现象：一旦你大权在握，立刻就会变得无计可施。"

在我离开伦敦之前的一天中午，我受邀参加约克公爵及夫人的一次便宴，席上只有公爵、公爵夫人、夫人的双亲，此外还有她的弟弟——一个十三岁左右的小家伙。过了不久，菲利普·萨逊爵士也来了。餐后公爵夫人托我和菲利普爵士把她的兄弟送回伊顿中学。

这个小家伙很安静地紧跟着菲利普爵士和我。到了学校后，两位班长陪同我们在学校附近走了一圈，后来，班长和其他几个学生带我们走进了一个卖糖果和普通茶叶的小卖部，说要请我们喝茶。公爵夫人的弟弟，还有近百名学生在外面等着我们。小卖部的楼上有一间很狭窄的屋子，我们围着一张小桌子坐下。这几个学生很周到，后来他们又问我是否要再来一杯茶时，我的一句随便应答却害苦了他们，因为我们的小主人钱不够了，只好和其他几个学生商量办法去了。

菲利普小声对我说："这可怎么办呢？他们请咱们喝茶，缺了两便士。"

最后，他们总算凑够了再叫一壶茶的钱，但是因为离上课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了，我们不得不赶快给喝完，就手忙脚乱地往校舍赶去。校长出来接待了我们，并领着我们进了一间大厅，大厅里刻着雪莱和其他许多名人的姓名。然后校长又让那两位班长领着我们进了雪莱住过的那间屋子，也是全校最神圣的地方。

我和哥哥雪尼已经很多年没有见面了，他现在已经退休了，和妻子住在尼斯，所以这次我决定从英国到尼斯去看看他。在我的记忆中，雪尼总是唠叨着一句话，说自己要是能赚到二十五万美元，就立即退休。事实上，他不但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而且还是一名杰出的喜剧演员，他拍了许多火爆的影片，其中包括《潜艇领航》、《吉星高照》、《箱中人》、《查理的姑妈》，等等，他肯定从中赚了不少钱。据我估计，他现在拥有的资产已经大大超过了二十五万美元。

那时候弗兰克·J．古尔德也在尼斯安了家，他得知我要去那儿看雪尼，就邀请我去他家做客，我答应了。

我打算先到巴黎停留两天，然后再去尼斯。因为我听说兰开夏八

童伶班的艾尔弗雷德·杰克逊正在女神剧场领班，他是从前剧团中的童伶之一。所以我决定先去巴黎，看看女神剧场。我和艾尔弗雷德见了面，他说杰克逊家族现在非常富有，已经有了八个舞蹈班，他的父亲仍旧健在，虽然已经八十岁多岁了，但仍然精神头十足，如果我想见他，在女神剧场肯定可以找到他，因为有几个戏班正在那里排练。

谈到往事，我们不禁感慨万分："真没想到啊！时间过得真快！"

他说："是啊，查理，你小时候的样子我现在还记得，你是个乖孩子。"

社会的赞扬只会暂时使你陶醉，就像蛋白牛奶酥一样，时间一久就会瘪下去。这一次我受欢迎，不代表我可以永远受到人们的喜爱。伦敦和巴黎的激情已经消逝，倦怠的感觉开始袭扰我，我需要好好休息一阵了。可是这个时候，又有人邀请我去伦敦守护神戏院，为王室作一次演出。这通知来的太突然，我来不及为此作准备，便汇去了二百英镑，没有去参加演出。这一下可是捅了马蜂窝，当局说我冒犯王室。守护神戏院经理的一纸通知竟有如女王的圣旨，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过了几个星期，第二次抨击又来了。有一天，我和朋友约好去打网球，我先到了球场。这时候，一个年轻人走到我身边自我介绍说，他是我的一个朋友的朋友。我有一个弱点，就是对新认识的人很好奇，尤其是那种善于聆听的人，这个小伙子就是这样的人，而且很有同情心。于是我便和他聊了起来，随着聊天的深入，涉及的话题也多起来。在谈到世界局势时，我悲观地表示，欧洲很可能会迎来又一场战争。

小伙子说："哼，如果再发生战争，休想指望我去战场。"

我回答："我能理解你。我对那些专给人们带来苦难的人很鄙夷，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吩咐我们去杀死什么人，去为什么事情送命。见鬼去吧，我就是不爱听人家吩咐。"

后来，和我一起打球的朋友来了，我和这个小伙子亲切地道别，还约他第二天共进晚餐，但是他并没有赴约。第二天，一个大标题出现在报纸的显要位置："查理·卓别林不是爱国者！"我这才恍然大悟，和我谈话的那个人并不是什么朋友，他原来是一位新闻记者。

报道是属实的，可是，我当时并没有允许他把我的个人看法公诸

于众。我的想法是：有人以爱国主义为幌子，残杀了六百万犹太人，你怎么能容忍这种爱国主义？也许有人说，那种事情只在德国发生过；可是，那种杀人的组织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有呀。我也许真的不是爱国主义者，但不是由于我在道德或理智上的反动，而是由于我不喜欢所谓“爱国主义”的感情。

我认为，所谓的爱国主义，大多数情况下只不过是一些地方主义的思想感情，比如赛马、打猎，吃约克郡布丁，或者吃美国牛肉饼、喝可口可乐。这些地方性的特产，如今已经世界化了。我愿意鼓吹所谓的“国家自豪感”。如果你只是尊重自己家族的传统，喜欢自己的住宅和院子，怀念自己的快乐童年，与家人和朋友很亲近，等等，我是能够理解你这种感情的。不幸的是，我本人没有真正体会过这种感情。假如我的国家遭到侵略，我一定会与大多数人一样，愿意为国家作出很大的牺牲。可是，我对祖国的爱，不会那么狂热，否则我担心自己会陷入纳粹式的思想情感中去。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才并不把“爱国主义”太当回事。如果不是因为我坚信某一政治目标，否则我不会考虑为国家牺牲自己；我更不会为某位总统、首相或独裁者而宁愿丢掉自己的生命。

两天后，我在菲利普·萨逊爵士的陪同下去孔苏埃洛·范德比尔特·鲍尔桑吃家午餐。那是在法国南部一个地方，风景迷人。一同进餐的客人当中，有一位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的身材又高又瘦，头发油黑，蓄着小胡子，看起来很容易接近。在吃饭的时候，我和他闲聊起来。

我们是从梅杰·道格拉斯写的《经济民主》一书聊起的。那位瘦长绅士脸上泛光，眼睛睁得大大的，甚至连眼白都看得清清楚楚，这让我相信，他肯定对我的某些想法很感兴趣。他似乎对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很赞同，我不妨援引孔苏埃洛·鲍尔桑那天午后所说的话：“我发现和卓别林谈话十分有趣，他那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接下来，可能是我的某些意见跟他不同，他的神情变得很失望。他是奥斯瓦德·莫斯利爵士，后来成了英国黑衫党头子。他的模样——瞳人上边露出眼白，咧开着的大嘴里露出牙齿，最然长得不是很可怕，但至少是感觉怪异的。

我还收到了埃米尔·路德维希发给我的一份电报，他说对我的《城

市之光》十分欣赏，很希望能和我见一面。他是一位作家，曾经为拿破仑、俾斯麦、巴尔扎克等人写了厚厚的传记。在法国南部，我们两人在我的旅馆里见了面。他留着很长的头发，嘴唇丰满，带有女性的某些特征，他的样子跟我想象中有很大差别。

他见到我后，一边将一片月桂树叶递给我，一边说："很多年前，在罗马有个风俗，如果一个人出了名，别人就会送给他一顶用月桂树叶编的王冠。您现在也是个成名的人，所以我将一片月桂树叶送给您。"此举有些做作，让人感觉很别扭。

没过多久，我逐渐适应了路德维希这种热情的赞扬，才发觉他这样做是为了掩盖他的羞涩。等他彻底放松后，我发现他这个人其实很聪明，也很有趣。

我问他："你写传记时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

"最基本的是态度。"他说。

"要是这样，那么，带有偏见和经过删节的记录就可以称之为传记啦。"我说。

他回答："可以这么说，在一个人的经历中，大约有百分之六十五的内容是不能写出来的，以免牵涉别人。"

在吃晚餐的时候，他问我："在你见过的所有事物中，你觉得最美的是什么？"

我毫不考虑地回答说："在我眼里最美的莫过于海伦·威尔斯打网球的动作，她的动作简洁连贯，姿势优美，给人的感觉既健康又阳光。还有一个新闻片镜头我也觉得很美，那个镜头拍的是战后不久，一个农民在佛兰德犁地，那片土地上曾经死了不计其数的人，那种美有种说不出的苍凉。"

路德维希也说了他认为最美的画面：在佛罗里达海滩上，几个穿游泳衣的漂亮姑娘坐在一辆敞篷汽车里，车子缓缓地向前行驶着，有一个坐在后挡泥板上的姑娘，用脚趾触碰着沙土，随着汽车的缓缓行驶，画出了一条丝带一样的痕迹。

我会在这本书里谈到一些与性有关的问题，这是我在前面提到过的。人类的繁殖是自然界中的重要活动之一，无论年纪大还是年纪小的男人，只要遇见一个异性，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琢磨一下他与对方之间是否会有性的可能。当然，我也不例外。但我在这方面的经验并

不多，讲不出多少新鲜事儿，更不会有什么值得渲染的内容。我只有在闲着没事时，才会忍不住想一些跟女人有关的事情。当我忙于工作的时候，是从来不想这些问题的。H．G．威尔斯曾经说过：“每个人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总会有忙完一切事务而闷得发慌的时候，这时候，就会多想一些关于性方面的问题。”

我忙完了所有的工作，在法国南部的天蓝海岸休假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特别漂亮而又散漫不羁的姑娘。我也是无拘无束的性格，所以我们两个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她将自己的事情毫不隐瞒地告诉了我，说她刚刚跟一个曾经深爱过的埃及青年结束恋情，她想忘记这段过去。虽然我跟她之间还没有建立明确的关系，但是彼此都心知肚明。我觉得自己很幸运，遇到了这样一个能够善解人意的姑娘。我每星期会给她一笔生活费，我们经常吃饭，跳舞，一起去娱乐场所。她很开朗，很漂亮，也很知情识趣。由于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我对她慢慢动了感情，一想到我要回美国，就舍不得扔下她一个人；一想到要和她分手，就觉得她很可怜；但是，有时侯她的行为也会引起我的猜疑。

一天下午，我们在俱乐部里参加茶舞，她突然将我的手紧紧拉住，原来她多次对我提过的那个埃及情人来了。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很扫兴，就带着她离开了。当我们快要到旅馆的时候，她忽然说手套忘在俱乐部了，让我先去旅馆，她回去取手套，很快就回来。我知道她是在找借口，但是我并没有多说什么，一个人回旅馆去了。过了两小时，她还没回来，我更加确定，她这次去绝不仅仅是为了一副手套。那天晚上，我约了朋友一起吃饭，眼看就到了吃饭的时间，还不见她的人影。我决定不再等她，准备自己去赴约。就在这时，她脸色苍白、头发蓬乱地回来了。

我对她说：“你不用去吃饭了，你还是回到被窝里去吧，那里既舒服又暖和。”

我肯定她是跟那个埃及情人在一起。她不停地辩解、央求，就是不肯承认有这种事，但又无法解释这么长时间的去向。我对她大吵了一阵，把她丢在了旅馆里，一个人去跟朋友吃饭了。

那天的晚餐我吃得毫无滋味，心里感觉很痛苦。回到旅馆，发现她不在。她不会已经走了吧？她走得可真快啊！我当时就慌了。当我

走进她的卧室，看见她的衣服和其他东西还在，心头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大概过了十分钟，她高高兴兴地回来了，说是去电影院了。

我很冷淡地对她说："明天我要去巴黎，现在把你的账结清，从此咱们一刀两断吧。"她没有反对我说的话，但始终不肯承认她去会了那个埃及情人。

我说："我承认我对你有一些感情，但是，因为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那么这点感情也不值得保存了。"接着我撒了个谎，说我曾跟踪她从俱乐部里出来，看到她跟那个埃及朋友到另一个旅馆里去了。没想到，被我这么一诈唬，她立即承认确实发生了这回事，接着她开始痛哭流涕地就赌咒发誓，保证以后不再和那个埃及人有任何来往。

第二天早晨，在我收拾行李的时候，她开始不停地抽泣。不一会儿，我的朋友上来说，他的车子已经在楼下等着我。她咬着食指，一边哭一边说："不要丢下我，千万不要……不要丢下我呀！"

我冷冷地问："那么你想让我怎样呢？"

她说："只要你陪我去巴黎，一到了那里，我保证再也不麻烦你了。"

她的样子真可怜，我的心软了下来。我说："这样一路上是不会愉快的，而且毫无意义，因为一到了巴黎我们就要分道扬镳了。"可她仍然坚持。于是，我们搭乘朋友的车一起去了巴黎。

车子刚刚起程的那段时间，车里的气氛是很尴尬的，她默不作声，我冷淡客气。但是一路上难免要看到我们共同感兴趣的东西，就忍不住要讨论，但是，埃及情人事件使我无法释怀，我们中间的裂痕已经无法弥合了。

我们将她直接送到旅馆，她说和我永别了，她感谢我曾经对她的好。这些话听起来有些虚假。最后，她和我握了手，装腔作势地说了一声"再见"，便消失在旅馆里。

第二天她打电话问我是否愿意陪她一起去吃午饭。我没答应。但是，我和朋友刚刚走出旅馆的大门，就看见了她，她穿着皮大衣，打扮得整整齐齐的等候着我。于是我们三个人一起用了午餐，之后，去参观位于马尔美松的约瑟芬晚年故居，拿破仑曾经将她遗弃在那里。那所房子相当美，就是在那所房子里，约瑟芬皇后洒尽了自己的眼泪。秋风萧瑟，此情此景让我们无比感伤。我忽然发现，她不见了，

后来在花园里的一个石凳上，我们发现了哭得跟泪人儿一般的她。看着她楚楚可怜的样子，我的心几乎软下来了，但是，她和埃及情人的事让我很不舒服。最后我和她在巴黎正式分手，我出发去往伦敦。

回到伦敦后，我又和威尔士亲王见了几次面。第一次见面是在比亚里茨，当时我和网球运动员科歇以及另外两个朋友在一起，在一家生意很火的酒馆里吃饭。弗内斯夫人带着亲王一起走进来。他们打算在饭后去俄罗斯俱乐部，问我是否愿意同去。

那次会面非常客套。先是互相做介绍，然后亲王殿下叫了酒，然后起来和弗内斯夫人跳舞。跳完舞后，他在我身边坐下，开始寒暄："您是美国人吧？"

"我不是美国人，是英国人。"我回答。

"是吗？那一定在美国待了很久吧？"他用惊讶的口吻说。

"我是在1910年去的美国。"

"哦，"他沉思着点了点头，"那应该是战前去的。"

"您说的没错。"

听了我的回答，他笑了笑。

谈话过程中，我跟他提到了夏利亚平准备设宴招待我的事情。亲王听说此事后，满脸孩子气地说他也想去。我说："殿下，您能去会见夏利亚平，他肯定会感到荣幸和开心。这件事就请亲王允许我去做安排吧。"

在夏利亚平的晚宴上，亲王一直陪着主人八十多岁的老母亲聊天，等到老人家去休息了，他才过来跟我们一起说说笑笑。亲王的这种随和开朗的风度让我很钦佩。

我小时候曾经在曼彻斯特待过几个月。虽然曼彻斯特有些凄凉空寂，但它对我很有吸引力，我觉得这个城市充满浪漫色彩。许是受到当地人的精神的感召，我决定趁着空闲，到那里去走走看看。

去曼彻斯特途经斯特拉特福，因为以前从来没去过，我便停留了一下，由斯特拉特福市长陪着去看了莎士比亚的故居。然后乘车去曼彻斯特。到达时间是第二天下午三点左右。那天是星期日，曼彻斯特的街上看不到一个人影，整个市区一片沉寂。见此情景，我不得不回到车上，去往布莱克本。

布莱克本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去的一个城镇，我在随剧团巡回演出

《福尔摩斯》的时候，经常到那里的一家小客栈，连吃带住，每周只收取十四先令的费用。在客栈里有个小弹子台，我在不演出时最爱在那里打弹子。我曾经和刽子手比林顿一起打过弹子，他常去那里玩。

五点整，我们到达了布莱克本。尽管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但我还是准确地找到了从前住过的那家客栈。客栈已经换了老板，可是我那个老伙伴弹子台仍旧摆在那里。我在那儿喝了一杯酒，没有人认出我来。

然后，我又摸黑来到了市场上，那是一个占地大约三英亩的广场，周围只有三四盏路灯是亮着的，整个广场充满了一种鬼魅的气息。有人在那里发表政治演讲，一群人聚在那里听着。当时政治局势不乐观，英国已经有四百万人失业，而且数目还在不断增加，但是工党提不出什么比保守党更好的办法来。

我在欧洲遍访名胜，自由自在地消磨着时光，不过是在追逐一些虚无缥缈的理想而已。我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受到了挫折，找不到生活的目标。自从有声电影问世以后，我就不知道该如何选择。虽然《城市之光》收视率很成功，赚的钱远远超过其他有声电影所赚的钱。但是，如果再拍一部无声电影的话，我就没有把握它还会这样成功。我很担心自己被新生代的电影界淘汰。也许，优秀的无声电影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在形象塑造上，有声电影更具优势。

我也考虑过，是否应该拍一部有声电影呢？如果拍有声电影，我就必须完全抛弃我流浪汉的角色。不止一个人向我提出建议，不妨让流浪汉说话。但我担心的是，只要流浪汉一开口，他就会变成另一个形象。只有当他不说话的时候，他的独特造型，以及身上的那套破烂衣服，才具有实际意义。每次想到这些，我就感到沮丧，因为我心里很清楚，一旦这个流浪汉开口说话，就意味着他永远不能达到我无声电影的标准。

因为我不敢面对这些现实，所以就给自己不断地加长假期。但是，我的内心总有一个声音在对我喊着："赶紧回好莱坞开始工作吧！"

我在英国北部的旅行结束以后，便回到了伦敦的卡尔登旅馆。当时旅馆里还住着前德国王储，他是德皇的儿子，不过我们没有会面。

有一次，我们在电梯里不期而遇，这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的笑片《从军梦》，德国王储在片子里是个丑角。想到这里，我不好意思地笑了。

我急着要订回美国的船票，这时忽然收到一封电报，是道格拉斯·梵朋克拍来的，电报称："请来圣莫里茨。为了迎接你的光临，这里将特意降一场雪。谨此恭候。道格拉斯。"于是我的计划又改变了。

电报刚刚读完，听到有人敲门，那声音有些怯怯的。我以为是侍者，就喊了一声"进来"。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门被推开后，向里面张望的是我在天蓝海岸认识的女友。我既吃惊，又有些恼火，但最后还是平静下来，用很冷淡的声音对她说："进来吧"。

接着，我和她一起去哈罗德商店添置一些生活用品，又买了滑雪装备，最后我还在邦德街一家首饰铺里给她买了一只镯子，她高兴得不得了。两天后，我们一起去了圣莫里茨见了道格拉斯。我看见他独自在那里，知道玛丽已经和他分手。虽然道格拉斯的处境跟我类似，也感觉到前途渺茫，但是我们心照不宣，绝口不提。我们一起去滑雪，让烦恼随着雪橇的滑动而消失。

我到了圣莫里茨后，特地邀请了雪尼前来。我想，反正也不急于回比弗利山，那就干脆取道远东返回加州吧。雪尼对我的提议表示赞同，打算送我到日本之后再分手。

于是，我们出发了，那不勒斯是此行第一站。在瑞士待的几天里，我和女友之间的吸引力彻底消失了，对此我们都有心理准备。一到那不勒斯，我便提出了分手。这一次，她的情绪很稳定，没有流眼泪。我想，她已经把这些事情看淡了，觉得无所谓了。我们的分手是友好的。船驶离岸边时，她在码头上学我像流浪汉那样走路。那是她留给我的最后印象。

---

(1) 兰贝斯等贫民区在泰晤士河以东，属于伦敦的东区。

第二十三章　日本之行

我之所以要去日本，是因为小泉八云的一本书，我对书里谈到的日本文化和戏剧很好奇。已经有前人写过无数有关东方各国的游记，而且全都那么引人入胜，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多啰唆了。但是，我在日本遇到了一些离奇古怪的事情，所以不得不提一提。

我们乘坐一艘日本轮船，避开了一月的凛冽寒风，驶入阳光普照的苏伊士运河。船到了亚历山大港的时候，另一批旅客上来了，有阿拉伯人，也有印度人。每日黄昏，那些阿拉伯人都要在甲板上铺好席子，面朝圣地麦加，虔诚地祈祷。我觉得，他们所代表的，是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

第二天早晨，轮船驶进红海，我们脱下“北欧人的衣服”，换上了白色的短裤和绸质的衬衫。轮船继续南行，即将抵达下一个港口时，大家都兴奋起来。日本船长冷静地宣布，明早就要抵达科伦坡了。斯里兰卡是个很有异国情调的国度，但巴厘岛和日本才是我们最向往的地方。

新加坡到了。很多榕树生长在海边，跟中国杨柳图案瓷盆上描绘的一模一样。在新加坡，那些在新世界游艺园里献技的中国演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所演的戏，大都是中国著名诗人的作品，由此可见，这些孩子们的才华是非同一般的。在那里，我看了一出要连演三个晚上的大戏，一个十五岁的姑娘担任主角，她扮演的是一个王子，嗓音高亢，具有不可思议的穿透力。第三天晚上的戏份，是全剧的高潮，在那最后一幕，我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感动。弦乐器发出如泣如诉的声音，锣鼓声响震天外，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音乐。另外，年轻王子被充军发配，即将退场时，那沙哑而嘹亮的歌唱，令人感到无比悲哀和绝望。有些时候，如果你不懂得一国的语言，反而更容易理解它的艺术，因为你会用最朴实的感觉去接纳一切。

雪尼一个劲儿地向我介绍巴厘岛，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据说，那里还没有被文化浸染，妇女全都袒胸露臂，秀色可餐。我们终于在一个清晨到达了巴厘岛。那个年代还没有海港和机场，人们乘上小木

船靠近了一个破旧的木头码头，登上了岸。

当时岛上住着美国水彩画家赫希菲尔德，他带着妻子已经来了两个月了。他们住的地方，正是墨西哥画家米格尔·科瓦尔鲁比亚斯的寓所。他们听说卓别林也到了巴厘岛，便邀请我们去做客。

几天后，音乐家兼画家沃尔特·斯皮斯也来看望我们，并共进午餐。斯皮斯在巴厘已经生活了十五年，当地土语讲得非常好。他给我们弹奏了一些钢琴曲，都是改编自巴厘音乐，听起来很有意思，与双节拍演奏的巴赫协奏曲很像。据他透露，巴厘人看不上我们的现代爵士乐，认为节奏过于迟滞，不够活泼，不如他们自己的音乐精致。他们认为莫扎特的乐曲不错，很有感情，但实际上，只有巴赫的作品真正对他们的胃口，因为巴赫的格调与节奏很像他们的音乐。

我不敢苟同他们的自信。在我看来，巴厘音乐有种冷酷无情的感觉，令人感到不安；即使那些悲哀的调子，也显得阴森可怖，流露出一种原始的兽欲。

午餐后，我们随意参观了一些庙和大杂院，看了斗鸡，参加了一些庆祝和宗教仪式。巴厘岛的神似乎都是享乐主义者，土著们之所以礼拜他们，不是出于敬畏，而是出于亲切。我曾参加过他们的一个仪式，直到凌晨五点才离开。巴厘岛人的仪式是不分昼夜的，每时每刻都可能举行。

巴厘人生性风趣，喜欢在性的问题上开玩笑，也喜欢谈一些实用的大道理，偶尔也喜欢玩弄字眼儿，这一点跟我们很相似。有一次，我想试探一下旅馆里那个年轻侍者，看他到底有多幽默，便问他：“小鸡为什么要穿过那条路呀？”

他一脸的不屑，对翻译说：“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

“你说得没错，那么，你知道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吗？”

这下他可糊涂了，结结巴巴地回答：“应该是先有鸡……哦，不对……”他把头巾向后推了推，再摇了摇头，“是先有蛋。哦，也不对。”

他拍拍脑门又想了想，最后很有把握地说：“是先有蛋。”

“那么是什么下的蛋呢？”

“是鳖下的呀，鳖是老祖宗，所有的蛋都是它下的。”

那时的巴厘简直是个天堂，岛上到处都是免费的娱乐活动。因为

当地人一年中只有四个月是下地种田的，其他八个月就靠玩乐打发时间。不过近年来，随着教育的普及，这个天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女人们将胸部遮掩起来，那些喜欢享乐的神也被遗弃，西方的神成了他们的信仰。

在去日本之前，我的日本助手小野告诉我，说日本政府将会接待我们，所有的准备工作他都已经安排好了。当轮船抵达神户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在码头上欢呼，天空盘旋着飞机，散发欢迎传单。灰暗的烟囱和码头，与连成一片的五颜六色的和服相互映衬，显示出一种很不和谐的美。所有的欢迎者都很兴奋，与我在其他地方见到的相同。日本人的种种表现，并不像传说中那样隐藏着神秘和仇恨。

日本政府为我们准备了专列，直接开往东京。沿途经过的每一站，都能看到有很多年轻姑娘，她们在站台上欢迎我们，身穿艳丽的和服，远望过去就像是一次花卉的展览。欢迎的人数越来越多，情绪也越来越高昂。到了东京，聚集在那里欢迎我们的大约有四万人。雪尼被人群拥挤得摔倒在地，要不是被及时拉起来，有可能被踩坏。

我以前总认为，是欧洲人的夸大其词才将东方描述得那么神秘。现在，我踏上了神户的土地，立即被一种说不清的神秘气息所包围。到了东京以后，这种气息就更加浓烈。我们的车在去旅馆的途中，经过一个清静的地方时，突然放慢了速度，最后停在了皇宫前面。小野扭头望着轿车后窗外面，神情显得有些焦急，然后他问我："您是否可以下车向皇宫鞠躬致敬？"

这个要求很奇怪。我问道："这是当地的习俗吗？"

当时，除了我们后边跟了两三辆汽车以外，四周一个人都没有。如果是习惯如此的话，那么应该有些人知道我要下车，所以应该有一群人等候在那里，至少是一小群人。

"是的，"他随口说，"您只要下车就可以。不鞠躬也可以。"

雪尼认为这个要求有些古怪，而且小野的神情也不对劲儿。但我们还是下了车，鞠了躬。重回车上后，小野看上去已经不那么紧张了。我发现，自从到了神户，小野就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想，也许是因为他工作得太累了，并没有多想。

当天晚上一切正常。第二天早晨，雪尼走进我的卧室，激动地控诉："我的皮包被人搜查了，文件都被动过了。太不像话啦！"

我安慰他说：“动就动呗，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无论我怎么安慰，他仍然无法平静，他说：“这件事情有些蹊跷！”

我笑他太多疑了。

不一会儿，日本政府派了一位特工来告诉我们说，无论我们去哪，都必须先让小野通知他们。雪尼坚持说这是对我们的监视，说小野肯定有不少事情瞒着我们。小野确实越来越显得忧心忡忡，这一点我也发现了。

雪尼的疑虑也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那天发生了一件怪事。小野说，一个商人要邀我到他家里去看几幅绢绘《春宫图》。我让小野转告那个人，说我对《春宫图》不感兴趣。小野很是为难：“您要是不愿意去，我就让他把画儿送到旅馆里来吧？”

“我不感兴趣，千万别让他来，别浪费他的时间。”我说。

“一两句话是很难打发走这些人的。”他踌躇着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嗯，东京这地方，有些不好惹的人。他们已经吓唬我好几天了。”

我说：“那我们去找警察。”

小野一脸无奈地摇了摇头。

第二天傍晚，我和雪尼以及小野到一家酒馆，坐在雅间里吃饭。忽然进来六个年轻人，其中一个人交叉着双臂坐在小野身边，其他五人并排站在后面一点的位置。坐在小野身边的那个人满脸怒容，用日语向小野叽里呱啦地说着什么。小野脸色惨白地听着。

我把一只手伸进了外衣口袋里，佯装里面有枪的样子，同时大声问：“你想做什么？”

小野低着头，看着他面前的餐具，小声嘟囔着：“他说，您不去看他的画，就是侮辱他的祖宗。”

我猛地站起来，一只手仍插在口袋里，狠狠地瞪着那个年轻人。“你到底想怎样？”

接着我对雪尼说：“我们走。小野，你去叫辆车。”

外面有辆汽车正等着我们，我们开车离开，直到这时才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首相的儿子犬养健先生邀请我们一起去看相扑比赛。更

神秘的事情发生了。比赛正在进行，忽然，一名随从走过来，拍了拍犬养健先生的肩膀，趴着他的耳朵悄悄说了几句话。犬养健先生对我说抱歉，要先离开一会儿处理一件急事，很快就会回来。直到相扑比赛即将结束的时候，他才面色惨白地回来，看样像是受了很大的刺激。我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他摇了摇头，突然双手掩面，说："刚才有人暗杀了我父亲。"

我们赶紧把犬养健带到我们居住的旅馆房间，给他喝了一杯白兰地，他才算平静下来，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我们。事情的经过是他母亲告诉他的。当时，首相正和妻子、女儿在屋子里，六个海军军官杀掉了门口的警卫，冲了进来。他们将首相团团围住，并用手枪对着他。首相努力和他们辩论了二十多分钟，但没能打动他们。他们沉默不语，并准备开枪。首相请求他们，希望他们不要在妻女面前杀他，这几个人答应了。于是，首相平静地带着他们到了另外一个房间。过了好久，妻子女儿听到枪声，首相被打死了。首相临死前一定是在试图说服他们，但是终究没能躲过这个噩运。

首相的儿子说，要不是当时他和我们在一起看比赛，他肯定也会跟父亲一起被杀。我们开车送他回家，看到了两小时前首相遇刺的那间屋子，地上的血迹还没有干。有许多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聚集在那里，但出于礼貌，他们都没有拍照。这些人希望我能讲几句话，我无法推辞，只得说，这是一个悲剧，无论是对首相家属和全国来说，都是惨痛的悲剧。

因为首相被杀，原来安排的首相接待我的仪式只好取消。

雪尼认为，这次暗杀也许与我们有些关联。他说："打死首相的刺客是六个人，而那天晚上到我们吃饭的酒馆里挑事的也是六个人，这绝对不是巧合。"

直到休·拜厄斯写的那部内容丰富有趣的《暗杀政府》发表以后，跟我有关的这个秘密才真相大白。原来，当时在日本有一个很猖狂的集团"黑龙会"，那次要我向皇宫鞠躬的事情就是他们指使的。下面是休·拜厄斯书中的一段文字，讲述了杀害首相的刺客的情况：

> 古贺清志是个海军中尉，这次暗杀活动就是他策划的。据他在军事法庭上供述，阴谋分子曾经预谋轰炸众议院，企图达到军

事管制的目的。他们计划，先由那些容易领到旁听证的文官混到楼上，往下扔炸弹；而武官则在门口埋伏，将那些逃出来的议员开枪打死。

还有一项更为惊人的计划，如果不是在法庭上被记录下来，简直难以置信，那就是要暗杀当时访问日本的查理·卓别林。首相曾邀请卓别林出席茶会，青年军官们认为可以乘机冲进去，将卓别林杀掉。

法官："为什么要暗杀卓别林，杀掉他有什么好处呢？"

古贺："我们相信，杀死卓别林可以挑起日美战争，这样就可以一箭双雕，因为他既是美国的红人，又是资产阶级的宠儿。"

法官："这么精心策划的阴谋，为什么后来又放弃了呢？"

古贺："因为后来有报道说，还无法确定举行茶会的事。"

法官："你们为什么要袭击首相官邸？"

古贺："将兼任政党总裁的首相推翻，也就是说，粉碎政府的核心。"

法官："你很明确地打算杀死首相吗？"

古贺："是的。不过我跟他之间并不存在私人恩怨。"

他们还供述说，之所以放弃暗杀卓别林的计划，是因为内部意见不统一，有人认为将这个喜剧演员杀掉，不一定能挑起日美战争。

我不难想象事件的经过，当暗杀分子正打算执行他们的计划时，却发现我原来并不是美国人，而是一个英国人。

日本给我留下的也不全是神秘和不开心的记忆。应该说，我在日本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快乐的。我看了歌舞伎，了解到它并不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剧种，而是古典与现代戏剧的混合。事实上，在歌舞伎中，剧情只不过是演员用来表现技巧的素材，而演员的演技才是最重要的。我发现，歌舞伎演员在演戏时，每当不能有效地运用写实手法时，他们就会干脆忽略那些手法。如果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歌舞伎的表演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比如，日本人要演出一场比剑时，对写实主义根本就不予理会。两名剑客站在舞台上，中间距离很远，他们凌空做出或劈或刺的姿势，这个在砍那个的头，那个在刺这个的腿。两人在各自的地盘上跳跃，转圈儿，姿势简直就像跳芭蕾。这样的战斗无疑是印象派风格的，斗剑的结果通过各自的姿势来表现。假如其中

某人死掉了，那么演员们又会抛弃印象主义的风格，而表现得很写实。西方的戏剧完全不同，如果我们表演比剑，会遵循写实风格，所有动作都力求真实，虽然难免有一些漏洞，但总的说来，每个动作都很小心谨慎。

日本人喜欢月光，樱花在他们眼里像是神灵一般圣洁，品茶时，他们总是那样沉静。日本人善于关注生活中某些简单的瞬间，这代表了他们的文化特点。这种文化，在西方文化的攻势之下，还能维持多久呢？这个问题很难有统一的看法。在我看来，宁静的日本文化，注定要在西方工业的烟雾中消散。

我的假期结束了。我见到了许多有趣的事情，也有许多令人懊丧的场面让我久久难忘。我看到许多霉烂的食物，堆得像山一样的货物，四周徘徊着一群群饥饿的民众，成千上万的人丢掉了工作，没有了生活来源。

在一次宴会上，我谈到自动化会减少就业的机会，有人认为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因为劳工可以去跟自动机械竞争嘛。另一个人说，经济萧条的确非常残酷，除非我们发现大量黄金，否则目前的危机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第二十四章　宝莲·高黛

离家已八个月后，在一个午后时分，我终于回到了比弗利山家里。站在屋子的中间，看着几缕金色的阳光洒进屋子，一道长长的日影铺在窗外的草坪上，显得那么安静。可我却思想混乱，茫无目标，只感到心神不安，寂寞难耐。我不知道这次回归，能不能给自己带来快乐。有种想哭的冲动。

本以为去趟欧洲会遇到一个人，她可以改变我的生活方向。可是，在我所遇到的女性中，几乎没有这样类型的。而那些符合要求的，却彼此没有好感。现在，加州对我来说就像是个墓地，没有一点儿生气。

我离开这么久，似乎已与世隔绝。我想打电话随便找一个朋友，约他们来吃晚饭，但一时间竟然发现，一个合适的人选都没有。我的经理里夫斯得知我回来了，就来看我，告诉我公司里一切都好。除了他，没有任何人来看望我。

我那幢房子太大了，我不喜欢自己在里面吃饭，于是，那晚我吩咐不必开饭，之后自己驱车去好莱坞，沿着好莱坞大街走下去。恍惚中，我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好莱坞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新兴市镇的格局：一排排的平房店铺排到很远处，陈旧的军需品商店，廉价药房，伍尔沃思和克雷斯吉连锁店，一切都带着萧条的气息，都俗不可耐。

我一边沿街行驶，一边想着：在好莱坞，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值得我留恋了，我是不是应该从此退休，将所有的东西都卖掉，到中国去隐居起来？无声电影的时代就要过去了，我也不想跟有声电影唱对台戏。

对我来说，电影制片厂就像是一潭冰冷的水，但是我不得不跳下去，因为有那么多沉闷无聊的事务需要我处理。不过，令人振奋的事情还是有的，《城市之光》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已经为我们净赚了三百万美元，现在每月也有十几万美元的进账。里夫斯希望我去好莱坞的银行见一见新上任的负责人，拉拉关系。可我已经七年没跟银行打

交道了，最终我选择不去。

德皇的孙子路易·费迪南德亲王到电影制片厂来看我，并和我一起回家享受晚餐。我们很谈得来。亲王是个机智而又风趣的人，我们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俄国革命，最后，他用一句话做了总括：“俄国革命是一出悲剧，我国革命是一个笑话。”

我回到美国后，看到了不少很神奇的事。富兰克林·罗斯福当上了总统，但美国并未如前任总统所预言的那样，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新总统发表了著名的演说——《被忘了的人》，使美国政治重新振作。他一上任，就开始用行动履行他的诺言。为了防止银行倒闭，他命令所有的银行放十天假。那段时间，全体美国人都在努力奋起。商店的经营继续采用信贷的方式，连电影院卖票都采用赊销的办法。在这紧张的十天里，罗斯福带着智囊团一刻不停，制订了新政纲领。同样的十天里，美国人民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

这一切也在影响着好莱坞的生活。优美宁静的无声电影已经退居二线，有声电影已经奠定了基础。事实上，除了包括我在内的少数几个人之外，其余无声电影的影星已经消失。电影仿佛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冷酷无情的工业生产。大得像间屋子似的摄影机，像神像般在摄影场上推来推去，一路上隆隆作响。电影制片厂的革命，主要是由配音的技术人员主导的，他们组装起了复杂的设备，收音机上缠绕着数不清的电线。一些人带着耳机，穿着奇装异服，像来自火星的勇士一样坐在那里，钓鱼竿似的传声器在他们头顶上晃来晃去，演员则在他们面前表演。一个人的四周布置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看着让人很不舒服。我对所有这一切都感到厌恶。后来这些仪器都做了改进，复杂的设备也便于携带了，摄影机被改成更易于移动的，只要拿出较少的费用就可以租用那些设备。但是，我仍旧提不起重新工作的兴致。我的脑子里依然在盘算着，我是否应该将拍电影的事忘个一干二净。我不能在好莱坞沉迷下去，也许我应当收起摊子去中国侨居，我可以在香港生活得很好。

另外，一个年轻的影评家发表的几句言论让我更加消沉。他虽然赞扬了《城市之光》，但又觉得其风格过于悲观。他认为，我应该更多采用写实主义手法。对于他的言论，当时我是默认的。不过现在看来，我当时见识有限，否则应该有很多条反驳他的理由，我可能会对

他说：所谓写实主义手法，事实上往往是假的，平淡无奇的，而且能够看出不自然的痕迹；电影艺术重要的并不是表现现实，而是通过想象力表达一定的意义。

我一直游荡了三个星期。有一天，乔·申克来电话约我到他的游艇上度周末。我对此并无兴趣，但还是接受了邀请，这是因为我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当时非常寂寞，而乔的船上往往少不了美丽的姑娘，我希望可以在美女中找到一线生机。

没想到，老天真的是眷顾我，我确实如愿以偿。我遇到了性格开朗的宝莲·高黛。一天晚上，她跟我说，前夫给她留下了五万美元，她准备把这笔钱投资到一家影片公司里。她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的文件，就等着签字了。我知道那家公司做的是滑头生意，于是强制性地阻止她不要这么做。

我说："差不多从电影创始以来，我就开始干这一行。根据我对这一行的了解，千万不要往电影里投资一分钱，如果电影是由我自己来拍，那另当别论；不过，即便是我自己拍，风险也不小。赫斯特的公司里有那么多人，分散在全国各地，美国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任何一件事，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可是即便这样，赫斯特投资在电影里的钱，还赔进去七百万美元。连他都这样，可想而知，你怎么可能想赚到钱呢？"

经我这么一说，她打消了投资电影的计划。这是我们俩交友的开始。

她刚从纽约来，对这里感到很生疏。寂寞把她和我联系在了一起。平时我们各忙各的，但是一到了周日，大家都会感到无聊空虚，便一起开车去远游。在那段日子里，我们将整个加州海岸线都跑遍了。和宝莲在一块儿，做的全是些无聊的事，比如看跑马、泡夜总会、参加各种各样的宴会，纯粹是为了消磨时间。当时我还没有制订出新的工作计划，不过，在疯狂游乐的同时，我经常会产生愧疚感，常常扪心自问：卓别林，你为什么不去工作呢？你到底在干什么？

幸运再次降临。完全是出于偶然，一件事情意外地发生了，这件事让我有了再拍一部无声电影的勇气。一天，我和宝莲去墨西哥蒂华纳看赛马，赛后，主持人请宝莲去给获胜的骑师颁奖。她立即答应了邀请。我从扩音器里听到她的声音，感到很惊讶。她是土生土长的布

鲁克林人，但居然能把肯塔基的交际花口音模仿得像模像样。毫无疑问，她是个演戏的好材料。我突发奇想，觉得她可以扮演一个街头流浪女郎。我展开想象：我扮演的流浪汉，在拥挤的囚车里邂逅了一个流浪女郎，流浪汉很有绅士风度，起身将座位让给女郎。这个情节可以作为电影中的主要段落，其他情节就此展开，这样，会有很多笑料。

记得有一次，我曾经会见纽约《世界报》的一位年轻记者。他听说我要去底特律，就给我讲了一些那里的事情：不少健康的青年人，从农村中出来，投入到城市的大工业中去，整整四五年的时间，他们被传动带等机械装置驱赶着，一刻不停，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我现在又想到了他的谈话，并确定了新的影片主题——《摩登时代》。有好多镜头应该是在工厂里，最后，流浪汉得了精神病。接下来的情节，顺其自然地发展。流浪汉病好后，被警察抓走，在一辆挤满了犯人的囚车中，遇见那个因为偷面包被捉去的流浪女郎。这个场景过后，下面就是经济萧条、罢工、暴动、失业，等等，两人身不由己地被社会的各种苦难所包围，在这个“摩登时代”里勉强填饱肚子。

拍戏时，为了节省时间，我使用了一台吃饭机器，以便工人们及时在吃饭时间也可以继续工作。为了把宝莲打扮得邋遢些，像个流浪女的样子，我在她脸上涂了几块油污，她差点儿哭出来。我开玩笑地安慰道：“这可不是油污，这就是美人痣！”

用时髦服装把一个女演员包装得光彩照人，是一件很容易办到的事情。但是，要把一个女演员打扮成卖花姑娘，又要将她俏丽动人的一面展示出来，就得伤脑筋了，我们在《城市之光》遇到过这样的难题。不过相比之下，《摩登时代》里流浪女郎的服装问题难度更大，如果处理得不够恰当，那些用于表现贫苦的补丁就会显得像戏装一样，于情于理都说不通。要想给宝莲设计出合适的服装，必须苦心孤诣，具备非凡的创造力。

《摩登时代》上映之前，报上刊登了影片的故事摘要，有几位专栏作家据此发表评论，说他们获悉该影片具有共产主义色彩。另一些影评家的说法似乎公正一些，他们说，该片既不拥护也不反对共产主义，如果打个比喻，那就是骑墙派。

影片在纽约和洛杉矶首映后，我只想着尽快远离这两座城市，越远越好。我不愿意被有关影片的报道所折磨，每次报道都让人心里七上八下：一会儿说第一个星期里观众人数打破了记录；一会儿又说第二个星期里人数略有下降。由于这样的逃避心里，我决定带上宝莲和她的母亲，一起去檀香山度假。临行前，我让公司随时与我保持联系。

我们上船是在洛杉矶，在一个大雨倾盆的天气里抵达旧金山。不过，天气并没有影响我们的情绪，我们上岸买了些东西，又回到船上。在经过仓库时，我看见一批货物上的戳印是“中国”。

“咱们到那儿去！”我斩钉截铁地说。

宝莲问：“到哪儿呀？

“中国。”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没开玩笑，咱们现在就去，否则以后就没机会去啦。”我说。

“可是我连换洗衣服都没带。”

“可以在檀香山买呀。”我说。

也许，没有任何其他方式比航海更有利于恢复你的健康，船上的日子会让你暂时抛开所有的烦恼。不过，航行总会结束的。船一抵达檀香山，我就看见了《摩登时代》的大幅广告，码头上站满了新闻记者，看上去跃跃欲试，好像要把我生吞活剥。这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

在檀香山只是短暂逗留，随即赶往日本东京。当时，日本刚刚发生了一次军事政变，几百人伤亡，鉴于此，我想这次去东京应该尽量低调，不要让人知道。船长很照顾我，帮我登记了一个假名字。所以，船到达东京时，没有人知道我来了。直到日本海关看了我的护照，才大惊小怪起来：“您来之前，怎么不通知我们呢？”我们在日本逗留的时间里，有一位政府派来的官员，始终在我们身边转悠。

从旧金山到香港的整个途中，我们几乎不和其他旅客交谈。不过，当船停靠香港，气氛一下子就热烈起来了。我和宝莲在旅途中结了婚。离开好莱坞五个月后，我们在新加坡搭了一条日本船回美国。当我们回到比弗利山家里的时候，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从电影制片厂传来：《摩登时代》已经风靡全国。

但是，我仍然被“是否应当再拍一部无声电影“的问题困扰着。整个好莱坞已经没有人拍无声电影了，我算是硕果仅存的一个。迄今为止，我是幸运的，但如果继续拍下去就不好说了，应该会有非常大的风险。可是，如果我真的去拍有声电影，也不大可能达到无声电影的水平。

宝莲由于在《摩登时代》中一炮走红，已被派拉蒙影片公司聘请去拍了几部电影。由于我总惦记着事业，导致情绪一直焦虑不安，所以也冷落了宝莲。我们结婚一年了，彼此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我当时既不能安心工作，也没有寻欢作乐的心情。在如此愁闷的状况下，我跟一个名叫蒂姆·杜兰特的朋友一起去了佩布尔海滩。我觉得，在那里我能工作得很愉快。

佩布尔海滩位于旧金山以南，相距一百多英里。那里有成群的麋鹿游荡在树林里，还有一些宽敞漂亮的大房子可供出售出租。总的看来，那是个蛮荒的地方。朽腐的树干横七竖八地倒在空地上，木虱和毒藤随处可见，还有丛生的夹竹桃，有毒的龙葵……这里景色苍凉，甚至有种阴森的感觉，似乎很适合女妖出没。一般人管它叫“十七里车道”，我管那地方叫“浪迹天涯者的家”。

我们租住的房子可以看到半英里以外的大海。房子里面很潮湿，很少有阳光照射进来，一生火就搞得满屋子里都是烟。蒂姆和佩布尔海滩上许多上流社会人物都认识，经常出去应酬，我从不跟他出去，只想安心工作。好多日子以来，我一直单独在图书室里看书查资料，累了就到花园里散散步，努力思索新的电影题材。可是，我越使劲想越想不出，最后我决定不再自寻烦恼了，也和蒂姆一起去见见我们那些邻舍。

诗人鲁滨逊·杰弗斯就在佩布尔海滩附近居住。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个朋友家里，当时我和蒂姆都在。他是个话语很少的人，我仍像往常那样高谈阔论，说了许多对当时的社会现象不满的话，主要是想活跃一下气氛。但是，无论我说什么，鲁滨逊始终不说一句话。晚会结束后，我非常后悔，觉得自己不应该一个人说那么多话，心想鲁滨逊一定对我很反感。可是我想错了，他在一星期后请我和蒂姆去吃茶点。

鲁滨逊夫妇住的房子在太平洋岸边的一块岩石上，是一个中世纪

石头城堡式的房子。房子是他们自己建的，鲁滨逊称之为“石窟”。里面最大的一个房间只有十二英尺见方。距离房子几英尺远的地方，是一个圆形石塔，塔高十八英尺，径长四英尺，样子也是中世纪风格。我觉得这种设计有点像小孩过家家。沿着狭窄的石梯走过去，便进了小圆屋子，墙上开了几个口，算作窗子，整间屋子看起来更像是一间地牢。这就是他的书房，他就是在这个书房里完成了那部《杂毛马》的。蒂姆说，只有心理上乐于早死的人，才会喜欢这种墓穴式的房子。话虽这么说，但当我看到鲁滨逊在日暮时分带着小狗出去散步，欣赏美丽的夕阳，脸上流露着宁静淡然的神情时，我敢保证，像鲁滨逊这样的人，肯定不会以死为乐的。

第二十五章　拍摄《大独裁者》

纳粹分子正在步步进逼，战争的气息又开始四下笼罩。在这个时期，我正在为宝莲写一部电影剧本，但是无论我怎么苦思冥想，却总是一点进展也没有。这个丑恶的阿道夫·希特勒正在煽起战争狂热，这时候我怎么能安心写浪漫故事或是谈爱情问题，去迎合女人呢？

亚历山大·科达在1937年就给我提过建议，说希特勒和流浪汉都留着小胡子，可以根据这种相貌的相似性，制造一些误会的情节，做一个与希特勒有关的电影故事。他还建议我同时扮演两个角色。当时，我并没有把这个建议当回事，现在我突然觉得这倒是个非常好的题材，当我扮演流浪汉的时候，我可以仍旧像从前那样不开口说话。而当我扮演希特勒时，我就可以当着一大群观众胡说八道，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可以通过戏拟的方式，结合哑剧的艺术形式，淋漓尽致地嘲笑希特勒。想好之后，我立即赶回好莱坞，怀着满腔热情，开始了剧本的创作。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才算将这篇电影故事写完，我给它命名为《大独裁者》。

故事开头讲的是，德国人为了吓倒协约国部队，准备发射大炮，号称射程达七十五英里。他们计划一炮轰平兰斯大教堂，没想到瞄歪了一点儿，只炸毁了一个公共厕所。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场上的情景，我把它作为影片的开场镜头。

宝莲前两年在派拉蒙影片公司演得很成功，这次她将在我的电影里担任角色。跟以前相比，我们之间最然陌生了一些，但彼此仍旧心平气和地保持着夫妻关系。

《大独裁者》拍到一半的时候，联美影片公司警告我说，海斯[(1)]办事处给公司发来通知，说这部片子的审查将会很麻烦。据说，英国办事处也担心反希特勒的影片不能在英国上映。但是，这部影片我拍定了，我非要嘲笑希特勒不可。假如我当时已经对德国集中营里那些恐怖的情况有所了解，我是不会拍这部片子的，因为我不会与患有屠杀狂的纳粹分子开玩笑。我当时之所以要拍《大独裁者》，只是反对他们“纯血统种族”的无稽之谈，想要嘲笑他们。我从来没有想到，他

们会犯下那样令人发指的暴行，我不敢相信，在澳大利亚野人区之外，竟然会发生那样的暴行！

在拍摄《大独裁者》期间，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经俄国来到加州，特地到我家来看我。陪同他的，是一个刚从牛津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年轻人的名字我已经记不清了，但他那天晚上说的话我仍然记得。他说："如果局势继续像德国等地那样发展，我想我的寿命还有五年就到头了。"斯塔福德爵士曾经去考察过俄国，俄国人的庞大计划让他震惊，虽然俄国人也面临着各种困难。总之，那里的一切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深，他认为战争是无法避免的了。

没过多久，更多让人懊恼的信件发到了纽约办事处，内容都是说，英国或美国绝对不可能上映这样的影片，必须停止拍摄。但是，我心意已决，必须要拍完这部电影，即使是自己租剧院也在所不惜。

《大独裁者》还没拍完，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一个让人沮丧的消息：战争已经开始，英国首先向纳粹德国宣战。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各条战线上还是沉寂一片。接着，战火突然四下蔓延开来，一个个坏消息传来：比利时被占领，马奇诺防线崩溃了，敦刻尔克遭遇惨败，法国已经沦陷，英国在苦苦抵抗。

这时候，纽约办事处突然接连发来电报，语气接近疯狂："赶快将你的影片拍完，所有的观众都在翘首以待！"他们哪里知道，拍《大独裁者》并不是那么容易，它需要大量的模型、布景和道具，光备齐这些东西就用了一年的时间。要是没有这些道具，成本起码要高上四倍。尽管如此精打细算，尽管摄影机还没动起来，五十万美元已经花光了，都是我的钱。

此时，希特勒决定攻打俄国了！这说明他真的发了疯。当时美国还没有参战，英美两国看到希特勒进攻俄国，都感到如释重负。

拍摄《大独裁者》期间，我收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信。影片拍完后，这类信更多了。无非是恫吓和威胁，声称这部电影无论在哪里放映，他们都要朝戏院里扔臭气弹，向银幕上开枪，反正会尽其所能制造混乱。起初，我想把这件事报告给警察局，但又担心这事一传出去，观众们就都不敢去看电影了。有一个朋友建议我说，不妨与码头装卸工人工会会长哈里·布里奇斯谈谈这件事。

于是我请布里奇斯到家里吃晚饭。我知道他反对纳粹，于是直言

不讳地向他说明，我拍了一部反纳粹的笑片，收到了一些恐吓信。我问他："电影首映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派二三十位码头工人来，让他们分散在观众们当中，如果纳粹分子真的过来捣乱，他们只要轻轻地跺跺脚就行，以免让那些浑蛋闹得太厉害。"

布里奇斯闻言大笑："查理，你放心，绝不会闹到那个地步！你有那么多观众呢，他们足以对付那些坏蛋，你只需要他们保护就够啦。再说，如果那些信是纳粹分子写的，他们也不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出现。"

我在纽约包了阿斯托和卡皮特两个戏院，用于最先放映《大独裁者》。先是在阿斯托戏院预映，是为新闻界举行的专场。当晚，富兰克林总统派来首席顾问哈里·霍普金斯参加，我设宴招待，饭后一起去看报界专场，赶到剧院时影片已经放映了一半。一般说来，给报界准备的笑片专场，观众会带着审视的目光观看电影，但仍然无法克制住自己发出笑声。那一次预映，他们笑得很厉害。

影片在纽约的两家剧院连续放映达十五个星期，当时，它是我所有影片中最出色的一部。影片预映一周后，《纽约时报》老板阿瑟·苏兹贝格请我参加午宴。我赶到那里，他却直接把我带上纽约时报大厦顶楼，引进了一个私人住宅。客厅里挂着巨幅照片，很多家具都是真皮的。在壁炉跟前站着一个身材魁梧、眼睛很小、表情严肃的人，他是美国前任总统胡佛先生。

苏兹贝格先生把我领到这位大人物跟前，说："总统先生，这位是查理·卓别林。"

胡佛先生笑眯眯地看着我，脸上出现了许多皱纹。他热情地说："我认识你，很多年前我们就见过面。"他竟然还记得那次会面，这让我很惊讶。那时候他好像正忙于入主白宫，为了招待新闻记者而在阿斯托旅馆设宴。我当时被离婚的事闹得心绪烦乱，于是就跟一个记者跑到宴会上去凑热闹。在那里，我聆听了胡佛先生的演讲。过后，我被介绍给胡佛先生。我好像一共只说了一句"您好"，除此之外再也没说什么。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又见到了胡佛先生，他现在和蔼地站在壁炉前。屋子里一共有十二个人，围着一张大圆桌午餐。席上充满着严肃的气氛，谈话一点也不放松。所有人都称胡佛为"总统先生"，我私下

里觉得这种称呼既不必要也不准确，毕竟他只是“前”总统。过了一会儿，我察觉到，他们请我来是有原因的。终于，苏兹贝格先生说：“总统先生，我希望您将这次去欧洲的使命给我们说明一下。”

原来，自从开战以来，欧洲的情况越来越糟糕，战争的痛苦以及对饥饿的恐慌迅速蔓延，形势已经到了水深火热的地步。所以，胡佛已经向华盛顿陈情，认为必须立即采取措施救灾。他对我们说：“诸位对这件事应该是很关心的吧！这件事不是代表任何一个政党，而是从单纯的人道主义出发。”说到这里，他向我斜瞟了一眼。

我严肃地点了点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愿意全力以赴支持这项计划！”

过了两天，华盛顿的“美国革命女儿大厅”邀请我前去，为《大独裁者》做演讲词。赶往那里之前，我要到白宫去见罗斯福总统，他说想看这部影片。我带着片子送往白宫，一走进总统的私人办公室，就听到总统的招呼：“查理，请坐！你这部影片在阿根廷给我们招来了不少麻烦呢。”整个会见中，与这部影片相关的话，他只说了一句。后来我把这件事说给朋友听，朋友用一句话做了总结：“你在白宫只是受到了接待，却没有得到拥抱。”

总统的“接待”持续了四十分钟。他敬了我几杯淡马丁尼酒，我无法推辞，全部一口气干了。后来，我好像腾云驾雾般走出了白宫。走出白宫后，我才忽然想起十点钟还要去广播。那是一次面向全国的广播，听众高达六千多万人。这么重要的演讲，可不能出糗啊。我连续淋浴了好几次，又喝了不少浓烈的黑咖啡，意识才清醒一些。

当时美国还没有参战，所以那天晚上，大厅里有不少纳粹分子。演讲一共要六分钟，我刚开始演讲，他们就大声咳嗽，毫无疑问不是真的咳嗽，而是故意捣乱。我很紧张，觉得口干舌燥。演讲到一半，我停下了，如果不喝一口水，我真的没有办法将演讲进行下去。可是大厅里连一滴水都找不到。迫不得已，我只好让六千万听众等候两分钟。直到有人用一个纸袋递了点儿水给我，我才坚持着完成了演讲。

---

(1) 海斯是指当时的美国电影摄制发行会主席威尔·哈里森·海斯。

第二十六章　参加集会演讲

在拍《大独裁者》之前，我已经意识到和宝莲的离异是无法避免的了，对此我们二人心知肚明。所以，在影片拍完后，宝莲借着回加州为派拉蒙拍电影的机会，独自回到比弗利山，而我不得不独守纽约的寓所。一两天后，我的管家弗兰克打来电话，说宝莲并没有在比弗利山的家里住下，而是收拾了她自己的东西就走了。等我回到洛杉矶，宝莲已经去了墨西哥，准备和我办理离婚手续。这次离婚，使我们这对做了八年的夫妻天各一方，我内心感到凄凉而无奈。

《大独裁者》毫无疑问已经成为美国人最喜爱的一部电影，但是，它同时也给我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我刚回到比弗利山时，报界的反应十分强烈，他们认为我擅自离开好莱坞去纽约举行影片的公映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而且不通知报界，也是故意远离民众。其实，我当时担心的是那些对《大独裁者》不怀好意的人会不等这部影片在纽约上映，就把它毁在襁褓中。我为这部影片投资了二百万美元，不能有任何闪失。在当时的美国，反纳粹的影片也有强大的敌人，这是让人无法理解的。无论我怎样解释，报界仍固守着一种敌对的态度，并开始散布流言飞语，比如编造故事，说我如何如何吝啬；还有些流言，是关于宝莲和我离婚的事情。在他们肆意中伤的同时，我的《大独裁者》在英、美两国接连多次打破了卖座记录。

《大独裁者》上演时，欧洲的战事越演越烈，美国虽然没有正式出兵，但是通过各种途径向盟国和苏联提供物资，罗斯福和希特勒的冷战态势已经很明显，纳粹分子正在陆续打入美国各类机关组织。

1941年12月，广播中传来了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日本偷袭珍珠港！

罗斯福总统立即对日宣战，很快，许多美国军队前往海外。与此同时，俄国人一面在莫斯科郊外阻挡着希特勒的大军，一面呼吁英美联军尽快开辟第二战场。罗斯福总统本人是拥护这一主张的，但是一些纳粹的同情者妄图离间美国和俄国盟友的关系，他们叫嚣：“让他们（德国和俄国）两败俱伤，然后咱们（美国）来坐收渔人之

利！”试图打乱美国国会和政府开辟第二战场的决心。广播中，每天都报有俄国人的战况，伤亡数目惊人，幸运的是，纳粹的战车仍旧滞留在莫斯科的郊外。

就在这个时候，我惹了一个大麻烦。一天，我突然接到驻旧金山的俄国难民救济委员会主席的电话，他说美国驻俄大使约瑟·E．戴维斯先生患了急性喉炎，问我是否可以去代替大使先生做一次发言。虽然丝毫没有精神准备，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大会在第二天举行，我连夜赶往旧金山，并于第二天上午八点抵达。

宽大的会议厅座无虚席，主席台就坐的是几位美国海军将军，还有旧金山市长罗西。排在我前面的几篇演讲，措辞都很谨慎，态度模棱两可。市长罗西说：“我们必须承认，俄国人是我们的同盟。”但丝毫不提俄国人的英勇抵抗，也不称赞他们的浴血奋战，要知道，当时的俄国人以极大的牺牲精神，苦苦抵挡着近两百个杀气腾腾的纳粹师。前几个演讲者的小心谨慎，让我觉得，我们对自己的同盟者并不真诚，也不全力以赴。这无疑是让我无法容忍的。

会议开始前，委员会主席特意关照我，要我尽可能多讲，最好能凑足一小时。我顿时呆住了，我本以为最多谈上四分钟就行了。等我听了那些政客们软弱无力的发言后，我不禁怒火中烧。我拿起筵席座位名片，在后面写了四条演讲提纲。在紧张的心情中，我听到大会主持人念起了我的名字。

我打了一条黑领带，穿着一件黑色的礼服，缓步上台。台下响起了一片掌声，这给了我信心，也让我稍加镇定。等掌声停下来，我说了一句：“同志们！”引来一片哄堂大笑。笑声过后，我斩钉截铁地说到：“我想我没把词儿说错，我就是要说‘同志们’。”又是一阵大笑，接着又是一片掌声。我严肃地说：“今天晚上这里有许多俄国朋友，此时此刻，你们的同胞正在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所以，称你们为同志是我的荣幸，也是你们应得的权利。”又是一片掌声，很多参会者都站了起来。

我又想起亲纳粹分子胡扯的“让他们两败俱伤”那句话，我不禁激动起来，于是我改变了口气，说：“我虽然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但我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共产党和我们这些普通人没什么不同之处，他们如果缺了胳膊或是断了腿，也会像我们一样感到疼痛，也同样会送

命。共产党人的母亲也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母亲一样，当她们听到自己的儿子一去不返的消息时，也会痛哭。这一切，我想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会知道。眼下，俄国就有很多母亲在痛哭，她们的儿子正在前线，随时准备牺牲……”

我一口气说了四十分钟，我谈到罗斯福总统，回忆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募购战时公债时发表的演讲，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台下的听众们时而大笑时而鼓掌。

我最后说：“现在又打仗了。我为什么在这里发表讲话呢？是为了战时俄国难民的救济工作。”我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钱可以帮助他们，但是，他们需要的难道仅仅是钱吗？要知道，就在现在，同盟国有二百万军队驻扎在北爱尔兰，整天无所事事；可是俄国人呢？他们单独对抗着大约二百个纳粹师！”

大厅里鸦雀无声，大家都渴望着我的结论。

“俄国人，”我用强调的语气大声说，“是美国人民的盟友！他们正在用鲜血捍卫他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捍卫着我们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美国人愿意战斗，斯大林元帅为此提出了邀请，罗斯福总统也发出了号召。所以，让我们现在就开辟第二战场吧！”

台下响起了欢呼声和掌声，持续了七分钟之久。我觉得那是因为我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他们不需要我再往下说了，全都不停地跺起脚来，并把帽子扔到空中。我有点担心，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是不是过于极端了呢？

这次演讲之后，并没有出现我所担心的不良反应，所以我又参加了几次公开的集会并发表演说，国内的舆论也渐渐一致起来。我从上一段婚姻的郁闷结局中渐渐走了出来，生活暂时平静了，但对于我来说，这只是一场暴风雨来袭之前的短暂的宁静。

果不其然，麻烦再次上门，不过这一次和上次完全不同。那是一个星期天，我和蒂姆·杜兰特打完网球，蒂姆对我说，他与一位名叫琼·芭莉的年轻姑娘有一个约会，她是保罗·格蒂的女友，刚从墨西哥城来到美国。由于芭莉小姐带着一位姑娘一起参加蒂姆的晚宴，所以蒂姆问我是否愿意同去，再说，芭莉小姐以前曾经表示很想见我。我没多想，就和蒂姆前往珀林诺酒馆。芭莉小姐很活泼，谈话也很有趣，我们四个人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

等到了下一个星期天，我又邀请了一些朋友来我家打网球，蒂姆又把芭莉小姐带来了。晚上我请蒂姆和芭莉到罗曼诺夫酒馆吃晚餐，经过两次接触，我和芭莉小姐的了解更进了一层。第二天早晨，芭莉独自一人来看我，故作神秘地问我是否可以陪她吃午餐。我那天正计划到圣巴巴拉参加一个拍卖活动，于是我建议她和我一块儿去，我们可以共进午餐，然后去拍卖现场。那天我在拍卖场上还算顺利，把两件藏品收入囊中。

芭莉小姐二十二岁，身材颀长，是个漂亮的姑娘，她的胸部非常丰满，坐在我的副驾驶座位上，穿着一套领子极低的裙装，显得妩媚动人。我的情欲和猎奇心被激发起来了。在回洛杉矶的路上，她说她已经和男友保罗·格蒂吵翻了，想在第二天晚上回纽约去。然后她又委婉地表示，如果我要留下她的话，她可以考虑留下来，不去别的地方了。

芭莉的这番话让我起了疑心，因为她的想法来得太突然，没有任何先兆，从情理上也说不过去。于是我很坦率地跟她说明，我不希望她因为我的原因而选择留下。然后，我径直把她送到她的公寓前面，向她挥手道别。

让我没想到的是，一两天后她打来电话，说她已经决定留下了，并希望我当天晚上去看她。她坚决的态度让她达到了目的，我不否认她对我的吸引力，我当晚去了她的公寓。从那以后，我经常和她约会，芭莉变成了我的非正式女友。

我和芭莉相处的日子大多是愉快的，但是她的某些古怪的做派和行为方式令人无所适从。经常的，她连个电话都不打，就在深夜突然来到我家，然后她又可能连续一个星期不露面。我为此暗自担心，但是只要她一来到我身边，看到她乐呵呵的样子，我又觉得自己多虑了，对她的不安情绪也就随之消失。

一天，在与塞德里克·哈德威克爵士和辛克莱·刘易斯一起用餐的时候，刘易斯提到了一出叫《梦里人生》的戏，塞德里克曾担任主演，而剧中的女主角布里奇特堪称现代版的圣女贞德。刘易斯建议，可以将这出戏拍成电影，肯定会精彩。我听后很感兴趣，于是向塞德里克要了这出戏的剧本来看。

芭莉来我这里吃晚饭，我向她谈起了《梦里人生》。她说她看

过，真希望有机会出演布里奇特这个角色。我起初没有把她说的话当真，当天晚上她拿起剧本朗读了几句台词，我听了大感意外，台词念得非常生动，音调中还恰到好处地带着点爱尔兰口音。我喜出望外，给她做了一次表情测验，看她是否适合出镜，测验的结果非常乐观。

芭莉的表现让我对她刮目相看，那些古怪举动引起的疑虑全部烟消云散，我认为自己在无意中发现了影坛的未来之星。我送她到马克斯·莱因哈特的戏剧学校去学习，让她多掌握些表演技能。这之后，芭莉忙于上课，我也难得和她相会。为了改编剧本，我和塞德里克联系，在他的帮助下，我用两万五千美元买下了电影改编权。随后我和芭莉签了合同，每周付给她二百五十美元。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一直专心地写作电影剧本。但是古怪的事情接连发生，芭莉总是莫名其妙地喝得大醉，开着她那辆凯迪拉克汽车在深夜里横冲直撞地跑来找我，我只好让我的司机送她回家。有一次，她酒后开车出了事故，把车撞坏，随手将车扔在事故现场扬长而去。她当时已经是我的电影制片厂的签约演员，所以我很担心，如果她因酒醉开车被警察传讯，那就会牵连到我的公司，引起不必要的流言飞语。我嘱咐了她很多次，但她丝毫不知悔改，到后来她变本加厉，经常深更半夜给我打电话，或者直接过来敲门，我如果不接她的电话，也不给她开门，她会砸碎玻璃跳进来。一到夜里，我就有世界末日到来的恐怖感。

我终于发现，她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去莱因哈特的学校上课了。我质问她为什么不去上表演课，她就说她不想做演员了。她还说，只要我给她母女俩付旅费，再给她五千美元，她就同意取消那份合同，回纽约去。芭莉现在已经是个烫手山芋了，她的要求我是求之不得。于是，我立刻同意了她的条件，付了她们母女的旅费，又给了她五千美元，很高兴地打发她们走了。后来，她有所悔改，但我也只是给了她一些道义上的经济支持。芭莉彻底远离了我的生活轨迹。

芭莉拍电影的事就像海市蜃楼，壮丽地登场，迅速地破灭。但是，对于买下《梦里人生》的改编权这件事，我并没有后悔。因为它的电影剧本我差不多快完成了，我自认为这个剧本很好，现在只需要重新寻找新的女主角。与此同时，《凡尔杜先生》这个剧本也进入了我的工作日程。

第二十七章　认识乌娜

一天，我在比弗利山的家中思考《梦里人生》电影剧本的细节，好莱坞电影演员经纪人米娜·华莱士小姐打来了一个电话。正是这个电话，给我带来了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华莱士小姐说，她有一个纽约来的委托人，也许适合担任《梦里人生》的女主角布里奇特。我在电话里询问这个人的详细情况。华莱士说，这个委托人叫乌娜·奥尼尔，她是著名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女儿。我没有和尤金·奥尼尔先生打过交道，只知道他的剧本风格一般都很严肃。这无疑让他的女儿在我心里留下了灰暗的印象。于是，我直截了当地问华莱士小姐："她会不会演戏？"

"她曾经参加过一个剧团在东部的夏季演出，有一点儿演戏的经验。你最好是亲自面试一下，看她能不能符合你的要求，"她说，"如果你不愿意用面试这种形式，那你就去我家吃晚饭，我让她也去，你再考查她。"

冥冥之中的一股力量促使我提前动身，到达华莱士家的时间比约定的时间早了不少。起居室的火炉旁边，坐着一个年轻的姑娘。因为华莱士小姐还没有回来，我就主动向她介绍了自己，并说她大概就是乌娜·奥尼尔小姐。她有些羞涩地笑了笑，她的样子和神态跟我想象的完全相反。她清秀而又温柔娴静，有一种动人心魄的美。在等候女主人回来的这段时间里，我和乌娜就坐在那里闲谈。

等华莱士小姐回来后，又为我们正式地做了介绍。当晚，我和华莱士小姐、奥尼尔小姐、蒂姆·杜兰特一起吃了晚饭。吃饭时，我们没有谈到业务，只是偶尔也会涉及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当我说到《梦里人生》的女主人公非常年轻时，华莱士小姐立刻回答说："奥尼尔小姐才刚过十七岁。"这让我非常失望。布里奇特这个角色虽然是一个很年轻的姑娘，但她却有着相当复杂的性格，所以我希望扮演她的人，是一个年龄较大、社会阅历深厚的女演员，而不是像奥尼尔小姐这样年轻、单纯的女孩。一想到这里，我不得不暂时打消聘用乌娜的念头。

没过几天，华莱士小姐在电话里问我怎么处理奥尼尔小姐的事，因为福克斯电影公司也有意雇用她。我没再犹豫，立即答应和她签订了合同。我和乌娜之间是天作之合，从认识她的那天，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就开始了。到现在，这种生活已经持续有二十多年了，我希望我们的日子能够永远这么延续下去。

乌娜身上蕴涵着与她的年龄不相称的幽默和宽容。自从认识了乌娜之后，我才发现了这一点，并常常因此而惊奇。她的善解人意，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让我不可自拔地爱上了她。虽然她那时才刚满十八岁，但我并不担心乌娜会像同龄的姑娘那么善变。起初我也是有顾虑的，因为我们年龄相差太大，我怕我们不能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但是，乌娜绝对是一个例外。她柔弱的身体内有一颗很坚定的心，一旦决定下来，就不会再反悔。我们商量好了，等拍完《梦里人生》之后，我们就马上结婚。

那时我已写完电影剧本的初稿，并开始筹备电影的拍摄工作。如果我能把乌娜那些特有的动人之处通过银幕展现出来，那么《梦里人生》肯定是一部不同凡响的佳作。

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很久不见的芭莉又闯进了我的生活。她在电话里无耻地对我的管家说，她现在身无分文，而且怀有三个月的身孕。她怀孕的事肯定是与我无关，我认为她是想敲诈我，于是吩咐管家说，如果她再来我家胡闹，就去报警。第二天，芭莉果然来了，然后高高兴兴地围着屋子和花园转了好几圈。我没有想到芭莉这次是有备而来，她受到高人的指点，故意惹我去报警，好就此把事情上升到一个她所希望的层级，我没有看破这一点，吩咐管家打电话报告了警察。

芭莉的计划成功了，没过几小时，报纸上就到处都是我的绯闻了，说什么芭莉肚子里的孩子的父亲卓别林抛弃了她，让她无依无靠地流落街头，而且还让警察抓她。我还没从此事对乌娜和她家人影响的担忧中解脱出来，一星期后，芭莉又以遗弃罪控诉了我。在这之后，我找到我的律师劳埃德·赖特，直言我已有两年不曾和这个女人发生过任何关系。

赖特建议我先暂停拍摄电影《梦里人生》，并劝我让乌娜先回纽约避避风头。为此，我和乌娜郑重地谈了一次，我们一致决定不准备

逃避，因为这样反而会让芭莉的阴谋得逞。我们之前既然已经谈到结婚，就干脆马上结婚，用结婚来反击一切谣言。

我们计划在距离圣巴巴拉十五英里之遥的卡平特里亚小村举行婚礼，婚礼前我们必须先到圣巴巴拉的镇公所去登记注册，领取结婚许可证。我们特意选择了一大早去注册，那时镇上还是静悄悄的。从内部消息得知，注册登记的男女中如果有一个是知名人士，管理登记的人员就会按动桌子底下的按钮，通知记者。所以，一大早行动可以最大可能地躲避记者的采访、拍照。我先站在镇公所外面，让乌娜进去办理一般的登记事项。工作人员记下了乌娜的姓名和年龄，然后问："新郎呢？"

这时，我走了进去。工作人员马上说："啊，是卓别林先生，真是想不到呀！"说着，他的一只手伸到了柜台底下。我们紧催他办理手续，他磨蹭了半天，但实在没法拖延更长的时间，最后不得不把许可证发给了我们。我们迅速离开镇公所，刚登上汽车，记者们的车已经驶进了院子。我们就像亡命逃窜的罪犯驾车飞奔，一阵风似地左拐右闪。汽车不时发出尖厉的刹车声，最终带着我们离开了静寂的圣巴巴拉街。最后，我和乌娜成功地甩掉了新闻记者，秘密到达卡平特里亚村，在那里举行了婚礼。

我们没有选择蜜月旅行，而是在圣巴巴拉租了一幢房子，准备在那里隐秘地过两个月的平静生活，以躲避媒体的狂轰滥炸。记者们根本不知道我在哪里，所以只要我们不理睬报纸上的无聊编造，生活还是安静的。只是门铃成了我们的梦魇，只要它一响，我们就会吓得跳起来。

我们每天傍晚都会去乡间的小路散步，只是不敢走太远，以免被人认出来。生活的节奏放慢了，身体得到了休养，可是内心却很挣扎，尤其是想到自己被很多的人痛恨，这其中还包括乌娜的父亲，拍电影的计划也无限期推迟。乌娜看到我愁闷的样子，总是想办法逗我高兴，读小说给我听。总体来说，在圣巴巴拉的两个月是浪漫而又有情趣的，尽管有时还会焦急和失望。

我们的蜜月假期很快就结束了。我刚回到洛杉矶，就从一个在美国最高法院工作的朋友墨菲那里得到了恼人的消息。他向我透露，芭莉起诉我的案子可能要开庭了，有一些政客希望通过此案把我彻底搞

臭。墨菲法官在信里建议我最好是请一个名气不大、地位不高的律师，千万不要请一个收费昂贵的大律师，因为这样会让陪审团认为我心虚。

由于极端焦虑，我没有听从这条建议，而是聘请了当时的大律师吉斯勒。这时，芭莉怀的孩子已经出生，并可以接受验血了。之前，根据我们双方签订的协议，我支付给她两万五千美元，她同意和孩子一起验血。我们选择了一个私人医院，芭莉、她的孩子和我都验了血。

吉斯勒第一时间拿到了验血报告，他声音颤抖地说："查理，血型鉴定证明，你不可能是孩子的父亲！"

"真是善有善报啊！"我激动地说。

虽然血型鉴定的结果让那些不怀好意的政客大失所望，但是他们坚持在遗弃问题上继续起诉。审判的日子终于到来，吉斯勒和我准时在九点五十分在联邦大厦外面会齐，然后一起去出庭。

我们走进二楼的法庭时，却没有引起什么骚动，这令我很奇怪。事实上，那些新闻记者已经不关注我了，他们可能认为我在这场官司中必输无疑。

吉斯勒的桌子上摆着一枝铅笔和几张纸，这些东西是用来做审讯记录用的。我不愿意呆坐那里无所事事，就信手拿起纸笔画起画儿来。吉斯勒见状，马上向我走了过来。

"查理，不能画！"他悄声说，一面夺过那张纸，撕了它，"这张画要是被记者们拿去，他们就会进行心里分析，然后推测出各种可能的结论。"

我画的只是乡间的一条河和一座小桥。我小时候就喜欢画这样的东西，天晓得这帮记者能拿它得出什么结论来。

审判室里气氛紧张，所有的人都正襟危坐。书记拿起那个小木槌，敲了三下，宣布开庭。他们一共向我提出了四款控诉，而这些罪名分明就是他们任意罗织的，并控告我侵犯了一个公民的权利。如果罪名成立，我必须服刑二十年。吉斯勒首先要求法庭对四款控诉不予受理。

确定陪审员的人选是个力气活，前后共花了两天的时间，从二十四位备选的陪审员中选出十二位，控辩两方各有权否决对方选出的六

位人选。陪审员都要受到双方仔细的盘询和严格的核查，以便做到尽量的公正和公平。

在选第九位陪审员时，一个女人走进了陪审员席。吉斯勒顿时说："我不喜欢她。"他重复说："我不喜欢她那种古怪的神态。"

在她回答问题时，调查员递了一张字条给吉斯勒。"不出我的意料，"他看完了字条悄声儿说："她是《洛杉矶时报》记者！咱们必须去掉她！你看，对方接受了她，接受得也太快了。"

我当时感觉这位女记者正在想什么心事，可是我又没戴眼镜，一点儿也看不清楚她的脸。

"倒霉！"吉斯勒说，"咱们只剩下两次否决权了，还是暂时留下她吧。"正如他所说，我们后来不得不用掉最后的两次否决权，排除两个显然对我们存有偏见的人，于是我们只好接受了这位女记者，这好像都是上天的安排。

法庭上，双方的律师大谈法律名词，我觉得他们是在做和我丝毫不相关的游戏。尽管对方所举的罪状听上去十分荒谬，但是我心里却在不停地嘀咕，担心万一局势难以控制，我会糊里糊涂地被判入狱。

审讯持续了好几天，芭莉的前男友保罗·格蒂先生，以及两个德国青年也出庭作证。保罗·格蒂承认，他从前就和芭莉相好，并且给过她钱。审讯也证实，芭莉曾经在一个德国青年的寓所里留宿一晚，这个德国小伙子承认了这件事。

案情终于审讯完毕了。陪审团决定用一个半小时来做出裁决，双方律师一致同意了这个决定。我无法想象陪审团竟然会用这么长的时间来决定一件如此明了的事情。我想要看看那位女记者的表情，借机判断她对此案的态度，但她的脸偏向了一边。当陪审员都出去做集体裁决时，她目不斜视地随着一队人走了出去。

吉斯勒和我一起走出了审判室。他悄悄地对我说："直到法庭做出裁决，我们都不能离开这里，"然后，他又非常乐观地说，"走，到外边去，坐在栏杆上晒晒太阳。"这几句话很微妙，让我感到身上压着一股阴森可怕的力量，让我怎么也逃不出法律的手掌心。

这时是下午一点半，我认为结果二十分钟以后就可以出来了。但是，没想到一等就等了将近三个小时，那真是让人坐立不安的漫长等待。

最后，连吉斯勒也着急了，他看着表说："四点钟了，怎么耽搁了这么久呢？"

尽管心急如焚，我们不得不开始冷静地讨论，案件中的哪几点会使他们耽搁这么多时间。

四点四十五分，铃声响了，陪审团已经做好了裁决。我的心"咚咚"直跳。吉斯勒陪我走进大厦时，悄悄地对我说："不管是什么，你都不能流露出任何情感。"

审判室里坐满了人，气氛十分压抑。陪审长把一份文件递给了书记。吉斯勒脑袋耷拉着坐在那儿，悄悄地嘟哝："如果被判有罪，那可是闻所未闻的最大冤案！"

在极度的沉寂中，书记开始宣读那份文件："查尔斯·卓别林，第337068号刑事案……控方第一款指控——"读到这里，书记官停顿了好半晌，然后才接着说，"不成立，现宣判被告无罪！"

人们发出一阵惊呼，但又逐渐安静下来，以便书记继续往下宣示。

"控方第二款指控——不成立！"

听众一时大乱起来，很多人都绕过隔开席位的栏杆，过来拥抱我、祝贺我。这时，法官和我说："卓别林先生，您现在没事了，以后也希望您不会再来这里。"说罢，他从座位上伸出手来，向我表示祝贺。吉斯勒小声地说："去跟陪审员握握手吧。"

我走近陪审团，那个被吉斯勒怀疑的女记者主动站起身来，也伸手向我表示祝贺。直到现在，我才有机会第一次仔细看她的脸。她长得很美，一看就是那种知书达理的人。她笑着对我说："查理，一切都非常好，这里仍然是一片充满自由的乐土。"

她的话无疑让我很震撼，我一时说不出话来，只能笑着点头示意。她接下去说："透过陪审员室的窗子可以看到外面。我看见您在来回地踱步，真想对您说别着急。就因为有一个人反对，我们才耽搁了那么久，不然我们十分钟内就可以做出决定了。"

听了她这些关怀之词，我感动地直想落泪，但我只是苦笑了几声，只是向她道了谢。

乌娜当时已经怀有四个月的身孕。我在等候宣判结果时，她正在家里。宣判结果通过广播传出去时，她正一个人坐在草坪上。我被宣

判无罪的消息让她激动地晕了过去。

我和乌娜婚后不久，她就表示不想做演员或明星。这让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我终于拥有了一个恋家的妻子，而不是一个热衷于抛头露面地出风头的女人。于是，我放弃了拍摄《梦里人生》的计划，开始编写《凡尔杜先生》的剧本。我后来常常想，电影界可能损失了一个优秀的喜剧演员（指乌娜），但是让一个更优秀的喜剧演员（指我本人）更加健康和长寿。

记得在这个轰动一时的案子开庭审理之前，我和乌娜去了比弗利山的一家珠宝店，修理她的梳妆盒。在等候的时候，我们去看店里展示的一些珠宝首饰。我们同时看中了一只镶着钻石和红宝石的精致手镯，但是乌娜嫌价钱太贵，我对店主说，我们再考虑考虑。等我们离开那家店，一坐上车，我就神情紧张地说：“亲爱的，开快点儿，越快越好！”说着，我就把一只手放进口袋，掏出了那只钻石和红宝石的镯子，说：“趁店员不注意，我把它拿来了。”

乌娜脸色惨白地说：“你不该拿的！”她把车往前开了一段，然后拐进了一条小街，靠路边停了下来。

“想想办法！……你不该拿的呀！”她说。

“可现在也不能送回去呀。”我说。这时，我再也装不下去了，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然后告诉她我刚才是在跟她开玩笑。其实，我趁她看其他首饰的时候，偷偷买下了那只手镯。

“可是你，以为我是偷来的，但是又想把它留下，哪怕是做一个从犯！”我取笑她说。

“我是不想再让你惹麻烦。”她微笑着说。

第二十八章　《凡尔杜先生》

我被芭莉起诉的事件反复折磨、痛苦不堪的日子里，许多好朋友来安慰我，他们想尽办法让我能开心起来。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是个剪着短头发的精力充沛的人，我经常和他在聚会中碰面，他总是玩世不恭地叼着一支雪茄。我把《凡尔杜先生》剧本拿给他看，他翻了翻，然后只说了一句话：“哦，亲爱的查理，您写了一部颇有中国风味的电影剧本。”

在一次晚宴上，我问莱昂·福伊希特万格：“你对美国的政局怎么看？”

他突发奇想地说：“查理，你看看，这些事很有意思：我在柏林盖好了新房子，结果希特勒掌握了政权，我不得不搬走了；然后呢，我刚在巴黎布置好我的公寓，纳粹军队又开进了巴黎，我又被迫搬走；现在，我刚刚在美国圣莫尼卡买了一幢房子。”说到这里，他耸了耸肩，无奈地笑了。

由于我不得不放弃《梦里人生》这个剧本，我一时觉得自己的事业被浓雾笼罩，前途难测，但我始终坚信一点：只要我能接着拍出一部精彩、卖座的影片，一切迷雾和问题都会烟消云散。抱着这样的信念，我终于编写完了《凡尔杜先生》。这个剧本的编写工作断断续续，前后花了我两年的时间，但到了拍摄的时候，却非常顺畅，只用了三个月，打破了我拍片的速度记录。随后，我就兴冲冲地把电影剧本寄给了布林先生的办事处，请他们审查。很快我就收到了答复，可结果却出乎我的意料：他们说我的剧本应当全部禁映。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当头棒喝。

布林办事处是电影联合会自己成立的一个审查机构，实际上归道德联合会管辖。我认为，审查工作的确是有必要的，但审查应该灵活一些，不能刻板得像教条，在评判时不应只看到题材，还要看它是否有高尚的情趣、深刻的生活哲理，以及细腻的手法。

萧伯纳说得好，你可以潇洒地往坏人的腮帮子上揍一拳，但却仍然无法解决生活中的所有问题。

在这里，我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故事梗概。凡尔杜是一个在银行工作的小职员，他在经济大萧条期间丢了工作，就剑走偏锋，专门去找一些老处女，和她们结婚，然后谋财害命。他的发妻是一个可怜又老实的残疾人，和他们的小儿子住在乡下，她对丈夫干的这些罪恶勾当一无所知。凡尔杜每次害死一个女人，就会像一个在外辛勤工作了一天的小职员那样回到家里。事实上，他有着既邪恶又善良的双重性格。他在给花草树木修剪枝条时，舍不得弄死一条虫子；可是同时，他又把被他杀害的女人一个接一个地投进林子深处的一个焚化炉。乍一看，这个故事有些暴力的成分，但都被我巧妙地处理为冷幽默和辛辣的讽刺，电影的主题是对社会问题的揭露和抨击。

负责审查电影的工作人员寄了一封长长的信给我，以解释他们禁映这部影片的原因。下面是我节选的一些语句："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骗子如何诱骗妇女去和他非法结婚，然后骗取她们的钱财的故事。剧本里有些地方隐含了对淫乱的描绘，我们认为那是不可取的……我们且不去计较那些在概念和含意上反社会制度的部分，光是戏中充斥的凡尔杜的观点，我们就无法接受。在我们看来，那些行为只不过是一出'屠杀的喜剧'。"

为此，他们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反对意见。为了举例说明，我从剧本中摘引了一两页有关莉迪亚的内容。莉迪亚也是被凡尔杜欺骗的女人之一，那天晚上，他正要向她下毒手。

〔莉迪亚走进光线朦胧的门厅，关了灯，向她的卧室走去。这时，凡尔杜在满月清辉的照耀下，慢腾腾地向门厅尽头的窗户走去。〕

凡尔杜（低声说）：真是太美啦……是在爱恋恩迪米昂吗？

莉迪亚（从卧室内传来）：你说什么？

凡尔杜（迷茫地说）：亲爱的，我说的是恩迪米昂，他是个被月亮迷住的美少年……

莉迪亚：行啦，别再想什么美少年啦，快来睡觉吧。

凡尔杜：好，亲爱的……我们踏着那软绵绵的落红。

（他走进莉迪亚的卧室。门厅里空荡荡的，在月光的照射下半明半暗。）

凡尔杜（从莉迪亚卧室中传来）：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灿烂

的月光！……这色迷迷的月亮。

莉迪亚：色迷迷的月亮？哈哈，瞧瞧你！真是一个傻蛋儿……哈哈哈！色迷迷的月亮！

〔音乐声迅速加大，直到高得可怕。接着，镜头渐渐隐去。等到镜头再现时，场景已经切换到了第二天早晨。过道仍旧是那条过道，不过那里此刻已经布满了阳光。这时，凡尔杜哼着小曲从莉迪亚的卧室里走了出来。〕

在审查人员看来，以上场景有很多不妥之处："请将莉迪亚说的这一句：'行啦，别再想什么美少年啦，快来睡觉吧'，改为'……去睡觉吧'。以上的动作，演员表演时应避免让观众有一种不好的感觉，即认为凡尔杜和莉迪亚这对男女即将颠鸾倒凤、声色犬马；另外，还应该删除'色迷迷的月亮'这一重复出现的句子；还有，还要改动'第二天早晨，凡尔杜哼着小曲从他妻子的卧室里走出来'这个动作，以免让人觉得他充满了邪念。"

另外，凡尔杜和他在深夜遇见的一个姑娘的对话，也是他们反对的一处。因为，审查人员认为，根据剧情描绘，那个姑娘是一个招揽顾客的妓女，因此该段也应该删除。

其他的一些意见，是反对一些镜头和一些零星动作的。比如：

"不必特意用'前面和后面奇形怪状的曲线'这样的词来描写那个中年女人，这是很庸俗的手法。"

"形容那些歌女的服装或舞步的用词，有些不堪入目；更不能把吊袜带以上的那一截光腿拍出来。"

"不能用类似'搔她屁股'这样的话。"

"镜头中不应描写或暗示浴室中的那些用品，否则画面会充满欲念。"

"应全部删除或改动凡尔杜说的'淫荡'这句台词。"

审查人员的这封长信，让我郁闷之极。好在这封信的结尾还是给我留了一线生机，信中说，审查人非常乐意和我当面讨论这件事，希望我的电影在符合电影法规的同时，又不会严重损害到娱乐的价值。于是，我马上驱车前往布林办事处。接待我的，是布林先生的助手，

他是个高大威猛、表情严肃的年轻人，说话直来直去的，就像一个盛气凌人的警察在盘问犯罪嫌疑犯。

“你反对天主教的原因是什么？”他问。

“你的这个问题让我摸不着头脑，难道我的剧本里有违反教义的内容？”我反问他。

“这里，”说着，他把我的剧本向桌上一扔，一页页地翻着，“也就是牢房里的那个镜头。罪犯凡尔杜对神父说：‘我的好人，您有什么需要效劳的吗？’”

“这有什么问题？神父本来就是一位好人嘛。”

“你这是在无理取闹。”他满脸轻蔑地摆着手说。

“说一个人是好人，我不认为这有任何无理取闹的意思，年轻人。”我针锋相对地回答。

我们就这样互不退让地讨论着，我突然觉得自己就像以智者著称的萧伯纳。

“你会用‘好人’来称呼一位传教士吗？不会的，你会叫他‘神父’。”

“好吧，那我就把‘好人’改成‘神父’。”我说。

“再看看这里，”他指着另一页说，“神父说：‘我到这里，是让你向上帝请求原谅。’但是凡尔杜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我和上帝倒能和平相处，可我和人类却冲突不断。’你让凡尔杜这样说，简直是在亵渎神灵。”

“你有你的看法，”我很无奈，“我也有我的看法，谁对谁错，上帝知道。”

“你还在剧本里妄谈了很多哲理。而且，”他鄙夷地说，“你还让凡尔杜瞧着神父这么说了一句：‘如果大家都不犯罪，那您不是没活干啦？’”

“这里是有点问题，我承认。但是，这只是为了诙谐幽默，我并没有故意侮辱神父的意思。”

“你这样做，会让凡尔杜演得比神父更出彩。”

“你想要神父在人们心里留下什么印象，难道也是一个搞笑的小丑吗？”

“当然不是丑角，可是，你也可以让他也说几句有趣的台词呀。”

“噢，原本是这样啊，”我说，“犯人眼看要被处死了，所以他才故

意装得满不在乎。可神父就不一样了，他必须时刻保持威严，所以只能说稳重的话了。不过，我可以再给神父加上几句台词。”

“还有，”他说起来不依不饶，“神父说：‘愿主饶恕你的灵魂。’凡尔杜却是这么回答的：‘他当然会饶恕我的！因为灵魂是归他管的。’”

“这一句又哪里有错了？”我问。

他重复着说了一遍：“‘他当然会饶恕我的！’他以为自己是谁呀，他怎么有资格这么跟神父说话！”

“这是他的内心独白，你要看了电影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说。

“可是，你这么说是把整个社会和政府都给抨击了。”他说。

“年轻人，你要知道，天底下没有哪个政府和社会是不存在问题的，也没有哪条法令不允许人进行批评，你说呢？”

我和布林先生的助手聊得口干舌燥，然后又和布林先生谈了一会。经过修改，我的剧本终于通过了。老实说，布林先生提出的一些批评倒是很有建设性。到最后，布林先生郁闷地说：“能不能别把那个姑娘塑造成一个妓女的形象？现在的好莱坞电影剧本里，几乎都会有一个妓女。”

他的这句话让我感到惭愧。于是，我答应他回去再修改一下这个情节。

影片拍好之后，我决定先向道德联合会试映。道德联合会一共有二三十个成员，其中包括审查团和各宗教团体的代表。在这次试映过程中，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寂。影片放映完了，然后灯光亮了起来。这时，坐在最前排的布林先生站起来，转身对其他的成员们说：“我觉得没什么问题……我看就通过了吧！”他的语气听起来很迫切。

但是，其他人却都没有开口，场面有些尴尬。后来，又有一个成员说：“我没有意见，可以通过。”可有些人还是在摇头。

布林先生无奈地对他们挥了挥手，说：“好了，没问题了，通过吧！”

大多数人都面无表情地一动不动，只有少数人勉强地点了点头。布林没等大伙儿再说出什么反对意见，就拍了拍我的后背说：“好啦，查理，你可以正式开映你的影片了。”

第二十九章　在好莱坞最后的时日

处理私人的问题占用了我很多的时间，使我鲜有时间去留意联美影片公司的营业状况，直到有一天律师提醒我，公司已经欠了一百万美元的外债。我清楚地记得，联美公司生意好的时候，每年可以赚四五千万美元，但是，作为股东，我只得到两次分红。另外更重要的是，联美影片公司在鼎盛时期零价格持有四百家英国电影院百分之二十五的股票。可能是那些影院做出的一种让步，目的是让我们保证供应他们的影片。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美国影片公司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拥有大量的英国电影院股票。我们在兰克公司拥有市值高达一千万美元的股份。

后来，联美影片公司的股东都像集体商量好一样，纷纷把股票出让给了公司，公司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现金，才收购了这些股票。所以，当我从日常的事务中解脱出来，重新把注意力放到联美上时，我突然发现，负债累累的联美公司只剩下了我和玛丽·碧克芙两个股东，我们各持公司百分之五十的股份。玛丽来信提示我，银行已经拒绝再向联美贷款。对于联美的问题，我并不十分担心，只要拍摄出一部好影片，市场大卖，我们的问题就会解决。这时《凡尔杜先生》刚刚拍摄结束，我对票房的预期很有信心，我的代理人阿瑟·凯利估计它至少可以给我带来一千二百万美元的票房。希望这个愿望可以实现，这样的话，联美不但可以偿还银行债务，还能稍微赚一些钱。

为了检验这部电影的市场反应，我特意为几个朋友放映了这部影片。几个人看过之后，都一起鼓掌，并说这部影片很精彩。他们这样做是发自内心的行动，而绝不是仅仅为了哄我高兴。

就这样，我满怀信心起程前往纽约，准备正式推出这部影片，但是出师不利，我刚到达曼哈顿，就看到了登载在《每日新闻》上的攻击性文章：“卓别林即将来到纽约，为其新片做宣传。我们要在记者招待会让他下不了台，谁让他下定决心准备和共产党人一路的呢？我们就要在会上向他发问，我们要向他发起挑战。”

尽管如此，我还是准备召开新闻发布会。联美公司的宣传人员不

禁为此担忧起来，我对他们说，我不是一个轻易会被吓唬倒的人，不用担心。

按照既定计划，我们第二天早晨招待美国记者们，所以在旅馆里租用了一间大厅。我按时走进大厅，觉得氛围和平时的招待不一样，这些记者看来是有备而来，招待会势必无法顺利进行了。我心中忐忑不安，只好竭力装出很有信心的样子。我说："各位记者朋友们，早上好！有关我的这部影片的问题，以及你们感兴趣的一切话题，你们都可以问，我来回答你们想知道的一切。"

他们听完我的开场白，都沉默不语。为了不冷场，我笑着说："请不要同时发言。"

过了一会儿，一位坐在前边的女记者问："听说你已经加入共产党了，你是共产党吗？"

"绝对不是，"我回答得很坚决，"下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不加入美国国籍？"另一个人问。

"我认为自己是一个世界公民，我不需要改变我的国籍。"我回答。

我的话引起了一阵不满的骚乱，有两三个人抢着发言，其中一个人大声发问："但是，你别忘了你是在美国做生意，赚美国人的钱。"

"不可否认，我的演艺事业在美国，"我笑着说，"关于钱的问题，如果说我是在赚美国的钱，那你们就错了。我们可以算一把明白账，我做的生意是国际性的，票房在欧洲等地也有很高的收入，我的收入中有百分之七十五来自美国之外的世界各地。从这些收入里，美国政府收取了很大一笔税金。所以，我是一个贡献很大、应当受欢迎的外国纳税人。"

我刚说完，从气势汹汹的人群当中，站起了一个人，他激动地说："这样一位艺术家，让我们对生活中的小人物有了如此深刻的了解，他的影片到哪里，哪里就响起一片欢笑声。可是，在场的美国报界代表们，却在一些政治问题上喋喋不休、揪扯不清，故意要激起大家对他的仇视和曲解，民众会作何感想？"

我的脑子乱极了，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便以和刚才一样的强硬口气说："你的话我没听清，你能不能再重复说一遍。"

这时，我的宣传员向我使了个眼色，在我耳边低声道："这个人

是你的影迷，他是站在你这边，他说得都是实话。”我立刻感觉这场招待会已经被我搞砸了，此时更是章法大乱。

此后我更无心去答复那些问题，于是想草草收场，我说：“我原以为大家都想了解一些这部影片的情况，但出乎我的预料，你们把这次招待会变成了政治辩论会，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你们如果继续问这方面的问题的话，我无话可说。”

局势变得对我不利，我还是不敢相信会出现这种结果。在《大独裁者》放映之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是，后来这部影片赚的钱比我之前任何一部影片都多，放映之后，它受到了各界的一致赞扬。想到这里，我不禁对《凡尔杜先生》的成功又鼓起了信心。

记者招待会没有成功，这让我倍感失望，以为这部影片也会受其影响。但是，出乎我的意料，《凡尔杜先生》在纽约连续上映了六个星期，票房极高，这令我极为高兴。但我并没有高兴几天，票房又开始持续低迷。我问联美公司的人员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分析说：“你的电影在开始的三四个星期里总是很卖座，因为这段时间看电影的都是你的老影迷。但是，因为报界这些年一直与你为敌，所以影响了普通观众对你的电影的看法。当你的老影迷看完之后，一般的观众因为受到了宣传的影响，很少看你的电影，所以票房才会先扬后抑。”

“但我的电影能给他们带欢乐，难道他们都不需要幽默和笑声吗？”我很不解地说。

他们递给我几份报纸，我注意到其中一份报纸上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是新泽西某地影院放映《凡尔杜先生》的情况，该州天主教退伍军团在影戏院外举着一些标语牌，上面写着：“卓别林同情共产党”、“把卓别林赶到俄国去”、“不能让卓别林老是反客为主”……

这些反对者的手段无疑起到了打击我的效果，那些大影戏院开始都来订这部影片，但是，美国退伍军团和其他势力集团寄给他们恐吓信。这些人威胁说，如果哪个影戏院上映卓别林影片，他们就要连续抵制那个影院一年，影院们不得不纷纷取消放映。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一些影戏院第一天晚上刚上映这部影片时全部爆满，但是，第二天就停映了。

那些天，我们每天都要收到几份取消订约拷贝的通知信，这段日子对我来说是无比沮丧的，甚至让我对纽约这座城市产生了恐惧感。

祸不单行，有人说《大独裁者》是抄袭来的，并以此对我提出控诉；当时有四位参议员在参议院里公开发言攻击我，报刊与公众都极度仇视我，形势简直糟透了。

很显然，《凡尔杜先生》的票房没能像预期那样达到一千二百万美元。影片的收入还不够填补拍摄的支出和各项费用，联美公司本来已经负债了，这次的票房失败更是雪上加霜。玛丽要求辞退我的代理人阿瑟·凯利，这样可以节省开支，我对她说，我也是公司的股东之一，这件事你没有权利独自决定。我又补充道，如果你解雇了我的代理，我反过来就会解雇你的代理人！就这样，我和这个最后的合作者也产生了矛盾。我最后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当中的一个人主动收购或者出让自己持有的百分之五十的股。但是，玛丽对此毫无反应，我只得作罢，这件事就这样僵着。

后来，一个律师事务所提出要收购这个公司，出价高达一千二百万美元，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啊！他们还说，这一千二百万美元其中五百万美元用大公司的股票来抵偿，七百万美元付现金，这个好消息让我和玛丽都极为兴奋。

我向玛丽建议由我来拿五百万元的现款，她来拿价值七百万的股票，她同意了。经过几个星期的协商，就等着签合同了。我的律师来看我，轻松地祝贺我："查理，马上你就有五百万美元了。"

可是，刚过了十分钟，他又告诉了我一个坏消息："那笔交易泡汤了，玛丽正准备签字的时候，忽然后悔了，她认为自己要等上两年才能将股票出手兑现，而你马上就有五百万元现金，这不公平。"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可惜我们错过了。后来，我们不得不以低于这个价格很多的价钱，把联美公司给卖了。

《凡尔杜先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痛苦，回到加州后，我才逐渐振作起来。然后，我就开始思索新的电影题材。这时候，我仍然对这个国家抱有希望，我不相信美国人民会在政治问题上耿耿于怀，不相信他们要抛弃我。我想到了一个新的主题——爱情。我认为无论是什么样的人，都会喜欢爱情故事。正如黑兹利特所说，与智力相比，情感更能吸引人。因为，爱情对一件艺术作品的贡献更大。所以，这次我的主题是一个爱情故事，剧本的名字是《舞台生涯》，它完全不同于有着冷酷的悲观主义的《凡尔杜先生》。这让我心动不已，一刻都

不能等待，决定立即动手开始工作。

我花了十八个月做《舞台生涯》的准备工作。在选择女主角时，我提出了几个条件：女演员容貌要美丽，擅长演感情戏。这几个条件都极难做到，经过好多次的面试和物色，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最后，在朋友的推荐下，我和克莱尔·布露姆签订了雇用合同。

在这里，我得插几句家里的情况，我在比弗利山的家庭生活又欣欣向荣起来。乌娜在这段时期生了四个孩子——杰拉尔丁、迈克尔、约茜和维奇。家中的一切，在乌娜这个女主人的管理下，都被整理得井然有序，而且让我感到顺手舒畅。周末的时候，我的住处总是宾客不断，都是一些老朋友。

《舞台生涯》的电影拍好了，我对这部影片很是满意，也极有信心。为了验证一下效果，我找来几个朋友搞了个小型试映会。他们看完之后，都说这是难得一见的好影片。我准备在这部戏公映开始后，全家去欧洲待一段时间，乌娜不愿让孩子们过多地受到好莱坞的不良影响，有送他们去欧洲读书的想法。

申请到英国签证的事很不顺利，为此我被一帮移民局的官员围着质询了一大通，问题五花八门，包括我的真实姓名、是否参加了共产党、是否与有夫之妇通奸等，乱七八糟，令人忿恨，我自然是据理力争，毫不相让。在我的不懈抗争下，签证终于拿到了，移民局官员的态度也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个世界永远不乏离奇和惊喜。在离开美国去欧洲之前，我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剩下宣传和公映《舞台生涯》这部戏了。

我不想重蹈《凡尔杜先生》的覆辙，特意在纽约为报界安排了一次午宴，来招待《时代》和《生活》杂志的编辑人员。在这之前，我的名声已经降低到了最低点，我要力挽狂澜难度极大，但我仍然极力想做好影片的宣传工作。午宴将在编辑部的办公室举行。那里四周都是光溜溜的白灰色墙壁，气氛极为冷谈。编辑部的工作人员都坐成一排，一个个神情严肃。他们都剪着短短的头发，看着就像从未谋面的外星人。我为了把气氛搞得热烈一些，竭力和他们表示亲热，并想尽办法逗他们高兴。但是天不遂人愿，那天的菜肴搞得很糟糕，鸡肉做得淡而无味，黄色的肉汁卤起不到任何点缀和调味的作用。结果可想而知，《舞台生涯》的宣传工作没有任何亮点，众多杂志对我的影片

进行了无情地批评，这简直让人沮丧得只想撞墙，但是几份大报纸的态度却是出人意料地积极，他们纷纷刊出对这部影片的好评，这是我欧洲之行的前夕唯一能够聊以自慰的事情。

第三十章　别了，美国

我乘坐的船是前往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我在清晨五点就登船了，这样做的目的是躲避递送法院传票的法警。那些日子我的麻烦不断，尽管都是一些很明显的诽谤我和讹诈我的案子，但是，政府默许了这些小丑的恶行。根据律师的提醒，我悄悄地登上船，把自己锁在舱房里。想走上甲板，就得等到领港员下船才行。我对这种一味的躲避向来不齿，但我还是乖乖地照律师的话做了，这是因为我近年来教训颇多，唯恐这次再会出什么意外。

在汽笛的长鸣声中，船平稳地离开海岸，向前驶入另一片天地。这时的我，本来希望能和家人站在上层甲板上，等候着这个令人兴奋的时刻。然而，我现在极为狼狈，躲在房舱里，从舷窗里偷偷望着外面。

翘首企盼中，“伊丽莎白女王”号终于起航，我没有耐心再等领港员离开船，迫不及待地从舱房走上甲板，闭上眼睛，大口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往回看，纽约高大的建筑群，在水雾中显得异常雄伟，它们离我越来越远，在烟云的映衬下也变得更加美丽。看着它们慢慢地消失在我的视线里，心头不禁涌起一种异样的感觉。

一想到全家人将要回到自己的故乡英国，我就极为高兴。面对浩瀚无际的大西洋，我感到自己的头脑变得无比开阔，似乎自己不会再深陷恶毒的诽谤，也不再是电影界里那个备受争议的神秘的人物。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幸福的人，正陪着妻儿去度假。我和乌娜坐在两张帆布睡椅上，甲板上的孩子们，正在尽情地玩耍着。这种快乐是多么美好啊！

我和乌娜聊了许多，移民局工作人员的亲切态度，难以割舍的美国朋友们……人就是这样，并不是天生容易仇恨，在受到一点点的礼遇时心就会软下来。

对于这次假期，我和乌娜做了周密的安排，除了要回到英国，还要为《舞台生涯》的海外放映做好铺垫工作。所以，我们这次的休假并非为了逃避是非或者单纯享乐，能够把工作与娱乐结合起来，我们

都感到非常满足。但是，事情还是出了点意外。

第二天早上，我们正高兴地吃着早餐。可是，早餐还没吃完的时候，有人递给哈里·克罗克（我的宣传顾问）一份通过海底电缆发来的电报，他当时还没打算看，便随手把电报放进了口袋里。但来人催促着说：“发电人正在等着您的回复。”哈里打开电报，看着看着脸色就沉了下来，看完后，他和众人打了个招呼，便回房舱去了。

过了一会儿，他在他的舱房里把那份电报读给我听。电报是合众社发来的，里面的内容是美国政府让我就一些涉及政治性质和有关道德败坏的控诉进行申辩。此外，美国政府对外宣布，拒绝卓别林再次入境，如果现在回去，就得先到移民局调查委员会去。合众社问我，关于此事，是否发表什么意见。

听到美国政府的这种态度，我有些惊愕。但我很快就恢复过来，这个令人失望的国家，就算不再回去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我很想告诉这些政客：离开那种仇恨的气氛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我现在倒是后悔为什么不早一点离开。对一个公民的正常行为，美国政府如此地妄加阻拦和干涉，同时又把自己伪装成道貌岸然的君子，这让我觉得厌恶和反胃。这时我想到一个问题，不禁害怕起来，我的全部财产还在美国，如果美国政府找个借口没收了它们……要知道，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所以我不能坐以待毙，我向合众社发去了一篇正式的声明，说我手中的再入境签证是美国政府颁发给我的正式法律文件，并不是一张废纸。我肯定会回到美国，对当局提出的控诉做当面的申辩，我希望这个声明能成为缓兵之招，让政府放弃过激的手段。

这之后，我们的船上便热闹起来。世界各地的通讯社，不断地拍来电报，让我就此事谈谈想法。“伊丽莎白女王”号停靠在法国西北部的瑟堡，有一百多位欧洲新闻记者等候在那里，准备采访我。吃完午饭，我在餐室里安排了一个记者见面会，时间是一个小时。对我的境遇，这些记者都表达了同情，但他们的问题让我感到疲惫不堪。

我们在南安普顿下船后，直接坐火车赶往伦敦。这些年来，我一直向家人赞美德文郡和康沃尔郡，这里是我的故乡，我对他们说，这里景色秀美。可是，在这里的丘陵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栋栋形式单调的住宅。乌娜看着这些黯淡的红砖建筑群说：“这些房子看上去都差不多啊！”所以，一路上我丝毫没有重返故乡的喜悦，心情很是

忐忑，因为我不知道乌娜和孩子们对英国的感觉怎么样。

“再等等看，前面就会好起来。”我说，“现在咱们刚经过南安普顿的外围。”我们一路前进，乡间的景色越来越美了，乌娜和孩子们的情绪也被调动起来，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火车到达伦敦滑铁卢站，一大群老乡像以前那样热情地等候在那里，他们对我的感情始终没有改变，还不论我的政治倾向，也不管我是否深陷各类丑闻的旋涡。他们欢呼着向我挥手，我们一行走出车站时，听到有人不时地这样喊：“查理，你是好样的！”听到这话，我心里极其感动，一股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我们住进伦敦萨芙伊旅馆，整理好了一切，我和乌娜一起站在窗前。我指着远处颇为壮观的滑铁卢大桥，让乌娜观赏。这座新建的桥让我想起了童年的时光，但是，现在的我对这座桥已经没什么感觉了。面前是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城市景色，我们就这样默默地看着。我曾经去过世界很多地方，也曾赞叹过巴黎协和广场上那多姿多彩的建筑和迷人的灯火，也曾感叹纽约曼哈顿岛日落西山金光璀璨的街景。但是，浪漫的巴黎和豪气的纽约都比不上我脚下的泰晤士河的景色，因为它的美富含人情味。

乌娜紧张中带着高兴，静静地观赏着远方的景色。她今年二十七岁了，但她兴奋的脸庞让她看起来显得年轻了许多。自打我们结婚以来，她经受的压力比我只多不少，可以说，我们是久经考验的患难夫妻。此时此刻，阳光照在她的乌黑的头发上，闪耀着温柔、知性的光彩。我突然发现她的满头黑发中竟然有了一两根银丝，我的眼睛有些酸酸的，喉咙哽咽着，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的心里即便是有万种豪情，在这一刻都化作丝丝缠绵，为了她，我什么都愿意做。这时，乌娜轻声道：“我喜欢伦敦。”

二十年前，我曾来过伦敦。工业化文明已经把自然之美远远地抛在了脑后，泰晤士两侧曲折、高低的河畔，已经被现代化的工厂所代替。高高耸立的烟囱破坏了城市的远景，至于我经常回忆起来的童年时代的蓝天，已经成为烟垢污染的灰色空间。

我陪着乌娜走出旅馆，在皮卡迪利和莱斯特广场上漫步，随处可见美国的舶来品，午餐柜、热狗摊以及牛奶房，英伦三岛的传统风情和景物已经被扫到角落里了，我不禁钦佩山姆大叔的文化侵蚀力。街

道上，三三两两都是一些不戴帽子的青年和穿着蓝斜纹布裤的少女，我记得，那时的人们上街时都戴着黄色的手套，提着绅士手杖，装饰打扮可不是眼下这个样子。人们的爱好变了，眼光也变了。现在，原来的社会已经被现在新的社会取代了。但你得承认，这是时代在前进。

我想去看看童年时居住过的地方，便雇了一辆汽车开到肯宁顿路，波纳尔三号的那幢房子现在没有人住，正在装修。后来，我们来到肯宁顿路二百八十七号，我和雪尼都曾跟随父亲住过。当我们的车穿过贝尔格雷夫广场时，看到了一些华丽的私人住宅里都点着日光灯，办公桌前坐着一些职员模样的人。其他的住宅也被改建了，新的办公用房像一幢幢长方形的水泥盒子。岁月匆匆，今非昔比，也许这一切都代表着进步吧。

伦敦的生活尽管使我远离了很多非议和刁难，但我仍有棘手的问题急需解决，其中最紧急的是如何把我的钱从美国取回来。我已经被禁止入境，这就意味着乌娜必须飞回加州，从我们在银行的保管箱里取出所有的东西。作为这个家庭的妻子和母亲，她的离去让我们全家为之牵挂，好在她去了十天就返回了伦敦。回来后，她就把此行的经过告诉了我。乌娜到了银行后，职员经过仔细地核对后，对她签字的笔迹有些怀疑，用疑惑的眼神审视了她一会儿，就走开了。说需要请示一下银行经理，乌娜焦急地等待着。最后，他们同意让她打开保管箱。

乌娜银行的事忙完以后回了一次比弗利山的家中。和我们离开的时候一样，家里的树木花草和安静的庭园仍是那样可爱。乌娜一个人在起居室里待了一会儿，家中的一切让她颇为伤感。后来，我们家的瑞士男仆亨利在这里碰到了她，亨利说，讨厌的联邦调查局在我们走后，派人来过两次，每次来都会找到他，不停地盘问他。问的都是一些让人不可理喻的问题，比如：你觉得查理·卓别林是一个好人吗？这家的人是否举办过有裸体姑娘参加的色情晚会……诸如此类的问题。他们把我认定是一个无恶不作的人，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我。亨利向联邦调查局的人说，在比弗利山的房子里，卓别林先生和妻子儿女没有干过任何出格和违反法律、道德的事情，一直过着很安静的生活。但是，联邦调查局的人不信，反而认为亨利是在袒护我。于是，这帮

凶神恶煞威吓亨利，问他到底是不是美国人，为什么帮着我说话，最后，还查了他的护照。

乌娜说，她听了这些事情，马上决定，不论多么留恋那幢房子，也要立刻卖掉它。即使我们忠诚、淳朴的女佣看见她时哭了，也无法再挽留她，她一刻都不想待在这个黑暗的、魔鬼般的国家里。

一些朋友总是很不解地问我，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和著名演员，查理·卓别林怎么会招来了一些美国人的反感和痛恨，而且是那种穷凶极恶的痛恨。主要的原因是我这个人不肯与人同流合污，也不肯低头屈服于一些有势力、有背景的人士。我不是一个共产党，但是我不会随波逐流地受一些人的煽动（哪怕他是什么参议员）去仇视共产党人。所以，我自然就得罪了许多人，在这些人的脑海中，如果不把我拔掉，恐怕会导致广泛的恶劣影响。直到现在，我还依然如此。

另外，说到美国退伍军团这个组织，他们平时也做一些具有真正建设性的工作，比如，制定美国军人权利法案，为退伍军人、军属尤其是军人家庭的穷苦儿童创办福利等，从这个方面来说，我感谢这个组织，因为这些措施都是有益的，也是富有人道主义的。但是，这并不等于我能全盘接受这个组织，这个组织的一些人员正在滥用他们的职权，在“爱国者”这个伟大称号的掩护下，随意地攻击和侵犯他人的自由。这些被特权阶层保护的“爱国者”，正在破坏美国民主政权的基础，他们形成的可怕病毒，正在侵害美国的正义形象，如果不能阻挡他们，他们会使美国演变成为又一个法西斯国家。

还有，非美活动委员会这个组织就是“滑头”的代名词，也是我比较反对的，这一组织的伸缩性很大，打着很多所谓“正义”的幌子，这个组织的人监视着美国公民的行动，限制他们的言论自由。

许多在英国的美国人，他们在此挣钱生活，但并不打算加入英国国籍；我和他们一样，虽然从英国到了美国，但我并不打算加入美国国籍。例如，有一位美籍经理在英国生活，他在米高梅影片公司上班，周薪很高，几千元的样子，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三十五年之久。但是，英国人却从来不介意他没有加入英国籍。

事情已经过去了，也许有人会说，我这样写是不是为了辩解，我可以肯定的回答，绝对不是！我写这本自传动机有很多，但是，绝不是为了辩解。我当时的处境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概括：当时的美国党派

意识鲜明，政府行为漠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的强大政权机器对我极为敌视。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美国的一些公众对我产生了敌意。

《舞台生涯》如期在伦敦上演，首映安排在莱斯特广场的奥狄昂戏院里。我有些心里负担，我的这部影片不是往常的那种卓别林式的喜剧片，观众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在首映之前给英国的新闻界做了一次预映，结果是有好评，也有恶意造谣。造谣的那个记者说，他看完电影就哭了起来，这实在是不负责任。这部电影从拍好到在英国的首映，中间隔了好长一段时间。作为制片、导演，我可以很清醒很客观地评价这部影片。对于自己的影片，我能欣赏其中的一些镜头，当然，也有一些镜头处理得不好。但总的来说，我很欣赏自己的这部影片，这并不是在自我陶醉。

《舞合生涯》在伦敦的首映的时候，玛格丽特公主也来了，这次初映的收入全部捐给慈善事业。影片公映后，虽然新闻界的反应比较平常，但影片的上座率却打破了当时的世界票房纪录。在美国，它受到了抵制，即使是这样，这部影片在美国的票房收入也超过了我以前拍摄的任何一部电影。

我和乌娜准备去巴黎。动身之前，在上议院，斯特拉博尔吉男爵设宴招待我们。在宴席上，我坐在赫伯特·莫里森旁边。他是工党的领袖，也是一位社会主义者，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他大肆宣扬原子武器在国防安全中的作用。我对他说，原子防务对英国来说意义不大，作为一个岛国，英国总是一个易受攻击的目标，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得到了印证，那个时候希特勒恐怖的V型火箭成为英国民众的噩梦。一旦受到原子武器的进攻，还没等我们发动报复式的反击，这个狭小岛屿内的所有有生力量就已经化为灰烬。所以，我认为，严守中立是英国国防的最主要政策，不要卷入野心勃勃的军事大国之间的争斗。不论在常规武器时代还是在原子时代里，我相信绝对的中立不会遭到破坏。但是，我这样一番苦心不会得到莫里森这样政客的首肯。

对于莫里森的叫嚣，竟然有许多聪明人都表示同意，他们均认为原子武器时代最有效的防护就是同样拥有大量的有威慑性的原子武器。比如，索尔兹伯里勋爵就是这样，我当面向他陈述我对原子防卫

政策的不满，但我在说完后，我明显地感觉到，勋爵对我的话很是不屑。

我深刻感觉到，一些政客和军人，正在误用科技成果，制造具有强大破坏力的武器。在很多时候，这些人的道德责任感和博爱精神是极端缺乏和不够格的，如果任凭这种情况继续的话，有朝一日，世界上所有和平民众的命运都会被这些人掌控。假如这些人真的掌握了大部分权力，他们迟早会再次发动战争，到时候人类都有可能毁灭。但是，却没有人行动起来，去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曾对我说：人有一种很好的习惯，那就是永远保持自己的求知欲。我对他说，人们只关注追求知识进步带来的好处，却忘了在许多情况下，科技进步带来的后果。奥本海默博士对我的看法深表赞同，他补充说，有些科学家只顾研究科学，好像陷入了宗教狂热症一样，他们不顾周边有什么人，在发生什么事。他们把自己认为的求知信条等同于道德标准，他们相信新的发现永远是有益的。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有些时候，科学的发展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危害。

卡莱尔说过，要想让我们生活过得更好，必须靠人们不断的积极有益的思考。然而，现实中的人们，只有处在极端严重的不利条件下，才会迫不得已地去思考。

自从乘船远离美国的那一刻，我的生活开始多了一分轻松和愉悦，少了一分沉重和忧伤，而且经常会受到特殊的礼遇。我到巴黎和罗马的时候，像一个凯旋的英雄一样，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在爱丽舍宫，法国总统樊尚·奥里奥尔亲自设午宴招待我们，法国政府还授予我荣誉军团军官勋章。没过多久，英国驻巴黎的大使馆也招待了我们。法国戏剧电影作家协会主席罗歇·费迪南先生，聘请我为该会的名誉会员，为此事，他还专门给我写来一封信：

亲爱的卓别林先生：

您驾临巴黎引起了轰动，我想没有人会不理解这种轰动，假如有人这么说的话，那么他就不会很好地鉴赏人类的价值，更不会理解我们为什么这样尊敬您，他们也就是藐视您近四十年来带给我们的快乐。这些人不会正确评价您赐给我们的众多的喜悦，

更不会衷心感谢您的教诲。我至少可以这样认为，这些人是完全身在福中不知自。

您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您的成就可以和那些取得了最辉煌业绩的名人媲美。

现在，许多人都被称为“天才”，但大部分都名不副实。我们认为，只有像您这样的人才配得上这个称号：他不但是一位了不起的喜剧演员，也是一位为人诚恳和气度非凡的人，同时也是一位电影制片者、一位作家、一位作曲家。所有这些优点，在您身上完美地展现出来。不仅如此，您朴实的人品使得您的人格更加纯粹，更加崇高。那些遭到和您同样不平境遇的人，在您这里受到启迪，感受到了温暖。您赢取了人们的崇敬，引起人们发自内心的爱戴；这些并不仅仅因为您个人出众的才华，更因为您激发的那种情感，那是对无数个喜欢你的观众的爱。

我们观赏《舞台生涯》这部电影的时候都笑了，那笑是发自内心的；我们留下了真诚的那是眼泪，但我们觉得，这眼泪明明就是你送给我们的礼物。

只有为人类造福而享有的盛名才是有意义的，我们觉得您就是，您的盛名是有价值的、是长久不衰的。您的演技之所以成功，不是依靠机灵耍巧，而是因为您演出时完全不受教条的束缚，潇洒自如，率真随性。许多人曾经体验过的那些苦难、快乐、希望与失望，这一切，你都会理解，那是因为，您自己也遭受过类似的难以忍受的痛苦。所以你才能和观众的心相通，您在表演中同情这些受伤的人，安慰这些受伤的心灵，让他们在笑声中暂时忘却了痛苦。这种表演给人以慰藉，给人以力量，虽然它也许并不能真的治愈人的心灵创伤。

您的表演真的很神奇，使我们时而哄堂大笑，时而突然痛哭。能够练就这么一套神奇的本领，您曾经为此一定付出极大的代价吧，我们虽然没能亲眼目睹这一切，但我们可以想象得出您本人一定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正因如此，那些琐碎的小事，您才能细致入微地表演出来。您从自己的生活片段中汲取来的这些小事，深深地触动了我们。

您的童年生活您到现在都没有忘记，在您的作品中，您忠实地反映出那个时期亲人的故去，那个时期自己品尝到的悲哀。您现在的所作所为，就是想让别人带着希望努力地生活，不想看到他们再遭受您那样的痛苦。一般的人出名后，就不愿意谈起自己

的过去，但您不同，虽然成名了，但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出身，您也从来没有因为一朝得志而忘了您那悲惨的少年时代。

其实，我倒认为，不忘记从前的艰苦磨难反而是您最大的优点和最重要的财产，这也是大家为什么会那样崇拜您的原因之一。毫无疑问，您看起来始终和观众心连着心，您那些细致的表演，引起了他们内心的共鸣。我脑海中不禁想到了一幅关于您的画面：您为了拍摄出富有人情味和有教育意义的作品，您综合了自己几方面的才能，将编剧、表演、导演等工作合而为一，为这一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您的作品不受理论的障碍，甚至极少受到技术的障碍，也是因为上述的原因；这也是您的作品博大精深的原因。每一个观众在观看时，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您好像一直和他们在一起一样。

您还做了一件很少有人能做到的事，那就是您让一些批评者对您也无话可说，不仅如此，他们甚至也被您的作品深深地打动了。虽然如此，也仅限于不批评您，对您的作品，他们还一句好话也没说，但他们心里面是这样想的：您不但表现出了费多的热情，还发挥了老式舞剧的可爱之处。实际上您确实具有这些特点，不仅如此，虽然您并没效仿任何人，但您还表现出一种米塞的风度，当然，您有您自己的风格，并不是在模仿他，这也是您能成名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模仿是没有生命力的。

今天，是我们戏剧电影作家协会值得高兴的一天，因为您来到了巴黎。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屈尊来协会一趟。您是属于我们这个协会的，我们十分希望您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更好地表达对您的尊敬之情。作为一位喜剧演员，您的表演是第一流的。在您的影片中，故事都由您亲自编写，片子由您来导演的，甚至音乐也是由您作曲。

我们这里有一些法国作家、电影剧本作家、戏剧作家、制片人、作曲家，他们都急于和您见面。以不同的方式，所有的这些人都知道这工作是光荣的，但同样地，这工作是艰苦的，也是需要作出自我牺牲的。像您一样，他们也都怀有这样的抱负：要同情那些无端受害的人，要在作品中描绘那种失去了爱的恐惧；要让他们看到生活中的种种悲欢离合，要让他们满怀希望，用和平与友爱弥补生活中那些受损的地方，要使民众感动，获得快乐。

谨向您表示感谢和诚挚的问候！

《舞台生涯》在法国放映时，法国政府的内阁成员以及一些社会名流都去了，各国大使也去了。不过，美国大使没有去。

法兰西戏剧院待我为上宾，为了我们的到来，法国一批一流的艺术家在戏剧院特地上演了法国戏剧家莫里哀的经典剧目《唐璜》。那天晚上，戏剧院灯火通明，法兰西戏剧院的学生们穿着十八世纪的学校制服，高举着明堂的烛台，列队欢迎我和乌娜，他们领着我们，慢慢来到上层楼厅，那里是高朋满座、美女如云。

在罗马，总统和部长们分别接见了我，并给我颁发了勋章。在《舞台生涯》的首映式上，发生了一件好笑的事情。美术部部长向我提了一个我认为很古怪的建议：绕过前面围观的人群，从后台的门进去。我想，好多人都在戏院前面等着，就是为了见我一面，我从后面进去，他们知道了岂不是很失望。抛开这一点不说，从正门进去也是起码的礼貌，因此我没有同意部长的建议。但部长并没有放弃，脸上的表情有些奇怪，他耐心地重复说，从后边走可以省却我许多麻烦，不过，他就是没有说为什么要走后门。但是，我还是坚持走正门，我不能远离我的观众，他见我态度坚决，便不再坚持。

那天晚上，我们乘的轿车驶近戏院，戏院外面灯火辉煌。我发现人群离得太远了，都在马路那面，被绳子围成的围栏远远地隔开了。我走下轿车，来到路当中，在弧光灯的照耀下，我面带微笑，学着戴高乐的姿势，竭力装出潇洒大方的神气，挥起双臂。突然，从我身边飞过去十几个东西，我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就在相关人员的搀扶下跑进了正门。回头看了一下，地上堆着二十来个卷心菜和番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不禁这样想。过了一会儿，担任我翻译的意大利朋友伤心地说了一句话：“在我们的国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真是令人伤心啊！”

后来，我知道了那些闹事者的身份，他们是一些年轻的新法西斯主义者。不过，从他们扔（番茄和卷心菜）的武器可以看出，他们只不过是为了借机示威罢了，并非真的想用暴力手段来对付我。示威者中有四个人当场被捕，因为警察那晚来得非常及时。警察问我，向不向那些示威者提出控诉。我说：“他们还都是年轻的孩子（大多是十

四岁到十六岁的青年），不用了。”

《法兰西文学》的主编路易·阿拉贡在我去罗马之前来电话说，让·保罗·萨特和毕加索想要见我，我便邀他们三人到了一个幽静的地方，最后选择了在我旅馆的房间里共进晚餐。负责我影片宣传工作的哈里·克罗克知道这件事后，惊骇地叫道：“你要是和他们三个见了面，咱们估计又得像在美国一样，因为政治问题而不断受到诽谤和攻击。”

“哈里，别担心。这里不是美国，是欧洲，何况这三位都是世界名人。”当时我有个想法一直隐藏在心里，那就是我决意不再回美国，因为我还有一些财产留在美国还没脱手，便没向其他任何人吐露过此事。只要是同阿拉贡、毕加索和萨特聚会一次，就和阴谋推翻西方民主制度差不多，这也是哈里害怕的原因。哈里在担心中还特地留下来了，在他的纪念册上，他还让这几位贵宾签了名。

三人中只有阿拉贡会说英语，对那天晚上的宴会，我不禁有些担心，如果交谈完全依靠翻译，那会是很费劲的。

毕加索的样子挺滑稽，看起来怎么也不像个画家，倒很像一个杂技演员或者小丑。阿拉贡的脸轮廓分明、人长得很英俊。从萨特的长相上，判断不出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有一张圆脸，但是，接触之后，你可以发觉他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他的身上有一种精明和敏捷的美。那天晚上，毕加索在宴会散后领着我们到左岸去，那里就是他的那间画室。和毕加索相邻的那户人家，在门口挂了这样一个牌子：“本屋不是毕加索画室，上面一层才是。”

我们走进顶楼的一间屋子，屋里的陈设十分寒酸，就像个库房。房梁上的一根铁钉上挂着一只光溜溜的灯泡，借着灯光，我们看到一张快要散架的铁床，一只破旧的炉子，铺满了灰尘的旧油画堆在墙脚边。毕加索捡起了一幅塞扎纳的精品给我们看，接着又捡起了另一幅，然后又是一幅……就这样，在尘土飞扬中，我们至少看了五十幅名画，当时，我恨不得把所有的画都给买下来，目的是给它们换一个正常一点的陈列地点，而不是在垃圾堆里。毕加索的这座小屋中，无疑像埋藏着一座金山一样。

第三十一章　定居瑞士

从巴黎和罗马回来后，在伦敦住了一段时间，我开始把寻找一所住宅列入了计划日程，我想找一栋公寓或者大一些的房子，我们一家人更好地安顿下来就行了。一个朋友劝我去瑞士定居，而我更喜欢留在伦敦，因为我们不知道瑞士的气候是否适宜孩子们生活，而且我们还担心我们手里的美元是否能自由兑换成瑞士法郎。

经过和乌娜商量，瑞士的自然风光还是吸引了我们，所以，在一丝忐忑不安的心情下，我们收拾行李，带着四个孩子来到了瑞士。我们的暂时落脚点选在了洛桑，住在紧挨日内瓦湖的湖滨旅馆。那时，已是秋天的季节，万物萧瑟，但是眼前的湖水和远方的群山仍是那么秀美。

接下来的四个月，我们都在寻找一所合适的房子。乌娜已经怀孕数月，那将是她的第五个孩子，她说出院后不愿再住旅馆，想舒舒服服地在自己家里休养。时间不等人，我停下手里的工作，四处去找房子，最后来到了沃韦小镇稍北的科西尔村的德班别墅，我决定就是它了。这所大宅占地三十七英亩，附带一片果园，里面除了一些普通的水果外，还有大颗的黑樱桃和鲜美的青皮李子。另外还有一个菜园，里面种有草莓、玉米和非常鲜嫩可口的芦笋。后来，无论我们外出到了哪里，每当这些蔬果成熟挂枝，我们总会从老远赶回来品尝。别墅的阳台前面是一片占地五英亩的草坪，四周郁郁葱葱的大树衬托着远处的湖泊和群山。

最初，我来到这么气派的一所住宅，内心有点儿胆怯，不知道我的收入是否足够各类开销。善解人意的房东告诉我如果住下来一共得多少费用。我算了算，自己的钱还是够的。这样我们就住进了有一千三百五十人的科西尔村。

住的地方安顿好了，我又聘用了几个助手：比尔·尼埃太太担任我的英文秘书，这本书的原稿就是经她之手打出来的；雷切尔·福特小姐为我们一家人安排生活，后来她当了我的总管家。

瑞士以说法语为主，我们来到德班后，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我们

才真正适应了当地的环境。孩子们暂时都在科西尔村的小学校上学，要他们在各门功课中都使用法文，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担心，在他们的心理上，这会产生不好的影响。但是，孩子们的适应力比大人要强，美丽的自然环境也给了他们足够的灵感，时间不长，他们就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了。看到他们融入了瑞士的新生活中，我们都很高兴。甚至孩子们的两个保姆凯凯和平妮也因为自己的工作，开始用功地学起法语了。

到了瑞士后，我们开始主动斩断自己和美国的一切关系。但是要抹去我们身上的美国印痕，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首先，我回到美国领事馆，要回了我的再入境签证，并对领事说，我已决定不再回美国了。

“查理，难道你真的不再回来了吗？”

“不了，”我说话的语气似乎是在道歉，“我越来越老了，那些无谓的麻烦我再也招惹不起了。”

领事很理解我的心境，他没再发表什么意见，只是说：“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你能回来，随时都可以，凭借普通签证入境就行。”

我笑着摇了摇头，说：“我打算在瑞士定居。”我和他友好地告别了，美国的事基本算告一段落。在我的内心深处，还有一丝不甘，我想迟早有一天，他们会主动邀请我回去。

乌娜知道我放弃了美国国籍后，也打算这么做。一次趁着去伦敦的机会，她联系了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他们说，办完这个手续，至少需要四十五分钟时间。“岂有此理！”我对乌娜说，“怎么会用这么长的时间，这是无理的刁难，我和你一块儿去。”

到了大使馆后，我大声地嚷嚷，仿佛要把以往受过的各种侮辱和诽谤都发泄出来。正在我发泄自己愤怒的时候，一间办公室的房门打开了。一个人走出来说：“查理，请您和尊夫人进来谈吧！”

这个人看出了我的来意，所以他第一句就说：“我们这也是在保护一个公民的正当权利，履行询问的手续，就是为了确认，一个美国公民是不是在头脑清醒的时候，已经经过了全面慎重的考虑，才要放弃他的国籍，如不是这样，将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尽管我的气还没有消，但不可否认，他的话是有道理的。

这人年纪不小了，是一个年近六旬的人，他说话的时候带着一丝

责怪的神气。他还说：“1911年，在丹佛的旧王后戏院，我看过你的演出。”

这也是我的一个影迷，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心中的怨气当时就平息了，我们开始心平气和地交谈，说起了许多以前在美国的往事。

时间很快过去了，手续都办好了，我们友好地道了别，我的坏脾气冒犯了使馆的人，乌娜也颇觉尴尬，让我的心情有些低落。

有一次，我和乌娜去伦敦办事，苏联大使馆通知我们说，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要在克拉里奇旅馆举行一个宴会，并说想见见我。我们到达宴会所在地，旅馆的休息室里已经人山人海，大家走来走去，个个神情激动。在人群中，一位俄国使馆的工作人员找到了我们，陪同着我们一路挤了进去。我看见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也正要从对面走过来，他们也是一路挤着，脸上一副厌烦的表情，看那样子，他们正要走出门去。

即使在拥挤的人群中，赫鲁晓夫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幽默感。陪同我们的人，在他正向大门口挤去的时候喊道：“赫鲁晓夫！”但是，赫鲁晓夫以为我还没有到，或者又是别的什么人要求见他，就挥手表示拒绝。于是陪同我们的人又喊：“是查理·卓别林！赫鲁晓夫同志。”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立刻停了下来，转身看到了我，表情由刚才的厌烦变成了高兴。在拥挤的人群中，我们相互介绍了自己。因为我听不懂俄语，赫鲁晓夫叫来一个翻译。他对我说，你演的电影，苏联人都非常喜欢看。随后，他用伏特加招待了我们，虽然乌娜觉得这种酒的味道不错，但我总觉得它特别的辣。

因为人多，费了好大的劲才腾出了一小片地方，我们一同拍照留念。外面的吵闹声让我们不能好好地交谈，赫鲁晓夫提议说：“我们还是进屋谈吧！”激动的人们很快发觉了我们的意图，紧跟着我们不愿让路。最后，在四个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才来到了里边的一间屋子。一进屋，我们不禁都松了一口气。我想，终于可以平静地说一会儿话了。

这时候，一个美国记者进来采访，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赫鲁晓夫先生，昨天晚上，我听说您的儿子离开学校进城寻欢作乐去了。”

赫鲁晓夫露出了半是恼怒半是无奈的神情，他回答：“我认为人

都需要轻松一下，出去玩一下没什么大不了的。况且我儿子读书很用功，他是个很规矩的青年人，做工程师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我们还没谈几句，有人对赫鲁晓夫说，哈罗德·史塔生（美国政客、律师）先生正在外面，准备拜会您。赫鲁晓夫转身对着我，开玩笑地说：“在你面前，您不介意我接见一个美国人吧。”

我笑了一下，说“请便。”

史塔生夫妇与葛罗米柯（苏联外交官，时任驻英大使）夫妇一起走了进来。赫鲁晓夫和我说，自己要失陪一会儿，但时间不会太长，请我等一下。然后，他便向屋子角落里的史塔生和葛罗米柯走去。

我和葛罗米柯夫人打招呼，问道：“这次离开英国后，是不是要回俄国。”

她说：“去美国。”

我说：“可是，你们在美国已经住了不少时间了。”

她有点儿尴尬地笑了：“我喜欢那个地方，所以不会很在乎。”

我说：“我不觉得美国有这么好！但美国的中西部地区的确是我喜欢的地方，比如，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我觉得住在这些地方的人，才是真正的美国人，他们代表了真正的美国传统和美国精神。所以，我认为这些地方，比美国的代表性城市纽约或着太平洋沿岸的洛杉矶和旧金山更能代表美国。”

这时，坐在一旁的史塔生夫人激动地说：“卓别林先生，听了您的话我真是高兴！您可能不知道，我和我丈夫就是明尼苏达州人。”她笑着继续道：“您的话让我很高兴，谢谢！”我想，她肯定认为我会借机对美国大发一通牢骚，因为我之前遭受到了不平的待遇和恶语中伤。不过，我并没有像她想的那样。其实，我自认为本人没有那么大气，也没有那么容易忘却一些人和一些事，但不论怎样，在这种场合下，向史塔生夫人这样一位和蔼可亲的太太发牢骚是不对的。

我看赫鲁晓夫和那几个人谈话一时半会儿结束不了，便打算告辞。赫鲁晓夫看见我要离开，就离开史塔生过来送我们。我和赫鲁晓夫他们告别时，看到史塔生正背靠着墙，漫不经心地向前瞅着。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没有向史塔生告别。我觉得只有这样做才合适，史塔生一定也希望我这样做。史塔生的目光告诉我，这是个可爱的人。

这次来伦敦，我们还是一如既往地住在萨芙伊旅馆。与赫鲁晓夫

见面的第二天晚上，在旅馆的烤肉餐厅里，我和乌娜正准备用晚餐，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和夫人来了。自1931年之后，我就一直没有收到过丘吉尔爵士的来信，也没有见过他。《舞台生涯》在伦敦放映后，这部影片经我同意后，被联美公司的分销办事处的人拷贝了一份，送到丘吉尔爵士家里，我很想让我的这位老朋友第一时间看到我的新作。过了几天他寄来了一封信，说他很喜欢这部电影，向我表示感谢。

丘吉尔爵士径直来到我们的桌子前，用不是很满意的口气和我打了招呼。那时乌娜正准备回房间去，我赶紧笑着站起来把她介绍给他。

乌娜还是告辞走了，我独自陪丘吉尔爵士和夫人一起喝咖啡。丘吉尔夫人说，她在报纸看到了新闻，是关于我和赫鲁晓夫会面的。

“我和赫鲁晓夫，一直相处得很好。”丘吉尔爵士说。

但我始终觉得丘吉尔爵士有什么不高兴的事。自从1931年以来，世界政局风云变幻，虽然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以个人之力给予了英国人民以勇气和信心，并因此成功地抵抗住了纳粹军队的进攻，成功地开辟第二战场，最终拯救了大英帝国。不过，我认为他那篇“铁幕”演说并没有任何出彩之处，反而加剧了冷战时期的紧张和对抗。

后来大家转移了话题，聊起了我的《舞台生涯》。丘吉尔爵士终于说出了那件让他不高兴的事，他说：“查理，为了祝贺你的影片成功，我两年前曾给你写过一封信。你一定收到了吧！”

“是的。”

“能不能问一下，你为什么不回信呢？”

“爵士，很抱歉。我当时以为，那封信不需要回的。”

但是，丘吉尔爵士也不是好对付的。“哦！”他不高兴地道，“我还以为你是对我有意见呢。”

“这怎么可能呢！”我还想继续说那封信的事，但他打断了我。

“不过，你的影片我还是很喜欢看的。”

没想到他这样的一位伟人，却会把一件小事记在心里，和老朋友为了一件两年的前的小事怄气，让我觉得有些好笑。但我和他在政治上的看法始终不同。丘吉尔继续道：“我来找你谈谈，并不是想瓦解英帝国。”

他说的帝国的“瓦解”，是指一些阴谋者利用那些广告宣传、电视和电影，此外，还有汽车和拖拉机、科学发明、交通速度的便捷等，以此来瓦解英国。而并不是指政治活动、革命军队、共产党宣传、暴力煽动等。

回到瑞士后，我收到尼赫鲁的一封信，是蒙巴顿勋爵夫人把我介绍给他的。勋爵夫人认为，在许多地方，我和尼赫鲁的政见是相通的。蒙巴顿勋爵夫人说，尼赫鲁去洛桑参加大使年会将路过科西尔，建议我们有机会的话可以见一次面。尼赫鲁在信中说，有没有时间和他碰一次面。就这样，我去了洛桑。

尼赫鲁身材和我一样矮小，这令我很是意外。一个待人亲切、安静内敛的妇女在他旁边，那就是他的女儿甘地夫人。尼赫鲁感觉十分细致，思路清晰入微，待人既富于感情又严肃、敏锐。刚开始还不怎么习惯，但后来我们就熟悉了。临走时，我邀请他去家中吃午餐，他很高兴地答应了。尼赫鲁在洛桑办完事后，我们一同坐车离开洛桑到我家去。一路上，我们聊了许多，他说蒙巴顿勋爵在任印度总督期间，为印度的独立作了许多贡献，并高度赞扬了他的努力。

我问尼赫鲁，在意识形态上，新生的印度将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他说：“不论选择哪一条道路，都是为了印度的人民。”他接着补充道，“印度已经开始执行一项国家经济的五年发展计划。”在狭窄陡峭的乡间公路上，他的司机以每小时七十英里的速度飞驰。他在车行途中一直高谈阔论，汽车一会儿一个急拐弯，一会儿又一个急刹车。老实说，尼赫鲁的话我并没有全部听进去，因为我一直在提醒那个司机减慢速度。汽车常常会发出尖利的刹车声，巨大的惯性推着我们向前撞，可是尼赫鲁只顾说着印度，根本没注意到这些。谢天谢地，后来汽车终于停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上，我也松了一口气。

朝鲜危机的爆发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大家都以十分焦灼的心态注视着那个东北亚半岛的局势。一天，中国在日内瓦的大使馆打来了电话，问我是否可以为中国总理周恩来放映《城市之光》，当时周恩来正在日内瓦，他是决定朝鲜半岛战与和的关键人物之一。

周恩来总理第二天邀请我们去日内瓦和他共进晚餐。总理的秘书在我们临出发前打来电话说，因为会议上出现了点意外，总理阁下可能会被一些事情耽搁住，晚餐时我们不必等他，他晚些时候就会到。

没想到我们到那里时却看到了周恩来，他站在寓所的台阶上，正在等着我们。我急于想知道会议上发生的事件，便问他可否告知到底出了什么事。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亲切地说：“卓别林先生，以和平的方式，问题在五分钟前就解决了。”

以前，我听过许多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在三十年代，中国的共产党人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绕过雪山和草地，到了贫瘠的中国西部。军队在转移的过程中分散了，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下，他们又被组织起来。最后，他们在北京建立了新中国。共产党也赢得了六亿中国人民的爱戴和拥护。

晚宴期间，周恩来向我讲了一件事，说的是毛泽东胜利进入北京城。当时，有一百万的北京市民在街道上欢迎他。在北京宽阔的广场上，他们搭建起一个大台子，高十五英尺，一百万人刚看到毛泽东从台子后面登上阶梯时，就掀起潮水般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当时，毛泽东已经征服了整个中国，他看到眼前的景象后，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周恩来曾经和毛泽东一起参加了那次横贯中国东西部的著名长征，受了不少的苦，甚至差点儿得病而死。当我看着他那张永远精神饱满而又英俊的面庞时，不禁为他依然保持着年轻和沉着感到惊奇。

我说，在1936年的时候，我去过中国的上海。

“是吗？”他想了想说，“很可惜没见到你，那年我们刚好成功转移到西部偏远地区。”

我开玩笑的说：“您现在再也用不着走那么远的路了。”

在那一次宴会上，我们相互敬酒，喝的是中国的香槟。我在祝酒时说，希望中国越来越美好。当然，我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但是，我衷心地祝愿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都能够过上美好的生活。

我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问这样的问题：你想念美国以及纽约吗？实际上我真的不再想念那些地方。在我心中，美国和纽约都已经不是我所怀念的那样了。在那里，随处可见规模庞大的工业托拉斯，铺天盖地的报刊、电视和商业广告，这和我心目中的美国生活方式完全格格不入。我需要的不是那些高耸入云的大厦、闪光灯不断的招待会以及觥筹交错的晚宴，而是另一种具有朴素的人情味的生活方式。我想到美国，就会想起它那完全商业化的社会。

为了完全结清我在美国的全部资产，我又不得不多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美国政府要求我把《舞台生涯》一片在欧洲所赚的钱交纳所得税，而且计税的年份要从1952年我到欧洲的时候开始，一直到1955年。虽然他们1952年就拒绝我重返美国了，但他们认为我在这期间仍旧是美国居民。我的美国律师说，我没有机会（当然我也不愿意）回到美国去就此事出庭辩护，所以在法律上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我已经结清了我在美国所有的资产，对他们的要求，我以后可以完全置之不理了。但我不想惹麻烦，经过咨询律师，我还是交纳了一些税款，比我实际应付的多出不少，但也比他们索要的少了许多。

也许，从此以后我和美国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但我并没有想象中的轻松。我们在美国的女用海伦知道我们不再回去时，寄来了一封内容如下的信：

亲爱的卓别林先生和夫人：

自从你们走了以后，我写过许多封信给你们，但是，我并没有把它们寄出去。除了为自己的亲人，自你们走后，我从来没有为谁这样伤心难受过，感觉心里堵得慌。我受不了他们这样不公正地对待先生，他们这些过激的行为令我很是不满，但我却无能为力。后来，听说你们真的不回来了，我们含着泪收拾了你们的东西。我真的很伤心，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缓过来呢。我也知道，你们也是迫不得已，但我还是不希望你们这样做。夫人，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请您和先生别卖这幢房子。我知道我说的话没多大用处，但我还是希望你们能留下这座房子。

这是个多么可爱的地方，这里所有的房间，虽然里面都只剩下地毯和窗帘，但是都有它们各自不同的可爱之处。一想到别人将要住进来，我心里就说不出的难受。要是我自个儿有钱该多好啊，我会把它买下来，但我知道，这是空想。也许，将来有一天你们会回来的，我会一直盼望着你们回来。夫人，就写到这儿吧，带我向先生和孩子们问好。

您忠实的海伦

海伦的这封信，我和乌娜看后，内心感到无比的辛酸。

男仆亨利也给我们寄来一封信：

亲爱的卓别林先生和夫人：

有一件事让我很快乐，前几个星期，有一次内部放映您的《舞台生涯》，朗塞尔小姐请我去看了。先生的哥哥雪尼和他夫人也去了，还有朗塞尔小姐和雪利，一共有二十多人。我想一个人静静地边看边想，便坐在后排很远的地方。在看的时候，我笑的声音最大，这影片太好了，但是，没人注意到我也一直在流泪。很奇怪，这部影片从来没在洛杉矶放映过，我从来没看过这么精彩的电影。里面的音乐也极为好听，无线电里广播过好几次《舞台生涯》里的音乐，但电台那帮人根本没提到那是先生作的曲。

先生和夫人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习惯外国的生活，不过，我听说孩子们喜欢瑞士，非常高兴。瑞士是世界上最老的共和国，八月一日是它的独立纪念日，和美国的七月四日一样。这是个美丽的国家，那儿有世界上最好的学校。总而言之，像瑞士这种保守的、繁荣的国家已经极为少见了。我出生在瑞士东部的加仑，还在那里服过两期兵役，我有一个兄弟在圣加仑，还有一个兄弟在伯尔尼。1918年，我离开那儿去了南美洲，后来，我曾经回去过两次。

祝：合家幸福！

亨利敬上

亨利的信写得虽然有些文法不通，但是我看了后足足开心了一整天。

我在加州的工作人员，在我还没正式脱离美国以前，都能正常领到薪水。但是，我也没办法一直这样支付下去，我在瑞士定居后，只能解雇他们。我拿出了八万美元，作为遣散费分给他们，就算是我对他们以前辛勤而诚恳工作的感谢。

在我即将结束自己的跌宕起伏的人生旅程之时，回首往事，我清楚地看到，我很幸运地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宠儿。我受到世人最广泛的关注，有许多人喜欢我，同时，也有人恨我。但这个世界是公平的，它让爱我的人远远多于恨我的人。我的一生有不少时间是在逆境中渡过的，但我相信逆境迟早会过去。正是领悟到了这一点，我对那些一帆风顺的事就会感到很愉快，对经受的那些厄运也不至于过分的悲哀。我不懂什么人生哲理，也不喜欢为生活制订过多的计划。我只知

道：为了生活，不管你是智者，还是愚人，都要努力进行工作。我也不像那种霸气的人思想很坚定，我有时候想法甚至是前后矛盾的；有时候，我甚至会为一些灾难无动于衷，反而为了一些小事感到烦恼。

我现在的生活更加充实了，我还想再拍几部电影，我现在的创作欲望很强。我忙着编写剧本，但我不一定自己去演，我的孩子们中间有几个很富有表演才华的演员，他们可以在我的指导下去演。慢慢老去的我并没有停止工作，我现在信心很足，因为我发现我还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不能同意叔本华对快乐的看法，他说快乐是一种消极的状态。快乐是什么？最近二十年来，我终于体会到了，我有一个那么完美的妻子。说到乌娜，不得不提到我们的爱情，纯粹的爱情是美丽的，因为我们无法表达出来。她性格深沉而又恬美，和她在一起我是幸运的，对我来说，她永远提醒着我该往哪儿走。有时候，我们会一起到外面去散步。当我落在她后面时，我就会看到她拢向后面的黑发露出几根银丝，看到她娇小而又挺直的身躯，那一刻，一种怜爱之情从心底油然升起。我对自己说，感谢上帝，把她带到我身边。

带着这种快乐和感恩的心情，我经常坐在德班别墅的阳台上，看着太阳慢慢落下，湖面的远处水天一色。碧绿的湖水旁边是大片青青的草坪，远处是峰峦起伏的群山，这庄严而宁静的美让我毫无杂念地沉浸其中。